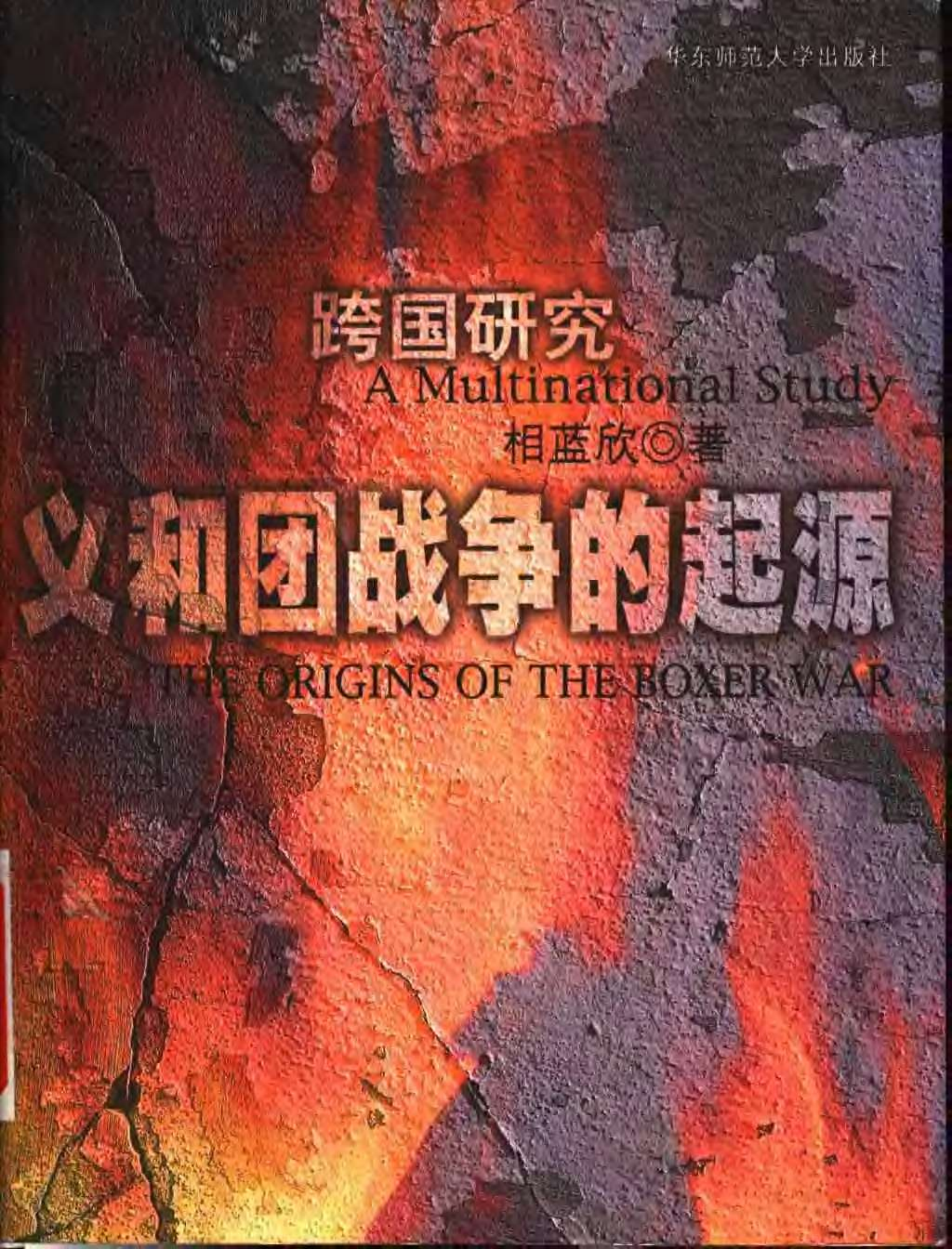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国研究
A Multinational Study
相蓝欣◎著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WAR

内容提要

这不是一部寻常的历史著作。

作者以其深厚的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的学术素养，选择了一个似已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义和团问题"作为本书题材，却开拓出一片为前人所未见的宽广领域。本书对"义和团问题"的解读既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解，而是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的互相联系入手，从思想与行动的互动中去探索义和团战争的真谛所在。

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卓越能力。本书是在广泛搜集并掌握中、英、法、意、日、俄等各国珍藏的档案文献，包括大量的私人信件与手稿的资料基础上，以面壁十年的功夫从事写作，因而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反映百余年前义和团战争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包含晚清中国内部的帝党与后党、维新与守旧、满族与汉族、民间与朝廷、教民与拳民以及南北清流之间乃至于朝廷内部各种派系之间的交合与纷争，体现了更为宏大背景之下的晚清政府与各国列强、各国公使与朝廷内部、儒教与洋教、民间社会与教会、各国的中国通与外交官、各国外交官与各国政府以及洋教中的新教与天主教，乃至列强各方之间的纵横交织与抗衡。

凭借作者二十余年海外游学的体察与历练，本书也远非仅是一般地记录上述诸种矛盾的展演过程，而是把渗透于列强对华政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活灵活现地加以揭示与比较，因而不仅使得本书读来饶有趣味，而且大有裨益于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西洋各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思想背景与行为特征。

由于本书在2003年初由Rotledge公司出版发行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影响，作者得以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的资格。


ISBN 7-5617-3617-7

定价 39.80元

相蓝欣◎著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相蓝欣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ISBN 7-5617-3617-7

Ⅰ.义… Ⅱ.相… Ⅲ.义和团运动-研究 Ⅳ.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113779号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著　　者　相蓝欣
策划组稿　周　洁
责任编辑　张哲永
责任校对　李雯燕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865537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开
印　　张　25.75
字　　数　337千字
版　　次　2003年12月第一版
　　　　　2003年12月第一次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7-5617-3617-7/K·239
定　　价　3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相蓝欣

1956年生于南京，祖籍北京市。1974年初到1978年初在安徽淮海郭庄大队插队落户四年整。1978年2月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获欧洲和北大西洋关系研究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美欧关系专家戴维·卡莱欧教授。曾受保罗·肯尼迪教授邀请去耶鲁大学任国际战略与安全项目奥林博士后研究员。在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一年，并在美国任教五年。现任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曾出版英文著作三部：《重建帝国主义远东》(1995)、《毛泽东的将军们》(1998)和《义和团战争的起源》(2003)。此外还发表过多篇关于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文章。目前在美国担任基辛格讲座教授，期间写作《中美关系中的民主理念的历史哲学思考——兼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优势》一书。

前　言

我为何要再写一本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呢？关于这个题目的流行著作自1900年以后已出了不少。同时，针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似乎已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回忆录和日记加以广泛的叙述。尽管如此，一个多世纪已经逝去，关于义和团战争的来龙去脉仍未被说清楚。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很少有像义和团事件那样受到了如此众多的神秘主义者和学术界专家们的青睐。保罗·柯文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很有趣的著作：《历史三调：义和团作为一个事件，一种经历，以及一个神话》，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与他的争执在于我认为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在所谓“义和团研究”的学术领域内，迄今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强调所谓“义和团暴动”，而对“义和团战争”本身则多由流行作家，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来关注。

这个题目花了我近十年的功夫。在研究了9个国家，再加上中国的史料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要使传闻式的这段历史成为信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上的理解与语言上的能力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主要障碍。我本意是在2000年，即义和团事件百周年之际

出版一本关于它的全史。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卷入这一事件,而大量的一手原始材料几乎未被学者动用过,要寻找起来和梳理清楚颇为困难。在本书中,我只能将此事件叙述一半,而且未必很成功,也就是说我只讨论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即到1900年6月20日为止,当时清廷已决定宣战,臭名昭著的围攻使馆事件亦已开始。当然,恰恰是这场战争的起源最扑朔迷离和令人费解,战事本身倒是相对有迹可寻,不难理解。

我对"义和团研究"这一领域中迄今为止的中外著作的最大不满是文化上的偏激观点充斥其中。英美世界的著作往往倾向于贬低他国他民族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同样,他国的著作也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多有诋毁和中伤。那些在围攻使馆事件中幸存的外国人则多在战后相互指责对方应对这一悲剧负责,传教士们抱怨外交官的傲慢,而外交官却反过来指责传教士是祸源之首,驻华新闻记者对双方均有微词。那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者们用"黄祸"眼光来看这一事件,而那些受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影响的中国研究专家则反唇相讥,指出"黄祸论"实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总之,在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至今缺乏一种超脱、公平和跨国度的著作。

当然,我们不必要对文化偏见的存在大吃一惊。在英语世界里,早在1901年伦敦街头就上演过木偶活报剧,将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描绘成一个懦夫。而1959年好莱坞的经典巨片《北京五十五天》,将查尔顿·赫斯顿(饰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和大卫·尼文(饰演英国公使)描绘成55天使馆被围中仅有的两位英雄。在非英语国家里,让·马必尔的流行名著《北京的血红色的夏季》(1978年法文出版),或者赫尔曼·施莱伯的小说《北京的受害者:克林德公使之死》(1936年德文版)则对英美人士的表现不敢恭维。这类文化偏见在各种文字的数百种回忆录里,以及大量的当事人战后出版的日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的研究,相当的一批所谓"日记"是在使馆解围后添加甚至杜撰的,只要这个事件的来龙去

脉仍然是个谜,个人情感仍将占上风,文化偏见的怪影将挥之不去。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存在于几种因素之中,首先是满清政府在睿智的恭亲王奕䜣去世后出现内在的权力失衡,其次是外国传教士与普通中国人民的矛盾不断加深。再者,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加剧,特别是后起的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进取姿态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清王朝的"百日维新"以悲剧和光绪皇帝被软禁而告终,年轻的锐意改革的光绪虽未被黜,但帝号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旱涝灾害肆虐华北地区,而谋立光绪接班人的危机开始危及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以上这些因素中当然都含有义和团战争起源的线索。但是一般人都忽略这样一个史实:义和团战争是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即由一个国家向全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是常例,但中国以一国向世界所有的强国开战则是特例。这种做法非但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期历史不合拍,而且与中国古老传统的联盟外交哲学相脱节。此外,还有史无前例的围攻使馆行动,这与以礼仪之邦闻名的中国传统伦理大相径庭。

1900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的起源有好几种假设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基本思路。

第一种基本思路在西方最流行的是文明冲突论。按照这个理论,义和团战争是中国落后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落后与先进、"中世纪"对抗现代化,以及异教徒抵制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要欣赏一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画家茹尔根·科那克福斯的代表作《黄祸》便一目了然。

然而,1900年战后的几十年中,这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者的地位大降,"黄祸论"也开始失去市场,学术界对此论已不能接受。遗憾的是,我认为"黄祸论"又开始以其相反的面貌出现,很多学者为了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论而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上,从而忽略了对这场战争起源的研究。由于义和团运动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官方学者得以搜

集和编纂大批原始档案史料，从而大大刺激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原本令人生畏的"拳匪"得到平反昭雪。应当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本身完全不足以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多卷本著作《剑桥中国近代史》未能就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提供任何系统的解释。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在中国山东义和团研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基本上不提这个事件的关键一段历史，即1900年的春夏时期。英国学者维克多·普赛尔的《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在义和团究竟是反清还是保清的问题上则模棱两可，不敢下判断。美籍华人切斯特·陈的著作《义和团大悲剧》虽然讨论了中方的某些考虑，但其所用的史料属最早由翦伯赞等人搜集的一批，早已过时。同时，陈的书对列强各国政府的外交及内政更缺乏了解，基本没有采用国外的史料。上述的这些最主要的研究都是局限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接触面太窄，当然难以有说服力。我以为，义和团运动本身很难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相比之下，列强各国政府和它們的驻华使节在这段时期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种种误解恐怕更能说明问题。

显而易见，围绕这个事件的种种谜团能够一直吸引学者和流行作家是不足为怪的。流行作家的兴趣主要在外国人如何经历和看待这个事件，而学者则往往从关注中方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历史事件。这种约定俗成的"分工"尽管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实际上正是多年来持续制造新的谜团的根源所在。其实，整个义和团事件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流行作家特别热衷于将中方的态度和行为神秘化，中国政治深不可测，玄妙无解，这样就比较容易将1900年的中国描绘成一种典型的野蛮落后的国度，从而为文明人如何在野蛮环境下生存的主题提供了最佳历史场景。学者则为义和团的神秘主义的行为和信仰如醉如痴，而对外国人在华的行为不感兴趣，认为与其研究的主题无甚关联。因此，迄今为止，除了极少几部关于双边关系的著作对两方面均有涉及，例如爱德蒙·威勒的《英国、中国与反洋教运动》，其他还没有出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全面研究的成果。事实上，对

中外的两个视角绝不可以分开来研究。如果将两块拼板合二而一，迷雾即可散去。其实，清政府在传统上对任何农民起义必定是要镇压的，而这一传统最终被鼓励义和团运动的奇怪政策所取代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清廷最高当局在1900年春夏之际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取向也无神秘可言。从逻辑上可作如下解释：清廷违反传统的内外政策的行为只能由外来因素，也就是说由外界的威胁所产生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祸论"还不能轻易地被忽略，"黄祸"情感确实对列强驻华使节和各国的政治家有重大影响。它能解释德皇威廉二世的变幻无常的行为，它也能解释日本政府和外交官在同样面临"黄祸论"的心理困境下只能有意识地保持沉默，并在1900年上半年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在阻止战争爆发的过程中难以发挥作用。它更能证明列强的对华外交实际上由欧洲大国政治所左右。如果仅将反"黄祸论"的情感变为赞扬义和团运动的工具，很多立足于文明冲突的学者的研究就偏离了正题，他们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而未能解决义和团战争的起源问题：(1)由于存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单一起因的论点而不能自圆其说；(2)前后逻辑上不能一以贯之。

第二种基本思路是将战争起源直接怪罪于在华的当事人，主要是指传教士和外交官。但这种流行观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传教士过于嚣张，而外交官则愚昧无知，此论在流行作家中相当普遍。特别见诸于乔治·斯泰格、保罗·克力门斯、维克多·普赛尔、彼得·弗莱明、里查德·奥康诺尔、埃格伯·基泽和让·马比尔等人的著作中。诚然，在义和团事件的初始阶段，传教士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究竟是何种作用还缺乏细致的研究。围攻使馆事件的幸存者之一，奥匈帝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阿图尔·冯·罗斯通医生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说过："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参加义和团。"尽管如此，将战争起源的总体完全归罪于传教士是不公平的。

外交官的作用常常被流行作家们大加鞭笞和嘲笑。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外交官对即将到来的仇外大屠杀毫无预感，对现实的危险视而不见。因此，那些对危险有高度警觉的人们的看法，特别是对

传教士的看法反而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与上述对传教士的批评一样不着边际,因为清政府并无仇外大屠杀的恐怖计划。应该说,任何政府对外开战的决策都是政治与外交的决策,历史上绝少有政治领袖视开战为儿戏的。就义和团战争而言,清廷的开战决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多国决策过程之间的互动,列强政府和清廷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列强在华外交官的行为却与"谨慎"两字相去甚远。

第三种基本思路源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这个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武装冲突。此论在过去的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曾十分流行,在西方也有不少支持者。当然,如果义和团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此论或可成立。事实正相反,这场冲突以中国为一方,而以西方主要列强为另一方。更有甚者,中国的一些教科书曾将它描述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英勇壮举,而清廷迫于人民压力也进行了反抗,这种说法则根本站不住脚。

上述三种大的思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均假设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义和团运动最先启动战争风云,满清权贵为仇洋而开战,而列强之间的争斗也难免一战。因此,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以为,将这三种说法糅合在一起,就可全面地解释这场战争了。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同时向11个列强宣战?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清廷大规模屠杀洋人计划的任何证据。因此,清廷在和战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只能说明宣战者太弱而不是太强。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开战的最后关头仍然举棋不定,开战决定实际上是被动的。此外,正式开战诏书所用的奇怪的语言也与国际公法不合:既不指明某个国家,又不说明开战的具体原由,只是抽象地宣布中国愿意接受外人的挑战。所以这个宣战诏书最多只能算是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外交照会,尽管其措辞极为强硬。笔者认为,此诏书本意在恫吓与威慑,不在开战。

当然,慈禧太后究竟如何默许"拳乱"的政策很难被证实,因为她没有留下私人文件,但这不等于说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永远是个不解

之谜。我们可以围绕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寻找证据以力图得出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解释,慈禧本人和大批的高官都曾确认清廷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受假想的外来威胁所主导。问题是这种说法是否可信?[①]

在联军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主导思想是恢复在华的均势。即使是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敢抱有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的档案史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列强曾计划以瓜分非洲的方式来肢解中国。此外,各国政府在1900年上半年都力图阻止中外冲突的升级,那么如何解释这一时期的失控局面,从而在华北导致一场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荒谬的战争,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多年来,我努力下工夫掌握这场战争中有关国家的所有语言,但未能掌握俄文。在此,我深切怀念一位年轻的俄国史学家、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维克多·布特涅夫斯基。他几年前不幸英年早逝。十年前我俩同是耶鲁大学的奥林博士后研究员,受保罗·肯尼迪教授邀请参加军事史研究项目,在纽黑文我们同住的公寓里,维克多向我介绍了大量的俄文文献,这些文献对本书的第二部,即战争过程本身更有用,我在此对维克多的友谊和耐心表示深深的怀念。

本书作者相蓝欣:

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

(英国 Rout Ledge Curzon 出版社 2003 年 2 月出版)

---

①关于慈禧太后和其他清廷高官的说法与详细分析,见本书第十一章。

序　幕——神秘的车队

1917 年秋。中国甘肃的古丝绸之路上,一支神秘的大车队出现在地平线上。几十匹骆驼拉着大车,车上装满行李,坐着妇女和儿童。在车队前开道的是一乘八抬大轿,显示出一个迅速消失的时代的舒适与安逸。在车队最后,一辆无篷大车拉着一具巨大的棺材,一队武装士兵在两边护卫。这个奇怪的车队在中国大西北的荒野上投下一条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子,与如血的残阳相互照映。

更奇怪的是,整个车队插了许多雪白的方块旗帜,上书"回京就医"。而中央的一面大旗赫然写着一个大字"端",在"端"字两旁有中华民国各地方政府的通行大印。大道上的过客不免驻足观望,但无人知晓"回京就医"是何官何人,更无人懂得"端"字为何意。

没有人意识到车队的主人曾经一度是中国最有权势,也是西方列强最为痛恨的男子,这正是端郡王载漪(1856—1922)。西方人认为他是 17 年前爆发的义和团战争的罪魁祸首。端郡王是道光皇帝的孙子,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兄。端郡王在上一世纪末突然成为权倾一时的重臣只有一个原因:他的福晋是桂祥的女儿,而桂祥是西太后慈禧的弟弟。端郡王从小好吃懒

做且刚愎自用,西太后对他并不喜欢。只是到了他42岁时,由于清朝廷在1898年"百日维新"后产生的政治危机,才突然把他推向了最高权力中心。当时,西太后迫于清代传统不能废黜光绪帝,尽管光绪之母是西太后的妹妹,她还是在1900年初决定立准皇储——"大阿哥"。入选"大阿哥"的正是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所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端郡王载漪获取了包括军机大臣和主管中国准外交部——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等核心位置。重权在握的端郡王一开始就劝说西太后将洋人全部赶出中国,因为洋人对这种变相的废帝阴谋持敌对态度。这就是义和团战争和围攻使馆这个举动的起始原因。战后,八国联军统帅部确认端郡王为祸首,并根据《庚子协定》,于1900年末把他流放到大西北。

眼下,清王朝已被铲除,流放中的端郡王载漪决定携家返京,这是1900年以来的第一次。载漪申请回北京的借口是就医,并将长子溥僎的遗体运回祖坟安葬。溥僎是一个月前去世的,他不是1900年的那个准皇储"大阿哥"。准皇储"大阿哥"溥儁是端郡王的次子,当时被流放在蒙古。端郡王此行的卫队由前清武卫军军官刘连成率领。刘连成当年供职于《庚子协定》中确认的另一名罪魁、董福祥将军的部下。董福祥以仇外出名,围攻使馆即主要由董军所为。在八国联军北京占领军统帅部的罪犯名单上,端郡王和他的排名最前,有所谓"端一,董二"之说法。然而,这两人都未被处以极刑。董回到老家甘肃固原,数年后即去世。

令端郡王载漪又惊又喜的是,北京的民国政府非常合作,回京的批文很快下发。更使他吃惊的是,沿途一路上,端郡王和其家眷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些名为民国政府的地方大员都以邀请端郡王赴宴为荣,并挑选上等旅馆供其一家居住。对共和政治茫然无知的端郡王当然不能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现象之下的潜流。其时,正如当时的知识界精英鲁迅在其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守旧派对毫无章法的民国政治厌烦已极,而对大清王朝的怀旧情绪则在各地滋长。同时,激进的知识分子正在鼓吹"新文化"运动,以开1919年五四运动之先

河。这个运动的要旨在于复兴民族主义,排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端郡王载漪既代表了旧式政权,又代表了排外心态,自然成为管理不善的共和国的那些新贵们的座上宾。

但是,这些新贵中的某些人对端郡王载漪的心态还不了解,有些过分热情的举措反倒使端郡王难堪。在甘肃省会兰州,某将军居然以当时时髦的西式大菜宴请端郡王。端郡王绝不肯动刀叉,明说不愿吃"洋"菜。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忍受"一下现代交通工具。到了河南境内,大车队已筋疲力尽,北洋政府为他们派了火车专列。据一直陪同端郡王的孙子毓运的回忆,小孩子们第一次坐"洋火车"都兴奋不已,既干净,又稳、又快。而老王爷则一路上闭目养神,一听到孙儿辈夸赞火车就大怒。

端郡王载漪的到来成了大新闻,京城震动。列强驻华使馆纷纷表示抗议,坚称北洋政府违反《庚子协定》。新闻记者云集王府周围,指望一睹端郡王风采,或拍上张把照片,甚至奢望得到一次采访机会,端郡王自然一概拒之。但是北京政府现在开始感到不快,京城谣言四起,说老王爷回来要发动兵变,推翻共和。几周后,曾为清廷大臣的现任大总统徐世昌派京城警察署长登门拜访,劝说端郡王住进中央医院,这样才好向中外说明"回京就医"的合法性,同时也可避开欲来造访的不速之客。住院期间,列强外交官还是进行了强行探视。据毓运回忆,端郡王载漪将满族长辫散开,遮住面部,端坐太师椅上一言不发。受此刺激后,端郡王决定携眷重返甘肃,徐总统如释重负,立即把原定的端郡王的流放费用提高百分之五十。

5 年后,端郡王载漪客死宁夏,终年 66 岁,身后留下一个入不敷出的大家庭。载漪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和回忆录,这样,20 世纪中国的极重要的一页也随着载漪入土安葬而掩埋了。[①]

---

①主要内容参照爱新觉罗·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总第 120 辑)。

目　录

第一章

清廷朝政的失衡

一、一个亲王之死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䜣（1833—1898）一病不起，溘然辞世。在病榻上，他告诫他的侄儿载湉，即当今皇上光绪："当心广东小人。"恭亲王所指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此两人是激进的改革家，正在促使光绪帝发动一场旨在改革政体的维新运动。这场触及大清朝政的全面改革当然是风险很大的。恭亲王还留下一份书面遗嘱，明确告诫光绪要尊重西太后，保国强兵，抵抗外侮，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朝廷的旧制，不要轻易放弃祖宗传统。[①]

恭亲王奕䜣之死是一个大事件，慈禧太后立即赐谥号为"忠"。丧礼5天，朝政暂停。然而，恭亲王奕䜣之死的政治意义则大大超过一个老年重臣的消失。当时在华的两位西方观察家在1911年发表的著作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满族权贵从此失去了一位老资格的代表人物，这位人物多年来以其智慧指导朝政。他在阻止排汉、排外的政策中施加正面的影响……很有可能，如果恭亲王当时尚未去世，拳乱之事恐不会

发生。"[②]

然而,年轻的光绪帝不愿听从伯父的忠告。13天以后,下诏发动维新,其改革的范围之广,不能不在清廷引起震撼,同时也受到守旧官僚的激烈反抗。对改革派来说,恭亲王奕䜣之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以康梁为首的广东激进派和光绪帝一样认为恭亲王奕䜣是改革的一大障碍,改革领袖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曾把矛头直指恭亲王:"皇上堂陛尊崇,既与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邸议政,亦与士夫不亲。"[③]

康有为的主要助手梁启超,在多年后曾回忆道:"恭亲王屡谏,谓祖宗之法不可变。"[④]

在"广东小人"的推动下,变法的条文虽多,虽彻底,但速度可能太快,太急于求成,因此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敏感性。一旦不能对付守旧派的抵抗,维新派在绝望之际,开始酝酿推翻慈禧太后的计划。维新派没有军权,轻易取信于袁世凯。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心腹荣禄将军的门徒。而维新派要清除的守旧官僚的名单上,荣禄居首,所以袁世凯立即将此计划告诉荣禄。慈禧太后一向以果敢刚毅著称,绝不会坐以待毙。她立即发动政变,用荣禄的军队逮捕维新党人,并将光绪帝软禁起来。所谓"百日维新"的流产,对皇帝本人和他的雄伟事业都是一场悲剧。

尽管恭亲王晚年日趋保守,他一直受到中外政治家和观察家的尊重。他是推动中国内外机制走向现代化的先驱,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准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直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对国际事物不屑一顾。恭亲王奕䜣判断力敏锐,政治上务实,外交上现实。此外,他还具备了两种素质:诚实和皇族血统。这两种素质使他成为有实效的政治家和与贪得无厌的洋人打交道非常有说服力的外交家。近四十年在清廷决策和谋略的经验中,恭亲王不仅是推动古老的大陆式帝国向海洋式的国家体系靠拢的主力,而且是朝廷中惟一能将不同派系加以整合的政治家。清廷内部矛盾重重,满族权贵与汉族士大夫的争斗不断,而官僚体制内部尚有

以地域划分的"南派"、"北派"之争。在外交上,更是各怀心思,争吵不休。

更为重要的是,恭亲王奕䜣恐怕是当时中国能使其横蛮的嫂子西太后既敬又畏的第一人。恭亲王知道慈禧虽无皇家血统,但野心太大,他一直担心慈禧的权力欲会给朝政带来麻烦。他当然同意孔夫子的说法"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人权力太大,对恭亲王的祖先创下的江山有害无益。据说在退居田园的十年中,恭亲王奕䜣曾私下里说过"祖宗的江山会断送在'方家园'"手里。[5]

恭亲王奕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生于 1833 年。成年以前,他一直是道光最喜爱的皇子。皇室家族,子女成群,竞争也很激烈。奕䜣很早就显示出做皇位继承人的素质。少年时期,奕䜣学习刻苦,为人诚实,自律极强。不像大多数的皇子,奕䜣真正地喜爱阅读经书,并特别爱好历史和军事,更不用说政事。他的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以皇家血统的标准,他的诗作颇佳,在世时已发表过诗集《乐道堂诗钞》,这些诗反映出他的情感和创造力。他的书法遒劲、有力,资深的士大夫阶层对他的字赞赏颇多。[6]在军事操练中,奕䜣也常有过人之处,不啻是为继承皇位锦上添花。很长一段时间里,朝中之人都认为皇储非奕䜣莫属。但在道光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中,情况发生了变化。

奕䜣的上书房师傅是一位严厉的四川人,叫卓秉恬。卓秉恬在朝廷上从不转弯抹角,迎合权贵,朝中佞臣对他多有微词。[7]在师傅的影响下,奕䜣在性格上也是诚实和直率的。这种直率性格对奕䜣继承皇位的前途却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中间发生了两件事,致使奕䜣的皇储梦落空。第一件事发生在道光皇帝死前的第二年,即 1848 年春,上命皇子随驾校猎于南苑。四皇兄奕詝猎技不如六弟奕䜣,便问计于其师傅山东人杜受田,杜师傅授意其藏拙示仁。当奕䜣意气风发,猎获颇多时,才发现四皇兄未发一枪一矢,坐观他人骑射,皇上当然不会不注意到。当道光询问时,奕詝即称:"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8]皇上大恸。校猎本来就有考察皇子之意,道光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他的祖父乾隆皇帝在弱冠之年即猎一熊

而受表彰，而其父以白莲教起义攻入宫廷大内时与歹徒英勇搏斗的出色表现，而成为嘉庆皇帝。道光自己10岁时亦获一鹿，也是登位的先兆。校猎不是仅仅比试武功，更重要的是检验个性。

奕询本正宫娘娘所出，其母与道光帝感情颇深，但不幸早殁。此次校猎，牵动皇上的情感，自然对皇四子呵护有加。道光帝不知奕询受他人指点，在逢场作戏。

另一件事发生在1849年。某日内侍忽传圣旨，召皇四子和皇六子入对。奕询的授读师傅杜受田知道皇四子口才不佳，出计让他侧重于“表孝心”。而奕䜣的师傅卓秉恬则告以“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是，奕䜣的侃侃而谈远不如奕询的痛哭流涕更得道光帝的欢心。道光皇帝究竟在何时决定了皇储人选尚不得知，但肯定与这两件事有重大关系。[9]

清代皇帝立储有个奇怪的传统，不以长幼为序，而以优劣论选，所以皇上立储往往在病榻上宣布。一般情况下，立储遗诏藏于寝宫的一只锦盒之内。此时，道光帝虽仍酷爱皇六子，但已决意立皇四子。道光病重时，召见重臣，打开锦匣，竟是一匣两谕，与传统体例不合。第一谕为“立皇四子奕询为皇太子”。第二谕为“立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一匣两谕足见道光的用心良苦，既册立了皇太子，又试图给奕䜣提供特殊的保护。因为只封奕䜣为亲王，而不封其他皇子，说明奕䜣的特殊地位。历史上不乏由于争位引起的兄弟阋墙事件，封奕䜣为恭亲王，也有告诫之意，希望他能恭慎行事。[10]

1850年初，道光帝终于归天，新皇上定帝号为咸丰。一开始几年，尽管有道光帝的特殊安排，咸丰对六弟仍不放心，让他参与的都不是机要，而是礼仪性的事务。恭亲王克守尽职，终于获得咸丰的好感，被委以重任。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迅猛，危及大清江山，咸丰帝急需一个可以信赖的至亲领导军机要务。于是，在1854年恭亲王奕䜣以军机处领班大臣之尊入主中枢。军机处源于雍正王朝（18世纪20年代），一开始是内廷的一个非常设机构，后发展成在内阁和六部之上的核心部门。此时，恭亲王奕䜣不过21岁。

几年后，兄弟俩因恭亲王生母的封号问题闹得不快，[11]但恭亲王的政治生涯并未由此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至热河并于1861年病逝该地。咸丰死后，八位顾命大臣试图篡权，将恭亲王排除在决策圈外。于是，恭亲王与6岁的同治帝的生母那拉氏联手发动了"祺祥政变"，一举成功。那拉氏虽被封为皇太后，号慈禧，但按传统只能"垂帘听政"，因而朝政由恭亲王替6岁的同治帝"代行"。作为摄政王，奕䜣开始行使大量的实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恭亲王的领导下，清帝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国内，奕䜣敢于起用汉人地方大员对打垮太平天国运动，赢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汉族地方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也积极参与了改革运动。在对外关系上，恭亲王采纳了建立一套新的外交机制的建议。1861年建立"总理衙门"，将过去分散的涉外机构统一起来。

太平天国战争使恭亲王奕䜣大开眼界，洋枪对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他意识到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训练方法确实优于中国，当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恭亲王领导了一场旨在军事现代化的洋务运动。

然而，小皇帝同治一天天长大，开始对叔叔的大权在握心存不满。更令人沮丧的是，恭亲王奕䜣逐渐感到年轻的慈禧太后并不满意礼节性的垂帘听政，而想独揽大权。小皇帝同治成年后不大喜欢管理朝政，到处寻花问柳。对西太后来说，这未必是坏事，正好给她提供了干预朝政的机会，所以对同治帝的表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十几岁的同治常在夜间抛开紫禁城中的众多妃嫔，而到京城中的八大胡同去寻欢作乐。[12]

恭亲王奕䜣对同治帝的行为深为焦虑，但也束手无策，因为带同治帝微服出游的正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载澂与同治帝的关系非常密切，给皇上介绍了宫墙之外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不久，两位年轻人都染上了性病。同治帝于1875年驾崩，年仅19岁。载澂也于10年后去世，时年28岁。这样，在从政22年，辅佐两代皇帝之后，恭亲王奕䜣再一次担负起辅佐第三个皇帝的重任。而1875年的慈禧太后

在政治上已羽毛丰满，新皇帝的候选人由太后自己挑选。同治帝无子嗣，慈禧若从其下代皇亲中挑选，自己就成了太皇太后，按例不能再垂帘听政。于是，西太后执意在同治的叔伯兄弟中选定一人，这就选到了年仅3岁的载湉。载湉是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譞之子，而其母正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那拉氏。新皇帝号光绪，据载恭亲王曾以不合传统体制为由屡谏，但遭否决。[13]在这件事情上，14年前"祺祥政变"所建立的权力分享体制已告结束。数年后，即1884年，慈禧更以中法战争失利为由，将恭亲王赶出了权力中心。实际上，中方在军事上表现甚佳，但议和上吃了大亏。印度支那从此沦为法国势力范围，而恭亲王则成了替罪羊。

导致恭亲王被解职的直接导火线是他与西太后在滥用权力的问题上的争执。1880年9月某日，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给太后的妹妹送御膳房食品。李三顺未带出宫通行证，与禁宫卫队发生争执，李撒泼把食物扔在地上并诬告卫兵。西太后听信李三顺谎言，坚持要处死卫兵。朝廷的法律专家均认为卫兵是在执行公务，而西太后却不愿让步。恭亲王率整个军机处与其抗争，终于获胜，此事却埋下了与西太后交恶的种子。[14]1884年的中法战争不啻给慈禧太后赶走恭亲王提供了机会。此后，奕䜣有十年之久闲处朝政之外，过着退休的生活。

从1884年到1894年的十年中，慈禧太后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将恭亲王赶出中枢之后，慈禧太后得以随心所欲地干涉朝政，并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儿皇帝光绪虽在1875年登基，但直到1885年以后才开始参与军国大事，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朝政日益失去内在的平衡。奕䜣的政治风格与太后的大相径庭，奕䜣注意选拔人才而太后喜用听话的佞臣。在奕䜣的论文集《乐道堂文钞》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政治哲学的特点，很多文章都涉及人才问题。其中一篇题为《为政人才为先折》说道："不有治人，何以有治法乎？""夫政者，纪纲法度之所由布也，一人统之，一人不能理之。故有主治者以综其要，必有辅治者以分其司，使主政而不得其人，材智之不逮，措置之失宜，必致礼乐

不兴，刑罚不中，而民亦无所措手足。”[15]

恭亲王奕䜣对朝中意见的分歧并不惧怕，因为他能将各派思路进行有效的整合。他对此有信心，有手段，尽管有时不能成功。此外，恭亲王奕䜣的为人和学识受到各派的尊重。慈禧太后则注重意见一律，以她的意志为准。所以，恭亲王对大胆起用汉族士大夫无所顾忌，而慈禧太后却偏信满族权贵和太监。

1894年，恭亲王奕䜣在十年的非自愿退休生活后，突然奉诏返回权力中心，此时他已是61岁了。当时，清王朝面临深度的危机。东邻小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增长，已跻身于列强之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非但进入了主导世界政治的海洋体系，而且开始按照西方强权政治的思路来制定其外交政策。为了冲出传统的内向型的亚洲国际政治模式，日本必须要像其他列强一样寻求领土扩张的途径。此时的日本帝国，还不能说有全球的野心，但其欲做亚洲第一强国的企图已昭然若揭，古老虚弱的中国自然成了日本扩张的主要目标。

日本帝国出击的第一个目标是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朝鲜是日本的近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对日本的安全有最大的关系。由于俄罗斯在远东的迅速扩张，控制朝鲜便成为日本的首要任务。这时俄国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快修到太平洋沿岸，日本政府认为时不可失，便于1894年夏利用朝鲜东学党人起义为借口，挑起了甲午战争。一开始，日本声称不会阻碍中国军队镇压东学党的行动，但当中方派兵进剿时八千名日军同时登陆，中日战争由此爆发。

清朝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分歧很大，慈禧太后本意主和，但举棋不定。大部分枢臣和光绪本人都主战，朝廷身陷两难困境。主和则必割地赔款，在一蕞尔东洋小国面前受此屈辱不能不对内地民心产生影响。打下去，中国军力大大不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战败了，同样面临割地赔款。此先例一开，其他列强必仿效日本，大清王朝的命运终将岌岌可危。

皇上和帝师翁同龢均竭力主战，但前线失利战报接踵而至，主战

派不能不面临缺钱、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和军队素质差的现实。在这一紧急关头，慈禧太后被迫接受不少枢臣让恭亲王奕䜣重新出山的建议。恭亲王当然深知太后主和，让他出山是为了寻求外交解决办法。恭亲王多年管理总署，外交经验丰富。恭亲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寻求愿意在中日之间斡旋的列强政府，他甚至向英国政府提供二千万两银子以期结为同盟，英国自然毫无兴趣。[15]此计不成，恭亲王考虑，割地赔款已在所难免，但要在谈判桌上少吃点亏，一定程度的军事抵抗还是必要的。

但恭亲王奕䜣不同意帝师翁同龢绝不能言和的观点。他在选强将上前线的同时，也开始遴选和谈代表。尽管前线指挥官有的临阵脱逃，有的指挥失当，中国陆海军还算英勇顽强，但最终不敌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朝廷内部的分歧和决策行动的迟缓也是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久，日本大获全胜，提高和谈价码。日本不但要求结束朝鲜对中国的所有义务，而且要求控制台湾和辽东半岛。

对恭亲王奕䜣来说，甲午一战是奇耻大辱。尽管这不过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对外关系中的又一次失利，但此次的对手是一个亚洲的近邻。从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来看，奕䜣更加担心的是朝政的明显失衡。已退休十年的奕䜣发现他已无力整合不同派别的意见分歧，他此时的心情沉重，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他知道他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

二、八旗权贵与汉族士大夫

朝廷内部的矛盾是第一种矛盾，也是最微妙的一种，它表现在八旗权贵与汉族士大夫官僚之间的关系上。八旗制度是为满人入关前为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那批战将而建立的。八旗有三种，即满旗、蒙旗和汉军旗。满人和蒙古人在打天下时早已是合作伙伴，而汉军则是那些在入关前与满人合作的明朝将领。1644年后，这三族给予世袭军人的待遇，每族划为八旗，因此共有二十四旗，约十六万人之

多。男性旗人生下来即是军人，有固定的国家口粮，成为朝廷官员，旗人不一定要走科举这一条路就可当官。应该说，前几代的八旗人士工作是勤奋的，后来的八旗子弟则玩物丧志，疏于工作和学习。除了军事训练，很多八旗子弟沉溺于酒肆茶楼，养鱼，赏鸟，斗蟋蟀，或到戏园听戏，京城的老票友多是此类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尚未达到识字作文的水平，却也成了朝廷命官。

汉族士大夫官僚与八旗子弟俨然不同，对他们来说，通往仕途之路只有科举一条。汉人从小就开始苦读四书五经，但在科场上大多数人仍是名落孙山。士大夫一般工作勤奋，教育程度高，但仕途上仍不免被八旗出身的高官所左右。此外，满汉不能通婚，靠裙带关系获得升迁亦不容易。汉族士大夫对八旗子弟的傲慢无礼和不学无术颇有微词，在清代近 270 年的历史中，清朝的科举制只出了一位非汉人的状元，他就是蒙古贵族子弟崇绮。当时崇绮获选是大新闻，他不久被任命为同治帝师。1900 年时，崇绮在义和团事件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恭亲王奕䜣于 1894 年回到中枢机构后，发现掌权者多为一批满族平庸之辈。过去，他曾经致力于削弱满人贵族对朝政的过多影响。作为皇亲贵胄，奕䜣刻意安抚汉族士大夫的自卑心理，他以诗文交友，着力提拔汉人担任重任，同时尽力压制八旗子弟的优越心理。奕䜣是皇室成员，不怕被指为“亲汉疏满”，但不时仍有满族权贵对他大肆攻击。

在奕䜣主政时期，汉人总督和巡抚的人数上升。道光时期，汉、满总督人数大致对半，而到 1864 年时满人总督的人数已下降到只有 2 人。在各省巡抚的人数中，19 世纪 50 年代有 6 人为满族，18 人为汉人，而到 1864 年则全为汉人。60 年代中，奕䜣竭力要求将满人陕甘总督乐斌解职并敢于将这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职务交给了汉人，造成轰动。此位置传统上虽非满人莫属，但乐斌不学无术，连文件都看不大懂。[17]西太后常常收到满族权贵攻击奕䜣“亲汉”的报告，某次西太后亦大发雷霆，当面训斥奕䜣“还不如把江山一并送给汉人

得了!"[18]

1894年的军机处首领是礼亲王世铎,他是著名的佞臣。奕䜣大为不满的是,在甲午战争的高潮阶段,世铎却忙于大肆操办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总理衙门的领班大臣是庆亲王奕劻,他在恭亲王1884年退出军机处后就一直担任此重任。奕劻为人圆滑,政治上锋芒不露,但敛财手段却颇为高明。他是乾隆皇帝的重孙,本无亲王名份,直到48岁时由于给太后筹办庆寿大典有功,被册封为庆亲王。庆亲王奕劻为人处事温和,但作为外交总管的能力非常有限。傲慢、嚣张的列强驻华使节都认为奕劻好对付。当时朝廷中就有人议论,说奕劻至多不过是一内务府总管之材,绝不是掌管外交之料。[19]与奕䜣相比,奕劻既无奕䜣的儒雅,又无奕䜣的坚毅。

八旗和皇室的下一代人更是江河日下。1894年的皇室子弟中几乎没有国家栋梁之材。很多王公子弟不学无术,混迹于古董店、梨园和青楼,无所事事。即使是较为严格的奕䜣自己,作为父亲也是失败的。其长子载澂不堪造就,成了花花公子。奕䜣的一位侄子载漪,封号端郡王,几乎"从不读书",而且极为傲慢无礼。[20]数年后,正是这位端郡王,成为义和团战争的罪魁祸首。所幸的是,奕䜣至少有一位侄儿励精图治,这便是胸怀大志,勤奋过人的光绪帝载湉。光绪可能由于身体原因,不思酒色,所以全副精力投入国事。然而,长期生活在姨妈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光绪的抱负难以伸展,西太后当然也不愿看到一位有作为的皇上。

奕䜣还发现,朝中的汉族权臣也比过去大为逊色,得到重用者多是取悦"老佛爷"的平庸之辈。军机大臣孙毓汶,以敛财和讨老佛爷欢心而出名。孙毓汶的好朋友,军机大臣徐用仪,连进士都未曾及第,全凭与孙毓汶的关系受到重用。徐、孙的关系之近,据徐家后人的回忆,连孙家的家产亦由徐帮着管理。[21]这两位重臣是军机处迎合西太后穷奢极欲生活方式的积极支持者,动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正是他们的杰作之一。[22]当时的一位较为正直的户部尚书阎敬铭,由于实在受不了老佛爷的脾气,提前告老还乡。[23]

三、南派和北派

甲午战争之际，军机处的佞臣都站在主和的慈禧太后一边。但大多数汉族高官，除了一贯主和的李鸿章外，多为主战派，站在光绪帝一边。主战派据理力争，认为即使战败，也应尽力抵抗，才能减少和谈的损失。光绪帝决定对西太后抗颜相争，但战争的惨败使得主战派成为替罪羊，为1884年以后十年的朝政失衡承担不公平的责任。

甲午战争的政治后果是朝廷中的所谓"后党"与"帝党"的公开决裂。年老的恭亲王奕䜣此时已心灰意冷，不想在帝、后之间自找麻烦。

在心理上，奕䜣希望依靠一批能干的士大夫收拾战后的残局，但汉族官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几十年来，那些相对清廉、有能力的士大夫一直分为南北两派。[24]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族士大夫分为两派是恭亲王奕䜣自己的杰作。北派的首领是同治帝师大学士李鸿藻，直隶人。南派的首领是大学士沈桂芬，祖籍江苏。两人都是有名的学者，又是能干的、诚实的政治家。他们同时又是朝中著名的"清流派"首领，以监督政府的腐败和劣政为己任。1870年以后，"清流派"按地域一分为二，有所谓"北清流"和"南清流"之别。李鸿藻门下北方精英荟萃，"北清流"的政治纲领侧重自我修身，防止腐败；而"南清流"在沈桂芬旗下强调政治改革，锐意洋务运动。奕䜣少年时受"南清流"师傅影响比较大，尽管他失去了太子地位，心理上是同情"南清流"的。

南派人士多祖居江浙沿海地区，心境开放，政策上有外向取向，因而对现代化洋务运动和外交政策得心应手。北派人士心理内向，仇外倾向较严重，政治上趋于保守。北派最担心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受西学的破坏，因而强调士大夫严格修身，自律。南派则较务实，对"中体"和"西学"的对立并不过分担忧。

南北两派人士除地理环境相去甚远以外，其文化背景、学术风格和个性上的差距也很大。北人言语直率，不善辞令，为人缺圆滑、变通。南人处事精明，语词精明圆润，办事灵活变通。北人在情感上爱走极端，而南人则笃信中和。北人看戏，常常如醉如痴，进入忘我的境界。而南人看戏则不大喧哗，安心欣赏。北人练功夫，习气功，而南人多不信之。所以，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前后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是不足为怪的，即使是朝廷中公开支持义和团的也大都是北方官僚。

南派、北派之间成见日深。恭亲王奕䜣主政时，对两派都能加以利用，恭亲王奕䜣的性格和声望使他成了两派争夺的主要目标，他自信可以采用制衡的方法，将两派的优点共用于国务。《乐道堂文钞》中有一篇恭亲王奕䜣论马的文章，其中说到"才者德之用也"。他认为千里马光有力而无德，仍不可用。南北清流的德才俱过人，所以要使他们一心为国，就需要在速度上加以协调、控制即可。[25]北清流在李鸿藻以下有张佩纶和张之洞两员干将，都是直隶人。南清流还有潘祖荫和翁同龢等，均江浙人。光绪帝师翁同龢至关重要，其父翁心存多年前也担任过奕䜣的上书房师傅。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翁同龢成为光绪帝师，对皇上的思想和行为影响颇大。

但在1894年奕䜣重返枢机时，发现他过去操纵南北两派的能力也荡然无存。李鸿藻死后，北派落入守旧大臣手中。军机大臣孙毓汶，汉军机大臣徐桐以及满族大臣刚毅成了北派领袖。既为佞臣，"清流"之名早已不存。除了张之洞这样的清廉的北派地方大员，其他人都是敛财高手。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北派都是甲午战争中主和的"后党"中坚分子。

沈桂芬和潘祖荫死后，南派实际上由帝师翁同龢独撑局面。甲午战后，翁成为替罪羊，在朝中非常孤立。当他听到恭亲王奕䜣在战后萌生去意时，亲自登门，劝他"宜权衡大势，毋作进退之词"，[26]翁同龢知道只有恭亲王方能压住朝廷两派争斗的阵脚。南派虽有皇上支持，但势单力薄，无实权基础。南派官僚多供职于礼仪和外交部门，

而浙江人徐用仪得以重用，是因为他同孙毓汶的关系。南派在军界更无势力，因此，翁同龢只好设法吸收新鲜血液，这就为广东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参与朝政提供了机会。

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中国的虚弱本质，汉人精英，特别是南方知识分子群情激愤。地方督抚为了筹集对日赔款和安抚民心疲于奔命，很多地方官对南派的改革维新思想积极支持，就连"北清流"的主要干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张之洞巡抚山西、总督湖广经年，对清帝国体制的弊病比他在北京的同党要看得更清楚。在湖北任上，张之洞锐意洋务，开矿、修铁路、建兵工厂。当然他的主要思想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7]甲午战后，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劝学篇》，试图将"北清流"的保守观点与维新派的论点加以糅和，公开提出"中体西用"原则。[28]张之洞的北派朋友对这本小书大为震怒，但光绪帝读后则大为赞赏，下旨大量重印。"百日维新"失败后，张的《劝学篇》更受到北派的鞭笞，守旧派大学士徐桐称之为"尽康说"。[29]

另外一位同情维新的地方大员是李鸿章，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待了二十年。李是安徽合肥人，家乡地处江淮之间，凑巧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中间地带。李鸿章是朝廷中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多年来，他有意回避南、北两派的派系纠葛，超然度外。但他的敛财术和权术则是清流党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李处事平稳，心态安祥，政敌多为"南清流"，但他也不贸然站在北派一边。在恭亲王奕䜣领导的早期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立过汗马功劳。甲午战后，李是最早意识到维新的必要性、认为洋务时期的面上改革已不能奏效的高官之一。不幸的是，作为《马关条约》的谈判代表，李鸿章成了万人痛恨的丧权失地的替罪羊。当时朝廷某御史在奏折中写道，李的外交激起众怒，百姓无不以"生吃李鸿章"之肉才能解恨。[30]所以在甲午战后的数年里，李鸿章不得不保持低调，不敢过多参与军机大事。

尽管如此，在年轻的光绪帝支持下，南派势力迅速上升。在北派首领李鸿藻 1897 年去世后，南派在朝廷上的影响力开始超过北派。

同时,《马关条约》之辱使广东的康、梁成为朝廷关注的对象。康有为1895年进士及第,发起声势浩大的"自强运动"。他主持的"强学会"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西方传教士也助以一臂之力。一开始,朝廷和慈禧太后对这一运动也是褒赏有加,不少权臣公开支持"强学会"的活动。一时间,南派、北派在"强学会"问题上似乎已消除歧见。李鸿藻和翁同龢都参与其活动,而张之洞更是向它捐款五千两银子。

但是,康有为此时已远远不满足于宣传鼓动的活动,他希望直接参政,推动维新变法。1895年后,他多次上书清帝,呼吁变法。由于他无权直接上奏折,他的支持者逐渐减少。1895年到1897年间,他的《上清帝书》总被朝廷权贵抛在一边,不得上闻。1897年后,由于翁同龢的政治需要,《上清帝书》和其他的一些政论文开始送达皇上。应该说,翁同龢起用康梁并不是无私的,他意在借康梁变法,巩固南派的权力基础。光绪帝对康的政论文十分感兴趣,特别是他的《孔子改制考》。在这本小册子中,康的主题鲜明,立意大胆,而且有直接的政治效应。康有为实际上是告诫光绪帝效法年轻的日本明治天皇,将权力从保守派中夺回,从而推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法。欲达此目的,光绪知道他必须削弱慈禧太后的权力,甚至除去太后老佛爷对朝政的干预。

四、最后的平衡招数

恭亲王奕䜣对这一切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尽管他不反对一定程度上的维新,但是他的着眼点仍在于保存大清的传统体制。作为清廷皇室成员和朝廷重臣,他当然最关心的是朝廷政治上的稳定。因此,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奕䜣竭力修复朝政由于帝师翁同龢势力过大而造成的失衡状态。奕䜣与翁同龢的私交甚好,政见也大同小异,但他对翁支持康梁的举措心存疑虑。康有为的政论在他看来几近颠覆,其言词激烈足以破坏大清现存体制,奕䜣认为决不能让康梁搅乱政局。同时,奕䜣也不能同意守旧派的反对任何改革的论点。

这些人中很多是奕䜣早期洋务运动的死对头。慈禧太后多次面告奕䜣对翁同龢权力过大表示不满，尤其因为翁是汉人。奕䜣在政治上力保翁同龢，但也意识到现任的军机枢臣多是一帮庸才，决非翁的对手。所以，他接受了太后的建议，提拔一位得力的满人进入军机处。

奕䜣一开始提了两个候选人，即刚毅和荣禄，朝廷选了刚毅。刚毅是北派的核心要人，不学无术且刚愎自用。此公最喜欢炫耀他的文史知识，但常常落人耻笑。在公开场合，他常爱用生冷词语，但发音却常出错。在汉人士大夫阶层中，刚毅是一大笑柄。刚毅从政的最大缺点是口无遮拦，上朝时对任何问题都要发表意见。某次慈禧太后在朝上问刚毅为何推荐提拔龙殿扬将军，刚毅答道，我在江苏巡抚任上，龙将军是我的"黄天霸"。他的本意是说龙是他的得力助手，却用"黄天霸"这种江湖人物来形容，自然引得满朝文武哗然。不久，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都对刚毅喋喋不休的言谈感到厌烦，他们决定将荣禄将军擢拔为军机大臣。荣禄是太后的心腹，有的记载认为他与老佛爷有染，[31]荣禄的提升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

荣禄(1836—1903)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满族权贵，他是著名的瓜尔佳氏后裔。先人是功勋昭著的军事将领，先祖费英东被誉为打天下的"第一功臣"。[32]荣禄的祖父塔斯哈在平定回族叛乱中阵亡，而父亲长寿和叔父长瑞都在广西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于同一天、但在不同地方战死，另一叔父长泰也不久阵亡。荣禄自幼丧父，"满门英烈"，朝廷对他特别眷顾。咸丰帝曾接见他，含泪勉励他继承遗志，不负众望。有这样的家庭背景，荣禄的仕途自然一帆风顺。

荣禄自幼不爱读书，但自律很强。他做事谨慎，为人处事灵活，不拘泥于一成之见。有传记说他"小有才，不读书，性情骄侈，猾巧而多忌"。[33]据某官员回忆，一次与荣禄在一起看戏，其间两位福建籍官员用福州话对戏文加以评点，荣禄疑为背后说他的坏话，当面相告：我也懂得福州话的。其实，荣禄在少年时随父长寿在福州任职时住过几年而已。第二天，荣禄还向请客看戏的主人抱怨，说这两个福建人在背后捣鬼。[34]其性格多疑，可见一斑。

对文史无兴趣的荣禄对军事生涯倒是很热衷，晋升得也很快。奇怪的是，荣禄一生笃信算命相术，可能是幼年丧父所致。他对《易经》和相术颇有研究，坚信命运由苍天安排。荣禄经常为心腹部下看相，据说对他们的仕途很有预见力，对面相特别精通，他的一个心腹陈夔龙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荣禄算命算得极准。[55]成年以后，荣禄每遇大事都要请教算命先生。不幸的是，1900年中，他的相士们显然未能替他算准，对他在该年的背运一无所知。荣禄在庚子年吃尽苦头，但仍不愿放弃他的爱好。该年11月，八国联军进京，荣禄随武卫军残部仓皇出逃，路上妻女先后死去。更糟的是，联军统帅部拒绝清廷任命他为留京和谈大臣之一，因为荣的武卫军参与了围攻使馆的行动。丧魂落魄的荣禄此时仍不忘给他的另一位叔父、四川总督奎俊去信，一方面抱怨相命家算得不准，另一方面又请奎俊在四川寻找一位有真本事的相士。[56]

荣禄在政治上的最大优势是与西太后的亲密关系。他俩年岁相同，自小就熟悉。在荣的一生中，他对太后的忠心从未动摇过。他在军职上迁升很快，同时又在几个要害部门担任过主管，其中包括京城步军统领、内务府总管、直隶总督、军机处大学士以及武卫军统领。通过这些经历，荣禄对朝廷高层政治的动向可以说是明察秋毫。

荣禄的家人在宫廷内部也非常活跃。其妻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之一，一个女儿嫁给军机领班大臣礼亲王世铎之子，另一女为醇亲王奕𫍽儿媳，也就是光绪帝的弟媳。这个女儿在1908年即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母亲。通过这样一种家庭网络，荣禄对高层机密了如指掌，行动自如。可以说，除了大太监李莲英以外，没有人比荣禄更了解太后老佛爷的心态。

荣禄的交友也很广泛。在内务府任总管时，他与恭亲王奕䜣相交甚欢，在军界与满、汉同事及部下都相处得很好。甚至对桀骜不驯的角色也能结为兄弟，这些人中就包括土匪出身的降将董福祥。对与董福祥的拜把兄弟关系，荣禄到1900年才开始懊悔。董仇洋太甚，成为围攻使馆主力，战后在联军的黑名单上列为罪犯榜首。

荣禄精明过人，不愿卷入满、汉和南、北之争，所以他与另一个超然的高官李鸿章相见甚欢。这两人平时说话谨慎小心，但碰到一起则无话不谈。荣禄是满族权贵，当然对维新不以为然，但也不反对有限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他与李鸿章的态度相去甚远，而与恭亲王奕䜣接近。他对康有为的言词满肚牢骚，因为对他来说，在政治上保住西太后的影响力乃第一要务。因此，甲午战争后荣禄的升迁对满清朝廷的利益来说，是利害参半，难以评说。

五、维新与反扑

从很大程度上说，"百日维新"的失败，削弱了汉族士大夫的权力，南派势力更是大降。在维新发动之前，慈禧太后突然采取了对南派的斩首行动，将帝师翁同龢开缺回乡。光绪帝虽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翁去之后，维新派群龙无首，维新的中坚只能依靠康、梁诸人。这些人刚进政府，对朝廷政治的运作还缺乏了解。光绪的维新变法诏书多出自康、梁之手，维新措施大胆、彻底，但也操之过急。维新派对守旧派的反抗缺乏思想准备，而守旧大臣借此机会联合一致，破坏改革成果。变法进展不顺，维新派开始大张旗鼓地裁减官僚系统，希望除去体制障碍，一举打跨守旧派的势力。年轻的光绪帝政治经验不足，一心想当中国的明治天皇，对维新派的急躁情绪勉励有加。当时在京的一位高官陈夔龙回忆变法时的政治气氛说："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22]大举裁官后，守旧派以"夺权野心"攻击维新派就比较得心应手，大批密折报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当时正在园中度夏，老练的太后不动声色，寻找最佳出击时机。1885年后，慈禧太后名义上归政于皇上，但仍在军机处和军方握有实权。御史安维峻曾上书指责慈禧太后继续擅权，所以皇上在对日战争中不能采取果断的措施。慈禧太后大怒，将他革职流放，但安维峻却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23]太后知道如果她直接干预皇上

的维新大计，朝野的舆论必对她不利，所以稳坐钓鱼台，伺机反扑。因为此时的军权在大学士、直隶总督荣禄的手中，太后并不惊慌失措。

维新派感觉到荣禄可能要在皇上去天津阅兵之际下手，所以秘密告诉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提前行动，干掉荣禄。此计为袁出卖，荣禄拥兵入卫，发动了政变。维新派在 9 月 21 日的政变中不堪一击，六君子弃市，康、梁受英国和日本的保护，逃往海外。

然而，对守旧派来说，政变固然成功，危机尚未结束，因为皇上并未被黜。荣禄在 1898 年的戊戌政变、摧毁"百日维新"变法中起了关键作用，权力得到迅速膨胀。然而，只要光绪帝一日不退位，他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靠荣禄一人之力，废黜皇帝是不可能的。1861 年慈禧太后与奕䜣发动的"祺祥政变"于法、于理都无可非议，因为当时的阴谋篡权者是咸丰帝的顾命大臣。戊戌政变不同，对象是当朝皇上。而且此次政变不仅仅是满族权贵内部的事，因为"百日维新"被守旧派看做是汉人谋反，从而满、汉矛盾也开始进一步加剧。

戊戌政变后的朝廷为极端守旧派所把持也就不足为怪了。清廷政治在 1884 年恭亲王奕䜣隐退后便开始失衡，到了 1895 年，整个权力中心都是八旗王公贵族和守旧士大夫官僚的地盘。北派重掌权柄，而南派人物多被逐出军机处。即使是李鸿章这样的中立派权臣，也未能幸免。李对变法有一定的同情心，政变之后，在直隶总督的高位上被贬到两广任总督，李的挚友荣禄接任直隶总督。李赴两广之前与荣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荣劝李不必灰心丧气，远离枢机未必是祸，而贴近京畿亦未必是福。[39]令李鸿章啼笑皆非的是，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的第一要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捕杀康、梁等维新派首领。

慈禧太后面临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新政权的合法性，此次再度垂帘听政，非议四起。皇上年纪尚轻，身体亦无大碍，清代历史上还没有推翻当朝皇上的先例。在宫内太监的密谋下，太后试图用药物加快光绪的驾崩，并不断传出"上体欠安"的信息，[40]但此计很快落空。地方官员对这种做法强烈反对，上海电报局总管经元善发起数

千地方名流的签名运动,公开呼吁"朝廷不能做此非分之想"。甚至督、抚一类的地方大员,也不甘寂寞。当密谋主使人荣禄向他们发绝密电报询问对光绪退位有何看法时,德高望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发出了著名的电报:"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41]迫于如此巨大的压力,朝廷只得暂时推迟废帝谋划。

刘坤一的电报还触及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即使对国内舆论可用强制手段,对洋人之口则束手无策。慈禧太后很清楚列强多数都支持维新变法,而英国和日本更是直接卷入这场运动。两广总督李鸿章报告朝廷,康有为逃至香港,李以十万两银子买他的头,但港英政府则对康严加保护,令人无从下手。梁启超去了日本,由日本驻天津领事护送上船。朝廷派了两名职业杀手赴日刺梁,也被日本政府所挫败。列强驻华使节对废帝阴谋更是充满敌意。自1861年以来,列强外交官对慈禧太后的几次擅权都未提出过异议,此次则不然。慈禧太后借皇位继承问题玩弄权术,为自己独揽朝政创造条件,但列强外交官对政变后的清廷拒绝默认。慈禧太后对英、日助康、梁出逃本已雷霆震怒,而当宫内传出龙体不适的信息时,列强外交官竟然强烈要求派西医给光绪帝检查身体。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傲慢要求,慈禧太后感到是在直接干预她的"家事",实在难以容忍。但为现实所迫,慈禧太后还是答应了让西医入宫。法使馆的医生在为皇上体检后,得出的结论更令太后不快:上体虽然虚弱,但无碍处理军国大计。[42]慈禧太后和守旧派篡权的企图更加由此暴露无遗,满朝权贵惶惶不可终日,紫禁城内出现一片仇洋的喧嚣。

自1861年以来,朝政第一次被把持在满族王公和佞臣手中,仇外排汉的风气达到了新的高峰。戊戌政变中崛起的是端郡王载漪和他的两个兄弟载濂和载澜。端郡王载漪野心大,权力欲强,由于他的次子溥儁不久入选"大阿哥"而权倾一时。其他的守旧派多团结在军机大臣刚毅和徐桐的周围,礼部尚书启秀是徐桐的得意门生,刑部尚书赵书翘则是刚毅的得力部下。南派人主军机处的只剩下浙人王文

韶。王文韶性格软弱，为人圆滑，在翁同龢开缺回籍后，不能重振南派的势力。即使是那些仇洋不甚激烈的高官多半也是反对维新变法的主力。兵部尚书徐用仪在变法中曾被开缺，政变后得到重新任命。户部尚书立山是太后老佛爷的心腹，曾任大内总管。总理衙门的汉族大臣固然不仇洋，但资历太浅，势单力薄。许景澄曾为驻德、俄公使，而袁昶虽曾在总署任过小官，但此次来署负责外交事务前却是在地方任职。总而言之，此时的朝中已无强大的政治势力能够平衡和制约日益膨胀的仇洋政策。此外，温和派中也缺乏首领人物，没有主心骨。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荣禄和军机大臣王文韶都是一心要保住官位，因而朝廷仇洋排汉的势力日益膨大。

所以，正如恭亲王奕䜣在病榻上所最担心的，朝廷内部的结构已经严重失衡，自我调节的机制已荡然无存。实际上，这种失衡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后才得到修复，其代价自然是惨痛的八国联军入侵。然而，朝政的失衡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奕䜣在去世前的那一年已意识到中外关系也开始严重失衡。甲午战争大大刺激了列强对华的胃口，他们互相竞争的势头达到空前的高潮，一时间，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已注定要走被列强瓜分的道路。

---

①见董守义：《恭亲王奕䜣大传》，第473页。

②Bland, J. O. P, and Backhouse, 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162.

③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卷1，第204页。

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卷1，第10页。

⑤王照：《方家园杂咏》，第88页。那拉氏西太后出生于北京的方家园，故有此说。

⑥奕䜣：《乐道堂诗钞》。

⑦关于卓秉恬的性格，见《清史稿》卷365，第10084页。

⑧关于杜受田，见《清史稿》卷385，第10114页。

⑨董守义：《恭亲王奕䜣大传》，第24—25页。

⑩同上书，第26—27页。

⑪奕䜣之母在奕詝之母死后曾对他担任抚养责任，所以恭亲王有与咸丰关于其

母的谥号之争。

⑫董守义:《恭亲王奕䜣大传》,第335页。

⑬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卷13,第104页。

⑭关于李三顺事件,见徐一士:《一士谈荟》,第409、418、420页。恭亲王与西太后的抗争,见《翁同龢日记》,卷29,第88页。

⑮奕䜣:《乐道堂文钞》,第114—115页。

⑯《翁同龢日记》,卷33,第95页。

⑰关于乐斌一案,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32—335页。

⑱杨天宏:《咸丰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23—26页。

⑲何刚德:《春明偶录》,第33页。

⑳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19页。

㉑戴逸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第10辑,《孙毓汶》,第122页。

㉒郭松义:《清朝典制》,第48页。

㉓《清史稿》,卷438,《阎敬铭传》,第10202页。

㉔关于北派、南派之争,见多私家著述,刘体仁:《异辞录》;岑春煊:《乐斋漫笔》;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吴语亭编:《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㉕奕䜣:《乐道堂文钞》,第149—151页。

㉖《翁同龢日记》,卷36,第107页。

㉗关于张之洞《劝学篇》,详见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第7章。

㉘张之洞:"China's Only Hope"(英译《劝学篇》)

㉙张謇:《张謇全集》,卷6,《日记》,第432—433页。

㉚安维峻:《谏桓存稿》,卷4,第142页。

㉛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1,第7页。

㉜《清史稿》,卷225,《费英东传》。

㉝引自林增年、李之海:《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3,第44页。

㉞《春明偶录》,第28—29页。

㉟《梦蕉亭杂记》,第75页。

㊱荣禄:《致奎俊叔》,1900年12月,见《荣禄存札》,第407—408页。

㊲《梦蕉亭杂记》,第75页。

㊳《清史稿》,卷445,《安维峻传》。

㊴《梦蕉亭杂记》,第11页。

㊵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第8页。

㊶国家档案馆编,《戊戌变法》,卷4,第360页。

㊷见《对光绪的体检报告》法文原本,存比利时布鲁塞尔外交部档案馆,卷号162,《姚士登公使私人文件》(Maurice Joostens Papiers)。

第二章

失控的"洋人"

一、列强外交官

尼古拉斯·欧格讷爵士自1892年起就担任英国驻华公使。1895年10月，他应中国政府要求被召回，[①]他行前受到恭亲王奕䜣等总理衙门要员的接见和送行。欧格讷借机发了一通议论，情绪非常激动。帝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原话："恭王爷为中国第一执政，又国家之尊行也，此今日之事，舍王孰能重振哉?"后来，他又颇为无礼地直言："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 且王果善病，精力不继，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成就乎?"[②]

欧格讷不仅仅是表露了自己的不快心情，而且表露了英国政府对俄、法、德通过干涉还辽，试图从中国索取报偿的嫉恨。李鸿章在马关割让了辽东半岛，这三国趁机向日本施压，迫其还辽，但实际上居心叵测，意在图利。英国被排除在外，自然心有不甘。欧格讷对甲午战争后的清政府朝政变局并不完全理解，也不体谅恭亲王奕䜣惧怕在此时变法的心态。但他的直言

的确触到了奕䜣的痛处，政治体制已失衡，而忠廉进取的官员越来越难求。奕䜣的关注重点仍在保持政体的稳定，不在大张旗鼓的变法维新。事实上，此时奕䜣已心灰意冷，萌生退居园林之意。

确实，列强在华的争夺从甲午战争后已开始进入白热化，英国长久以来试图建立的自由贸易帝国已受到他国的严重挑战。尽管日本在华的野心对制约俄国有利，但是法、德、俄在华的扩张则直接削弱了英国在华的传统支配地位。欧格纳公使对"三国干涉还辽"的前景看得很清楚，新一轮争地盘、争修铁路、争开矿权的斗争即将开始，英国试图在华维持既得利益的政策将被其他的列强所抛弃。

甲午之战是远东国际关系重新调整的开端，此后的"争夺中国"的浪潮在极其复杂的大国同盟关系的背景下展开。

然而，列强对现存的远东国际关系相对平稳的体制的挑战，实质上是借中国政府内部失衡的机会开始的。甲午战争中暴露的清廷体制上的弱点令列强胃口大增，日本第一个发现其有机可乘。1895 年以前，列强在华的贸易和领土上的得益只局限于远东地区，而 1895 年以后的帝国主义已具有全球意义。贸易和投资汇集于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而民族主义的旗帜亦开始跟随在华的基督教传教活动而一并张扬。一种并非神圣的同盟将民族主义的精英、商贸利益和传教事业结合起来。因此，此时对华的渗透就有了三维的特点，对清政府威胁极大。

但是，三维的对华渗透也让在华的外交官疲于奔命，北京是外交官感到最麻烦的任职地点。列强都开始把中国某一部分看成是自己的私产，因此各国都不允许他国在"利益均沾"的中外条约的体制上占便宜。所以外交官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监督他国外交官的行为，而对中国内政则兴趣不大。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最惠国待遇"，即列强在华的权益均等，它不是清朝内政的发展所能制约的。列强可以威胁中国政府，但不能经常互相威胁。更重要的是，列强各国的对华政策还要受大国政治，主要是欧洲政治所主导。此时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正处于频繁互动和重新组合的阶

段，发展趋势尚难以预料。

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对全球政治的平衡开始发生影响，各列强政府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一批“中国通”来处理对华事务。过去，外交官在华呆得越久，作用越大。而如今“中国通”被看作是视野狭窄的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有鉴于此，1895年以后，大批的“中国通”被调离北京。而这种现象又与恭亲王奕䜣对外交影响力的下降相巧合，因而中外沟通突然成了问题。著名的德国公使马克斯·巴兰德驻华近33年，此时也奉命回国。他的后继者申克和海靖都是非洲事务专家，对中国一窍不通。英国政府在欧格讷走后，也派来了非洲事务专家，原驻开罗的总领事窦纳乐少校被派往中国。英国政府的思路显然与德国一样，将1895年的中国看作潜在的非洲大陆，因而需要懂得瓜分政策的外交官在华服务。

窦纳乐本人对自己的越级提升沾沾自喜，他生前最爱说的笑话是英国外相当时对他的任命实际上是偶然的。据称，当时的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以为被召来谈话的是另一位被选中的驻华公使，后来发现搞错了，于是将错就错，破格提拔了窦纳乐。[3]窦纳乐视中国人为非洲人，轻蔑有加。在1896年7月的一份电报里，他说道：“欧洲或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政府)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4]在北京，老资格的“中国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对窦纳乐的任命有以下评论：

> 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非洲黑人)的经验。[5]

其实，其他的列强政府与德、英一样，也热衷于“尼格罗方法”。法国

政府不甘示弱，调回"中国通"施阿兰以后，派来新公使毕盛。毕盛曾为新闻记者和国会议员，熟悉非洲事务，对法属印度支那却不甚了然，何论中国。意大利则急调其在非洲的主力外交官，驻开罗的公使马蒂诺。不幸的是，马蒂诺使华时间太短，尚未进入角色，便已成为各国使节的笑柄，这是因为他在1899年"三门湾事件"中犯的大错。马蒂诺被召回后，由他当年在开罗的助手萨瓦戈侯爵接任。美国政府在1898年召回使华13年之久的查尔斯·登比，调来国务卿海约翰的朋友、对中国事务完全不懂的康格少校。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派缺乏亚洲经验的格尔思男爵取代老牌"中国通"喀西尼公使。

因此，到了1898年前后，外交使团几乎都换了新面孔。这些人本来互相不熟，外交摩擦比过去更严重。这批人对中国根本就不懂，所以对清廷的内政更是不屑一顾。从他们发回国内的电文来看，主要内容多是关于对其他使团活动的猜测和分析，鲜有对清廷政治的精辟见解。即使是在华的外国新闻记者，也不能免俗。新闻记者本来就不愿进北京，他们多喜欢待在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那里华洋杂处，生活舒适。记者报道最多的也是列强在华的争斗，很少涉及中国政治的现实。就连进取心极强的《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逊，对清廷政治也是一知半解，缺乏兴趣，而对列强矛盾的分析则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特莱沃尔·罗伯所批评的："莫理逊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完全取决于他对帝国主义的狂热支持，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要真正地理解中国内政。"⑥

1895年以后，整个世界将中国视为受人宰制的一匹病马，下一个奥斯曼帝国或非洲大陆。各国扩张的胃口大受刺激，因为中国的解体迟早要发生。所以，挽救中国只能借助外力，以中国内部的逻辑来理解中国是为"白种绅士"所不齿的行为。新到的外交官很少有人刻意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莫理逊驻华多年，最痛恨的是那些"汉化"的白人。尽管他有时得依靠"中国通"在文字翻译上做些工作，其中就有日后臭名昭著的伪造中国历史的白克浩司先生，但莫理逊的写作灵感决不受孔子的任何影响。相反，对他的心态影响最大

的是英国著名作家基普林的“白种人世界责任”说。即便是老“中国通”赫德爵士，也是基普林的狂热信徒，搜集过不少他的诗作。

外交使团的中文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只有英使馆有中文训练项目，德使馆的中文翻译柯达士的水平之低，以至于海靖公使上任伊始，就决定不用他。海靖夫人伊丽莎白多年后回忆道：“柯达士的中文受中国人耻笑。”[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00 年 6 月，柯达士陪同公使克林德男爵在赴总署的路上受伤，因而成了举世闻名的人物。各使馆翻译官所受的中文训练多在其国内，当时意大利使馆的主翻译是 23 岁的维塔利男爵，曾在拿不勒斯王家东方学院学习过中文。1899 年，新任公使萨瓦戈侯爵到任时，不大相信罗马外交部在他行前对维塔利的介绍，称其“非但精通中文，而且懂其他五种亚洲语言”。世居热亚那的萨瓦戈侯爵决定开个玩笑：在天津上岸时，萨瓦戈故意向中国仆役提出一段较长的要求，由维塔利翻译。维塔利说了半天，中国仆役仍不甚了了，领班只好请出一位懂英文的仆人。维塔利大为尴尬，讪讪地向萨瓦戈解释在拿不勒斯学中文时，他只学过语法，不谙发音，所以有此难堪。与柯达士不同的是，维塔利日后却成为著名的语言专家。[8]

以这类水平的使团与中方沟通必然有很多困难。新来的使节不懂中国礼仪和文化，只好更多地采用直接恫吓的手段与中方交涉。当时使团内的一种流行观点是，既然中国人视外人为“野蛮人”，西方式的外交手段就不能使用，而“尼格罗方法”恐怕更能奏效。光绪帝师翁同龢在日记里多次记有洋人到总署“大闹”的细节：公使为达到目的的一个通常做法是向中方提出以 48 小时为期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德使海靖最为突出，他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9]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在 40 多年以后写回忆录时，对此类做法仍然津津乐道，他认为中国人并不把外交作为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的一种程序，因此，西方外交上的手段和绅士般的礼节在华并不适用。反之，索性以“野蛮人”自居却能收效。中国外交强调“以夷制夷”，大吵大闹则能挫败此计，不给中国政府钻空子。[10]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使团对甲午战后中国内部发生的剧变缺乏认识。与此同时,清廷内部的仇洋心态也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外交官们仍不以为然。此时中外关系的危机已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阶段,而恭亲王奕䜣的一病不起更是雪上加霜。美国传教士学者阿瑟·史密斯在义和团战争后这样写道:"今日看来,毫无疑问的是恭亲王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他在1898年春天去世,使朝廷统治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⑪这是对恭亲王生前作用所做的有见地的评价。奕䜣是第一个愿意破除"华夷之辨"外交体系的皇室权贵,他的外交风范有口皆碑,他一生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之间力求平衡。1894年重回枢机后,他已力不从心,因为此时的中外关系已近失控,当时最头痛的莫过于传教士与中国公民和佛、道、儒冲突的问题。

二、传教士们

如果说当时的驻华外交使团在与清廷沟通上已出现困难,有一批外国人却成天与中国人打交道,这就是西方传教士。西方在华的传教活动并非始于鸦片战争,只是在鸦片战争后更加大量地涌入。清政府曾一度杜绝传教活动,而罗马教廷对早期传教士在华的一些做法也颇有微词。1842年以前,传教士主要是争取合法性,1842年以后,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大规模扩张传教活动。早先的传教士把重点放在吸引士大夫和官员入教。以利玛窦(1552—1610)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当时的中国文化佩服不已,他们致力于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和生活上的"汉化",于是在士大夫圈子中如鱼得水。他们传教时将《圣经》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梵蒂冈教廷对此种作法颇有意见。

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将传教重点转移到普通百姓,因而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儒家传统冲击很大。不平等条约确立了传教的合法性,传教士也不必擅改教义以适

应中国士大夫的口味，所以梵蒂冈非常满意。然而从一开始，士大夫集团对传教的规模就深为忧虑，认为其动摇民心。传教士虽也想争取士大夫的支持，但收效甚微，所以对中国官方成见日深。

传教士对中国的思想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虽有贡献，但他们来华传教的动力来自"优等文化"的自信心。他们与利玛窦神父时期的耶稣会士的心态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中国已失去了大国王朝的辉煌，传教士们看到的是一个落后西方文明几百年的穷国。正如基普林的《白种人世界责任》一书所述，当时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12]列强各国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有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志在改变中国，并用基督教义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时的传教活动由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在背后撑腰，没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恐怕要成功地吸引大批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一是传教士拒绝接受基督教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观点。事实上，基督教反对祭祖这一项就很难在中国土壤上扎根，因为祭祖是中国人维系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圣经》称耶稣无父有母，而其母未婚而孕，这些都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神话。二是基督教对中国人来说，不算典型的宗教。中国人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都刻意回避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是为世俗界作精神服务的。而基督教却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入教者的世俗生活无不与教堂的活动有关，从生到死，如婚姻、社交等都常在教会的圈子里进行。而在中国，社会交往和礼仪活动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教会不啻对这些传统组织是极大的威胁。三是中国"宗教"的特点是请求赐福，保障身后不再受苦，并无基督教的"原罪"说。也就是说，中国人通过宗教的行善活动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积德"。佛教有时也讲"回头是岸"，但它的教义的基石是将世俗人生视为"苦海"，是一个幻影而已。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则将生与死看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无"赎罪"、"地狱"等概念。基督教却宣扬世俗世界之外的耶稣来对人类加以拯救，目的是在天国获得永生，而不是为了下一世过得更好。总而言之，大多数的

中国人都会感到基督教义不可理喻,因而谣言四起,对它诋毁甚烈。比如,传教士要办孤儿院,而中国百姓则认为西人贪财出名,办孤儿院的目的是炼制童子眼中的油,用它在寻找财宝时照明,因为童子无邪,所以独具慧眼。这虽然听起来荒谬,但中国百姓确实看到了洋人在中国的实际行为与他们的纯真教义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中国是一个供奉多种神灵的社会,对基督教的教义本身并不特别排斥,而排斥的是传教士和其他在华人士的世俗表现。事实上,中国士大夫对在教义上与传教士辩论一直没有很大的兴趣。

西方传教活动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展迅猛,这不是因为教义深入人心,而是因为传教活动此时已取得特殊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政府干预基督教活动的障碍扫除,所以从一开始,传教活动就可以说已经政治化。很难想象,当时中国的道士能够获得去西方国家传教的许可。1870 年的“天津教案”中,法国天主教的望海楼教堂被焚,法领事丰大业被戕。根据善后的《天津条约》,传教活动被允许在通商口岸以外自由发展,来华的传教士因而大增。

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最积极,也最有成效,因为法国政府是教皇认可的在华护教国。法国政府当然不会放过利用其护教地位获取国家利益的机会,尽管此时的法国是第三共和政体,理论上是反教会的国家。但是法国政府讲现实,在为梵蒂冈服务的同时,也不忘为国谋利。当时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列昂·甘比大有如下的名言:“反教会精神不应成为法国的出口商品。”他的意思是说,法国共和制政教分离,当然应在国内政治中排斥教会的干扰,但如涉及到对外关系,法国政府还是应采取现实的态度。

意大利政府此时也想加强意人在华的传教活动。但是,意大利在统一之初已与梵蒂冈交恶,所以教皇不可能同意大利政府合作。况且,意大利在华传教士要受法国保护,就不得不持法国护照,意大利的殖民主义扩张分子对此极为不满。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克里斯皮内阁成立后,对法国护教权的挑战才正式开始,此时的意大利在这个问题上还得到了后起的德帝国的支持。

这段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教案此起彼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传教士干涉地方的刑法诉讼程序。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为防止邪教再起，明文禁止非法宗教组织的活动。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基督教也是一种邪教，而中国政府却无力禁止。很多村民为了实惠，纷纷入教。他们中不少人都有特定的目的，比如政治避难，逃脱债务，刑事诉讼，或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不少人是泼皮无赖，本来就与科举无缘，一旦有了传教士的撑腰，一些最糟糕的地痞无赖，一夜之间能成为村霸，而且常常在公堂上大获全胜。后来任云南巡抚的岑春煊在多年后回忆说：民怕官，官怕督、抚，督、抚怕总署，总署怕洋人。长此下去，国将不国。[13]当然，地方官在教案中首当其冲，最怕传教士，因为一个教案处理不当就可能丢官。教案问题成为朝廷、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头痛的难题。

有意思的是，法国护教权也扶植了一些与教会对抗的秘密社团。在 19 世纪末，很多反洋教社团都打出了义和团的名号。西方的教会史学家一般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即传教士在 19 世纪中、后期在华的成功，是与当地秘密社团的积极合作有关系的。秘密社团是政府的眼中钉，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等更是以反清出名。乾隆时期，白莲教徒曾一度攻入紫禁城，朝野震动。

传教士刚到达一些村落时，首先被他们的特殊政治地位吸引的是秘密社团成员。在他们的帮助下，传教活动因而得以顺利开展。据德国的山东鲁南教区于 1885 年的一份报告称："一大批有造反倾向的秘密社团成员已向基督教投降。"福若瑟神父来自奥匈帝国，在他的报告中也称有一批"黑玫瑰会"成员加入教会，此会可能与山东的"梅花拳"有些关联。从 1898 年到 1900 年，梅花拳一类的组织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坚。传教士还记载了有的秘密社团的首领曾主动与他们联系，请他们到家乡去"发展基督教的宏伟大业"。[14]由于教会是中国政府明确保护的惟一的"邪教"，秘密社团愿意借它作掩护。应该说，传教士对其动机是明白的，但他们的文化优越感促使他们相信基督教义的力量能够感化这些造反分子。德国传教士薛田资的《在

孔夫子的家乡》一书中，甚至吹嘘德国鲁南教区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圣言会”教士能够吸引当地的优良分子。此言虽不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多反清的秘密社团自律很强，内部规章明确规定禁嫖赌，禁勒索，禁大吃大喝，禁霸占良家妇女等等。很多社团还一意济贫，薛田资所在的巨野的磨盘张庄，是鲁南教区的“模范村”，当地的秘密社团功不可没。[15]

但这种互相利用的结盟关系最终还是破裂了，这是因为基督教义毕竟与社团的信条不合，或是因为传教士的日常行为为社团成员所不齿。比如说，秘密社团不接受无赖泼皮，而教会的大门对任何人都敞开。社团内部纪律严格，德行第一，而传教士则不遗余力，经常干涉地方诉讼，破坏地方上的社会、宗法纽带。

传教士来自许多不同的教派，互相之间为了争取入教者而竞争非常激烈，并常常不择手段，最佳办法是争取打赢官司。英国驻华的一位领事于1899年报告说：“我发现传教士一天比一天倾向于借助领事权力来争取教徒，因而卷入世俗的官司诉讼。”这种发展趋势非常糟糕，他指出很多新入教者为不法之徒，无非利用传教士达到个人目的。他举例说，在湖北某地，有两个村子因为一个池塘的所有权的纠纷而对簿公堂，官司打输的那个村子决定全村加入天主教会，所以神父立即要求重审，而打赢官司的村子见势不妙，也全体加入英国国教。[16]正如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学家肯尼斯·拉杜雷特所指出的：“很难确定传教士在何种程度上用政治影响吸引教徒，但这种方法被相当普遍的运用则是不争的事实。”他特别注意到天主教徒增加最快的事实，在1870年中国有369441名天主教徒，到1896年已达到532448人。[17]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吸收的教徒中，不法分子的比例大增，整个村子同时加入的现象也常常发生。中国农村的传统宗法制度受到如此打击，开始趋于不稳，民、教冲突日益加剧。

秘密社团与教会发生冲突的大背景不仅仅是民、教矛盾激化，而且还有甲午战败和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奇怪的是，关于秘密社团与教会由一开始合作到变成死敌的具体过程，教会方面的史料绝少

涉及，梵蒂冈海外布道会对这一特殊现象似乎也茫然无知。我们知道的是，甲午战后，秘密社团成为反洋教、护村民的领导力量。当然，如前所述，此时的中国各阶层都已开始意识到传教士活动的严重性。地方官惧怕丢官，对传教士百依百顺，工商阶层担心传教士带来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竞争，而普通百姓则对教徒的特殊地位愤怒不已，对地方官的绥靖政策积怨日深。[18]

地方官本来应当严加控制秘密社团的行为，但由于教案太多，索性对社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民、教冲突能迫使传教士离开自己的管辖区。所以，秘密社团在传教活动愈多的地区就愈活跃，特别是有反清传统的社团视传教活动为清政府统治的最薄弱的环节之一。[19] 19世纪90代中，社团反教的活动更加激烈。传教士可以通过使馆压迫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在地方上，却生存在危险的夹缝中，成为社团打击的理想目标。

教会与社团的冲突终于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地方官撒手不管，社团得以大量吸收新成员，与教会争夺信徒。教会对社团的企图很清楚，知道他们意在离间清廷与教会的关系。19世纪90年代中叶，双方都知道大规模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传教士的优势在于其政治权力，而社团的优势在于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天主教传教士由于在教案中首当其冲，所以最早便发出了民、教冲突危险的警告。他们知道民、教冲突不在教义，而在政治权力。但他们向使团报告时，不得不以"宗教迫害"为由，以掩盖民、教冲突的实质。梵蒂冈和传教国政府对于传教事业与中国秘密社团造反的这样一种共生过程缺乏了解，所以在1899到1900年间义和团事件突然爆发时毫无思想准备，驻华公使们也感到措手不及，只有天主教传教士们心知肚明。

基督教新教缺乏梵蒂冈这样的权力中心，传教活动也不能得到新教传教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新教传教士的态度只能是相对平和，他们尽量避免民、教冲突。英、美两国政府一直不大愿意将传教活动与外交政策直接联系起来。但是从187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也

大量涌入中国。按照《天津条约》,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传教地点,无需领事审批,但在当地一旦出事,领事必须出面加以保护,所以英、美政府都对这个问题头痛不已。1891年,英国驻汉口领事加德纳向伦敦外交部抱怨道:"我们的传教士不顾风险,我行我素,而大英帝国政府又不能允许其公民在华受辱或遇害。"对传教士的保护确实很难,因为他们经常跑到领事难以管到的地区。英国驻华海军司令里查兹上将也抱怨道,传教士总是要做一些越轨的事,一旦出事,他们马上要求政府采取"炮舰政策"以逼迫中国就范。由于列强在华竞争是全方位的,英国政府不肯批准加德纳和里查兹上将提出的限制传教活动的建议,此事就不了了之。[20]

与此同时,天主教传教国越来越愿意利用传教士的活动在华谋取利益。法国作为护教国,用传教士为外交政策和经济利益服务是势所必然。但法国与后起的德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德国实际上是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正如下一章要专门讨论的那样,德帝国政府对德国传教士在鲁南教区活动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而其与鲁南教区安治泰主教的正式合作却更是另有所图。

总而言之,在华教案增长的速度异常惊人,它是与列强在华争夺的白热化同步进行的。在中国发生的教务教案,从1856年至1899年的43年里,中国发生的重大教案有700多件,小的教案则不计其数。这700多件大案中,涉及新教传教士的只有100余件,而涉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多达600余件。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的传教士有800余人,教徒70余万人。而新教教士也有500余人,只收教徒8万多人。[21]由此可以证明,不是因为新教的教义和仪式不如天主教教义和仪式更有吸引力,其实新教仪式要相对简单得多,其主要原因是在天主教传教事业的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实力,无此不能吸引70余万教徒之众。

所以,所谓"教案"实质上是权力之争,非教义之争。中国人称它为"教案",恰恰是认为它属于法律诉讼范畴,与外交关系本身不应有直接的联系。然而,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教案"不可能与外交或

"夷务"分割开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列强在华的争夺加剧,两者的结合更加紧密。此时的清廷意识到教案可能会招致割地赔款,关系重大,不能放手让地方官处理。所以总理衙门被众多的教案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现存的大量教案档案史料,即是民、教冲突不断升级的一个明证。[22]

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的一大支柱。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在华的行为不能诉讼,同时又有责任加以保护,这种丧失主权的两难境地多年来让总理衙门束手无策。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回忆,恭亲王奕䜣在世时曾对他说过:"把你们的鸦片和传教士从中国弄走,一切都会相安无事。"总署大臣文祥也对他明说:"将治外法权除去,你们的商人和传教士在中国完全可以行动自由,任何地方都可以去。"[23]应该说,治外法权对传教活动是最大的保障,但同时也纵容不少传教士为所欲为,导致教会声名狼藉。传教士当然不愿放弃治外法权,事实上,这个条款直到1943年才彻底废除。

教案对清政府的另一个打击是在财政方面,19世纪90年代的教案中大案增多,政府赔款数字也迅速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也开始连续数年出现赤字,而甲午战败后的对日赔款更是大大增加了财政压力。[24]列强在华争夺的种种招数中,处理教案是比较有利可图,而且是风险较小的手段。

三、冒险家们

1861年,清政府在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后,对中外关系的两个方面开始有所区分。政治方面称为外交——尽管内部多称"夷务",而工业化和对外经济则由一个新词,即"洋务"来表述。正是在洋务方面,一些主管官员与外国政府和客商产生了某种共生关系。不平等条约本身不能保证来华客商的业务定能成功,"炮舰政策"可以保护在华利益,不能保证赚钱。由于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官督商办",所以,外国客商或政府代表在中国商业上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其获取政府批文，如获得开矿、修铁路的许可，以及获得租界的能力。正因为这样，与洋务官员的关系就至关重要。中国的商务规则与国际惯例还相去甚远，官员素质和品行亦很低下，所以腐败盛行，贪污、贿赂、敲诈的手法五花八门。

大批的外国冒险家也因此被吸引到中国来。首先是一批中国官方雇用的淘金者，也就是那些在中国海关为赫德爵士工作的外籍雇员。赫德1835年生于北爱尔兰的波塔当城，1854年来华在英国公使馆工作，后加入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在任数十年。赫德颇有语言天才，而且是理财的一把好手。他对人谦恭，不像很多洋人那样傲慢无礼。他身材瘦小，体格上也不给中国人一种压迫感。恭亲王奕䜣在60年代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就立刻对他产生好感，一向很注重礼节的奕䜣甚至还触摸他的西服并请他展示西服的设计功能。从那之后，赫德便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朝廷甚至将很多理财大事都交付于他，而无论是有关赔款、借贷、购买军火，还是建电报局、修铁路，只要朝廷有要求，赫德对工作也总是非常敬业。赫德十分注重在保持其对英帝国和对中国政府的忠诚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他的影响力不断增大，1885年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公使，赫德为了保持其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拒绝了这一任命。

海关总税务司是中国政府雇员，但他的实际收入按业绩提成。赫德每天平均工作18个小时，是出名的工作狂，但他也因此得到巨额回报。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英国也是难以想象的，他拥有的“赫德爵士洋乐队”是在华使团社交活动上的重头戏。1895年，赫德已经60岁。在中国的时日太久，未免身心都疲惫不堪。他的个人行为也越来越古怪，他在多年前就将其妻子打发回英国，而他与中国的情妇养了一群混血儿。[25]他工作忙碌，每周还要开三次社交宴会，但他却越来越感到孤独与忧郁。在赫德的在华日记里，每年有三个日子都有类似的悲凉记载：生日那天，他感到年老体乏，觉得是否应该告老还乡；情人节那天如收到一张贺卡，就欣喜若狂；而每年圣诞节那天，他都重复一句话：“今天是圣诞节！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在日记

中还自称是“无家、无友和老朽”。[26]

伦敦外交部此时对赫德的表现深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开始怀疑。赫德从不讳言反对列强在华的争夺方式，当然，就个人利益来说，中国之瓦解也就意味着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面对瓜分浪潮的高涨，他只好藏而不露，甚至不愿再为英国政府出谋划策。甲午战争以后，新到北京的外交官都觉得赫德与他在国外的名声大不相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既固执，又脆弱的老糊涂。赫德给英国政府分析中国局势时也是显得吞吞吐吐，有意混淆事实。他有时也高谈阔论，但有点像高深的哲学说教，晦涩难懂，外交部对他十分不满。他的日记也变得让英语国家的人都难以阅读，他的日记中经常夹杂着随意用英文字母拼写的中文内容，并大量使用奇怪的比喻，[27]他的手迹连历史学家都要不断琢磨才能看明白。长期以来，赫德的梦想是将中国建成亚洲经济大国，他劝告列强要自我克制，并对英国的政策十分不满。由于这种态度，直到1911年去世时，赫德都未能获颁他长期渴望中的勋爵封号，而以爵士地位怏怏而终。

赫德在海关用了不少私人，但还是能控制腐败，将海关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在1899年出版的《全球游记》中，他对赫德有如下评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28]

海关雇员以英人和爱尔兰人为主，但也有其他国家的雇员能够进入中国的权力高层。其中重要的一位是德国人，天津海关监督，古斯塔夫·德璀林。德璀林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外籍顾问，在洋务和外交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同赫德一样，德璀林也面临一个双重效忠的问题，但他在关键时刻是绝对站在德国利益一边的。在1897年的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中，德璀林是主谋之一。总之，地方各海关的外籍官员都积极参与总督和巡抚的洋务和外交活动，然而无人能比赫德在中国更有影响力。

除了理财之外，海关外籍人士还是中外沟通的一个重要的、特殊

的渠道。中国驻外使团一般效率极差，出使并不是一个美差，很多士大夫官僚宁愿呆在国内也不愿放洋。在外国首都，中国外交官太过拘谨，不懂社交，异常孤独。中国外交官太重礼仪，只爱在正式场合活动，不习惯秘密外交。清廷对驻外使节发回的信息常常不满，每每通过海关外籍人士加以补充，或请他们直接传话。一般情况下，海关要奉清廷之命方可对外联系，但赫德则有直接上书的权力。在写奏折的同时，他也不忘给英国政府提交报告。总之，海关外籍雇员待遇丰厚，是中外双方都有需求的"双面间谍"。

第二种来华的冒险家是对中国不甚了解的生意人，其中很多人在本国有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他们中有的是银行代表，有的是企业商贸代理，有的是非正式的政府代表。这当中就有俄国的银行家吴克托亲王，德国大军火商克虏伯公司的代理，以及意大利军火工业巨头安涉多公司的代表。他们的背景各异，人等各色，应有尽有。甲午战后，银行家在中国最为活跃。中国政府财力日拙，《马关条约》的赔款数字极大，所以外国银行认定是借贷的好机会。奇怪的是，当时列强政府对中方提出的任何种类的贷款建议都愿意考虑，而且互相之间竞争激烈。无论是购买武器、开矿，还是修铁路，外国银行代表都要积极争取机会。西方工业化的结果之一是"剩余资本"大大增加，在本国投资的收益率必然下降。中国地大物博，外资尚未大量涌入，风险低，利润高。

外国银行对中国提供贷款的真实原因并非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还贷能力，恰恰相反，中国缺乏还贷能力就意味着必须用矿山开采权、铁路修建权和租借地作抵押。也就是说，通过借贷，中国的领土和资源成为借贷国的抵押物。长此下去，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必然受到威胁。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对中国的前景看得很清楚。1898年瓜分中国的势头兴起，英国朝野震动。首相索尔兹伯里告诫国人不要过分紧张，张伯伦反唇相讥，指出列强在华的争夺必定会导致帝国的解体。[29]他多次指出，如果允许部分中国领土作为贷款抵押，就

会引起争夺土地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瓦解指日可待。

各国的政治家都对争取贷款机会极为重视，甲午战后，这方面的竞争趋于白热化。首先是修建铁路租借权之争，1896 年到 1898 年间，中国开始考虑修建铁路，因为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之一是缺乏现代的运兵交通工具。清廷先考虑修建京汉铁路，请法国资本家出面。但在一开始，法国银行界就有疑虑，因为中国要求官督商办，政府不直接担保，且利率不高，为 5.3%。[30]当时，法国是世界上的大债主，巴黎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但法资的注意力在欧洲和俄罗斯。法、俄于 1894 年签定了同盟协议，所以在俄投资更为保险。同时，法国在华并没有多少制造业投资，所以法国银行预期的在华业务也不会很多。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看准了这个机会，劝说法资加人。随后以俄、法名义建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其资本主要来自法资和比利时国王本人，[31]比利时国王有意参加京汉铁路的修建。

道胜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在华修建铁路。对法、比、俄以这种方式进行修筑铁路权的竞争，其他国家都大为紧张。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弗朗西斯·伯蒂向首相报告说：“比利时出资参加的京汉铁路公司不过是为法国夺取京汉铁路权作掩护，我们认为此举是敌对行为。”[32]英国政府甚至命令驻华海军司令西摩海军上将在长江口进行炮舰示威，逼迫中国政府放弃批准京汉铁路计划。最后，中国政府只得向窦纳乐公使正式道歉，并将其他铁路的修建权让给英国考虑。

英国政府在华一贯积极支持英资汇丰银行的竞争活动。同时，中国政府为了“以夷制夷”，故意请美国人修建粤汉铁路。法国这时候也开始恐慌，但美国当时还是债务国，资本不足。于是，比利时国王再度出资加入美国为此筹建的“美中发展公司”。至此，法国方得以心安。

德国当时对华主要是越洋军火贸易，既无租界，又无其他业务。但德国政府也不甘人后，于 1890 年建立了“德亚银行”。俾斯麦首相曾训令其驻华和驻日公使要积极扶持这个在上海的德资银行。[33]显而易见，道胜银行、汇丰银行或德亚银行的业务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商

业银行的范围。它们的活动与各列强政府直接支持的对华贷款政策紧密相关,因而也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

另一种贷款是战败赔偿贷款。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行动之后,各国都知道中国政府此次必在国际上举债以付给日本赔偿费。事实上,光是支付日本还辽一项就得3000万两银子。此时,巴黎金融市场利率最低,中国政府提出了贷款要求。"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主谋俄国当时想建南满中东铁路,以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海参崴的距离。财政大臣维特伯爵抓住机会,迅速开展外交行动,让法国以4%的低利率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分36年还清。由于沙俄政府亲自为这一贷款担保,所以非常顺利。德、美、英政府均大为光火,赫德也加入反对法国贷款的行列,批评它为"政治贷款"。在此基础上,俄国于1896年成功地说服李鸿章签订了所谓的《中俄密约》,以俄方保证15年内在军事上支持中国对付日本的再次侵略为条件,迫李拱手让出满洲铁路的修建权。

《中俄密约》只是减轻了中国对日本的恐惧,但实际好处在俄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密约也标志着俄、法在华亲密合作的终止。俄国并没有将此密约告诉盟友法国,而由李鸿章密告法国公使施阿兰。正如施阿兰在向巴黎的报告中指出的:"俄人外交手段灵活多变,他们已意识到将军们在华已远远不如工程师和银行家更为重要。"[33]法国人对俄国人的不诚实异常恼火,因为《中俄密约》的基础是法国和比利时出资的贷款,而俄国却用来获取外交和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但出资者法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在贷款之争的同时,大批投资者也进入中国。他们主要是为了寻找矿山、港口的租借权,以期成立控股公司。一时间,数百善于花言巧语的银行或企业代表来华淘金,热闹非凡。不少人来华时自称有过硬的背景或绝对可行的计划,由于在华的商贸机会取决于这些人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如何,所以他们当中不乏吹牛撒骗之徒。西欧、北美的商界和银行界往往不明虚实,上当受骗,不少招摇撞骗的承包商和代理人屡屡得手。

意大利人安杰罗·罗莎第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莎第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路易基·罗莎第的侄儿，他与好友卡洛·鲁迪尼合伙，想来华寻找机会。卡洛的父亲是意大利首相。罗莎第品行恶劣，与他叔叔威望不可同日而语。他于1895年来华后，首先结识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基督教徒马建忠。马建忠介绍他与李认识后，李对罗莎第的背景很重视。罗莎第为了进一步抬高他在中国的地位，请卡洛·鲁迪尼帮忙争取到一枚国王颁授的"圣·莫里齐奥大勋章"，此勋章获得者在国外与意大利公使的礼仪地位平起平坐。1898年，李鸿章接受了罗莎第的请求，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矿产公司。李因此致电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询问罗莎第此人是否可靠，罗丰禄说没有问题，因为罗莎第是伦敦金融市场的关键人物考斯登的朋友，[35]李鸿章遂下决心促成此事。

罗莎第想组建的是英国和意大利合资的公司，定名为"福公司"。但他对中国的国情，甚至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他一开始就盯上了山东，而意大利驻华临时代办萨瓦戈告诉他德国人早就觊觎山东，并劝他考虑山西。罗并不知山西在何处，有何物产，萨瓦戈就借给他一本德国地质学家李希特霍芬的名著《中国地质》。看完书后，罗开始对山西情有独钟。巧合的是，山西的确有大量的矿产资源，而且巡抚是李鸿章的门人。因为有了李鸿章的支持，罗立即开展活动，上下打点以保证所有有关的重要人物都有好处。他还远赴伦敦与英国政府和银行界洽谈，并在伦敦注册了"福公司"。英国政府对"福公司"也有兴趣，因为此事由意大利人出面比英国人牵头更好，可以避免与俄国、法国甚至德国的直接冲突。罗莎第以4万英镑为资本，开始大量发行"福公司"股票。

在北京，罗莎第的诡秘行为引起各国公使的极大关注，但却是罗莎第本人的为人处事作风使得外交官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他衣着华丽，生活奢侈，在使团社交场合，总见他衣冠楚楚，突出地炫耀他的"圣·莫里齐奥大勋章"。他还在上衣口袋别着一把耀眼的纯金小刀，抽着哈瓦那雪茄在那里自我吹嘘。外交圈中无人喜欢他，甚至连

意大利的萨瓦戈侯爵都觉得他不可容忍，称他为"犹太胖子"，因为他是犹太血统，而且特别喜欢招摇。英国公使窦纳乐本已奉命帮助罗莎第促成"福公司"之举，但罗沙第在某次英使馆宴会上调戏使馆的英人女招待，窦纳乐公使大怒，宣布罗沙第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萨瓦戈为他说情也不顶事。不久，由于李鸿章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能帮助罗莎第获得此项目的总理衙门批文。为了使资金到位，罗莎第索性以山西巡抚批文冒充总理衙门批文蒙骗英国政府和金融界。伦敦金融界对此不合惯例的做法有所怀疑，便坚持要有窦纳乐公使的联署。此时，窦纳乐公使坚称决不与这种唯利是图的冒险家打交道。罗莎第无奈，只好天天缠着萨瓦戈想办法。萨瓦戈则称尚未获罗马外交部的指令，不能干预这类私人商务。罗莎第大怒，天天到意大利使馆吵闹，萨瓦戈回忆录中载有罗莎第"不让我有片刻的安静"的话语。绝望之下，罗莎第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中国。

罗莎第离开中国之后，萨瓦戈接到了罗马外交部的指示，要求支持"福公司"这一项目。尽管萨瓦戈很不情愿，但还是利用其外交职务之便开始着手此事。他首先说服窦纳乐公使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到总理衙门盖章。在被中国方面多次拒绝之后，萨瓦戈就索性坐在总署里喝酒，聊天，直到掌灯时刻也不愿离开，居然最后得以成功。[36]有意思的是，等萨瓦戈拿到总理衙门的批文时，"福公司"已成为英资的独资企业。萨瓦戈曾精心设计过一枚"福公司"的商标，商标上将意大利的三色旗与英国的米字旗巧妙地结合起来，至此也派不上用处了。多年后萨瓦戈还回忆道，他当时不得不违心地支持罗莎第的活动，因为这是"意大利人在中国的惟一重大利益"。[37]当时在华发生的类似丑闻是举不胜举的。

有些小的生意人倒很成功。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惟一的西式旅馆叫"北京饭店"，老板是瑞士人奥古斯特·沙莫。沙莫1867年生于洛桑附近的潘达兹小城，17岁来华帮其姐夫管理"北京饭店"。沙莫从侍应生做起，一直做到总经理，并与来自旧金山的美国姑娘、性情果敢的伊丽莎白·麦卡锡结婚，这对夫妻档将"北京饭店"办得有声有

色。他们在后来的义和团事件中以勇敢和乐于助人出名，使馆解围后，沙莫获得不少政府颁授的勋章，但这对夫妻在义和团事件中的最大收获是从八国联军士兵手中廉价收购的大批被抢劫的中国古董。[38]

外国客商关注的重点人物除李鸿章外，还有洋务大员盛宣怀。盛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从未进士及第，但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在当时中国政府"官督商办"办理洋务的原则下，朝廷特别需要像盛宣怀这样既为国效忠又懂洋务的人才，而一般进士及第的士大夫反而对洋务不屑一顾。盛长期是李鸿章的左右手，在李的庇护下，升迁很快，此时已是督办铁路、电报事务大臣。李、盛是中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策划者，在洋务上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两人也借督办洋务聚敛了巨额财富，因此在外交上总是坚持避免中外冲突，常常落个汉奸败类的罪名。梁启超对李鸿章是非常敬佩的，但他也批评过李鸿章由于过分喜爱"洋务"而有时忘了"国务"。[39]

四、国际地缘政治与"百日维新"

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百日维新"的失败反映了英国和日本在华势力的下降，而俄国影响力却在上升。应该说，从1840年以来，列强还是第一次积极干预清廷的内政，英国和日本在"百日维新"的整个过程中都有参与。变法本身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楷模，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对光绪帝的影响巨大。英国也一贯积极支持变法，早在1895年，欧格讷公使在离任前就发出过变法的呼吁。

更重要的是，英、日支持变法有地缘政治的考虑。甲午战争之后，《中俄密约》的签订对英、日在华的利益有很大影响。英、日政府都认定清廷的保守派是亲俄派，而窦纳乐公使从不掩饰他对李鸿章的厌恶。1896年7月，窦纳乐公使曾警告伦敦外交部关注李鸿章两面三刀的外交术："我希望女王陛下的政府在对华谈判任何问题时不

要依赖李鸿章。据我所知,李只会作出任何承诺,而决不会真心履行这些承诺。""百日维新"失败后,窦纳乐公使在总理衙门多次攻击李鸿章。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逊的报道,李之受贬到广东,与窦纳乐公使的大力攻讦有直接的关系。[40]

英国首相与窦纳乐公使一样,是公开的仇俄派。所以对英国来说,光绪帝权力的上升对反俄大计有利。变法过程中,英、日政府都过低地估计了当时已经63岁的慈禧太后的势力。窦纳乐一贯认为慈禧太后对政府的控制能力有限,某次入宫受光绪帝接见后,窦纳乐写下如此感想:"我只需要二百名'红衣兵'(即英在非洲的殖民军),如果其他公使不反对,就能轻易地发动政变,拿下紫禁城。"[41]日本人当时也很乐观,变法期间,前首相伊藤博文亲自来北京,给光绪帝出谋划策。

然而不久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开始铁腕掌权,英、日政府绝望之际,匆忙帮助康、梁逃往国外避难。此举被清廷视为是直接干涉内政,英、日的影响力大降。俄国在整个过程中是受益者,势力大增。

英国在华的老对手法国在"百日维新"前后均无利可图,《中俄密约》打破了法俄连手制英的传统战略。此外,法国外长德卡赛对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兴趣不大。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曾建议将云南并入印支殖民地范围,德卡赛认为会挑起军事冲突,不予考虑。同时,1898年,英、法在北非的法绍达的军事对峙,一度有开战的可能。此事和平解决之后,德卡赛更不愿在殖民地问题上与英交恶。更重要的是,法国与英国合作的基本动因来自德帝国的威胁。1897年以后,英国在华的利益不仅受俄国的影响,而且受到后起的德帝国的直接挑战。总之,英国在1898年的远东已开始感到几面受攻,地位难保。

---

①欧格讷的傲慢与鲁莽为恭亲王奕䜣所不喜,中国要求将其召回。

②《翁同龢日记》,卷34,第92—93页。

③Siegler, Sylvia: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Imperial Servan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p.10.

④Wilgus, Mary,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Open Door and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00, p.83.

⑤同上, p.79.

⑥Trevor-Roper, Hugh: *The Hermit of Peking*, pp.29—31.

⑦Heyking, Elisabeth von: *Tagebücher aus Vier Weltteilen*, p.195.

⑧*Salvago-Raggi Memoirs*, in Licata, Glauco, ed. *Notabili della Terza Italia*, p.328—329.

⑨《翁同龢日记》,1897—1898 多有记载。

⑩*Salvago-Raggi Memoirs*, p.342.

⑪Smith, Arthur H.: *China in Convulsion*, *vol*. 1, p.128.

⑫Schlesinger, Arthur, Jr., *in John K. Fairbank*, *ed*,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336—373。小阿瑟·施莱辛格这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指出,"文化优越感"是来华传教士的最基本的动因。

⑬岑春煊:《乐斋漫笔》,第 253 页。

⑭Kuepers, J.J.A.M.: *China und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üd-shantung-die Geschichter einer Konfrontation*, pp.29—31.

⑮Stenz, Georg: *In die Heimat der Konfusius*, *Skizzen*, *Bilder und Erlebnisse aus Shantung*, p. 200.

⑯Young, L.K.: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103.

⑰Latourette, Kenne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10 and p.329.

⑱大量的《教务教案档》(台湾编)与德国"圣言会"史学家的著作都证实了这一点。

⑲在这一点上,我与普赛尔和周锡瑞的观点均不同,我认为义和团"扶清"是策略。

⑳Wehrle, Edmund,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pp.49—52.

㉑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 1980),附录 1—3。

㉒见《教务教案档》。

㉓Hart, Sir Robe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p.158.

㉔《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卷第 4016 页记载,1897 年对外贸易赤字为 39327267 两白银,而 1898 年升为 50542185 两,对日赔款为 2 亿两。

㉕Fairbank, J.K.et al.: *The I. G. in Peking*, pp. 23—26.

㉖*Sir Robert Hart's Diaries*, Belfast, vol. 58, December 25, 1900.

㉗《赫德在华日记》由其家人于1972年赠予北爱尔兰女王大学图书馆,但因为解读这些日记颇费周折,所以日记虽已供查阅二十多年了,但仍未被学者们充分利用,费正清曾组织出版过部分内容。

㉘《赫德在华日记》中(卷54,1899)夹有这本书的英译片段,显见他对此书非常重视。

㉙*The Times*, May 5 and May 14, 1898.

㉚Lee, Robert: *France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China*, 1885—1901, p.71.

㉛Kurgan-Van Hentenryk, G.: *Leopold II et les guoupes financiers belges en Chine*.

㉜*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FO17 1362/197—203.

㉝Stoecker, Helmuth,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p. 254.

㉞同上,第121页。

㉟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53页。

㊱Salvago-Raggi, *Memoirs*, p.342.

㊲罗莎第在华的种种行为主要见《萨瓦戈回忆录》,第336—343页。其他材料现存于意大利外交部档案馆的罗莎第档案,"*Commodore Luzzatti-Operazioni finanziari e commerciali in China*"。

㊳Campiche, Paul: "Notes sur la carrière d", Auguste Chamot: in *La Revue Historique Vaudoise*, March, 1955.

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3,第93页。

㊵Wilgus, Mary, p.83.

㊶同上,第80页。

第三章 德国式的帝国主义

一、争夺势力范围与多变外交风云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竞争逐渐失控，各国政府都不得不面临一个中国有可能以非洲方式被瓜分的前景。如果成为现实，19 世纪末的国际关系体系将受重大影响。1899 年，英国退休海军上将别瑞斯福德勋爵在英政府和商界的支持下来华考察，并出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题名为《中国的解体》。然而，列强各国虽然都有瓜分中国的企图，但是每一个强国政府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至少不要在近期内发生。中国地域广阔，任何一国想独霸都是不可能的。同时，中国的重要性还远远没有达到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均势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列强不愿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引起武装冲突。所以，从伦敦、巴黎、彼得堡到华盛顿，各国政府都从全球政治的角度，而不仅仅从地区竞争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问题。

各国外交部的中国政策也因此由熟谙欧洲政治的专家，而不是"中国通"来制定。举例来说，英国外交部的远东事务次官弗朗西斯·伯蒂，对中国并无深刻的

了解。他去东方旅行最远只到过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而法国外交部的对华政策则受著名的坎朋兄弟的影响。茹尔·坎朋是驻美大使,而保罗·坎朋则驻节伦敦。外交部的远东问题专家们在决策过程中作用不大,在德帝国外交部,老牌"中国通"巴兰德的发言权有限,因为对华政策掌握在德皇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手中。在俄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不在外交部而在财政部。在所谓"贝佐布拉索夫远东帮"势力于1900年兴起之前,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对华事务上最有发言权。[①]美国国务院则根本不用"中国通",即使是在制定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时,依靠的也是院外的"中国通",如威廉·洛克希尔。日本政府当然不缺乏中国事务专家,但其对华外交的视野过于狭窄,关注重点是俄国在华的行动。因此,日本在华外交的主旨是在满洲和华北地区制衡沙俄的势力,"中国通"并无大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心想"走出亚洲",因而竭力仿效西方列强,以全球地缘政治的观点来制定对华政策。日、中在文化和历史上的特殊纽带对西化的日本外交反而是个障碍。

在这样的形势下,列强各国虽然在华竞争激烈,但都希望能缓解甲午战后的失控局面,以便在远东找到一套保持稳定的办法。以欧洲政治为中心的现实外交此时尚能抑制列强各国对中国市场的巨大胃口。此外,列强自然都希望在华拥有势力范围,但都不愿公开对此加以鼓吹。对各国政府来说,"势力范围"的概念各有不同。英帝国此时已在长江流域有大量集中的商贸利益,这一地区已成为事实上的英国势力范围。所以英国不喜欢用这一概念,主要是惧怕他国亦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其他地区独霸一方。英国政策的主旨是防止"势力范围"概念的合法化,索尔兹伯里首相在1898年5月宣布:

> 目前充满活力的国家将逐渐侵入濒临死亡的地域,文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种子已经播下……我们不能容忍英国在这个世界地域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②]

俄国人全力以赴地完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财政大臣维特苦心经营的这条大铁路注定要迫使俄国设法控制满洲。1896年，俄国政府向李鸿章大量行贿，[3]通过《中俄密约》已经获取了建设中东铁路的租借权，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到海参崴的路程，减少了修建费用。[4]但是《中俄密约》本身对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还未造成直接威胁。订立《中俄密约》的消息传出，中外哗然，彼得堡和北京都矢口否认此约的存在。迫于国内外压力，恭亲王奕䜣改变了原来支持李鸿章的初衷，不愿与《中俄密约》有任何干系。当李鸿章派人将《中俄密约》文本原件送达恭亲王府时，恭亲王拒而不收。[5]中国政府实际上到1910年才承认有此《中俄密约》。李鸿章认为《中俄密约》文本放在总理衙门太不保险，只好将它一直保存在自己的私人文件之中。[6]结果是，《中俄密约》在官方的口径中虽不存在，但中方仍不得不履行义务，而俄方以15年与华秘密结盟来对抗日本的承诺实际上名存实亡。

法国政府对势力范围概念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驻京公使毕盛曾多次催促法国政府对此作出决策。外长德卡赛对毕盛的"中国必被瓜分论"不以为然，他更愿意听取坎朋兄弟的意见。在伦敦和华盛顿任大使的坎朋兄弟对法国对华政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他们的中心论点是要避免与其他列强在中国进行非洲大陆式的争夺。他们认为，中国与非洲本质上不同，非洲大陆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社会、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法国与他国一样，认为必先占地，然后才能探明此地是否有经济价值。中国不然，它是一个统一的古老帝国，政治权力集中。此外，英国人早已占尽先机，将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变为事实上的势力范围。而且中国其他地区的地理、地质、人文环境的特点早已探明，在不平等条约的"利益均沾"的原则下，一国不可能随意占地而同时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

保罗·坎朋还特别指出，法国如欲在华建立正式的势力范围，惟一可能的选择是毗邻印度支那的广西和云南两省。这两个省份不但贫穷，而且缺乏矿产资源。当地民风强悍，少数民族集居较多，而且

以仇洋出名。所以在广西和云南建立势力范围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法国都没有多大好处。因此,法国与他国一起努力维持中国的现状恐怕是惟一有效的方针。[7]

日本和美国对"势力范围"的概念兴趣不大,尽管这两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呈上升趋势。它们都不愿看到由于势力范围的划分而破坏"机会均等"的原则,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上与英国的政策同步,重在贸易自由,而日本需要英国的支持以遏制俄罗斯。它们的长远利益与英国是一致的,所以对英国利益没有威胁。因此,能够在远东地区直接挑战英国利益和英国主导的游戏规则的只能是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

对柏林和罗马来说,"势力范围"的概念首先就意味着有必要获取一块地盘。这两个国家在华的商贸起步较晚,只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日趋活跃。在他们获取势力范围之前,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过早的解体。甲午战后,德国和意大利都迫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开始关注远东地区。从 1897 年开始,德国开始公开挑战现存的远东国际关系体系,手法既独特又残忍,富有戏剧性。接踵而来的意大利,则手法拙劣,颇有喜剧效果。

二、安治泰主教和德国的"全球政策"[8]

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外交开始采用进取姿态,英国对德国的野心膨胀大为担忧。德国突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出人意料。德国外交的令人不安还反映在它的外交风格上,德皇威廉二世和他在华的代表都突显了德国的咄咄逼人的姿态,申克公使和海靖公使的表现尤其嚣张。他们为了达到德国的目的,不遗余力,完全不顾及中国政体的脆弱特点。不久,德国对现存的"机会均等"原则开始进行挑战,从而在本质上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游戏规则。德国在华的进攻型姿态与德国政府此时开始推行的"全球政策"是密不可分的,[9]作为民族统一最晚的德帝国,此时感到自己的羽毛

已经丰满，要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争夺一席之地。俾斯麦首相时期所建立的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战略至此被"全球政策"所取代。

德帝国的"全球政策"从远东开始推行是有偶然因素的。德帝国以基督教新教为国内政治的主导，但它在亚洲的扩张却得益于天主教会在华的渗透与发展。随着时日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哪一个列强比德国更能利用传教士的作用。德国于1871年统一以后，天主教受到大规模的政治歧视和迫害，俾斯麦发动的"文化斗争"旨在摧垮天主教在德国的神权和俗权。1874年，天主教神父阿诺德·扬森(1837—1909)发起一个海外传教的组织，但是在德国无立足之地，只好将总部设在位于德国和荷兰边境的荷兰小城斯泰尔，并将该组织定名为"圣言会"，这就是日后在中国声名极大的德国天主教机构。当时在德国，很少有人注意到扬森的组织。扬森精力充沛，事业心极强，没有过多久，就把"圣言会"办得有声有色。到了19世纪末，"圣言会"已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美国和中国等地都有了分部。由于"圣言会"的迅速发展，1882年罗马教廷决定授予"圣言会"在中国山东设立鲁南教区的权力。从此，德国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影响力大增。

带领"圣言会"打进中国的是扬森选中的安治泰神父(1851—1903)。应该说，安治泰在华的使命是非常成功的，但"圣言会"在华活动的历史却毁誉参半，这主要与安治泰本人的素质有关。安治泰生于1851年，父亲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旅馆的老板。安治泰生来是一个怪才，特别擅长谈判和打开局面，扬森之所以选中他，正是看到了在中国发展传教事业的艰难。安治泰在雷根斯堡的神学院学习过3年，毕业后，于1875年加入在斯泰尔总部的"圣言会"，任神学教师。他去斯泰尔不久，就表露出对"圣言会"严格的规章制度的不满，因而转向争取到海外传教的机会。当时由于德国的"文化斗争"，天主教士大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对去海外传教事业很有吸引力。1876年，即安治泰加入"圣言会"的第二年，神学讲习班发生了内部危机。

当时"圣言会"共有4名教师,其中3名因为对扬森会长的管理风格不满,愤然离去,只剩下25岁的安治泰尚未决定去留。扬森会长为了"圣言会"的声誉,苦苦挽留安治泰,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一下子提出三条苛刻的条件:第一,他能够接受禁欲原则,但不能接受"圣言会"的衣着规定和每日祈祷书原则;第二,"圣言会"从今往后所有的精力都应放在海外传教事业上;第三,如果扬森会长保证将以海外传教为自己的惟一任务,他将永远留在圣言会。扬森大吃一惊,没有料到安治泰有着自己的一套处心积虑的思路。经过再三思考,扬森除了在衣着和每日祈祷书问题上不愿让步以外,答应了安治泰的其他要求。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治泰改变了"圣言会"的发展方向。数年后,扬森会长在得知安治泰在中国我行我素,并不遵循衣着规定和每日祈祷书原则,感到后悔莫及。[10]

安治泰在抓住机遇,达到既定目的的谈判上特别有能力。在华的数十年中,他的软硬兼施的功夫是中外皆知的。尽管安治泰在"圣言会"传教事业上功不可没,但他个人的野心和性格特点往往成为他的包袱,也是他最后垮台的主要原因。安治泰身材矮小,不过一米六十左右,但精力异常充沛。他于1880年来华,仅仅十年工夫,就成为总理衙门最惧怕、也最头痛的传教士。来华之初,"圣言会"尚无独立的主教区。安治泰不断扩张传教活动,以向梵蒂冈施加压力在鲁南建主教区。梵蒂冈一开始对这个新兴的传教组织不够了解,不愿任命安治泰为主教。直到1885年,在扬森会长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游说下,鲁南"圣言会"主教区正式成立,安治泰也顺理成章成为主教。奥皇的支持是关键,因为"圣言会"在华传教士中有好几位来自奥匈帝国,安治泰的副手福若瑟神父也是奥地利人,所以奥皇对"圣言会"特别眷顾。同时,梵蒂冈海外"布道会"对安治泰提供的在鲁南传教活动的一些数字感到高兴。据他的报告,在1885年以前的3年里,"圣言会"传教士吸收了687名中国教士,接受忏悔706次,举行圣餐仪式627次,为1142名儿童进行了洗礼仪式。[11]

成为主教以后,安治泰的第二个步骤是使"圣言会"从法国护教

权下面解放出来。安治泰来华之前，所有在华的天主教的保护权力掌握在法国公使手中，如果出现教案，要按法国护教的规定来办。正如拉杜雷特所说："法国护教的动机不在于保护天主教信仰，而是在于法国的声望和势力。法国对华贸易额并不大，如同在柬埔寨、安南和东京湾地区一样，法国要求对当地事务有发言权的主要根据是护教权。"[12]

因此，法国驻华公使对总理衙门有一种特殊的掣肘权力。但"圣言会"教区在安治泰主教的领导下，决心打破法国的一统天下，寻求德国政府的保护，并为德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在这一点上安治泰是坚定不移的。当时的德国政府在俾斯麦领导下对天主教并不友善，所以对安治泰在华的活动漠不关心。但在1886年间，德国政府决定撤销"文化斗争"，意在与梵蒂冈和解。德国外交部开始关注安治泰主教在华的事业。与此同时，"圣言会"在华的扩张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安治泰开始采取大胆的行动，试图打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孔夫子的家乡济宁（辖曲阜）。过去有不少传教士虽然想做但都不敢有此妄为，而安治泰则锲而不舍要在济宁扎下根来。济宁是兖州府所在地，而孔子家乡曲阜在济宁治下，所以兖州府是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圣地。

从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间，中国政府同安治泰在兖州问题上不断发生矛盾。中国政府希望安治泰主教不要心存不轨，但安治泰坚持不懈，不肯让步。安治泰的手法多变，时而用驻北京的公使要挟总理衙门，时而又制造种种教案，借机大闹。在与地方政府的多次谈判破裂后，安治泰心生一计，要求在济宁租赁一间房屋，以便在谈判教案期间休息。济宁官员不知有诈，允之。但当他一旦获得在济宁的立脚点，就不肯离开，坚持要求在济宁建立传教点。中国政府也坚决不肯让步，总理衙门在1888年致法国公使李梅的信中，抱怨安治泰欺人太甚。信中甚至说中国人是"圣人孔子"的门徒，兖州府如同西方基督教的圣地一样重要，是中国"宗教经文"的发源地。[13]总之，双方争斗激烈，互不相让。当时连德国公使巴兰德都开始觉得安

治泰的做法有点太过分,弄不好会影响德中关系。但是,安治泰下定决心要攻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1892 年 5 月,安治泰在给"圣言会"扬森会长的信中这样解释他的动机:"六年来,我一直在为此事而斗争。有时我被人像围剿野蛮人那样地追赶,有时鞋子都跑掉了,光脚奔逃。我的马曾多次被人杀掉,我的中国教徒被逮捕入狱,酷刑致死,或在狱中死于饥饿。但是直到现在,那个撒旦的城堡还未陷落。我在这里的传教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拿不下兖州府,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没有意思,也不能持久。我在兖州的落脚点都受到威胁,没有兖州府,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在空气中漂浮,一阵风就能把我们吹得无影无踪。"[14]

安治泰一开始就希望获得德国政府的保护,因为他对法国人不放心。但是护教权在法不在德,所以他暂时还必须在德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梵蒂冈自然不希望新教的德国政府涉及天主教事务,而德国政府则想让"圣言会"脱离法国的保护。在公开场合下,安治泰阳奉阴违,两面讨好。他对梵蒂冈的说法是反对德国护教,但他在 1889 年听到巴兰德公使将奉召回国述职时,立即面见德公使,请他转达给柏林政府希望获得德国保护的心愿。迫于德国的压力,梵蒂冈最终答应由安治泰主教决定选择德国还是法国,于是在 1890 年安治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德国。

"圣言会"鲁南教区归德国保护以后,巴兰德公使立即出马干涉兖州争端。他指责中国政府有意在宗教教义上对天主教歧视,因为兖州府治下有那么多的佛教寺院和道观,为何不能允许天主教传教?中国政府继续抵抗,军机大臣孙毓汶恰恰是济宁人,又是著名的守旧官僚,自然在其中推波助澜。而兖州府的士绅和百姓也自发地组织了抗教活动,民情愤然,教案迭起,安治泰不得不暂时退却。1891 年长江流域发生大规模的"扬子教案",法、德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镇压教案肇事者的最后通牒,巴兰德借机再次提出兖州问题。如此反复折冲,直到 1896 年德国政府向中国发出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此事才以安治泰大获全胜而结束。在兖州事件中,德国政府看到了

安治泰对付中国人的非凡能力和倔强的性格。[15]

在德国开始护教以后，安治泰还不遗余力地与德皇威廉二世建立特殊关系。德皇将安治泰主教称为他最欣赏的"基督教第一信使"，安治泰不久便成为德皇宫廷里的座上宾。仗着德国政府和罗马教廷的双重支持，安治泰不免沾沾自喜，在威胁中国人的手段上更加残酷和大胆。同时，在德国护教权被梵蒂冈批准以后，安治泰更加以铁腕控制所辖的鲁南教区。安治泰理财能力极糟，且开销甚巨，所以鲁南教区的经费常常是入不敷出。因此，制造教案竟成了他敛财的重要手段之一。他的手下有几个精明强干的助理，比如副主教福若瑟、魏弗尔神父和新来不久的薛田资神父。安治泰不会放过一个教案的机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勒索，所以与"圣言会"有关的教案在山东发生的频率最高，牵涉暴力的次数也最多是不足为奇的。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 世纪 90 年代中，鲁南的很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1890 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洋"谐音。一场混战之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传教士在堂上称此人过去曾输过教案官司，今次是蓄意无疑。地方官不敢开罪洋人，而那位屠夫被判有罪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16]此事引起民情激愤。教士和教民的另一种寻衅借口是在传统节日里，由教民对传统仪式加以耻笑。而一旦非教徒村民不让教民参加庙会、春节等活动，教士便出面告官，谓"宗教歧视，不合条约"等等，并要求赔偿。

鲁南教案层出不穷，地方官疲于奔命，进退两难。一方面，地方官为取悦朝廷，必须减少教案；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安治泰主教的胃口越来越无止境，教士打赢教案官司越多，越是得寸进尺。1888 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对传教士痛恨不已，民、教冲突之严重可见一斑。更有甚者，由于安治泰所制造的种种麻烦，没有一位巡抚大人能在山东任职超过两年。1896 年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在一

奏折中明确指出："……而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背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17]

安治泰的所作所为不仅使中国人侧目，就连他手下的传教士对他都颇有微词。安治泰对下属以铁腕治之，在教区里不容许不同意见。他来华后开始大量酗酒，每日必去村中酒店喝上一通，醉时胡作非为，借酒与中国地方官或是传教士同僚无理取闹。他的另一个怪癖是长期与一位远在波希米亚的女子保持通信，该女子是莱特纳夫人，身份非常神秘。

其实莱特纳夫人乃一名村妇，自称某日亲耳听到过上帝的声音。当年"圣言会"会长扬森到奥地利游说奥皇时，在南部蒂洛的山中发现此人，并将她介绍给"圣言会"同仁。安治泰对她极为信任，在大事小事上都要请她指教，比如要建一座新教堂，选地应在何处，对申请来华的新教士如何挑选，与中国政府如何打交道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常常写信给莱特纳夫人，请教如何控制下属的办法。这两人通信之多，牵涉的事件之广，以至于扬森会长都感觉到莱特纳夫人在干涉"圣言会"的内部事务，于是在 1893 年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安治泰仍保持与她的书信往来，她对安治泰主教在华的行为影响到底有多大尚难准确判断。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波希米亚村妇对"圣言会"同僚之间的关系是了如指掌的。[18]

有的鲁南教区的教士不堪安治泰的压迫，向"圣言会"总部写信报告安治泰的专断暴虐行为，但所有信件一经安治泰的手都被扣下，而写信者不久就被派往民、教冲突最多的地区工作。莱特纳夫人曾

告诫安治泰不必为属下担忧，因为他们工作太辛苦，难免心情不佳。事实并不是这样。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洲"圣言会"的同僚都开始听到一些关于安治泰个人行为不正常的风言风语，梵蒂冈和扬森会长开始进行调查。安治泰强迫命令福若瑟副主教写信为他的行为辩护，但鲁南教区的教士终于冲破阻力，向扬森多次报告了实情，尤其是关于安治泰酗酒闹事，甚至在回欧洲的客轮上与乘客大打出手，以及他的暴君式的管理方式。总之，90年代中，"圣言会"总部已认为安治泰"不可救药"。[19]

其实，安治泰回欧洲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某次在斯泰尔"圣言会"总部，他受邀给神学班的新学员讲一讲他在中国传奇式的经历，安治泰讲到得意处，居然大谈醉酒之后的欲仙感受。另有一次，安治泰在大醉之际，找到扬森会长大闹，说要永远退出"圣言会"，扬森非常不快。1896年，鲁南教区的教士集体上书，要求撤换安治泰主教。早在1890年冬天，第一个斗胆直呈己见的教士是林布洛克神父，此后多位教士亦开始写信向总部报告。最后，在1896年，一向胆小怕事的福若瑟副主教在忍无可忍之际，也站了出来。安治泰的秘书韩宁赫斯神父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目前在鲁南教区的邪恶的形势只能由一名新的主教来收拾残局。"安治泰此时已完全自我孤立，在他与下属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墙。扬森会长此时感觉到鲁南教区的问题并不是由于艰苦的工作环境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教士们对安治泰已经绝望，所以不得不大声疾呼，请求救援。在薛田资神父的鼓励下，鲁南教区的教士集体要求安治泰下台，薛田资神父被梵蒂冈召见，解释要安治泰主教去职的理由。[20]

安治泰的地位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他决心打出一张最后的王牌，利用德国政府的势力，保住他的主教地位。19世纪90年代以来，安治泰一直在与德国政府秘密合作，他在德国对华政策上起的作用连梵蒂冈和"圣言会"总部也不十分清楚。梵蒂冈和扬森会长都当面警告过他不要在此事上陷得太深。但是，这位巴伐利亚小旅馆老

板的儿子,不仅对酒沉迷不能自已,而且对政治权力更是如醉如痴。他常常在下属面前夸耀自己的政治背景,就连梵蒂冈也不能对他奈何。中国政府更不值一提,只是在他的股掌之间随意玩耍,因为在柏林,他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20]所以,1896年的危机促使安治泰寻找走出困境的途径。对他来说,宗教信仰已成为第二位的因素,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

三、德国的炮舰政策与胶州湾事件

1890年俾斯麦首相辞职后,德国政府开始重视安治泰主教在华的活动。安治泰不仅被德皇誉为"基督教第一信使",而且被认为是能够对付中国政府的奇才。更重要的是,安治泰的教区恰恰在山东境内。早在德国统一之初的19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就开始有兴趣在山东寻求一个海军基地,或者至少是海军加煤站。但当时俾斯麦首相对海外扩张没有兴趣,他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种德国能够占主导地位的外交体系,所以将山东问题搁置起来,不想在海外殖民问题上与其他的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尚且,德国当时在华的经济势力太小,搞殖民活动得不偿失。但是德国政府,特别是海军部,对这个主意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对德国政府起关键影响的是著名的传教士、地质学家费尔南德·李希特霍芬(1833—1905)。此人先后赴华七次,写下了《中国地质》的巨著。李希特霍芬本人,在1873年就曾向德国政府建议在华东的舟山群岛寻求一个海军加煤站,以此作为对华渗透的跳板,但此建议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争夺日益剧烈,加煤站问题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申克公使此时属意山东的胶州湾。同时,德国军方的"海军派"势力大增。在提尔皮茨上将的领导下,"海军派"获得德皇威廉的大力支持,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海军。提尔皮茨是独具战略眼光的军人,他确信大英帝国已下定决心,防止德国势力的崛起。要成为全球性的大国,德国目前拥有的弱小的海军力量远远不足以同英

国皇家海军抗衡。俾斯麦去职后，他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体系也开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野心膨胀的所谓"全球政策"。因此，在华获取海军基地的问题不经意地成为这种"全球政策"的起点。

德国在1896年加入"三国干涉还辽"外交行动的目的，就是为日后与中国谈判海军基地埋下伏笔。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雄心已远远超过寻求加煤站，他考虑在中国创建一个"模范殖民地"，以向德国民众和帝国议会证明建立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德国政府与清廷做了几次非正式的会谈后发现，清政府对这种想法表示坚决反对。于是，在北洋大臣李鸿章1896年6月访问德国时，由外交大臣马夏尔向他正式提出在华获取海军基地的要求，李鸿章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李指出在条约体系下的"机会均等"原则意味着其他列强不会容忍德国单方面得益，必然要进行仿效。[22]几天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德国驻俄大使冯·拉多林亲王举行会谈。许景澄明告拉多林，德国政府如用强硬手段，中国方面将不得不予以军事回应。奇怪的是，拉多林将此谈话报告柏林，说是许景澄暗示非武力不能达到德国之目的。[23]许景澄早就开始关注胶州湾问题，数年前就曾写过请求在胶州湾设防的奏折。但当时清廷在大肆兴修颐和园，已动用了海军军费，胶州湾设防和建设中国自己海军基地的建议不可能得到实行。此次与拉多林谈话后，许景澄感到德方已露出动武的玄机，立即再次上书，请求考虑在山东半岛设防的建议。[24]

在柏林，各方政要和军方也在积极讨论在华设立海军基地问题。在舟山群岛和胶州湾之间，安治泰一直主张选择后者，他的动机与传教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真正促使德国政府下决心选择胶州湾的是中国海关的德籍天津总监德璀林。1895年11月3日，德璀林在柏林与帝国海军总参谋长威廉·克诺海军上将进行了极为秘密的会谈，德璀林以七大理由说明获取胶州湾的好处：

（1）进出华北自如；

（2）作为军港，自然地理条件极佳；

（3）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资源丰富；

(4) 有可能获取修建到北京的铁路租借权；

(5) 此地区的人民身体强健，头脑聪明；

(6) 气候条件适合欧洲人居住；

(7) 疏浚条件好，便于建立现代港口。[25]

至于用何种手段获取胶州湾，朝野上下都认为必要时应该动武。德璀林本人就倾向以突然的动作，非常的手段达此目的。德璀林做事一贯急躁，他的上司、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曾对他的为人有如下评价："德璀林一向过于乐观，做事不愿灵活通融，就像一块没有草芯的土砖。有时他做事的目的不明，动机令人堪忧，有时他的目的明确，但手段则未加深思熟虑。此人有些奇才，很有性格，但绝不会转弯抹角，如同一只穴鸟，戴上华丽的尾巴，冒充孔雀。"[26]

然而，德璀林的性格与德皇颇为相似，所以大受威廉二世的欣赏。在与德皇的一次单独谈话中，德璀林告诉威廉二世，中国人实际上只懂得用武力来表示的语言，颇得德皇的欢心。更有甚者，中国驻俄使馆任用的德籍参事克莱耶也在私下里秘密给德国大使拉多林出谋划策。克莱耶在 1896 年 11 月告诉拉多林，德国如不迅速采取行动，中方就会认为德国人软弱，今后更难让步。克莱耶还说，只有俄国人懂得怎样和中国人打交道，《中俄密约》便是明证。德皇收到这份秘密谈话的记录后，欣喜若狂，并在一旁批注道："说得对极了！德璀林跟我也这么说过！"[27]老牌"中国通"、前驻华公使巴兰德一开始对武力夺地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德国如果这么做，"早晚会引起中国民族情绪的激愤，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尽管如此，巴兰德也认为，如果决心已下，"胶州湾当然是最佳选择"。[28]而且动作要迅速，军事准备要充分，不能退却。[29]

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于 1896 年从海军参谋长的位置上主动退下，要求到远东任职和考察。他在华达一年之久，任德国东亚舰队司令。这一年对他来说收获颇丰，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在我出掌帝国海军部长之前的一年里，我有幸考察了德国在海外的利益，获益匪

浅。"[30]在远东任上,提尔皮茨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重大战略问题。他更加坚信德国如果没有国外的海军基地,就不可能保障对外商贸的正常进行。他几乎同时与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一起得出了"海军至上论"的结论——即未来的战争胜负取决于制海权。他相信只有刺激德国民众和议会对海外扩张的胃口,才能获得大量的经费,实现他的建立强大海军的梦想。此行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让他在中国沿海实地考察了众多的岛屿和港湾,他的结论与柏林不谋而合,胶州湾为最佳选择。1897 年回到柏林时,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已草拟好占领胶州湾的协定书。此时德国政府的人事有重大的变动,提尔皮茨很高兴地看到"全球政策"的支持者都身居要职。布洛夫侯爵成为外交大臣,此人以鼓吹"自主外交"出名。史利芬将军长期宣传备战,被任命为帝国陆军总参谋长,而提尔皮茨本人就任海军部长。前任海军部长霍尔曼海军上将因在帝国议会辩解不力,海军军费遭削减1200 万马克而被德皇解职。新任命的三个人配合默契,成为推行"全球政策"的三驾马车。他们的战略思想以英、俄为假想敌人,英国的海军和俄国的陆军是主要竞争对象。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夺取胶州湾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全球政策"也就在中国开锣登场。据德内阁的一份绝密文件,夺取胶州湾有六大目的:

(1) 有助于德国商贸活动的扩张;
(2) 保持远东国际关系的均势;
(3) 保护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
(4) 为海军扩军计划开道;
(5) 为德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作出的努力获取报酬;
(6) 在青岛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31]

占领胶州湾计划是在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德皇威廉二世从小就对航海有强烈的偏好,他积极支持了"海军派"的活动。甲午战后,日本从《马关条约》得到的种种好处令他羡慕不已,便也想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据德外交部的常务副大臣霍尔斯坦的记录,当时德皇

外交部自行采取行动，不管中外舆论。1897 年 1 月，在一封给霍尔斯坦的私人信中，海靖抱怨道："我国在中国非常孤立，并无支持我方立场的'三国同盟'。意大利使馆只剩下一个 24 岁的翻译，在北京无所事事；奥地利的公使尚未到达，而且奥国对华既无利益，又无特别的兴趣。"

海靖接着指出：

> 俄国人在华可以坐观其变……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我们的战舰不能像无家可归一样在中国海域游来游去，等待行动的机会。我们动手越晚，我们的信誉就越低，因为我们已明确提出过要求，又不敢加以实行。[35]

然而德国对华的野心通过德皇之口早已传遍全球。1896 年夏天，有一位"神秘的驼背"来华考察。列强在华的外交官很快就知道他是德皇的私人特使，德国基尔军港的首席工程师法兰齐欧斯。他的使命是对几个中国港口再作一次技术性的勘察，他也得出胶州湾是最佳港口的结论。德国政府此时焦虑万分，外交部和提尔皮茨对海靖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1897 年夏季，德皇与他的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询问沙皇对德占胶州湾的看法，尼古拉二世原则上没有提出异议。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柏林准备不遗余力地寻找借口。

四、巨野教案

在此关键时刻，安治泰主教的鲁南教区终于提供了机会。1897 年 11 月 4 日，安治泰在斯泰尔出席"圣言会"总部的会议。这天清晨，一封措词极短的电报送到安治泰主教手中，上面写着："能方济和韩理被害。"原来三天前，在山东巨野的磨盘张庄，两位"圣言会"教士韩理和能方济来访该庄的薛田资神父。薛田资在山东教案中异常活

跃,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当晚,两位外来神父下榻薛田资的卧室,夜半有村民30余人打进教堂,要找那个"大胡子"薛田资。薛多次参加民、教冲突,且被指控有强奸妇女之嫌,早在6月份,薛田资就报告过有人要杀他。[36]但这天晚上薛让出卧室,自己睡在守夜人的小屋,从而得以幸免于难,而韩理和能方济则被掳走,在野外被杀。

安治泰接到电报,不顾扬森会长的劝说,立即动身去柏林。他对此事的重要性当然是心知肚明,他知道以他的名义要求德国政府参与此教案的解决,必然给德国政府帮了大忙。数月以来,安治泰对德国未能采取行动大失所望,他背着扬森会长等人,催促德国海军采取占领行动。如前所述,他当时在鲁南教区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德占胶州湾的行动才能保他过关。同时,安治泰还企图借德军行动将教区从鲁南扩大到鲁东。

安治泰与德外交部早已有特殊关系,早在1890年就有外交部关于他的秘密记录。当时霍尔斯坦对他的评价是:"手段高强,极聪明,而且过于精明。"[37]安治泰在1894年正式提议过占领胶州湾。1896年3月,他曾经给外交部一封密信,抱怨说,德国至今没有行动,使他在山东的地位下降,因为中国人对德国政府光说不做的行为加以嘲笑。使外交部大惊失色的是,安治泰主教还威胁要让鲁南教区重归法国护教权。[38]德国政府在华的最佳借口是教案,当然不能容忍安治泰放弃德国护教权的想法。固然,安治泰其实也不是真心想如此,不过是给柏林施加压力。

安治泰于1897年11月7日到达柏林,他发现德国政府根本不需要他的呼吁而采取行动。德国军方早已箭在弦上,而德皇则更是欣喜若狂。实际上,在能方济和韩理被害的消息传到柏林的前一天,德皇还在训斥外交大臣布洛夫"不懂如何抓住过去几年里所出现的(在中国)的有利时机"。可是现在,就像霍尔斯坦告诉德国驻英公使保尔·海茨菲尔德所说的那样:

命运的安排,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害的消息就在陛下训斥

发生的一天后传到这儿……皇帝打电报给首相说，我们那种过于谨慎的政策……应该到此为止。[39]

德皇有意识地公开炒作他对两位传教士被害事件的愤怒，并公开邀请安治泰主教到刚刚落成的波茨坦新皇宫与皇家成员共进早餐。但是安治泰发现政府对他的扩大教区的想法并不赞成，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家，对扩张传教事业并无兴趣。他多次告诫海军同僚，占领胶州湾的目的不光是建立海军基地，更重要的是建立"青岛模范殖民地"，所以要避免卷入在山东的民、教冲突。由于胶州湾的管理工作由海军部负责，所以没有必要增加帮助安治泰主教扩大教区的负担。[40]

德皇在欣喜之余，不管政府的态度，直接训令驻华的东亚舰队司令棣利士海军上将，要他占领整个山东半岛。此命令与海军部和政府的计划严重冲突，提尔皮茨不得不与首相霍亨洛赫亲王一起，以避免对华全面开战为理由，劝说德皇收回成命。[41]

五、中方的回应

中国政府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企图虽然早有所闻，但对突发的巨野教案造成的后果还是措手不及。清廷的第一个反应是迅速破案，不给德方以口实。据当事人薛田资神父事后回忆，地方官在山东臬司毓贤的领导下，第二天就开展搜捕，并立即抓获40多人，进展神速，进而在五六天之内就确认了3名主犯，[42]但是中方的及时行动已不可能阻止德国的海军行动。在柏林，霍亨洛赫首相收到电报，称沙皇尼古拉二世有可能不履行1897年6月份与德皇达成的默契，已派俄舰驶往胶州湾。德皇亲笔写信给首相说："中国人不是勇士，我对中国人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我们早就应该迈着坚毅的步伐大步跨入山东，我相信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43]

为了强化德国的决心，在棣利士东亚舰队从上海起锚开航之时，德皇居然让他的弟弟亨利亲王再率一支舰队从德国出发驶向中国。棣利士舰队三日之内便到达胶州湾。当时守卫胶州湾的章高沅以为德舰不过是友好的暂时停泊，当德舰派遣600余名官兵登陆之后，阻止和抵抗却为时已晚。棣利士命令章高沅48小时之内退出胶州湾，清廷已惊慌失措，命令章高沅不得抵抗，以免衅自我开，所以德国占领胶州湾成为既成事实。[44]

朝廷内部争论非常激烈，恭亲王奕䜣忍无可忍，下令调兵备战，同时召见海靖公使，据理力争，要求德国撤军。但多数枢臣认为中国不堪与德一战，很多人甚至相信其他列强不会坐视不管。山东巡抚李秉衡积极主战，他与一大批御史联名上书要求朝廷开战。御史虽无实职，但作为朝廷谏议官，对民心和朝政仍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在上书中严词抗争，指出德舰队来胶州湾并不是为了教案，而是意在夺地。他们认为，指望列强支持的想法过分天真，因为列强各怀鬼胎，实不足恃，俄国沙皇恐已私下支持德皇的行为。所以，依靠和平解决是不可能把德人赶出胶州湾的，而其他列强必随之跟进，长久以往，中国必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或有转圜的机会。[45]

据《翁同龢日记》载，恭亲王奕䜣义愤填膺，竭力要求决战。[46]但朝廷犹豫不决，坐失战机，主和派一味强调"以夷制夷"的好处。李鸿章甚至建议以离间俄、德的办法，迫德退兵。他的根据是俄沙皇已派舰驶向胶州湾，当时还有两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军官在汉口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据称英、日有意联手阻德霸占胶州湾。[47]朝廷一等再等，期望此计能成功，开战的机遇迅速逝去。

不久就发现，沙皇派舰是假意对德的行动不满，而真意是要租借旅顺口。俄国的借口是去岁曾获中国政府允许让其远东舰队在青岛不冻港过冬，今胶州湾已被德占领，只好另择一地，其实俄国早就觊觎旅顺口。英国当时的注意力在北非与法国进行争夺，根本无暇顾及胶州湾事件。而日本名为支持中国，实际上想租借福建的厦门。

直到 1897 年年底，中方才承认外交方面的彻底失败。中、德胶州湾谈判不得不正式开始，双方谈判的时间拖得很长，达 4 个月之久。主要是德方有意拖延，不断提高价码。德国舰队来华，本意不在解决巨野教案，而是为了租借整个胶州湾，并要使青岛成为第一个在远东的德属殖民地。与此同时，各列强根据“机会均等”原则，也开始提出各种租借要求。1898 年 3 月，俄国租借到旅顺口，而英国宣布租借威海卫。德国方面对此无话可说，而中方也束手无策。

《胶州湾协定》于 1898 年 3 月签订，德国获 99 年租借权，并有权修铁路和开矿山，胶州湾的最大城市青岛成为德国海军部直接管辖的准殖民地。更有甚者，海靖公使还利用巨野教案，迫使清廷解除巡抚李秉衡的职务。德国在山东的戏剧化的行动至此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胶州湾事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触发了列强强占中国沿海各港口的一系列行动。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在《胶州湾协定》签字之前就已组建了青岛殖民政府，他的本意是创建一个“模范殖民地”。他甚至考虑过在青岛帮助中国重建海军，以扩大德国海军在华的影响。然而德国的行动引发了山东以至中国全国各地的反德烈火，提尔皮茨在胶州湾的很多长远设想都难以得到实行。

胶州湾事件对中国内政和外交关系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国内政治上，它是“百日维新”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此之前，康有为多次上书清帝，都未受到重视。胶州湾事件给他的“强学会”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在他的政论文中，康多次把中国比作已被瓜分的印度和波兰。1898 年春，几个德国士兵在一座孔庙里毁坏圣像，康有为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公车上书”大声疾呼变法。胶州湾事件后，中国确实面临被肢解的危险，因而康梁的变法学说更有号召力。在受到翁同龢的引荐之后，康有为与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了第一次对话。恭亲王奕䜣有意回避，指派荣禄等重臣参加。据康回忆，荣禄开宗明义便强调“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的回答是：“祖宗之法为保祖宗之地，而今日祖宗之地已不保，何以祖宗之法不能变也？”荣禄哑口无言。[48]

六、清廷的困境与义和团的兴起

德占胶州湾使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在全国各地滋生。山东巡抚李秉衡为人清廉,忠贞爱国,竭力主战不成,反而被革职,地方上一片哗然。海靖公使是李秉衡解职背后的主谋,在他给柏林的报告中也承认,尽管中国地方官勾心斗角,互不团结,但在李秉衡去职一事上表现出罕见的"团队精神"。[49]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也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员,但他也不免要步李秉衡的后尘,不过他的任期更短,连一年都不到。1898 年以后,山东群情激愤,对德占领胶州湾和修铁路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高密和日照等地曾发生抗德的暴力事件,德国在青岛的军事当局立即派遣远征军,对当地百姓大肆报复,杀死多名村民,焚烧大批房屋,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清廷面对山东的骚乱束手无策,对德军的暴行无法制止。此时,一些秘密社团纷纷起来组织各种反洋活动。由于德占胶州湾以教案为借口,秘密社团自然以传教士和教徒为主要打击目标。1898 年 5 月间,抗教活动在山东风起云涌,巡抚张汝梅向朝廷多次报告民、教冲突日趋严重。他认为这些冲突本来是由于教民依仗教士势力,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而造成的。他强调说:"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50]

此时,清廷主要关心的是在山东避免再一次可能引起割地、赔款的教案。尽管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是第一次割地,此次胶州湾事件与以往的割地不同。香港、台湾均不在大陆本土,而胶州湾不仅在本土,而且战略地位重要,离清廷的权力中心也相距不远。胶州湾事件已打开了列强以新的方式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潘多拉盒子"。此外,过去的割地多是战败的结果,而胶州湾的失去仅仅是由于一个不起眼的教案。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逊正确地指出海靖公使可谓"革命化的列强对华政策"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胶州湾事件

开了列强对华新政策的先河。莫理逊的报道有讽刺德国的意思，然而，海靖公使夫人在日记中却认为，海靖对莫理逊关于他的评价肯定会感激不尽的。因为胶州湾事件后，柏林外交部对海靖的表现非常不满，立即将他调到墨西哥任公使。海靖夫妇认为此项调动太不公平，海靖的辛苦成果将被他人、也就是继任的现驻墨西哥公使克林德男爵来享用。[51]

再者，胶州湾事件迫使中国政府意识到在不平等条约的牵制下，要防止教案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列强在华争夺铁路修筑权和开矿权是以中国领土作为贷款的抵押。胶州湾事件表明列强已开辟了一条新的瓜分途径，即以活人也就是传教士作为割地赔款的借口。从清廷的角度看，传教士实际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排头军。在华的传教士实际上等同一种最糟糕的"移动人质"，因为根据条约，他们在华行动自由，不受政府干扰，但一旦出事，中国政府却要担当全部责任。此外，传教士中还不乏宗教狂热分子，对牺牲自己，报答上帝之恩，全然不在乎。清廷因而感到对付教案无能为力，总理衙门对此更是灰心丧气。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就在冥思苦索解决办法，将教案与外交关系分开来处理。比如，有人曾提出请罗马教廷派一特命全权使节驻京，专门处理传教问题，这样就可以把教案与列强在华的争夺脱钩。但是，基督教并非天主教一家，正如某御史在1896年就指出的，西教分天主、耶稣(新教)两门，互不买账，罗马教皇对新教并无约束力。因此，只有劝西方各国同意在华设双方都能接受的"总教士"名目，才能有效地把教案和外交分开。此说虽有道理，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总理衙门只好作罢。[52]

既然中国政府管不了传教士的活动，所以只好严格制定地方官处理教案的条规。比如在1896年就规定："如系事起仓猝，迫不及防，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其保护未能得力，系自办理不善，应照办事不力降两级留任。"此类规定并未触及民、教冲突的实质，地方官当然无所适从。[53]

所以在1898年山东教案迭起之时，清廷只能不断地向巡抚张汝梅和他的继任毓贤下指示，严饬镇压教案，但民、教冲突却越演越烈。[54]朝廷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1899年春季，总理衙门又想出一个新招，将处理教案的权力逐级明确地下放到地方官手中，从而建立起一种岗位责任制。此计本由总理衙门与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协商以后所定下的，这就是所谓处理民、教冲突的"五条规定"。该规定提出：

> 兹因欲使民教相安，便于保护起见，议定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数条如下：分则教中品秩。如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护理主教、印务之司铎亦准其见督、抚（如主教不在）。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见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55]

这种新规定引起地方官的普遍不满，因为一方面，北京朝廷不过是将护教责任推给地方，没有在根本上解决体制上的缺陷。另一方面，这种规定实际上还削弱了地方官处理民、教冲突的权威，秉公办案成为不可能。所以总理衙门的五条规定，尽管用心良苦，只能产生负面的实际效果。

教士地位提高，面地方官地位的下降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抗洋运动在山东发生。很多秘密社团于1899年先后出现，这些社团自称"义和拳"或"义和团"。而在英语世界里，第一次出现"拳民"(Boxer)的提法是在1899年10月。

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义和团"组织。这些秘密社团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利用武术活动传播反洋思想和发动民众。地方政府的势力越弱，秘密拳会的吸引力就越大，其中有些拳会确实有很长的反清历史。为了争取民众支持，这些拳会有意识地掩饰其反叛的宗旨，只以仇洋为口号。它们在组织上有严密的规章，思想上有神秘主义的特点，尤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到1898年德占胶州湾之前，应

该说这些秘密组织虽然开始活跃,但尚未找到一个统一的纲领和发动民众的战略,而胶州湾事件对他们的活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898年10月,直隶和山东交界的地区出现了以拳会为主导的运动,第一次打出了"顺清灭洋"的旗号。[56]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梅花拳会"的师傅赵三多。一般来说,中国农民非到民不聊生之际,对反叛朝廷的活动总是心有余悸的。但赵三多打出的口号是有报效朝廷的意思,于是乎四乡百姓风起响应。直、鲁交界地区的冠县和威县本是法国护教区,赵三多实际上是借胶州湾事件,打击整个传教活动,当然深得民心。当地的一位法国传教士芒冉在1900年3月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这一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情况,据称:"义和团来自山东,但在直、鲁交界地区发展得如火如荼。为什么呢?就因为德国占领了胶州湾。他们对我们(即法国、意大利的传教士)也开始十分不友好,因为这些中国人心中怒火在燃烧,他们认定我们天主教会是外国侵略的先头部队。"[57]

上海出版的一份法文报纸在1899年12月29日也指出:"德国租借胶州湾,使得中国的反叛者攻击天主教会找到了政治理由。"[58]甚至安治泰主教本人也不否认山东义和团动乱与德国占领胶州湾有直接关系。1899年6月,安治泰在受维也纳的一家报纸采访时承认:"租借胶州,和随之而来的租借旅顺港与威海卫,在拳乱之前不久发生,实为触发中国人激烈反抗的导火线,北京的朝廷更为愤怒。"[59]从种种迹象来看,赵三多的"顺清灭洋"活动已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鲁西南也活跃着一支不同的秘密社团叫"大刀会"。直、鲁交界处拳会多由贫苦农民参加,而鲁西南的"大刀会"首领多是富裕的地主。甲午战后,鲁西南社会秩序混乱,盗匪盛行,一些地主士绅开始自行组织起地方武装,保卫身家财产。"大刀会"自称曾从某和尚处学到刀枪不入的"金钟罩"法术。[60]"大刀会"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成员不多,而且既不反清,也不反洋,地方官对"大刀会"维持当

地治安的活动褒赏有加。

山东巡抚张汝梅去职后,由毓贤接任。毓贤曾任曹州知府,对当地"大刀会"的首领多有扶掖。然而,此时的"大刀会"也开始反洋活动。有证据表明,"大刀会"加入民、教冲突与不法教民对"大刀会"维持当地治安不满有关。一些市井无赖被"大刀会"整治以后,加入教会,并恃教士势力进行报复。1896年时矛盾已经激化,"大刀会"在鲁西南攻打教堂和袭击教民。当时毓贤已任山东臬司,他奉朝廷之命对"大刀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大刀会"风波暂时平息。德占胶州湾以后,"大刀会"借机东山再起,并专以反洋教为己任,所以"大刀会"迅速地加入山东拳会的反洋浪潮是势在必行。

应该指出的是,反洋群众运动起于山东是自发的,但是他们在1898年以后采取的新的政治口号"顺清灭洋"却并非源于山东,而是受到四川反洋教运动的直接启发。19世纪90年代中,四川的民、教冲突也很激烈,19世纪90年代末在大足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运动。大足起义的首领是余栋臣,绰号"余蛮子"。余栋臣领导的运动第一次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清兵入关建立政权以后,中国民间的反清情绪一直存在,内外交困的清廷对余栋臣刻意将满人与洋人分开的作法倒有点沾沾自喜。表面上,清政府对余的起义也进行了镇压,但手段并没有像对付一般反清起义那样残酷,而是剿抚并用。四川是内陆省份,洋人不多,余栋臣的灭洋活动尚不至于造成割地赔款。同时,列强在四川也没有势力范围。

德占胶州湾以后,全民仇洋情绪大增,清廷感到对余栋臣的活动不能再容忍。余栋臣起义被镇压下去,但清廷只是把他捉拿入狱,并未处以极刑。余栋臣起义与山东的拳会动乱本无直接关系,但余的行动纲领和口号直截了当,毫无神秘主义的光环。据现存的余栋臣散发的一份传单,余对德占胶州湾痛恨不已:"海禁大开以来,泰西传教通商,凡我二十一行省,率土俱杂外洋,积久竟忘庇荫,气习遂至猖狂,不应欺凌乡党,不应侮弄祠堂,不应袒护教民,不应动摇边疆。剪灭孔圣正教,竟尔败坏五常……予实义愤所迫,委身以报君王。刻下

山东被害，志人谁不心伤。今日兴举义兵，特将一纸宣扬。”⑪

余栋臣的纲领、口号和策略对北方的拳会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898年，大足起义的消息传到山东，一些山东籍在四川的官员起了传播作用。大足县令丁昌燕正是山东人士，而且对洋教有切齿痛恨。因此，西方学者在传统上将仇洋单单归因于山东百姓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并不是由于山东民风保守，才有仇洋偏见，而是由于德国强占胶州湾，才把四川和山东这两种本无关连的反洋运动结合在一起。“余蛮子”入狱之后，山东拳会按照他的做法开展有效的斗争，对日后山东的局势有深远的影响。

---

①关于伯蒂的背景情况，见 Hamilton, Keith: *Bertie of Thames, Edwardian Ambassador*.

②Malozemoff, Andrew: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Chapter VIII.

③关于李鸿章受俄国贿赂一事，见 Romanov: *Russia in Manchuria*, p.105.

④*The Times*, 5 May, 1898.

⑤窦宗一：《李鸿章年谱》，卷5，第113页。

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912页。

⑦Paul Cambon to Delcassé, May 11, 1899, *DDF*（法国外交文件），vol. 15, pp. 273—278.

⑧中外学者长期以来都认为德国在“全球政策”的实行过程中与“圣言会”有直接的合作，此说不确。在英语世界里，对安治泰的背景和经历几乎一无所知，拉杜雷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只是很简单地提过一下，而对安治泰的助手福若瑟更不熟悉。1972年哈佛大学出版的《德国在山东》一书里，作者施莱克在介绍“圣言会”背景时重复拉杜雷特的原文。从“圣言会”史家的德文著作里，我们才知道，与德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是安治泰本人，而不是“圣言会”。

⑨⑩关于安治泰的背景和经历，见 Rivinius, Karl: *Weltliche Schutz and Mission*, Chapter 5 and Bornemann, Fritz: *Arnold Janssen, der Gründer des Steyler Missionswerkes 1837—1909*, Chapter 4. 关于1896年的“圣言会”鲁南教区的危机，见 Bornemann，同上，第96—97页。

⑪Bornemann，同上，第147页。

⑫Latourette, Kenne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306.

⑬⑭Rivinius,同上注⑩,第434—435页。

⑮Kuepers: *China und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ud-Shantung*, 1882—1900, p.78—82. Bornemann, 同上注⑩, 第248—256页。

⑯Bornemann, 同上注⑩, 第151页。

⑰《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6页。

⑱Bornemann, 同上注⑩, 第187—195页。

⑲德国学者以为安治泰整天喝的是"米酒",我估计在鲁南地区,安治泰恐怕主要是喝高粱、白干一类的白酒。见Bornemann,同上注⑩,第410页。

⑳Bornemann,同上注⑲,第295—306、第409—418页。

㉑同上,第410—411页。

㉒*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GP), vol. 14, p.27.

㉓Bornemann,同上注⑩,第24—25页。

㉔《清史稿》,卷466,《许景澄传》,第10247页。

㉕*GP*, vol. 14, p.36.

㉖Schmidt, Vera: *Gustave Detring (1842—1913) im Dienste Li Hungchangs*, pp. 81—82.

㉗*GP*, vol. 14, p. 39.

㉘*The Holstein Papers*, vol. 1, p. 139, Memoirs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㉙Michael, M. in Kuo, Hengyü ed.: *Von de Kolonialpolitik zur Kooperation*.

㉚Tirpitz, Alfred von: *Memoirs*, pp. 450—451.

㉛Feng, Djen Dia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898—1901*, pp. 35—37.

㉜*The Holstein Papers*, vol. 1, pp. 178—179.

㉝Bülow, Prince von: *Memoirs*, pp. 450—451.

㉞刘体仁:《异辞录》,第14页。

㉟*The Holstein Papers*, vol. 4, pp. 4—5.

㊱关于巨野教案的近期研究,见路遥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113页。

㊲Winzen, Peter: *Bülows Weltmachtkonzept*, p. 82, note 97.

㊳*GP*, vol. 14, p. 25.

㊴*The Holstein Papers*, vol. 4, p. 49.

㊵Rathenhof, Udo: *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chen Reiches, 1871 bis 1945*, pp. 155—156.

㊶The Holstein Papers, vol. 4, p. 51.

㊷Kuepers，同上注⑮，第136—137页。

㊸*GP*, vol. 14, p. 79.

㊹《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页。

㊺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第432—433页。

㊻《翁同龢日记》，卷36，第111页。

㊼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第431页。

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38页。

㊾Kuepers，同上注⑮，第146页。

㊿《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页。

(51)Heyking, Elisabeth von: *Tagebücher aus Vier Weltteilen*, p. 287.

(52)《光绪朝东华录》，第3363—3364页。

(53)同上，第3786页。

(54)《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7、19页；《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1，第76、第82—83页、第109、308、405、434、447、466页；《清实录》，卷413，第393页。

(55)《光绪朝东华录》，第4327页。

(56)关于这个秘密社团，见路遥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三、六章。

(57)路遥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246页。

(58)同上，第79、245页。

(59)《教务教案档》，卷6，第150页。

(60)《大足县志》，卷4。据《义和团辞典》，"保清灭洋"的口号最早由长沙士绅谭培章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的。

(61)《近代史资料》，卷1，1958年版，第131页。

第四章

意大利的戏剧性表演

一、暧昧的意中关系

如果说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戏剧式的行动让中国清廷感到束手无策，对列强这种新的争夺方式感到绝望无助，另一个随之而来的列强对华提出的领土要求则迫使中国政府下决心不惜一切开战。这个不速之客是意大利，它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连一个正常的借口都没有。意大利虽然在19世纪末也积极参与了列强的扩张殖民地的活动，但它是列强中最弱者之一。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以后，主要的殖民兴趣在非洲，对远东并无企图。意大利的殖民扩张分子组织了种种协会，比如地理学会、殖民研究所、海军同盟以及造船业主协会等等。他们在非洲到处考察，寻求殖民机会。当时列强各国的内部，一般都有两派帝国主义分子，一派是"非洲派"，一派是"亚洲派"。而意大利只有"非洲派"，并无"亚洲派"。来自西西里岛的政治家克里斯比对殖民扩张特别热心，他希望让意大利的农民重新定居到北非的埃塞俄比亚，既能获得土地，改善生活，又不会受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克里斯比任首相期

间实施的北非政策缺乏实力基础。1896 年,意大利殖民军在北非的阿多瓦战役中大败。埃塞俄比亚人在皇帝美内利克的领导下,击败了由 16500 人组成的意军,并消灭近 6000 人,这个死亡数字比意大利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所受的损失还要大,尽管战死的士兵大多数是意大利殖民军在当地的厄里特利亚招募的。阿多瓦一役,意大利的国际威望大跌,国内一片哗然,克里斯比内阁也随之倒台。此役使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政策不得不作重新调整,那些扩张主义者对非洲失望之余,对亚洲的兴趣开始大增。

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教廷在意大利统一之后,一直在罗马的地位等问题上矛盾重重,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不能积极地为意大利的国家利益服务。意大利在华也有一小批传教士,但他们只能持法国护照,方可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意大利传教士在华北也很活跃,在民、教冲突中不比他国同僚逊色。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处的冠县,意大利传教士就是著名的"梨园屯教案"的主谋之一,而此教案正是赵三多的义和拳运动发展的契机。意大利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未受本国政府过多的注意,直到克里斯比内阁于 1894 年成立时,中国才开始成为意政府的扩张兴趣之一。克里斯比组阁前,一位民族主义的埃及学教授厄内斯托·沙巴莱里,已经在佛罗伦萨成立了一个旨在支持意大利海外传教活动的全国性的协会。沙巴莱里教授知道意大利政府不好公开出面支持这个协会,于是请了各方名流和政要作为会员,竭力鼓吹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些名流中有热亚那公爵和著名政治家奥古斯特·孔第等。克里斯比首相受这个协会的影响很大,他对宗教信仰本身并不狂热,但对法国垄断护教权一直心存不满,所以下决心发动挑战。①

意大利统一后的政治体制衰弱,地区差别很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 19 世纪末期,国内的保守势力试图以海外扩张为契机,推翻统一以后的第一位首相卡米洛·加富尔所创建的"自由主义的意大利"的政治模式。加富尔在统一之初就试图打进中国,并多次向中国政府炫耀意大利是基督教——罗马文明的发源地。

1866年以前，意大利国王在华只有两个非正式代表，一个是詹姆斯·豪格，另一个是约翰·登特。前者常驻北京，后者待在香港。这两个人均系英国公民，是加富尔首相的私人朋友。[2]1864年，当时的首相马可·闵凯蒂决定向中国和日本派遣一支庞大的代表团，闵凯蒂对中国的主要兴趣是蚕茧和生丝贸易。但代表团尚未出发，闵凯蒂内阁就已倒台，所以由其继任者拉马莫拉首相重新组团。拉马莫拉指派意大利海军舰长维多里奥·阿明江为代表团团长，并请意大利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著名的达尔文学家菲力波·菲力比博士为主要成员之一。阿明江舰长率团于1866年到达北京，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签订了商务条约。尽管阿明江大言不惭地吹嘘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中国人知道如今的意大利绝没有当年中国史书记载的"大秦国"——即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旧称那样的风光。中国人允许意大利派驻北京公使主要是从"以夷制夷"的概念出发，并不表明对意大利国家威望的特别尊重。

建交后，两国关系一直没有长足进展。184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意大利在华的经济活动多以非法经营为主。直到1898年，意大利人在华只有一项事业超过他国，那就是对苦力贸易的垄断。意大利商人在这种非法贩卖人口的生意中获利颇丰，几乎控制了向南非和北美的人口贩卖。[3]意大利海盗在中国海域也经常出没，成为意中关系的一块心病。但在两国的正式关系上，意政府对双方商定的很多项目都不能有效地实行。意大利在华的领事报告和政府出版的关于远东的文件对意大利的企业界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私人资本对华投资的兴趣不大。比如说，意中双方早就有意共同勘定中、意之间的航海路线图，而意方对此并不积极，中方也逐渐失去兴趣。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对中国一般情况都不够了解，很少有人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文化。

因此，当1896年的阿多瓦战役惨败之后，意大利扩张兴趣开始转向远东时，才发现意大利在远东的列强争夺战中毫无优势。此时，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快，大企业开始关注中国市场。

生丝贸易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因为意大利的丝绸产品在欧洲市场颇具竞争力。据当时的一项调查报告，意大利丝绸工业每年需从中国进口2万团生丝，但由于没有意、中直接通航的路线和航班，意大利的生丝进口商只能与德国劳埃德航运公司签约，走德国的不莱梅经热亚那到上海的航线。这种运输方法造成成本昂贵，进口生丝的利润不高。[4] 1895年，在企业家曼弗里多·坎帕里奥的倡导下，122家大企业在米兰创建了"意大利工业界在华和远东的合作协会"。会员中不乏在工业界有执牛耳的大公司，如意大利信贷银行、巴斯托基公司、意大利冶金公司等等。由于这个协会的建立，意大利对华的经济渗透才算正式开场。[5]

1895年9月，著名的帝国主义组织——意大利地理协会在罗马召开年会。这个协会对意大利殖民政策的取向一直有重大的影响。正如史学家理查德·鲍斯沃斯所指出的："表面上看来，意大利地理协会是风雅的学术团体，其实不然。自1880年以后，帝国主义风行，而地理协会总能在关键时刻引导意大利扩张野心的取向。"[6]这个协会的成员有很多政要，比如圣·朱里亚诺等。在这次年会上，会员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加强在华的领事工作，为工商界提供积极的服务，同时也要求私人资本主动提出在华投资的建议，并请政府考虑建立从意大利的热亚那到上海和横滨的直航路线。[7]当时意大利在华的合法经济活动与其他列强不可同日而语，连比利时这样的小国都在中国的铁路事业中有大量的投资。在华做生意并不容易，代价很高，而且要有多年经验的积累。意大利在中国既无政治影响力，又无金融杠杆，所以要获得中国政府的项目合同更是难上加难。在上海开展航运业务的意大利公司——"意大利工业联合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中惨淡经营，入不敷出，终于在1899年倒闭。[8]

然而，北意大利的工业化的强劲势头，并不能轻易改变政府对海外扩张的政策。同时意大利政府的外交体制也不能适应时势，这个时期的政府多为南方人把持。克里斯比上台之初，试图对外交部进

行改革，但收效甚微。据萨瓦戈回忆，此时的外交部与19世纪60年代的机构差不多，已很难应付意大利殖民主义在全球扩张政策的需要。外交部的内部分工仍是老一套，无非是一分为三，即内务、外交和领事部。外交部招募的官员也以贵族子弟为主，考试内容陈旧，注册考试的费用昂贵，一般平民根本付不起。不少高级官员完全不称职，萨瓦戈记得一位部级官员整天在办公室里吹口哨，而另一位则忙着玩彩票。[9]克里斯比的体制改革重点是重新恢复废置已久的秘书长位置，便于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但是，意大利议会对政府的工作干预很大，所以秘书长一职只好由资深的老年外交官担任，因为这类人一般性情温和，不怕被议会胡搅蛮缠。政府的工作效率之低，使得工商界对政府缺乏信任。即便是罗莎第在华组建英意"福公司"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也很有限，而意大利工商界也不愿贸然加入。罗莎第在意大利出售的"福公司"股票，只有一家公司认购，大多数的银行和企业认为意大利在中国既无重要的商业利益，又无租借地，风险太大，所以"福公司"的意方人员多是工程技术人员。意大利驻华使馆常常接到政府的指示要"保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积极促进在华商贸活动"，而在京的意大利外交官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政府并未采取积极的态度。[10]不幸的是，"福公司"本来是意大利人牵的头，最终却成为英国独资公司，意大利工业界对此极为不满。

1898年4月，罗莎第的合伙人，卡洛·鲁迪尼议员在下院正式提出要在中国获取一个港口的建议。他认为其他列强在华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租借地。外交大臣威斯孔第·维诺斯塔在议会作证时说意大利在华采取行动的机会尚未到来，他说："我们此时还不能仿效他国单独采取行动。"[11]事实上，外交部此时已在考虑这个问题。德占胶州湾以后，中国似乎已走向被瓜分的道路，意大利当然不能放过这一机会。萨瓦戈侯爵当时任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他一开始也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政府长期以来对华事务漠不关心，意大利不可能一下子取得突破。萨瓦戈向外交大臣建议在采取行动前应做好充分准备，比如要设法控制意大利海盗船在中国海域的活动，加强领事

工作，搜集多方情报，并在中国改善意大利的形象。当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成功后，萨瓦戈看到列强并没有反对德国的做法，便开始向罗马建议立即在中国寻求一个租借地。[12]

意大利政府一开始就考虑在东南沿海寻求一个港口，最好是在宁波与厦门之间，因为这个地区距离列强的势力范围较远，争议不会太大。收到萨瓦戈的电报后，意政府决定派遣一艘大型巡洋舰"马可·波罗号"驶向中国海域，意大利官方宣布"马可·波罗号"驶华是为了加强保护意大利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当时在上海曾于 1898 年初发生过限制生丝出口的事件，中国政府担心生丝的大量出口会影响到丝绸成品的销售。两江总督刘坤一宣布对蚕茧和生丝的出口不予办理火灾保险，以加大这些产品出口的风险，减少出口额。意大利借此事派遣巡洋舰，于情于理都太过分。"马可·波罗号"的真实任务是勘察中国沿海的港湾，主要是三沙、台州和三门湾。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大利的举动当然是具有挑衅性的，当时限制蚕茧出口并非针对意大利一国，其他列强并无如此激烈的反应，但意大利对此却很敏感。

萨瓦戈的计划不久就搁浅了，因为意大利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年春季末，米兰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军方在意大利国王的支持下，向大街上游行抗议的平民开枪，死伤多人。政府本来以为这场游行会演变成武装暴乱，事后的调查发现并无任何暴乱的证据，鲁迪尼内阁被迫引咎辞职。鲁迪尼是 1896 年阿多瓦战役惨败后从克里斯比手中接过内阁的，两年来，鲁迪尼试图在政治保守派和殖民政策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对海外扩张的兴趣很浓，对鲁迪尼的谨慎小心的殖民政策大为不满，于是借鲁迪尼辞职之际，任命一个军人来组织保守派政府，将他的军事副官路易基·佩鲁推上首相的宝座，并以海军上将菲利切·卡内瓦若取代温和派的威斯孔第·维诺斯塔成为外交大臣。新首相和外交大臣都是国际关系的新手，对列强长期在华争夺的微妙关系缺乏了解，因而在政策上犯错误是不奇怪的。

翁贝托一世的很多顾问都告诉国王,意大利在阿多瓦战役丢脸以后,民气不振,国际声望也很低,因而需要寻找另一个机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挽回意大利的面子。1897年在希腊发生的克里特岛危机中,国王欣然命令意海军参战,他甚至幻想过把罗德岛从土耳其手中夺走。而此次在中国有可能获取租借地的机会,当然不愿轻易放过。军政府上台伊始,就开始选派得力的外交官使华。新公使人选是老牌非洲问题专家贾科莫·马蒂诺,时任驻开罗公使。马蒂诺家族是外交世家,早在西西里王国时期就起过重要作用。这个家族成员与埃及王公的关系十分亲密,其中有一人居然在1908年被任命为"马蒂诺帕夏"。马蒂诺公使虽然能力非凡,是外交部的得力干才,但他对远东却一无所知。此外,他的生活方式糜烂,对工作颇有不良的影响。在开罗时,他已与一犹太女子同居,并生一私生子。在使华的途中,又在日本横滨临时找了一个姘妇。萨瓦戈时任驻华临时代办,他在开罗曾与马蒂诺共事多年,知道他的上司是一个年届60岁的老色鬼。[13]

马蒂诺为了表示他来华的重要性,特地乘坐"马可·波罗号"巡洋舰。当萨瓦戈到天津迎接时,这位新公使下船便说:"我们要立即采取占领行动!"萨瓦戈大吃一惊,忙问"占领何处?"马蒂诺说:"让马可·波罗号舰长决定。"他并郑重其事地说:"萨瓦戈,你的光荣时刻将要到来,你将成为将意大利三色旗插上中国领土的第一人!"萨瓦戈感到啼笑皆非。马蒂诺甚至解释说,意大利人做事动作迟缓,需要外力的推动。他还说国内政治形势在急剧地向右转,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云云。[14]所以从一开始,马蒂诺公使就把他的任务看得过于简单,情绪上也过于乐观,而实际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二、三门湾最后通牒的由来

马蒂诺、萨瓦戈和"马可·波罗号"舰长到达意大利驻华使馆后,立即坐下来看军事地图。从直隶的渤海湾一路看下去,很明显,北方

沿海的外国兵舰已经很多，而浙江地区则无人问津。于是，他们三人迅速决定在浙江沿海寻求一个租借地。其实，意大利人对浙江很早就开始关注，因为这个地区是中国生丝产量最大的基地。意大利的米兰在19世纪末已成为欧洲丝产品贸易的中心城市，自然对浙江格外青睐。1898年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出版了一本书，称浙江是丝绸之都，所以在浙江沿海获取一块租借地至关重要。[15]在另一本关于浙江的地理和经济环境的专著里，学者加里教授对浙江的风土人情、气候条件和经济情况都做了详细的研究。

"马可·波罗号"舰长到浙江沿海进行了一番勘察，他认为三沙岛最佳。在给马蒂诺的电报里，他说"三沙岛第一，宁波第二，三门湾第三"。马蒂诺公使本来答应由舰长决定租借何处，但此时突然坚持三门湾第一，并将这个意见电告罗马当局。发电之后，萨瓦戈即发现马蒂诺公使已离开北京，据称是应李鸿章的一个儿子的邀请到长江流域打猎去了。萨瓦戈收到罗马方面的电报，询问马蒂诺公使为何在选择租借地问题上与"马可·波罗号"舰长的意见不一致，但萨瓦戈已不知公使的去向。事后，马蒂诺从天津返京时，萨瓦戈才知道他到横滨接其日本情妇去了。萨瓦戈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也不知道马蒂诺为何一心主张三门湾。但马蒂诺公使回京后，萨瓦戈就意识到他的临时代办工作可以结束，他很高兴能重返意大利。几个月以后，三门湾最后通牒事件爆发的过程中，外交部再度调查"谁做的错误选择"，萨瓦戈在罗马为"马可·波罗号"舰长做了辩护，错误在公使，不在舰长。[16]

马蒂诺到华以后，虽然情绪激动，跃跃欲试，但此时"百日维新"已经开始，他只好将三门湾一事搁置，静观事态的发展。马蒂诺对中国政情一无所知，所以也没有参加其他列强外交官在维新时期的活动。然而，他乘坐"马可·波罗号"来华的做法也令中国政府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海军示威。所以在北京的开头几个月，马蒂诺无所事事，只能等待机会。变法失败以后，西方外交官对慈禧太后的重新亲政普遍不满，而马蒂诺则认为中国政府在戊戌政变后已

变得非常虚弱，正是意大利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实际上，他对政变后满族权贵的仇洋情绪毫无感觉。1898 年 12 月，马蒂诺电告罗马当局，说："我们在华的预备工作……已告完成。""马可·波罗号"舰长"也同意三门湾为最佳选择"。[17]

罗马的军政府接到此电后，大为兴奋，立即开始紧张的外交活动，其中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是首要任务。美国政府于 1898 年宣布了中国"门户开放"政策，英国表示支持，而德、法、俄却态度暧昧，但军政府一开始与英国外交接触就犯了错误。意大利驻英大使伦西斯奉命面见索尔兹伯里首相，告诉他意大利只不过在三门湾以内寻求几个岛屿作为租借地，而外交大臣卡内瓦若海军上将却告诉英国驻意大使加利勋爵，意大利想要整个三门湾，而且有意扩张到浙江内地。伦西斯对英首相说要尽量避免武力冲突，而外交大臣则告诉英使意大利在中国政府不愿合作的情况下，便要考虑动武。

索尔兹伯里首相闻讯大怒。意大利政府尽管强调该租借地不会影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索尔兹伯里认为意大利此举难免会引起列强之间的争端，破坏在华的现存均势。在北京的窦纳乐公使也同意首相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如果浙江沿海今后被列强渗透，由意大利牵头，比其他列强更能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因为意大利对英国利益并无威胁。[18]

索尔兹伯里首相再来电询问窦纳乐对此事的看法，窦纳乐声称，意大利的行动固然会对英国的利益有一定影响，但从外交上说，对意大利表示支持也无妨大局。据窦纳乐估计，意大利不太可能达到目的，因为它缺乏向中国政府施加足够压力的实力后盾，因此英国如果仅仅表示象征性的支持对自己并无害处。[19]此外，英国在此事上支持意大利有可能离间法、意关系。所以，索尔兹伯里在 1899 年 1 月决定对意大利表示支持，但先决条件是不能对中国动武，不能将三门湾租借权转让给他国。[20]

法国政府听到风声后非常不满，驻英大使保罗·坎朋一眼就看穿英国此举是为了孤立法国。[21]但此时法国也在考虑租借广州湾，所

以不好公开出面反对意大利的行动。法国公使毕盛在北京奉命向马蒂诺表示支持。德国政府则态度暧昧，布洛夫外交大臣担心列强之间是否会因此引发争端，所以德国政府婉言劝告意大利放弃这种价值不大、而代价昂贵的计划。[22]意大利驻德大使兰扎得知德国的态度后劝告罗马当局不要顾及他国的意见，迅速采取行动。[23]美国政府不愿表态，俄国人表示反对，而日本正在觊觎厦门港，所以也表示"无保留的支持"。于是，意大利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基本上达到了目的。此后不久，德国也由于其他列强持赞成态度而转向支持。[24]

1899年2月底，意大利军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指示马蒂诺公使立即采取行动。军政府提出要求中国允许意大利在三门湾拥有特权，租借期为25到50年，具体条款参照中德《胶州湾协定》。同时，意大利还要求获得从鄱阳湖到三门湾的铁路修建权。为了表示意大利政府的决心，罗马方面又派遣三艘军舰驶往中国海。罗马方面还指示马蒂诺，尽管意大利无意开战，但这个想法不能让中国政府知道。马蒂诺立即起草正式照会，很快就将它递交给总理衙门，他以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对此要求加以拒绝。几天以后，马蒂诺公使愤怒地报告罗马当局，中国政府不仅对意大利的要求一口拒绝，而且有意违反外交惯例，将照会不拆封，原件退回，以羞辱意大利政府。[25]

1899年3月5日，清廷总理衙门在致英使窦纳乐的一封信中说："本衙门不能接受意大利的要求，而且考虑到与意大利公使在此事上进一步理论，无非是浪费笔墨，所以将原件退回马蒂诺先生。"[26]也就是说，中国方面认为此事连谈判的余地都没有。罗马军政府大为震惊，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由于意大利的国际威望所系，军政府的第一个反应是动武，否则佩鲁首相领导下的内阁永远不能从这样的羞辱中脱身。外交大臣卡内瓦若甚至提出要中国政府对这一非常做法支付赔款，因为这是外交惯例所不能容忍的。卡内瓦若的家族是靠贩卖黑奴起家的，他视中国人为非洲黑人，所以更加觉得忍无可忍，连他的表弟萨瓦戈对他的态度也颇有微词。

在北京的马蒂诺更是怒不可遏，他坚决要求罗马军政府批准他

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最后通牒。可悲的是，马蒂诺连中国的军事实力都茫然无知，于是他跑到德国使馆向海靖公使请教。据海靖夫人回忆，马蒂诺从海靖那里得到中国海军实力的数字后，用法文向海靖致谢："亲爱的朋友，我的国王和国家就全部仰仗您了！"[22]马蒂诺到处出游，生活放荡，自然没有时间研究中国的事务。

同时，卡内瓦若外交大臣指示驻英大使伦西斯告诉索尔兹伯里首相，此事必须尽快了结，同时告诉英国说，第三艘意大利军舰已奉命起锚。伦西斯报告说，索尔兹伯里首相不同意意大利动武。1899年3月8日，意大利政府正式批准马蒂诺的请求，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通牒说，如果4日内中国政府不接受意大利的要求，马蒂诺将离开北京，而意大利舰队将直取三门湾。在此紧急关头，索尔兹伯里首相突然发话，说中国政府尽管有权拒绝外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但将原照会不开封退回是违反国际惯例，英国政府愿意就此问题与中国交涉，不能让中国开此先例。于是，英国通知意大利政府，要其驻中国公使窦纳乐立即与总理衙门会谈。

1899年3月8日，窦纳乐公使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个照会，指责中国政府的行为不能容忍。中国政府第二天回复说："退回照会绝不是有意羞辱意使，而是出于对意、中关系的爱护。"[23]罗马军政府当然也希望通过窦纳乐重开谈判的途径，以避免一战。可是，在3月10日那天，也就是马蒂诺公使奉命提交最后通牒之前，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外交技术故障，马蒂诺在同一天内收到意大利外交部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于12点30分发出，指示马蒂诺立即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但在下午4点20分，外交部又发出了第二份急电，命令马蒂诺立即搁置最后通牒一事，等待进一步指示。马蒂诺此时正在最后通牒的措词上反复斟酌，心情过于激动，居然没有核对两封电报的序号。由于两封电报到达的先后次序被颠倒了，也就是说第一个指示在第二个指示之后才到，马蒂诺以为递交最后通牒才是最新指示，于是乎直奔总理衙门，以相当傲慢的态度将最后通牒送交中国政府。意大利使馆的管理混乱，出现这样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据萨

瓦戈回忆，他经常连密码本都找不到，还要到德使馆去借用。马蒂诺犯的这个大错却使三门湾事件难以逆转。

其实，在北京的外交官对意大利的行动都不以为然，很少有人相信马蒂诺能成功。即使是意大利政府依重的英国公使窦纳乐也并不是全心全意地帮助马蒂诺。法国公使毕盛认为，英国无非是利用意大利保护其在华利益，但意大利政府并不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加煤站，其野心太大，是想把整个浙江变成它的势力范围。毕盛还报告说，俄国公使格尔思曾公开批评意大利所采取的行动，并私下里鼓励中国人抵制意大利的企图。[29]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对意大利的行动也大为吃惊。1899 年 3 月 12 日在给他在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的信中说："意大利递交了最后通牒，中国政府只有 4 天做出回答。形势十分严峻，不管中国政府答应与否，局势都会向坏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无钱，又无像样的海军，也无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其他列强必然仿效意大利，中国大难临头了。不是中国自己垮台，而是列强将把她拆得四分五裂！"

值得注意的是，赫德事前并不知道意大利的企图，所以他责怪金登干未能将此事在西方报界的报道及时地寄给他。[30]其实，英国政府当时对赫德已缺乏信任，窦纳乐公使在为此事所做的外交活动前没有事先请教赫德。

马蒂诺提交最后通牒的同时，意大利政府已收到有关法、俄政府将反对意大利立场的报告。意驻法大使托尼艾礼紧急约见德卡赛外长询问此事，德卡赛予以否认，并刻意指出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来自英国报纸，显然与法国政府有关。然而，在是否支持意大利立场的问题上，德卡赛有意回避。德卡赛实际上对意大利非常不满，对意大利事先不通知法国，而先与英国谈判的做法颇有微词。[31]

意大利政府更担心的是索尔兹伯里首相也开始改变立场，英国认为意大利的做法有可能对英国的政府带来不利影响。1899 年 3 月 9 日，卡内瓦若外交大臣指示驻英大使伦西斯向英国政府询问其立场是否有变化，同时表示不相信索尔兹伯里在意大利政府而临困

境之际会抛弃意大利。伦西斯报告说索尔兹伯里现在已不愿公开支持意大利,特别对意大利采取武力行动表示不满。英国首相还批评意大利缺乏耐心,所以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32]

更糟糕的是,伦敦路透社在 1899 年 3 月 11 日报道了意大利对华最后通牒一事,引起舆论轰动。意大利政府此时尚不知道马蒂诺公使确实已经提交了最后通牒,于是外交大臣竭力否认有此事。但路透社的报道将最后通牒的文字内容都已详细披露出来,罗马朝野一片哗然。当外交部还在庆幸让马蒂诺暂停提交最后通牒的电报已及时发出时,北京公使馆报告说,马蒂诺误把第一封电报当作是最新指示,最后通牒已经送交中国政府。卡内瓦若大怒,电告马蒂诺称他的行为"无法解释"。[33]意大利军政府在万分窘迫之下,不得不命令马蒂诺撤回最后通牒,并立即回国述职。

1899 年 3 月 12 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尚不知内情,仍如约赴总理衙门帮意大利力争。领班大臣庆亲王奕劻告诉窦纳乐说:"租借一地对意大利单方面有利,但我不懂此事对中方有任何好处。中国政府如允之,则他国必亦步亦趋,中国的领土完整将受到灾难性的损害。"

应该注意的是,英国公使并未反对中方拒绝租借地的做法,而是着重强调中国应按外交惯例,有礼貌地正式提出拒绝,而不能采取蔑视他国的做法。窦纳乐认为此事的重要性在于应当惩罚中方的态度。在他还准备进一步交涉时,突然接到意大利公使馆翻译官维塔利男爵的信息,马蒂诺公使已被召回,而且意大利外交部决定请窦纳乐"暂时代管"意大利公使馆。窦纳乐马上认为此举不妥,他向伦敦报告说,在这个时刻召回马蒂诺公使不仅将损及意大利的威望,而且对在华的其他国家的公使都有极为不利的影响。索尔兹伯里首相立即通知意大利政府,说明窦纳乐的观点有道理。但是为时已晚,因为意大利外交大臣已于 1899 年 3 月 14 日在议会宣布了召回马蒂诺的决定。[34]

马蒂诺心情沮丧地离开了北京,但他不愿立即返回意大利,便借故在天津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不相信意大利获取三门湾的计划已经

寿终正寝，于是在天津仍然加紧活动。他不久给在京的维塔利发了一封密信，说他在天津认识了一位曾在意大利海军服务过的阿马尼舰长。此人当时是都灵的大军火商安莎多公司在华的代表。马蒂诺郑重其事地请阿马尼"像军人一样宣誓保密"后，告诉他帮忙完成一项对国家利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任务。原来马蒂诺听说阿马尼与总理衙门大臣裕庚私交甚好，就请他筹集一大笔资金，用以贿赂裕庚，并称此事十拿九稳，有政府的全力支持。阿马尼舰长不知内情，对马蒂诺幼稚的计划信以为真，欣然应允。在北京留守的维塔利看到此信，认为此事太危险，一旦败露便不可收拾。同时，他知道裕庚因为与外国人过往太密，已经受到政府内部的批评。他将此事及时报告了罗马当局，所幸的是，阿马尼舰长不久得知马蒂诺已被召回，所以不愿采取任何行动，此事就此作罢。马蒂诺在罗马当局的严令之下，才悻悻地回国述职，[8]意大利在华的戏剧性表演的第一幕至此结束。

三、萨瓦戈的"戏剧性表演"

中国政府对这一次轻而易举地取胜颇感意外，不免有点飘飘然。由于这是中国对列强的租借要求取得的第一次毫无代价的胜利，朝廷的守旧派仇洋的态度更加坚定。意大利军政府虽然召回了马蒂诺公使，但仍然面临如何收场的问题。保守派的《晚邮报》公开指责政府外交的失利，而将马蒂诺公使作为替罪羊。[9]左派议员则在议会大吵大闹，要求外交部对此事做出合理的解释。其他的政党也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意大利政府在华的政策提出异议。一些政府要员借机联名辞职，引起政坛的混乱。应该说，大批的政治精英借此事抛弃政府正是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意大利"对极端保守的军政府的不满。然而，如坐针毡的政府仍然力图挽救，坚持要在中国夺回面子，因为佩鲁内阁无法解释中国政府为何能以公开的、残酷的方式羞辱意大利王国。此时，意大利驻华使馆已无人负责，因为英使窦纳乐也即将回国度假。于是，意大利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立即选派新公使赴

任。外交部一开始想把驻日公使奥里菲尼调往北京,但卡内瓦若外交大臣却属意他的表弟,刚从北京临时代办任上回国的萨瓦戈侯爵。

萨瓦戈年方三十几岁,头衔不过是二等秘书。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越级晋升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但是萨瓦戈不愿接受此项任命。首先,他从来就不喜欢北京。1897 年他第一次赴京时,就觉得北京一无是处,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北京大相径庭。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伊丽莎白在日记中记载道:"萨瓦戈对这个城市痛恨不已,他住的公馆条件太差,花园简直像撒哈拉大沙漠。"[37]在此之前,萨瓦戈在开罗和马德里任过职,与北京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萨瓦戈多年后在回忆录中也说:"我当时实在无法相信……这就是北京——天朝中央之国的首都。整个城市是泥土路,没有树木,没有花草。即使古老的城墙也一律是灰暗的颜色,墙头都呈方块型,没有巍峨壮丽的城垛。"[38]

此外,萨瓦戈不肯赴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替马蒂诺公使阁下的大祸收拾残局。于是,他以父亲病重为理由,向外交部请求换人。但外交部不同意,并以抗命的严重后果对他进行警告。不得已之下,萨瓦戈向病中的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老侯爵回电说应当赴任,并说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他"7 日之内即可下床"。其实老人的病情严重,刚刚动过大手术。[39]

萨瓦戈于 1899 年 5 月赴华就任。为了威胁中国,他率领了一支由 4 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当到达上海时,萨瓦戈有意在沪暂驻,不愿启程北上,以向中国政府示威,逼迫总理衙门重开谈判。这种喜剧式的海军示威未能奏效。同时,意大利的国内政治也开始出现危机,外交大臣卡内瓦若引咎辞职,而佩鲁首相在重新组阁期间发生困难,找不到外交大臣的人选。此时的外交部是一个烫手山芋,佩鲁中意的人选都不愿接受此职。前首相鲁迪尼、前外交大臣威斯孔第·维诺斯塔等都不支持政府在远东的政策。鲁迪尼甚至私下里告诉法国驻意大使巴莱尔:"即使是国王出面要我组阁,我都不会接受。"[40]自由派著名的政治家乔里蒂一开始是支持佩鲁政策的,现在也开始改

变立场。佩鲁最中意的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西尼·索尼诺,此人也是国王喜欢的人物。然而,索尼诺明告佩鲁此举不妥,因为这样做就会促使自由派和左派联合起来反对政府。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人选,还是请威斯孔第·维诺斯塔重掌外交部,这样各方都能接受。经过多次劝说,威斯孔第·维诺斯塔表示接受。

新任外交大臣威斯孔第·维诺斯塔出生在米兰世家,与殖民主义的狂热分子和南方政治家都有很大区别。他对意大利的国家利益看得很清楚,而且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注重实力与目标的平衡关系,绝不愿意铤而走险。他意识到意大利在三门湾事件中脸面已失,现在需要做的是以最小的代价收拾残局,尽量挽回意大利的国际威望。萨瓦戈使华时,外交部曾指示他采取强硬态度。1899年5月到达上海以后,总理衙门对他不予理睬,所以他向罗马当局建议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他报告说在途经新加坡时,曾会晤回国度假途中的英使窦纳乐,窦纳乐对意大利表示支持,并说中国如果在这件事上获胜,不但将损害意大利的威望,同时也损害整个公使团的威望。有此先例,中国政府将更加肆无忌惮,忘乎所以。[41]新任外交大臣对萨瓦戈的建议不以为然,他明告萨瓦戈意大利议会和公众舆论都反对夺取三门湾的政策,所以最好是在华获取一个岛屿,对国内国际都有个交代。萨瓦戈大为不满,他认为新外交大臣的指令与他亲自率领舰队来华的强硬姿态完全不合拍。其实,萨瓦戈本来就对威斯孔第·维诺斯塔有很深的成见。萨瓦戈侯爵家族长期以来就是这个新任外交大臣和他的夫人两个家族的政治对手。萨瓦戈父亲是前首相拉马莫拉的挚友,他们两人与威斯孔第·维诺斯塔有多年的明争暗斗。萨瓦戈记得小时候曾对父亲有一次决定参加威斯孔第·维诺斯塔夫人阿菲耶里侯爵家族的午宴感到大惑不解。[42]除政见不同外,萨瓦戈对新任外交大臣的对华政策也不敢苟同。他认为意大利现在要体面地退出三门湾事件已经不可能,而且按照外交大臣的指示,在华获取一个岛屿作为意大利租界,这实际上毫无意义。那些有价值的岛屿远离大陆,意大利在这样的地方建立租界很难维持

下去。于是他向外交部力争按原计划行动，并请求增派舰队来华，他认为中国在浙江沿海缺乏抵抗的力量，外交大臣否决了他的建议。[43]

在北京待命的维塔利男爵的日子更不好过。意大利在最后通牒问题上出丑以后，维塔利日日如坐针毡。当他听到意大利舰队到达上海时，欣喜若狂。他向罗马当局报告说，马蒂诺公使被召回后，中国政府洋洋得意，甚至散布谣言，说"马可·波罗号"巡洋舰是从别的国家租来的，意大利并无此实力。现在意大利舰队来华，中国人大为惊恐，总理衙门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意大利马上采取军事行动。维塔利还夸张地报告说：慈禧太后就此事召开了紧急御前会议，她听到意舰已到的消息后，"吓得发了眩晕"，后来李鸿章安慰慈禧太后说意大利国内对此类行动并不支持。维塔利认为，中方将被迫重新考虑在三门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44]

事实正相反，直到1899年6月中旬，中国政府仍不理睬在上海赖着不走的萨瓦戈。不久，意大利外交大臣下令萨瓦戈立即赴京就任，萨瓦戈只得从命。到北京后不久，萨瓦戈在紫禁城向光绪帝递交国书。在递交国书仪式上，光绪皇帝突然违反常规，从萨瓦戈手中亲自接过国书。传统上，国书应由某大臣接手，然后转呈皇上。萨瓦戈和维塔利感到这个举动非同小可，以为是意大利海军示威所起的威胁效果，维塔利更是飘飘欲仙。萨瓦戈回忆录中说他"逢人便说此事"。不幸的是，第二天总理衙门派专人来意大利使馆通报说昨日递交国书时，礼仪上出了差错，并特别强调下不为例。[45]

事实上，中方对三门湾问题没有做出丝毫的让步，萨瓦戈从即将赴任的中国驻法大使裕庚口中探知西太后已下定决心绝不让步。裕庚与西太后比较接近，他的女儿也常在宫里陪伴老佛爷。据裕庚说，太后认为中国向俄、法、英、德作出让步是迫不得已，而意大利实力太弱，不值得考虑。[46]萨瓦戈有意用挑衅性的词语，以激怒罗马外交部，但是外交部并不肯上当。事实上，当时外交部已在开展对马蒂诺最后通牒一事的内部调查。负责调查的秘书长马尔瓦诺在报告中指出，通过对马蒂诺使华期间的来电进行综合分析，马蒂诺有意促使意

大利政府采取极端的行动,对此事要深刻地反省,并要吸取教训。所以,不管萨瓦戈如何挑逗,外交部决不为其所动。1899年6月底,威斯孔第·维诺斯塔明确告诉萨瓦戈,意大利政府已决定放弃在华的一切殖民活动,并指示萨瓦戈争取租借一个海军加煤站,让政府有面子下台。

萨瓦戈在1899年7月中报告,尽管他只向中国政府要求一个加煤站,然而总理衙门坚决不予考虑。他进一步地报告一个带刺激性的消息:说西太后最近在宫廷会议上宣称她不会让意大利人"得到一抔黄土",并说意大利没有能力采取任何重大行动。[47]

8月里,意大利海军部通知外交部,说海军方面也不赞成在华采取军事行动,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都不现实。如果一定要通过开战以挽回国际威望,至少也得要有两个月的准备。目前,既无财力,又无公众支持,确实很难实行。[48]

萨瓦戈在北京仍不死心,他甚至想与中国谈判在浙江修建铁路的租借权,他以为意大利政府为了国家的威望,还不至于彻底放弃在华的租借计划。外交大臣收到报告后,立即否决了他的新想法,并警告他不要忽视国内政治的压力。萨瓦戈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此时的活动已有抗命之嫌。不久,早已沮丧已极的萨瓦戈收到罗马当局的指示,以技术原因为借口要将"马可·波罗号"巡洋舰召回意大利,这样一来,用其他几艘较轻型的战舰在中国海域开战更是不可能的了,[49]萨瓦戈对付中国政府的能力便一步步地被意大利政府所削弱。

当然,意大利外交部仍然希望萨瓦戈能谈成加煤站的问题。而1899年整个一个夏天,中国政府对萨瓦戈的请求仍然不屑一顾,并明确告诉他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情急之余,萨瓦戈在总理衙门正告中国大臣们,意大利并非中国所想象的那么虚弱,意大利不仅是基督教和罗马文明的摇篮,而且是现实欧洲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欧洲公会"(Concert of Europe)的一个重要成员。可怜的维塔利男爵在翻译成中文时,将"公会"译为"剧场(theater)",中国大臣们莫名其妙,不明白为何将意大利外交称为"戏剧表演"。伦敦《泰晤士报》记

者莫理逊听说此事后，将它刻薄地发挥成意大利在整个三门湾事件中的表现等同于“闹剧”，萨瓦戈看到这个报道后非常恼怒。[50]

1899年10月，外交大臣正式通知萨瓦戈：“海军部已放弃在华海军行动的任何计划，因为你所建议的要求增加三艘战舰和四艘运输舰的计划是绝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其他列强也与三门湾事件断绝关系。英国首相早已放弃对意大利的支持，德国并开始以意大利租借权为借口，向中国要求新的开矿权。日本政府表示对意大利的支持本来就不是实心实意的，法国则从一开始就对意大利的在华行动态度暧昧，而俄国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下，意大利外交部不得不指示萨瓦戈放弃任何进一步的活动，[51]三门湾事件从此正式寿终正寝。

三门湾事件对萨瓦戈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两次耻辱之一。他在1899年6月份抵京时，就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情绪一直很低落。三门湾事件对他是进一步的打击，使他成为公使团的笑柄．再加上莫理逊在《泰晤士报》上的恶意报道，使他无地自容。多年后，三门湾事件的屈辱仍在他的脑际徘徊，尽管不是十分情愿，但他还是决定撰写回忆录。他说：“我为什么要写回忆录呢？因为老年人无事可做，穷极无聊，只好靠回忆过去来打发时光。”他对当时的墨索里尼政府也非常厌烦，认为与北京公使团的环境差不多。他写道，三门湾事件与他曾参与的解决阿多瓦战役的和平协定一样令人羞辱。他在三门湾事件后一直在北京抬不起头来，只是到了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围攻使馆事件发生后，冲淡了其他外交关系，转移了视线，他才略感宽慰。[52]其实，萨瓦戈不知道的是，如果意大利政府当时真是按照他的建议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中意之间开战将在所难免，因为中方已做好了不惜一战的准备。

四、中方的强硬态度

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已下定决心不能再让列强获得新

的租借权。中外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列强对她采取敌对态度的一种报复。1898年12月，总理衙门断然拒绝批准新的铁路修建权。[53]1899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采矿权必须要有中方50%的股资为前提。[54]三门湾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政变后的新政府开始巩固权力的阶段，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决定不能让意大利的非分要求得逞。清廷认为意大利既无借口，又无实力，所以不予理会。确实，意大利在华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中意贸易与他国相比也实在微不足道。马蒂诺最后通牒被撤回后，中国驻意公使罗丰禄在致意大利政府的照会中这样表明中方立场："中国政府不能理解意大利政府为何要求在华拥有加煤站或海军基地，意大利在华的政治和商贸利益尚不足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使意大利在华的利益要大得多，中方也不能理解为何要向意大利提供单方面的好处。"[55]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知道其他列强对意大利的支持也是半心半意的，就连马蒂诺公使最信任的英使窦纳乐也不放过在总理衙门嘲笑意大利的机会。就在意大利意欲动武之际，中国政府误听讹传，以为"马可·波罗号"是两艘巡洋舰，并向窦纳乐询问。窦纳乐大笑，说并无"马可"和"波罗"两舰，意大利不过只派了一艘巡洋舰来华。

马蒂诺最后通牒出丑后，中国政府更不把意大利放在眼里。然而，当萨瓦戈率舰队再度来华时，清廷确实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的清廷已由守旧的仇洋派把持，没有任何辩论就开始备战。1899年5月，总理衙门指示两江总督刘坤一秘密备战，防守东南沿海。刘坤一报告说备战早已开始，而且以先发制人的战术为主导。但是中国海军主力都在北洋，刘坤一只能以陆上防御为主。[56]同时，浙江巡抚刘树堂报告朝廷，认为东南沿海的海军力量不敌意舰，只能"坚壁清野"，不让意军登陆后长驱直入。清廷认为这种待敌防守的方法不能奏效，因为浙江民风懦弱，[57]一旦诱敌深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求刘坤一和刘树堂以重兵布守海防线，坚决不让意军上岸。[58]

萨瓦戈在上海赖着不走，清政府估计他有可能直接夺取三门湾。朝廷发出的"廷寄"指出："意舰在淞远船不图进口，显有索租不允即

欲强占之意。以彼海隅小国辄敢无故称兵,若不力挫其锋,何以惩前毖后。前据刘坤一与刘树堂电商南洋水师太单,势难争雄海上,均主陆防以守为战不为无见。惟陆军扼要驻守,兵力不可不及之处。层层布置,静以待动。如果登岸,即便并力迎击,毋得稍涉观望致堕狡谋。"此谕还命令刘树堂至少要以一万兵力保卫沿海。[59]

刘坤一在1899年5月间也报告说萨瓦戈公使在沪逗留,意在直取三门湾。刘坤一派人对意舰队做了详细侦查,报告说:"现驻吴淞意舰相较钢厚六寸者一艘,三寸者两艘。"而中方多为木制兵舰,实力悬殊,形势严峻。[60]清廷指示刘坤一,不可由中方开衅,尽管胜负难料,但要尽力而为。此时,刘坤一收到上海海关的一位英籍雇员的信,信中对意大利索取三门湾做了两种解释:"意一欲仿效俄租旅顺通商,二因俄在西伯利亚铁路之外拟添新路,英阻不成,为暗助英。"所以意大利不过是虚张声势。[61]刘坤一对此事有国际背景的说法虽然很感兴趣,但不能轻信意大利不会真的动武。所以继续积极备战,以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萨瓦戈在上海要求重开谈判不成,突然率舰队北上,到达山东海域。此时清廷感到不安,不知他意欲何为。1899年10月间,清廷接到报告,说意舰队的攻取目标可能是庙山群岛。盛宣怀同时发来密电,说过去两天之内,探知意舰长共接发了十余封密电,军事行动恐怕即将开始。清廷恃北洋海军实力,对山东沿海不是特别担心,而且刚从德国购买了4艘鱼雷艇,故清廷立即命令直隶总督裕禄积极备战。军机处密令袁世凯调其新军缓慢地、不露声色地向山东沿海靠近,并以操练为名,开始备战。[62]山东巡抚毓贤发出指令,要求各方严加戒备,不能让任何意大利人以考察、游览为名进入山东。[63]

然而,意大利迟迟按兵不动,使中国政府大惑不解。清廷不知道这段时间里,萨瓦戈公使正与意大利外交部不断发生争论,而总是不能说服外交大臣。这样,清廷就有了足够时间重新调整在东南沿海的部署。军机处发现东南防务的漏洞很多,当地守军对海战一无所知,甚至连军舰的旗语也不懂,于是立即派北洋水师提督叶祖圭率舰

南下。[64]1999年10月底,清廷再次指示东南督抚不管意舰队采取行动与否,都要积极备战,但是中国兵舰不得出海迎战,因为海上实力仍然悬殊。[65]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海军提督叶祖圭于1899年11月间在长江口举行了军事演习,主要是海岸火炮实弹打靶和鱼雷艇攻击的操练,刘坤一报告说演习大获成功。[66]到了12月底,意大利仍无动作,清廷颇为沾沾自喜,以为意方在中方的备战威慑下,已丧失了开战的勇气,于是在对意大利态度上更加强硬。在一份措词严厉的上谕中,清廷通告各省督抚:

> 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偪处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行议和之理。[67]

此上谕是戊戌政变以来措辞最为强烈的,它反映了清廷此时抵抗列强领土要求的决心。因此,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以前,慈禧太后领导的朝廷就有了开战的心理准备。这就说明,很多学者都以为中国于1900年对列强宣战只是由于义和团事件引发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义和团事件不过是个触发机,不是深层原因,深层原因是列强在华的激烈争夺。1900年的驱洋和开战,很大程度上受到三门湾事件大获全胜的影响,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为了政治上生存的目的,当时的清廷已不排除对外动武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清廷对三门湾事件的沾沾自喜,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意大利国内政治不知情的基础之上。应该说,意大利未能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压力,而不是清廷备战的结果。因而,朝廷守旧

派从这一事件中吸取的经验是有误导作用的。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意大利的内情略知一二，在他赴任经过香港时，曾与意大利驻港的领事有一段很有趣味的交谈。李鸿章问意大利领事，意大利是一个较穷的国家，为何要做出派舰队来华这样耗资巨大的蠢事来？意领事则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意大利确实穷，但这是由于政府在各方面的开销太大的原因。李又问为何意大利公使在北京不向罗马当局直言相告此事不值得做？意领事说外交官不能对政府已定下的行动计划发表看法，除非应政府的要求方可。李太息云："这种办事方法甚为奇怪，在实地工作的外交官一点权力也没有。"意领事说现在用电报通讯，政府更能控制外交官的行为，过去不用电报时，公使的权力要大得多。李又叹道："你们的公使在北京也对我这么说过。"[68]

浙江巡抚刘树堂在1899年底的一封奏折中将中国政府此时的心情反映得淋漓尽致：

> 臣以大势计之，窃以为意大利不足虑也……国小民贫，难筹战费一也；运一兵来华约费华银二百余元，难以动大众二也；自拿波利起至中国二万余里俱无该国埠头，煤水皆仰给于人三也；一兵、一卒皆须运自本国，非若英兵可拨由印度，法兵可出自安南四也；即使如愿以偿得地，而兵力不足以常川驻守，财力不足以振兴商务，虽得美地如获石田五也。

朝廷看罢此奏折甚喜，在旁硃批说刘树堂有全权备战，"朝廷不为遥制"，[69]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三门湾事件使甲午战争后的一再让步的屈辱心态为之一变，但此次大获全胜不过是一次虚假的胜利。即使如此，在内部政治失衡、外部患难交加的时刻，虚假的胜利也正中下怀。不管怎么说，正如赫德爵士在1900年11月所说，意大利在三门湾事件中的失败，确实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头。他说："中国政府借三门湾获胜的东风，对列强的租借要求开始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能再容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了。"[70]

意大利的惨败对清廷的进一步排外政策起了催化作用,仇洋的满族王公和八旗权贵纷纷弹冠相庆,更加变得不可一世。

---

①Crispi, Francesco: *The Memoirs of Francesco Crispi*, vol. ii, p. 337.

②Vittorio Arminjon: *La China e la mission italiana del 1866*.

③Jenkins, E.: *The Coolie, His Rights and Wrongs*, London, 1871, see also, Licata, G., *Notabili della Terza Italia*, p. 122.

④Nocentini, Lodovico: *L' Europa Nell' Estremo Oriente ed gli Interessi dell Italia in Cina*, pp. 185—186.

⑤Borsa, G.: *Italia e Cina nel Secolo XIX*, p. 42.

⑥Bosworth, Richard: *Italy, the Least of the Great Powers*, pp. 52—53.

⑦Nocentini, 同上注④, 第 188—189 页。

⑧Borsa, 同上注⑤,第 43 页。

⑨Salvago-Raggi: *Memoires*, pp. 239—240 and p. 281.

⑩同上,第 77 页。

⑪*Atti parlamentari italiani*, Camera dei Deputati, Discussioni, XX Legislatura, 1 e Sessione, April 25, 1898, p. 6155.

⑫Borsa, 同上注⑤,第 77—78 页。

⑬Salvago-Raggi, 同上注⑨, 第 348 页。

⑭同上,第 345—346 页。

⑮Masini, E.: *Viaggiatori e Naviganti fiorentini*, p. 5 (Firenze 1898).

⑯Salvago-Raggi,同上注⑨,第 347—348 页。

⑰Borsa, 同上注⑤, 第 82 页。

⑱*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 (DDI),Third Series, vol. Ⅲ, p. 80.

⑲Borsa,同上注⑤,第 88—89 页。

⑳*DDI*,同上注⑱,第 99 页。

㉑*DDF*, vol. xv, pp. 233—234.

㉒Mack Smith, Denis: *Italy and its Monarchy*, p. 135.

㉓*DDI*,同上注⑱,第 81—82 页。

㉔Borsa, 同上注⑤,第 92—93 页。

㉕*DDI*, 同上注⑯,第 107 页。

㉖此信的英文原文,见 Borsa,同上注⑤,第 204—205 页。

㉗Heyking: *Elisabeth von*, p. 286.

㉘Borsa, 同上注⑤,第 205—206 页。

㉙Borsa, 同上注⑤,第 221—222 页。

㉚Fairbank, et al, *The I-G in Peking*, vol. 2, p. 1190.

㉛*DDF*, vol. XV, p. 203.

㉜*DDI*, 同上注⑱,第 116—117 页。

㉝同上,第 117 页。

㉞Borsa, 同上注⑤, 第 216—218 页。

㉟M.E.A., serie P, b.407.

㊱*Corriere della Sera*, March 14, 1899.

㊲Heyking: *Elisabeth von*, p. 219.

㊳Salvago-Raggi, 同上注⑨,第 329 页。

㊴同上注⑨,第 347—348 页。

㊵*DDF*, vol. xv, p. 267.

㊶M.E.A., Serie P, b. 407.

㊷Salvago-Raggi,同上注⑨,第 232 页。萨瓦戈认为他与外交大臣的争斗是子承父业。

㊸Salvago-Raggi to Visconti-Venosta, May 27, 1899, Serie P. Cina, 406.

㊹M.E.A., Serie P, b.406.

㊺Salvago-Raggi: *Memoires*, p. 352.

㊻*DDI*,同上注⑱,第 182 页。

㊼㊽MEA, Rome, Serie P, Cine 1899, b. 406.

㊾*DDI*,同上注⑱,第 191 页。

㊿Luo, Hui-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vol. 1, p. 69.

51 *DDI*,同上注⑱,第 212 页。

52 *Salvago-Raggi*,同上注⑨,第 211 页。

53《光绪朝东华录》, 第 4272—4273 页。

54沈桐生:《光绪政要》,卷 3,第 1462 页。

55MEA, Serie P86 – Cina 1899.

56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 1,第 8033—8034 页。

57清廷对浙江民风懦弱的说法,可能源于鸦片战争时期的驻浙守军不战自溃的情况。

㊽《清实录》,卷57,第822—823页。

㊾同上,第831页。

㊿《刘忠诚公遗集》,第8040—8041页。

61同上,第8035页。

62《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37页。

63《筹笔偶存》,第39—40页。

64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5,第30—31页。

65《清实录》,第975页。

66《刘忠诚公遗集》,第61—62页。

67《清实录》,第975页。

68M.E.A., Rome, Serie P, b. 407.

69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5,第36—37页。

70Hart, Sir Robert: *Fortnightly Review*, November 1900, p. 715.

第五章

群情激愤的山东

一、义和团的起因

奥匈帝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罗斯通多年后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对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有如下看法："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加入义和团。"罗斯通认为义和团战争爆发由三个因素造成：

(1) 欧洲列强试图瓜分中国；

(2) 列强们通过条约或直接用炮舰政策和传教士活动迫使中国就范；

(3) 这种做法引起了两方面反应：

① 中国老百姓的反应，

② 朝廷仇洋官员与慈禧太后的反应。[1]

确实，列强到山东扩张来的不是时候。当时，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也在肆虐华北地区，1898 年山东饱受洪水之灾，黄河于 8 月决堤，34 个县受洪水侵害，数千的村庄被淹，饥荒盛行。成千上万的村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吃草根，咽树皮，社会气氛十分紧张。清廷派李鸿章为巡视黄河大臣，李报告说至少需要200万两

银子才能治理黄河，朝廷经费紧缺，只好作罢。[2]

1898年冬天以后，旱灾又开始害苦农民。华北大部，包括山东和直隶数月无雨，对春耕带来严重的威胁。洪水和旱灾虽然都是自然灾害，但它们对百姓的心理压力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柯文指出，对于洪水，一般百姓可以用常识来加以解释，比如当地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于旱灾，以当时农民的一点有限的科学知识，就很难解释。此外，洪水是突发性灾害，决堤的发生就是一例。旱灾则是一种充满悬念，令人焦虑的持久性事件。旱灾不会一下子造成人员死亡和饥荒，但让人在心理上难以忍受，对将来充满恐慌。所以人们的焦虑渐渐增强，需要找到对旱灾解释的其他非自然性的说法。[3]在中国也是这样，黄河多年来就难以驯服，中国人虽敬河伯，但一般认为水灾是自然灾害，用治理河道、加固河堤的人为方法可以防止或减轻它的危害。但中国人特别笃信求雨，认为对付旱灾更需要神灵的帮助，从朝廷到地方官都常常主持求雨的仪式。所以说，防旱比防涝的宗教迷信色彩要浓得多。一般老百姓很自然地认为旱灾乃阴阳风水失调所造成，于是要寻求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种种证据。列强入侵山东，洋教堂的存在，以及铁路的修建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破坏风水的明证，因此农民将自然灾害归罪于洋人是不足为怪的。

此外，求雨仪式一般以道家为主，比如请张天师呼风唤雨，而不请佛寺的和尚。由于基督教的入侵，中国所有的传统宗教都受到冲击，其中道教对西教的抵触情绪恐怕最大。佛教重来世，厌现世，宣扬修炼成佛。而道教崇拜多神，对现世有造反精神。佛教与基督教都强调对权威的服从与认命，而道教则倡"无为"，与基督教的"参与"概念实际上相左。所以，旱情愈严重，道家思想愈是深入人心。

山东的反洋运动更由于列强之间的国际政治斗争而被进一步激化。列强入侵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而且冲击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儒家虽然也强调服从权威，但以"仁"为核心的一套概念似乎对洋人完全不起作用。列强外交官和传教士对地方司法制度的蛮横干预使满、汉官员的仕途受到很大的威胁。天

主教士在中国尤其胆大妄为，甚至连新教传教士都对他们颇有微词。根据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著作《动乱中的中国》说："只要中国教民与非教民有任何争执，天主教神父就一定要包揽诉讼。如果神父一时不能威胁地方官做出对教民有利的判决，他还可以用'宗教迫害'为借口向法国领事诉求。所以，在诉讼过程中，天主教神父完全不考虑司法的公正性，只是一味地要求按他的意愿办案。"④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官僚文化还敌不过西洋的一个宗教，所以儒学与道家结成战术上的反洋同盟势在必行。应该说，这是自清朝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胶州湾事件以后，德军在山东为所欲为，与百姓冲突不断，而列强外交官则向中国政府不断施压，要求减少民、教冲突。这两者本身互为因果，使清廷束手无策。山东地方士绅的作用因而很重要，这些士绅经常与传教士直接打交道，而且对他们自己在传教士眼中的地位最为敏感。同时，地方士绅对朝廷的上谕和通告所做的解释直接影响百姓的情绪。正是这批人最早意识到胶州湾事件对他们的生存和社会地位将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于教案而割地赔款，此端一开，他国效尤，后果不堪设想。就山东士绅来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已远远不是一个书本上的问题了。地方士绅是中国城镇村落是否稳定的晴雨表，这个阶层一旦开始仇洋，或对清廷不满，地方秩序的大乱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山东的另一个更危险的迹象是，在反洋运动的背后多是曾在历史上有抗清行为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尽管互相之间尚无直接联系，但自四川余栋臣被捕后，它们开始用余的"顺清灭洋"口号来发动群众，效果十分明显。1898 年底，这些秘密社团开始有组织地用武力打击传教士和教民。所以到了 1899 年 10 月英文报刊始有"拳民"(Boxer)之名目。

实际上，山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拳民"组织。所谓"拳民"，是指包括活动于三个地区的秘密社团组织：以曹州大刀会为中心的鲁西南，以朱红灯为领导的鲁西北茌平和平原县的神拳会，以赵三多为领

导的直鲁边境的梅花拳。这三个地区洋教士比较多，民、教冲突也比较集中。鲁西南和鲁西北的秘密社团与赵三多的拳会不同，大刀会和神拳等组织强调刀枪不入的神秘主义，而赵三多的梅花拳则是以真功夫为主。严格意义上说，所谓“拳民”，是指梅花拳会的成员。而在 1898 和 1899 年内组织抗洋活动最得力的也是梅花拳。梅花拳在直、鲁边境的冠、威两县活动本来就比大刀会和神拳有地理优势。此区域地居直、鲁两省交界处，两省政府都难以管理，遑论中央政府，因此这里是三不管的“飞地”。在这里，土地税按照所雇的长工人数计算，所以很容易虚报数字，历史上就是逃税地主的理想地区，自明朝以来就已如此。此外，这一地区的地方治安由于政府权威的微弱，多由自行组织的乡团来维持，所以有日后“义和团练”之说。⑤

赵三多起义的导火线是著名的冠县梨园屯教案。此案由来已久，一直得不到了结。早在 1873 年，梨园屯的意大利传教士就想拆掉当地的一座破败的玉皇庙，用以建立一座教堂。因此，民、教冲突非常激烈，年复一年，积怨很深。法国公使对梨园屯案积极干预以后，中国地方政府决定将此庙地皮让给教士。梨园屯村民十分愤怒，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双方互不相让，在中国教案史中也非常罕见。村民在此案中能够坚持不懈进行斗争，主要得力于当地老百姓公推的“十八魁”，他们是抗教的中心。到了 1897 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十八魁”借机起事。他们决定请在直隶的邻县——威县的著名梅花拳首领赵三多来主持抗教大计。

赵三多是梅花拳的第十四代传人。在冠县“十八魁”的帮助下，赵三多率梅花拳于 1897 年起事。一时间四乡响应，约二千多人手持刀剑开始攻击教民，至少打死两人。法国公使要求中国政府逮捕“十八魁”和赵三多。赵继续抗教，不予理睬。地方官派兵到梨园屯弹压，强行拆除玉皇庙，将此地基归于教士和教民，从而使民、教冲突进一步加剧。⑥

1897 年底，德占胶州湾给赵三多重新起事带来机会。梅花拳开始利用公开“亮拳”的仪式招募新成员和扩大影响力，数千农民踊跃

报名加入拳会。中国政府和传教士对赵三多的号召力大为震惊，清廷被迫下令赵三多解散拳会。为了争取合法化，赵三多决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据赵的助手郭栋臣多年后回忆，当时梅花拳会的大佬对该拳会以公开名义举事感到担心，于是赵三多决定不用原名。其实，梅花拳本名义和拳，当时已有150年左右的会谱记载。据路遥等人的研究，该拳会可能是反清的"清水教"的一个分支。在18世纪时，清水教首领王伦发动起义，曾对清廷打击甚烈。"清水教"被镇压之后，其中的一支"义和拳"改名为"梅花拳"，得以继续生存下去，[7]"义和"之名目显然比"梅花"更有号召力。

1898年10月21日，梨园屯拳民在赵三多领导下正式武装起事，攻打教堂和传教士，四周县乡多有村民参加。新组建的义和拳民开始头戴红巾，有了统一的标志。他们有的扛大刀，有的拿着鸟枪，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也就是在这次举事中，赵三多公开打出了一面旗帜。据冠县的法国传教士伊索勒的目击所说，这面旗帜上大书"顺清灭洋"。[8]伊索勒还注意到这是一面黄旗，或有争取合法化之嫌。很明显，赵三多这时已正式接过了四川余栋臣的口号。

然而，清廷此时正忙于与德国交涉，一段时间内对赵三多的起事还不太注意，面对鲁西南大刀会的镇压更为严厉，大刀会在历史上与义和拳并无直接关系。清廷直到1899年5月才对赵三多的活动感到紧张，因为赵三多通过努力，开始将各色拳会纳入一面旗帜之下。在直隶正定大佛寺，赵与其他拳会首领联合开会，将他们的活动统一起来，并给义和拳冠以"神助"两字，以利于接纳那些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秘密社团。在这一地区，儒家学说并不发达，所以"神助义和拳"的吸引力非常之大。

大刀会在鲁西南等地仍然坚持活动。德占胶州湾成为既成事实以后，朝廷和山东地方官的重点政策是镇压大刀会，因为巨野教案是发生在鲁西南地区。张汝梅在1898年接替李秉衡任山东巡抚以后，对大刀会是有同情心的。张汝梅曾在中法战争中立过功，对列强侵

入中国内陆深感愤怒。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多次强调对付大刀会不能“不分良莠”。他指出大刀会并无反洋历史，不过是因为德占胶州湾后才开始仇视洋教活动。他提出不妨将大刀会办成团练，便于控制。[9]朝廷对他的建议不予理会，一味命令他剿灭大刀会，张汝梅当然不愿积极贯彻执行。1899 年初，张汝梅突然被朝廷解职，理由是贪污腐化。实际上，一个月前确有人参奏张汝梅贪污腐化，但朝廷通过调查，已颁发上谕，指出对张的弹劾缺乏证据，并处分了参奏张汝梅的官员。[10]这次搬运此种理由将张汝梅解职，实在是因为清政府不堪德国方面的压力。

新任山东巡抚是毓贤，朝廷选择此人是有深谋远虑的。毓贤多年在山东为官，对该省的情况十分了解。从 1879 年起，他就在山东一步一步地从知府升到臬司。毓贤以镇压地方骚乱出名，其方法残酷，手段毒辣是众所周知的，光是在曹州知府任上，一年之内就杀了二千余人。德国传教士在鲁南教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毓贤的强硬政策。1897 年的巨野教案中，毓贤亲自主持对韩理和能方济被害案的调查，其效率之高，下手之狠，连德国人都感到震惊，自然拍手称快。然而，巨野教案也改变了毓贤对传教士的态度。尽管他破案神速，还是未能阻挡德国舰队来到胶州湾，并蛮横地宣布将其占领。因此，尽管清廷选中毓贤是希望他能早日平息山东的民、教冲突，但此时的毓贤已对传教士和德国充满了敌意。所以，毓贤在山东的巡抚任内对解决民、教冲突并不得力。

与前几位巡抚相比，毓贤对山东的教案更加了解。接替张汝梅以后，毓贤同其他官员一样，都感到反洋运动在山东已成为群众运动，不是用简单的教案所能解释的，因此光靠镇压手段已经不能奏效。毓贤在曹州知府任上对大刀会曾有过扶持，他也和张汝梅一样，反对“不分良莠”的镇压措施。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一份报告中，毓贤刻意指出分清良莠的四个原因。其一，很多不法之徒利用大刀会名目闹事，乘机枉法；其二，教民中有不少人与不法之徒联合起来；其三，不法之徒用反洋教为名骚扰良民；其四，一些他乡的不法之徒加

人大刀会纯粹是为了泄私愤。[11]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李秉衡和张汝梅的看法大同小异。毓贤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之时正在河南任职，他对秘密社团从一意主剿到一意主抚的变化过程并不长。而他一到山东，就发现最令人头痛的仍是老对手德国人。

二、德军在山东的暴行

安治泰主教在胶州湾事件中，没有能够达到将鲁南教区直接归于德国占领当局管辖之下的目的。但是，"圣言会"传教士仍然利用这个机会积极扩大传教活动的范围。1898年11月9日，薛田资神父来到日照县。当地群众对他的行为早有所闻，于是将他团团围住，并游街示众。后来，他与6个中国教民被困在一间房子里达数日之久。当地民众说这些教民中有的是罪犯，要求薛田资将他们交出。这一事件结束后不久，薛田资在给父母的信中也承认有几个教民可能是犯了法的，"对我们的声誉没有任何好处"。但在义和团战争后，他在《在孔子的家乡》一书中，有意把这个细节略去。[12]

地方官派兵为薛田资等人解围，并支付2500两银子作为赔偿，日照群情愤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反洋运动是当地士绅领导的，所以影响很大。薛田资获救后不久，3名德国的铁路工程人员也在这个地区被村民追打。于是，德国在青岛的海军当局决定以此为理由，再发起一场军事远征。1899年3月，在薛田资的带领下，180名德国士兵在日照登陆，他们立即将县衙门所在地占领。几天后，德军到兰山出征，焚烧了300间民宅，并拆毁一个村庄。山东巡抚毓贤对此非常不满，他向总理衙门报告说德军行动完全不近情理，因为薛田资神父一案早已了结。[13]

事实上，德军出征日照是另有目的的。德国在青岛的总督亚希克舰长向柏林报告中说他的这次行动有三个目的：一是帮助德国公使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铁路修建权问题；二是向中国施压以便在山东获得更多的开矿权；三是帮助安治泰主教为薛田资事件获更多

的赔偿。然而,日照远征的后果不堪设想。愤怒的村民们开始用暴力四处攻击教民,抢夺他们的财产。各地的骚乱增多,愈来愈多的人开始用"保清灭洋"的口号来打击教士、教民。尤为甚者,德军占领日照长达6个星期,在结束占领时还把当地的5位知名士绅押解到青岛作为人质,日照的百姓非常愤怒。当亚希克总督正在考虑再派远征军时,却发生了安治泰主教与德国公使海靖的冲突。原来,安治泰在收到赔偿银两后,擅自向中方宣布德军立即会撤军。海靖公使怒不可遏,指责安治泰僭越他的公使权力。[14]

日照事件刚刚平息,高密县又发生了村民反抗德国修铁路的暴乱。根据《胶州湾协定》,德国有权修建从胶州到济南的铁路。然而,德国设计师和工程师在选定路线时,根本忽略民风民俗。为了施工方便和省钱,所选定的路线常常要通过一些坟场,对中国人的祭祖文化嗤之以鼻。此外,铁路所经之处还要破坏不少结构精密的灌溉渠道,对村民的农作物有直接影响。更糟糕的是,铁路员工专横跋扈:"平日倚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一日。"[15]1899年6月,一名铁路员工居然在高密县的一个集市上抚摸一位妇女的胸部,民愤顿时爆发,铁路员工遭村民痛殴。此后,村民还拆毁了不少铁路工程的标志。德军当局再次派遣军队远征高密,在两日内枪杀了15人,重伤30余人。在占领高密县城以后,又杀害了7人。德军的暴行更为反洋斗争火上加油。直到7月,中国政府再次让步,德军方才撤兵。[16]

安治泰主教此时对德军暴行也开始担忧,但他更关心的是中国人散布的流言对民心的影响。安治泰主教向柏林报告说,山东地方官有人散布谣言,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真正原因是皇帝做出的放弃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认为此类谣言特别危险,因为它会将中国人的反洋情绪全部集中于德国一国。此外,这个谣言是地方官所散布的,因而说明官、民有结成反洋同盟的倾向。[17]"圣言会"教士在山东的反洋浪潮中当然是首当其冲。日照事件后,村民开始以攻击教堂和教民为报复手段,"圣言会"教士感到四面楚歌。1899年1月,在山东诸城的威维尔神父报告说,当地的教民家庭几乎全被抢

过，多数教堂被焚。更有甚者，就连劫匪都开始打出“保清灭洋”的口号。[18]一时间，四川余蛮子发明的政治口号在山东家喻户晓。1899年10月9日，英文的《北华捷报》从山东发回的报道第一次使用了“拳民”(Boxer)的字眼：“一个秘密社团已在山东兴起，它的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仇视洋人和基督教。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这个组织用‘拳民’为名，而在去年春天，就曾试图将山东寿张的传教士全部赶走。”然而，《北华捷报》认为此次暴乱同历史上的其他暴乱一样，很快就会销声匿迹。[19]应该说，“拳民”这个统一的名称在西文报纸第一次出现，说明了赵三多将清廷与洋人对立起来的策略，即“保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已经在山东被广泛运用。大刀会和其他拳会没有能够统一领导抗洋斗争，而赵三多的义和拳虽然与高密、日照等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的口号却开始深入人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军暴行也同时加剧了青岛德国军事当局与“圣言会”的矛盾。日照事件之后，德军的暴行被披露到欧洲的报刊上，而披露这一事件的权威人士恰恰是“圣言会”的当事人薛田资神父。薛田资神父在德国的《科隆大众报》上多次撰文，将德军的所作所为给予详细的报道。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当局大为愤怒，决定对“圣言会”进行报复。首先，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当局在德文的《德意志亚洲观察报》上，刊登了前山东巡抚张汝梅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的几封信。亨利亲王在胶州湾事件中曾亲率一支舰队来华。张汝梅在日照事件后写的这些信强烈批评了“圣言会”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他指出德国当局只知道薛田资神父在日照受辱，而不知“圣言会”传教士平日如何欺凌普通老百姓。张汝梅明确指出，“圣言会”教士往往只听教民的一面之词，便对诉讼大加干涉，层出不穷的教案的真正根源即在于此。紧接着，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当局的首席行政官施拉马耶博士，一位对天主教传教士向无好感的新教徒，也在报上撰文批评“圣言会”的活动，并引用张汝梅的信件为证。[20]张汝梅在信中还指出薛田资神父不过是“伤及毛发”，已获赔甚多。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当局对安治泰主教在拿到赔款之后，即开始批评德军的行为尤

其十分恼火,认为这是忘恩负义。

1899年11月,安治泰亲自向德国首相霍亨洛赫报告,对德报刊登张汝梅的信件和施拉马耶的文章表示气愤。安治泰说,他已命令"圣言会"的每一个传教点去调查何人何时对中国百姓有欺凌行为,并特意报告说山东巡抚毓贤是这一事件背后的主谋。

眼下的形势对安治泰来说确实不太有利,新任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在1899年6月份到达了北京,但是新公使对"圣言会"在华的传教活动并不热心。克林德男爵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的家庭背景,他对传教士一向有恶感,他的一个叔父是著名的威廉·克林德主教,以领导"社会天主教运动"出名。威廉·克林德主教强调教会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对传教士参与海外殖民活动十分不满。另一方面,新任公使本人20年前即在德国驻华的公使馆服务,当时还没有"圣言会"的传教活动。此外,克林德男爵自恃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通",因而对那些传教士并不倚重。

至19世纪80年代末,克林德在华服务已十年。从译员做起,一直升到临时代办。1890年奉调去华盛顿,不久又出任驻墨西哥公使,此次是与海靖公使对调再次来到北京。安治泰主教于8月份到北京向克林德报告山东的形势,他发现克林德对局势的严重性并不以为然。在京期间,他还会晤了李鸿章,李居然出乎意料地建议只有将山东巡抚毓贤解职,方可平息山东的暴乱。李还建议安治泰主教与克林德公使一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克林德表示拒绝。[21]

三、中国政府的态度

李鸿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可能因为他感到毓贤在山东只能加剧中外冲突。几个月后,毓贤果然被解职。但此事背后的直接主谋并不是德国公使,而是新任美国驻中国公使康格和法国驻中国公使毕盛,[22]很有可能这两位公使也曾接到李鸿章的暗示。康格来华不久,就收到美国传教士发自山东的报告,说山东巡抚一味仇洋。康格

到总理衙门要求毓贤去职的态度十分强硬，据英国学者扬格所说，“差不多是命令的口吻”。[23]1899 年 12 月 7 日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康格说明了他要毓贤去职的原因：“山东巡抚毓贤是众所周知的仇洋人物，他在山东的民、教冲突上从来不肯尽职尽力。”[24]

在山东的传教士一直都报告说毓贤本质上是个仇洋排外分子，他们还散布流言，说清廷此时已在鼓励拳会的发展。可是，毓贤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与他的前任有本质上的不同？清廷此时是否真的在支持山东的反洋运动？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 1898 和 1899 年中，清廷处理民、教冲突的政策有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助长了反洋运动的气焰。

应该说，清廷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形势有错误的判断。第一，清廷一直在民、教冲突上坚持自 1870 年以来的传统政策，即“曾国藩原则”。曾国藩是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重要官员，他在 1870 年受命解决“天津教案”。当时，法国驻津领事被愤怒的民众打死，法国天主教堂望海楼被焚烧，不少地下秘密社团参与了这一起教案。曾国藩认为法国传教士引起的民愤太大，不能将所有参与暴乱的人视为同罪，一并处罚，于是采用了著名的“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的处理原则。曾国藩的策略是将秘密社团与平民加以区分，只按罪量刑，而不是根据一个人是否是秘密社团成员来判罪。这样，秘密社团就没有借口利用中方在天津教案中的忍辱让步发动反清的暴动。清廷从 1870 年以后，一直采用同样的策略。山东历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并不是发明对秘密社团要“分清良莠”政策的始作俑者。然而，德国入侵山东以后，“曾国藩原则”在很多方面已很难实行，因为当时山东的反洋运动已不仅仅是以抗教为主，民众支持的基础已迅速扩大，赵三多的成功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原本有反清倾向的秘密社团找到了一个合法的掩护，以爱国者自居，朝廷对这个根本的变化尚未有足够的认识。

传教士和列强外交官坚持指责毓贤一味支持拳民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毓贤对秘密社团一直是有高度警惕的。1899 年

中，毓贤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大刀会。6月中，德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说大刀会在嘉祥、巨野和济宁攻打教堂，山东巡抚毓贤暗中保护大刀会。毓贤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兵镇压，抓获8个暴乱主谋，其首领陈兆举被就地正法。8月，毓贤捕获开州大刀会的首领刘赞虞，也将他立即正法。10月，毓贤派兵围剿平原的朱红灯和心诚和尚领导的神拳会。当时平原民、教冲突加剧。据平原署理知县蒋楷报告："查卑境向有美国耶稣，法国天主两教……查教民赖主教之势，动辄诬控；主教信教民之言，动辄函电。一位地方官秉旨查办，尽属子虚。"[8]应当指出的是，蒋楷是少数几位在山东要求积极剿拳的地方官，庚子以后受到朝廷的褒奖。他决不会与拳民合作，但对传教士的行为仍然恨之人骨。

朱红灯会武功，略通些医术。他自称是明朝皇帝朱姓的后代，所以他的拳会从一开始就有反清性质。巡抚毓贤对他早就有所注意，决意主剿。在与官兵多次冲突以后，朱红灯也开始改变策略，打出赵三多式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完全不为所动。于是在平原发生了森罗殿大战，双方都有重大伤亡。朱红灯退走茌平后，清军滥杀无辜，并肆行抢掠。指挥官袁世敦是袁世凯的弟弟，他纵兵杀死300余村民，此事震惊北京朝廷，毓贤也因此受到处分，而袁世敦和蒋楷都被革职。应该说，到此时为止，毓贤还是一意主剿的。平原事件受处分后，他的态度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洋教士和外交官说毓贤一贯主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朝廷在第二个问题上对形势也有误判，这就是所谓"团练"问题。平原事件以后，毓贤开始意识到朝廷并不主张一意进剿，而要保持曾国藩区分良莠的原则。然而，毓贤到山东的首要任务是平息民、教冲突，他获选担任山东巡抚的本意就在此。他是平乱专家，只知"剿"，不大懂得"抚"。按列强外交官的要求，所有山东的拳会都要明令取缔，但这并不符合朝廷一贯坚持的"曾国藩原则"，毓贤也没有权力做到这一步。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毓贤的政治嗅觉力告诉他朝廷可能同情反洋运动，于是从他将来的仕途来看，剿还不如抚，因为

围剿朱红灯一役反而给他带来了厄运。也有可能，在 1899 年底毓贤已收到仇洋的端郡王载漪的指示，要他支持反洋运动。[26]因此，毓贤在 12 月份重新向朝廷提出张汝梅的建议，将拳会收编为正式团练，便于绥靖地方。但此时，美国和法国公使已经向总理衙门要求解除毓贤的山东巡抚职务，团练计划便很快搁浅。

编制团练的计划本来不是毓贤发明的，戊戌政变以后，朝廷就在考虑这个计划。当然，朝廷从来没有把秘密拳会考虑在计划中。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坚持恢复了许多旧制。当时地方上十分不稳，于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于 1898 年 10 月第一次在宫内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乡团的设想。荣禄在一封奏折中说，应当恢复保甲制度，并在地方上建设乡团，以维护秩序。这个建议受到地方大员的积极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甚至认为此举不但可以绥靖地方，而且可以增强国防。他说："臣惟外洋立国，尽人为兵。中国一时尚难及此，惟团练犹是遵行我法。管子内政，唐之府兵，即其制也。"他又说："查向来办团，按户抽丁，往往役及老弱残废。人数虽众，于事何有裨益，反恐苛派骚扰。惟有变通办理，专用年富力强之人，操习刀矛枪炮各件，略以军法治之，以期用命。"[27]

湖广总督张之洞数月之后也表示支持，并说此举有益无害。但他同时又强调，办团原则应是"官督绅团。城内有官弁兵役，只办保甲，毋庸团练。且城乡人多油滑，团亦无用。每县四乡，酌分数团。每团设正副团首各一人，以端正殷实读书有功名者充之。"[28]不久，清廷下达上谕，决定在四省试办团练：即直隶、奉天、山东和山西。[29]上谕虽然没有特别提出民、教冲突的问题，可以看出这四个省的教案最多，最复杂。朝廷操办团练并不是对秘密社团特别青睐，但在此时办团，难免让拳会人士利用。拳会成员本来有些武艺，入团更加容易。

朝廷在此事中的判断失误恰恰在于：没有意识到此举对拳会的大发展有间接推动作用。一时间，各种反教反清组织都改名为"团"，甚至地痞无赖也开始以团练名目鱼肉乡里。先后出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都在奏折中用过"义和乡团"的概念，所以多数中

外史学家就认为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官方支持的背景。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路遥等人的研究表明，赵三多虽然后来将"义和拳"也改为"义和团"，但"义和拳"绝非乡团出身。[30]历任的山东巡抚都有想将拳会编成团练的设想，但一直未能成功。而筹办团练的上谕下达后，山东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教抗洋已成为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地方官已经不可能将众多的拳会收编入团。事实上，形形色色的非法组织已经开始自称是"义和团"，而政府主办的团练则寥寥无几。在外国人的眼里，这么多的"团"的出现是官、民合作的证据，其实大谬不然。

毓贤去职以后，各国公使属意的山东巡抚的人选居然是袁世凯。袁世凯是戊戌政变的罪魁，而且是一介武夫，并无地方行政经验。公使们青睐袁世凯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来自李鸿章的忠告，李认为袁世凯有能力解决山东问题。李鸿章一直通过他的洋幕府成员，如德璀林和美国人佩色克，同各国公使保持秘密联系。[31]其次，公使们对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敦大肆进剿的劲头也颇为赞赏。

袁世凯的投机术一向高明，早就在觊觎山东巡抚的职位。山东大乱，朝廷不知所措。袁世凯乘机于1899年7月向朝廷上奏，自称有解决办法。当时意大利舰队已北上山东海域，袁奉朝廷之命带兵在山东沿海以演习为名悄悄备战。在此期间，他在荣禄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向朝廷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他不同意历任山东巡抚的主导看法，即将山东问题完全归咎于传教士。他说地方官在办理民、教冲突时也有不当："近闻东省官吏，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其仇视者固是倡民生事，而畏夷者尤是挟怨激变。"袁世凯建议用持平的手段解决山东民、教冲突，并提出一整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其中第一条即是"慎选守令"，袁世凯实际上是向朝廷毛遂自荐。朝廷此时对山东问题已筋疲力尽，自然对袁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将此奏折作为上谕转发。[32]几个月后，毓贤被迫去职，朝廷立即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任职后，很多权臣如李鸿章等都很高兴，公使团也认为是一大喜事。赫德爵士在日记中的记载颇能反映外国人的心情："袁世凯被

任命为山东巡抚……如果他有全权，将会将山东治理得比任何人都好。"[33]

赫德担心袁世凯的权力有限是有道理的。朝廷内部对袁世凯的任命本来就有争议，很多大臣担心袁世敦在平原惨案中的表现对袁世凯有不利影响，使他难以服众。袁世凯本人也杀人成性，喜用军法。据说他曾在军营门口看到一蔬菜小贩，一时心中不快，举枪毙之。所以朝廷在发布任命的同时，也告诫他不要对心中不平的百姓任意动武，以免酿成人民造反的大祸。[34]

袁世凯一到山东，就将他对付拳会的策略明示于众。他的目的是要放弃多年来实行的"曾国藩原则"。到达济南不久，他就开始宣布拳会是反叛朝廷的组织，应一律禁止。吴桥县令劳乃宣在此之前写了一本小册子《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袁世凯阅后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大量重印。劳乃宣的观点鲜明：所谓义和拳不过是清廷建国以来的反清组织余孽，一直有反叛心理。此书以学者考据的手法写出，自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劳乃宣的基本观点并无考据的实证，他不过是通过以前各个时期的剿匪上谕而得出上述的结论，所以完全忽略了 1898 和 1899 年之间的拳会反洋运动的复杂背景和国际环境。过去的上谕与列强在华的争夺并无关系，而劳乃宣仍从中国内政的角度，有意歪曲历史，否定拳会组织的爱国动机。他将山东的所有拳会统统归到清廷最害怕的"白莲教"旗下，于是给中国政府和外国在华使节镇压拳会提供了相同的理由。

在劳乃宣的合作下，袁世凯颁布了对付拳会的六条措施：

一曰正名以解众惑；

二曰宥过以安民心；

三曰诛首恶以绝根株；

四曰厚兵威以资镇慑；

五曰明辨是非以息浮言；

六曰分别内外以免牵制。

袁世凯的上司直隶总督裕禄指示他不必将此公告报朝廷批准，对付义和拳匪这类欺诈之徒只需用武力即可。[35]然而，朝廷对放弃“曾国藩原则”还是有顾虑的。端郡王载漪和他的追随者对拳会与官军作战的能力很感兴趣。前山东巡抚毓贤奉诏赴京后，朝廷认真地倾听了他对山东局势的看法。毓贤大肆吹嘘义和拳会的超人能力，朝廷守旧派听后大为兴奋。虽然慈禧太后本人在这个阶段对拳会的特异功能是否相信尚不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朝廷权贵如端郡王、庄亲王、刚毅等对毓贤所说的却深信不疑，认为拳会并不都是反叛之徒，不少人是忠于朝廷的义士。[36]

袁世凯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显然要带来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行动，山东的百姓更加人心浮动，对袁的企图惶惶不安。一位英国传教士从山东报告说：“新任山东巡抚不受百姓信任，对他一意镇压反洋运动的做法心怀疑虑。他来到山东之前，名声已经很差，被普遍认为是个滑头，不可信赖的人。”[37]朝廷对袁世凯采取大规模动武的手段愈来愈担心，1899年12月，朝廷指示刚到任的袁世凯对教案要“持平办理”，不要轻易用兵。正确的策略应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几日后，朝廷又发电警告袁世凯不要一意进剿，以免引起平民造反。同时，朝廷收到一位保守派的御史参劾袁的奏折，该奏折称袁世凯到山东以后，老百姓已被逼到造反的边缘，因为他下车伊始就宣布要彻底剿灭拳匪。由于他的兄弟袁世敦在平原的暴行，山东百姓更是对袁世凯恐惧万分，该御史还直言建议应该另选一人抚巡山东。朝廷大为不安，又向袁世凯发出第三次警告，要他不要随意动武。[38]

这三封电报对袁世凯确实是个牵制。尽管如此，他在山东对拳会活动仍是很强的震慑。不少拳民开始离开山东，进入直隶。列强当然对袁世凯的政策极为赞赏，驻京的公使们执意要求中国政府将所有的仇洋组织一概明令禁止。袁世凯愿意动用武力予以合作，自然深得公使们的欢心。英使窦纳乐向伦敦乐观地报告说：“关于山东的未来局势，目前最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是新任山东巡抚人选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已将他的所有部队带进山东。此人一贯决策果断，

该动武时决不手软,所以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平定山东的暴乱。”[39]

然而,公使们实在过于乐观,因为袁世凯在山东并不能随心所欲。此外,列强各国对山东问题也缺乏一致的立场。

四、列强与山东

海关总监赫德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直不满。1898 年末,他给下属的指示信中提醒说:“目前形势太微妙,难以把握。连海关都很难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新的事业,务必请诸位要谨慎小心。”[40]到了 1899 年春,赫德开始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他在 5 月给在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的信中说:“英国强租九龙一事已造成严重后果,而俄国又突然要求修建满洲到北京的铁路。同时,德国的军事行动激怒了山东人民,在中国到处发生的事情都令人不安。”赫德分析道:

> 中国人的特点是务实和富有哲理性,一般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不管皇帝是谁,政府如何,只要老传统尚存,他们不会轻易自找麻烦。然而,每一千个中国人里必定有一小批不安分之徒,一旦他们看到政府在外族入侵之时软弱无力,造反精神就会被唤醒。他们不会将外国人看作是先进文明的代表,而认为他们不过是另一种不安分的歹徒,所以便跃跃欲试,趁政府的虚弱之际滋事生非。

赫德还告诉金登干说,近来有谣言说中国人要将所有的洋人驱逐出境,并嘲讽地说:“不知西方意欲如何?”[41]赫德的分析表明他确信山东之乱源于列强的政策,这与许多公使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公使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是传教士,而传教士多以中国人的传统排外、仇视基督教的心理来解释山东的问题。赫德认为排外仇教的加剧是对列强入侵的特殊反应,而传教士则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列强各国政府此时对在中国发生的民、教冲突并不十分感兴趣，它们的注意力在于地缘政治的争斗。英国政府对德国突然发兵占领胶州湾十分不满。法驻英大使坎朋在1899年5月报告德卡赛外长，说索尔兹伯里首相非常不快，曾问他："为何德国人有足够的时间，也不向我事先打招呼，便自行占领胶州？"[42]法国公使毕盛在北京注意到在德国公使海靖离任宴会上，英使窦纳乐借故未到。为了遏制德国在远东的势力，英国政府考虑与俄国达成一项合作的协定。长期以来，列强在华的争夺是以英—俄矛盾为核心的。德国的入侵将英—俄矛盾暂时地淡化了。于是，英国试图与俄国达成互相承认势力范围的协议，但是俄国却乘机想把它的影响力从满洲扩张到华北和黄河流域，其中包括山西、河南和山东的一部分。英国人大惊，坚决予以拒绝。俄国又要求英国明确界定"长江流域"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概念。然而英国实际上在考虑将"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长江盆地"，这样就要从上海延伸到四川。双方你来我往，经过几番秘密谈判，于1899年5月达成《英俄协定》。然而，此协定并无实际价值，因为俄方最终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一个关键条款，即俄国不支持任何列强在"长江盆地"内修建铁路。[43]因此，协定中双方互相承认势力范围的条文形同虚设。

法国政府对《英俄协定》非常不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孤立法国。德卡赛外长甚至以为英国有企图要将"长江盆地"变成另一个马来半岛甚至印度殖民地。法国在"长江盆地"的利益已经很重要，1899年法国在此地区有3亿多法郎的投资。《英俄协定》签订后，毕盛公使沮丧地报告外长："瓜分中国已成了无法掩饰的事实。"[44]毕盛一贯主张法国积极参与瓜分，但是保罗·坎朋和驻俄大使蒙特贝洛对这个意见不愿苟同。这两位大使都认为英国突然重提"势力范围"问题，实际原因是为了防范德国。由于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与俄国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有冲突，英国意在引诱德国正式界定势力范围。德国工业界目前对华直接投资的兴趣并不大，对殖民活动也不热情。因此，德国正式界定势力范围后，就不能再染指"长江盆地"。据他们

分析，德国肯定对《英俄协定》不满。如果德国不愿上钩，则将给法国提供机会重新与英国修好，因为英国人骨子里还是赞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45]所以，《英俄协定》反而成了法英和解的一种催化剂。

于是，德卡赛否决了毕盛要求与英国谈判正式界定在华势力范围的提议。到了1899年6月份，果然不出所料，德国政府对《英俄协定》大为光火，连法国驻德大使诺埃耶都对布洛夫外交大臣的强烈反应大吃一惊。布洛夫认为《英俄协定》的结果是中国大部地区落入英国之手，对欧洲他国的利益是极大损害。[46]到了1899年年底，法国政府欣慰地看到英国政府又回到支持中国“门户开放”的立场，由山东引发的列强地缘政治的斗争才暂告平息。然而，山东已群情激愤，仇洋烈火在熊熊燃烧，公使团不得不开始考虑对山东局势的共同立场。

山东反洋运动爆发之初，法使毕盛曾希望将冲突控制在德国教区。然而，到了1898年底，暴力事件在法国护教区也大规模发生。1898年7月间，巴黎海外布道会的两名神父在广西被杀。10月份，法国的沙奈神父与13名中国教徒在广东丧命。与此同时，余栋臣在四川的攻击目标主要是法国教士。10月底，赵三多起义地区也发生在法国护教地区。1899年初，平原的法国教士大批逃离传教点，除了教堂和教民房屋被焚烧外，抢劫事件同样层出不穷。反教活动有地方绅士支持，有的地方官也加以姑息，因而发展势头很大。尽管山东的形势严峻，毕盛公使仍坚持认为山东动乱的根源是德国入侵。他在一份向巴黎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德国在山东的政策是暴乱根源，但德国还在继续为教案获取赔偿，山东地方官愤怒不已，因而故意放弃对教士教民的保护之责。毕盛认为，德国的官方政策是只护教士，不护教民，而现在对双方都管，所以地方官对法国的护教权也开始撒手不问。[47]然而，法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地缘政治，对民、教冲突不大关心，所以对法国传教士在华遇难的事件并未作出过激的反应。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对山东的民、教冲突兴趣不大，因为问题的来源是德国和天主教。英国外交部从来没有把传教士看作是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1897年，著名的“中国通”、与康有为的“强学会”

有密切关系的李提摩太牧师在伦敦要求与政府官员会谈,外交部无人对他感兴趣。山东动乱的严重性只是在袁世凯主持山东之后,不少拳民进入直隶,才引起英国公使的重视。英国新教传教士虽然不如天主教士那样为所欲为,但当地百姓对他们的存在也是心怀不满。新教教堂一般有个尖顶,被普遍认为是破坏当地风水的象征。而新教强调的社会改革方案也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安,从清廷的角度看,新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危险,因为它在中国到处宣传改革。通过办报、出书、建学校,新教向中国人灌输了不少危及中国体制的新思想、新概念。再者,很多新教传教士直接参与了康梁的变法,其中以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最为活跃。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一般百姓已无暇顾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别,只想将洋人统统赶出中国去。

然而,对在华新教活动保护最力的不是英国而是正在崛起的新教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整个 19 世纪 90 年代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是防止中国被列强正式瓜分,中国的解体将危及美国在华的利益。但是英、美政府都不想在教案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免与中国交恶。与法国相比,英国政府更加不愿意卷入民、教冲突,特别不愿意为了中国教徒的利益而与清廷发生冲突。英、美在华的领事对传教士向无好感,但德占胶州湾之举开创了以教案获割地赔款的新途径,英、美政府也开始关注教案问题。英国是头等强国,需要维护全球的势力均衡,于是美国在英国的鼓励下担当起保护新教活动的非正式代表。

1899 年初,天主教士被总理衙门授予正式官衔,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旨在切断教案与割地赔款的直接联系,如果将传教士列入中国官僚体制的品秩,就能够减少列强外交官干涉教案的权力。这项政策与清廷在胶州湾事件后为了防范再一次割地的决心是一致的。法使毕盛一开始积极支持此项新政策,他和法国主教樊国梁都参与了此事的谈判。但不久他又开始意识到,接受这个方案将意味着法国护教权的终结,于是又开始反悔。英、美政府一开始也有些糊涂,它们对此方案的初步反应是认为这是法国的

阴谋。美国国务院指示康格公使为新教教士争取同样的权力，但因新教各会对此坚决反对而只好作罢。[48]英国政府一开始也担心此举会让新教教士失去保护，英国国教的领导人对天主教在华得到这样的地位非常不满。在上海召开的英国国教主教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天主教神父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干涉已达到了令人警觉的地步”。[49]在武昌的浸礼会教堂在给窦纳乐公使的信中指出，传教士不是政府官员，对司法诉讼并无知识。而上海的新教联合会则要求给予新教教士同样的特权，但不要头衔和品秩。

其实，每个新教传教士都将自己看作是主教，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实践中争取到了与当地最高地方官见面商谈事宜的权利，表示不需要天主教主教所给的头衔。[50]此外，在华的新教传教运动都有各自民族国家的背景，不像天主教有梵蒂冈这样的跨国权力中心。因此，很多新教教士本身是民族主义者，对国家利益和主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为郑重起见，就此事专门询问了国教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教士头衔问题被搁置一旁。[51]

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门户开放”的声明是英籍中国海关雇员希普斯利帮忙制定的，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对此表示欢迎，但其他列强和中国都对这次声明没有发表正式意见。同时，山东的反洋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898年，新教在四川的内陆传教会有一名教士弗莱明被杀。1899年初，山东沂州的抗教组织在打击天主教的同时，也攻击了新教教堂。1899年在华的美国人共有2335名属于传教组织，法国人中也是大部分与天主教传教活动有关。但此时法国护教权地位已在下降，而美国护教权地位却在上升。19世纪末，不少美国的重要人物都认为传教活动可以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就属于积极支持传教活动的一员。马汉在19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如果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没有进入夏威夷群岛，这些岛屿恐怕早已落入他国之手。他认为：“那些批评传教活动与和平发展

与进步相矛盾的说法荒谬至极。”[52]巧合的是，美公使康格出生于西部的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对传教活动特别尊重。他对传教士的要求一般是有求必应，比如刚上任不久，为迎合教会的旨意，就有迫使毓贤解职之举，很多传教士写的书中都对他护教的努力表示欣慰。[53]

另外两个列强，即俄国和日本，在中国并无传教活动，所以山东的动乱对它们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担心。俄国仿效德国占领胶州湾，强行租借了旅顺口以后，引起列强的一系列租借活动，此举对李鸿章企图与俄国签定密约很有妨碍。戊戌政变后，两国关系由于亲俄派被贬而进一步恶化。1899 年 4 月，中国政府坚决拒绝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请求扩建满洲铁路的计划。维特试图重修中俄关系，但中国的反洋运动已经开始波及满洲。尽管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民、教冲突中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抗俄行动仍然此起彼伏。1899 年初，旅顺口发生大规模骚乱。俄国在旅顺口的军事当局决定在中俄管辖区的中间地带征收土地税，2000 多农民在马承逵的率领下攻击俄国的税收站，造成流血事件。[54]

1899 年，俄国最担心的是山东的动乱向全国扩展，动乱将危及俄国在满洲的利益和铁路建设项目。同时，俄国还担心山东的动乱可能会引起列强的武装干涉，损及俄国在华北的利益。从 1897 年以后，俄国在华采取的是守势，意在保护既得利益，所以俄国在北京的外交官坚决反对公使团采取一致的行动以迫使中国就范。

日本的看法与俄国不同。日本政府对山东的动乱既有一定的亚洲人的同情心，又要考虑列强的地缘政治关系。日本的精英势力在甲午战后已开始将中国问题视为白种人与黄种人在亚洲斗争的一部分，日本人对西方的“黄祸论”也是恨之入骨。著名的政治家近卫公爵在 1898 年曾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白种人对中国的瓜分步伐在加快，使得中日的命运变得不可分离，认为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斗争即将到来。近卫还组织了一个“共同文化社”，鼓吹中日“一个种族，一种文化”的理论。很多政府要员与近卫的想法如出一辙。1898 年 5 月，农商大臣写道：“如果我们要真心地保护我们在华的利益，必须要

阻止中国被列强瓜分，然后才能争取和平，引导中国发展生产和增强实力。当日本与西方列强冲突开始时，我们就能在东亚保持均势。"[55]

德国入侵山东时，日本参谋本部曾派人建议与中国结盟，但并非出于真心。然而，日本对中国在胶州湾问题上的同情让清廷感到高兴，地方大员如张之洞也表示感谢。所以，"百日维新"之后，尽管日本帮助梁启超出逃，两国关系并未急剧恶化。政变后的慈禧太后政权在国际上颇为孤立，因而也对日本伸出的橄榄枝乐于接受。

日本在华的关注重点是俄国，但与彼得堡政府一样，对山东民、教冲突漠不关心，日本知道山东问题乃是列强入侵所激起的。但到了 1899 年，山东的拳会运动的矛头开始指向所有的外国人，日本政府倒是感到措手不及。[56]日俄在华无传教事业，但中国的反洋浪潮有可能引起列强军事干涉。西方列强可以从海路进攻，而俄国则有优势直接从陆上派兵。所以列强在华的军事行动将是日本的最大恶梦，因此日本在 1899 和 1900 年上半年一直对民、教冲突保持低调，不想激化中外矛盾。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看到列强在华的外交官很难就山东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各自心怀鬼胎，互不信任。即使是反洋运动开始带有某种绝对排外的特点时，还是很难协调共同立场。然而，列强在华外交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对中国政府的统治能力不屑一顾。他们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时，总是盛气凌人，以命令的口吻逼迫中国就范。中国政府在 1899 年为镇压拳会活动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但列强外交官对此总是嗤之以鼻，认为中国政府故意表现出无所作为。这样一种态度，不能不让慈禧太后感到列强政府对她采取的是一种直接的敌对的情绪。然而，此刻列强外交官尚没有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因而慈禧太后还不用过分担心列强在密谋推翻她的政府。如果列强开始联手行动，这就必然会触及慈禧太后最敏感的神经——戊戌政变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个重要当口，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在 1899 年 12 月被害的事件。在英使窦纳乐的领导下，公使团以此为契机开

始了联合外交行动，于是历史在1900年初便以一场偶然的悲剧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历史上，常常会发生一个危机触发另一个危机的连锁反应。当所有的引爆因素都合起来成为一个炸弹时，大危机的爆发便是指日可待了。这就是为什么公使团突然采取共同立场之日，便是清廷内部政治危机的爆发之时。

---

①Kaminski and Unterrieder: *Wäre ich Chinese, so wäre ich Boxer*, p.45.

②沈桐生:《光绪政要》,卷4,第1428—1430页。

③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pp. 69—73.

④Smith, Arthur H.: *China in Convulsion*, vol. 1, p. 103.

⑤路遥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一章。

⑥同上,第三章。

⑦同上,第95页。

⑧Steiger, George N.: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p. 132.

⑨《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4—16页。

⑩同上,第95页。

⑪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卷1,第44页。

⑫Kuepers: *China und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ud-Shantung 1882—1900*, pp. 152—153.

⑬《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22—23页。

⑭Kuepers, 同上注⑫,第165页。

⑮《筹笔偶存》,第30页。

⑯《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1,第308—311页。

⑰Kuepers, 同上注⑫,第149—150页。

⑱同上注⑫,第159页。

⑲*North-China Herald*, October 9, 1899.

⑳Kuepers, 同上注⑫,第181—182页。

㉑同上注⑫,第182—183页。

㉒Smith, vol. 1, pp.176—182.

㉒Young, L. K.: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108.

㉔*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Affairs in China*, p. 77.

㉕全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1,第429—430页。

㉖据毓贤的后人所称,有此可能性。见叶赫颜扎·仪民:《文史资料》,卷33,第178页。

㉗《光绪朝东华录》,卷4,第4226—4227页。

㉘同上,第4340—4342页。

㉙同上,第4746页。

㉚路遥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八章。

㉛关于李鸿章洋幕府,见Folsom, Kenneth: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关于德璀林的作用,见Schmidt, Vera: *Aufgabe un Einfluss der eru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Gustav Detring* (*1842—1913*) *im Dienst Li Hung-Changs*, pp.3—4.

㉜《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27—29页。

㉝*Hart Diary*, vol. 54, December 11, 1899.

㉞《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44—45页。

㉟《义和团》,卷4,第467—472页。

㊱《清史稿》,卷465,《毓贤传》,第10247页。

㊲伦敦国家档案馆(PRO), FO228/1343.

㊳《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44—47页。

㊴*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 3, 1900, p. 4.

㊵Morse, H. 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3, p.157.

㊶Fairbank, et al. *I. G. In Peking*, vol. II, p. 1197.

㊷*DDF*, vol. xv, p. 273.

㊸*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vol. I, chapter I, *Russia and the Far East*, 1897—1899.

㊹*DDF*,同上注㊷,第333页。

㊺*DDF*,同上注㊷,第273—281页。

㊻同上,第366—367页。

㊼*DDF*, vol. xvi pp.1—3.

㊽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500, note 70.

㊾Pearl, Cyril: *Morrison of Peking*, p. 108.

㊿Wehrle, Edmund, *Britain: China and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p.134.

�51 *PRO*, FO228/1343.

52 Mahan, Alfred T.: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p. 172.

53 Lindbeck, John M. 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1898—1901*, p.82, note 127（未刊博士论文,耶鲁大学,1948）。

54 黎光等:《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32—34页;又见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29,第5页。

55 Reynolds, Douglas R.: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p. 28.

56 青木周藏:《青木周藏自传》,第325页。

第六章

中外沟通的两大问题

一、拳乱无碍大局

山东的动乱当时并不是朝廷重臣们关注的中心。整个1899年中，北京的保守派关心的是如何使废帝计划合法化。25年前，慈禧太后决意挑选她的外甥载湉为光绪帝，这种做法虽然有违祖制，但毕竟开了先例。当时朝野上下的反对呼声很高，因为光绪是同治皇帝的同辈。朝廷命官吴可读不惜以死抗争，并留下了轰动一时的遗书，要求慈禧太后恢复正统的皇位继承制度。[①]慈禧太后对此绝不肯让步，因为新皇帝如果来自同治帝的下一辈，她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得再垂帘听政。

不幸的是，慈禧太后自己选中的光绪帝现在成了反叛她的急先锋。"百日维新"中，光绪显然有意向要结束慈禧太后的政治生命，对太后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皇位继承问题是她的家事，外人无权干涉。光绪对她的背叛有违家法，并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扯不上国际政治问题。因此，慈禧太后一心要主持的废帝计划就是由这种心态来主导的。

然而，在祖制森严的清代朝廷里，这种事情只能做而不能公开谈论。光绪帝正值青壮年，身体虽然孱弱，但尚无大恙，且在位已有20多年，朝廷守旧派很难找到恰当的理由将他公开废黜。此外，皇位继承问题是满族的内部事务，与汉人无涉。"百日维新"给慈禧太后的一大教训是不能过分地信任汉族士大夫，整个变法运动乃"广东小人"所为。因此，废帝阴谋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而秘密地进行。应该说，自18世纪以来，由少数皇亲贵胄全面地把持朝政，恐怕还是第一次。

但是，皇室的下一代年轻人里鲜有治国的栋梁之材，这些人不但刚愎自用，而且不求上进。慈禧太后只能一方面继续依靠老年重臣，另一方面悉心挑选皇位继承人。老资格的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依然位高权重，但年轻一代的皇室宗亲们的地位也开始迅速攀升，其中以端郡王载漪最为突出。然而，对慈禧太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荣禄将军。荣禄在保守派所把持的朝廷里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对慈禧太后的心理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从而能够适当地提出太后最感兴趣的建议。太后与荣禄之间的相互理解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之上，只要荣禄在身边，慈禧太后无需直接表露内心世界的活动，就常常能达到目的，荣禄完全理解慈禧太后急于废帝的心情。当时光绪帝年纪尚不到30岁，虽遇挫折但来日方长，而慈禧太后已经64岁。荣禄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他知道废帝计划肯定能得到多数满族权贵的支持。反对维新，并在戊戌政变中受益的保守派都对"老佛爷"的百年之后感到不寒而栗。

早在维新变法的前夜，荣禄就试图让慈禧太后重掌大权。他曾组织大批朝廷重臣联名请愿，请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但是朝廷内部的反对呼声很高，荣禄只得作罢。某日，他将此建议告诉汉人大臣、兵部尚书徐郙，徐坦言相陈，说此举必将引起舆论的非议。[②]戊戌政变以后，荣禄积极地发起废帝活动，这一次他找到两位老资格的同谋。一位是蒙族贵族崇绮，他是同治皇后的父亲；另一位是汉军大学士徐桐，他曾经担任过同治帝师。荣禄的政治感觉十分准确，他知道此时抬出同治帝的旧臣非常能够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态。这时慈禧太

后对当年选中光绪帝已后悔莫及，自然要追思早逝的儿子同治帝。所以，在这个时刻，慈禧太后对同治旧臣的意见必然重视。

崇绮是大学士赛尚阿之子，早年参加过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他的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是在科场上名列榜首。非汉人而能考中状元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大清王朝的 260 多年中，满、蒙子弟获此殊荣的惟崇绮一人而已。清朝廷对科举还是慎之又慎的，从来不愿落下偏袒八旗子弟、破坏科举制度的恶名。崇绮的试卷一式十份送往军机处和慈禧太后本人，让最高当局亲自予以定夺。当时的一致意见是，尽管这次考试的结果非比寻常，仍然要以文取士，所以崇绮顺理成章地拔得头筹。几年后，崇绮的女儿获选为同治皇后，他本人也权倾一时，如日中天。可惜好景不长，同治帝沉溺酒色，19 岁便驾崩。崇绮此后长期郁闷不乐，很少参与朝政。到了 1899 年时，他已基本上退休在家，无所事事。

徐桐的父亲徐泽春当过礼部尚书。进士及第以后，徐桐担任过起居注侍讲官，然后一路升迁，仕途平稳。徐桐是著名的守旧派学者，门人很多，而且由于担任过同治帝师，所以在朝廷中影响很大。他于 1896 年起任军机处大学士，但因年事太高，实际责任并不多。1899 年徐桐已年届 80 岁，朝廷曾特别恩准他上朝时可由太监搀扶。[3]徐桐仇洋甚烈，中外皆知。他的寓所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据说他每次上朝，都要命令轿夫绕道而行，因为他不愿看到洋人的建筑。英国公使窦纳乐在一份给伦敦外交部的电报中这样评论过崇绮和徐桐：

> 崇绮是满族人，[4]他与外国人没有任何交往，据说是有保守倾向的人。徐桐是汉军八旗的后裔，据说对外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他住在使馆区的同一条大街上，以坚决反对在该街铺设柏油路面而出名。他也反对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方案。[5]

荣禄促成这两位政治元老重返权力中心之后，自觉羽毛丰满，便开始推行废帝的大计。一时间大批重臣云集到废帝活动的旗帜之下，其中有军机处大学士刚毅和赵书翘，户部尚书启秀，庆亲王奕劻，辅国公载澜等一批较年轻的皇室成员，虽是乌合之众，但声势颇为浩大。恭亲王奕䜣去世后，朝政已失去了内部制衡的机制，保守派一手遮天，很少有人敢对废帝阴谋提出异议。由于废帝这件事不能公开讨论，一切活动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这正合荣禄的本意。荣禄一贯喜爱幕后操作，平生最厌恶用文字表达思想，他做事极其谨慎。在废帝活动开展之初，他曾向地方督抚发电试探他们的态度，没想到回应十分强烈，以反对者居多，他不得不放弃直接废帝的做法。1899年中，荣禄开始寻找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既能摧毁光绪皇权的合法性，又能避免由于违背祖制所引起的非议。经过深思熟悉，他提出了在保守派看来是极其聪明的方案。由于光绪帝至今无子嗣，荣禄提出用建储的方法达到今后废帝的目标。关键之点在于，新建王储将继承同治帝的大统。这样一来，一方面这个方案可以表明慈禧太后愿意重新回到吴可读以死相谏的正统皇位继承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此计可以一箭双雕：既能防止光绪帝日后干预皇位继承问题，又可以避免直接废帝所带来的政治反响。由于新建王储的名分尚不足以称为太子，所以可立为"大阿哥"。荣禄知道此时立太子，洋人必然不允。[6]

慈禧太后和朝中守旧派对荣禄的建议大喜过望。为了吸取教训，荣禄这一次不敢将此计划交给地方大员去讨论。他只是找到密友李鸿章，将此事透露给他以作试探。荣禄十分聪明，他首先声称这并不是他个人的主意。但李鸿章听到后大惊失色，直言道："君有几许头颅敢试此举。"李鸿章最担心的是洋人的反应。[7]事实上，1899年间，宫廷大内曾宣布过皇上御体欠佳，驻京公使团便一片哗然。公使们强烈要求慈禧太后允许法使馆的医生进宫探视，因此清廷深知洋人对戊戌政变的敌对态度，废黜光绪帝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响。李鸿章对这件事的后果比他人更加清楚，英使窦纳乐在同李鸿章谈

话时曾表示大英帝国政府只肯同"光绪政权"打交道。[8]法使毕盛也曾明告李鸿章:"外国政府绝不会接受光绪无缘无故被废的做法。"[9]据工部主事、《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李希圣的说法,江苏粮道罗嘉杰曾向朝廷报告,说英国人可能会动用武力来复辟光绪的地位,慈禧太后闻讯后大为惊骇。[10]太后和荣禄都明白废帝活动的风险很大,但是还是决意按计划行事。

1900年1月24日,建储上谕正式颁布。内称:"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皇太后懿旨俟朕生育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再四恳求如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11]

溥儁是端郡王载漪的次子,他的入选并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兄弟桂祥的女儿。这样一来,"大阿哥"的血统与慈禧太后所属的叶赫那拉氏家族又进了一层,而光绪帝的母亲只是太后的妹妹。建储的宗旨是为了承接同治而不是光绪的大统,因此光绪帝虽然未被废,他不得不承认其皇位在表面上的不合法性,这就为今后任何时候的退位制造了合法的借口。同时,朝廷又任命崇绮和徐桐为"大阿哥"的上书房师傅。这样,长达一年多的废帝计划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其实,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上海电报总办经元善再度发起请愿运动,他联络了1231位当地名流联名公开反对建储的决定。在一封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经元善等指出:"人心沸沸,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求王大臣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12]

这份电报对朝廷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它一方面公开了近支王公图谋私利的举动,另一方面还明确点出了朝廷最敏感的问题,即洋人对"废帝"一事将有激烈的反应。经元善在不久前宫中宣布上体欠安时就曾表示过抗议,由于他的"善人"家族背景,朝廷当时不愿对他予以深究。但此次事件让慈禧太后感到忍无可忍,朝廷立即下令逮捕经元善和他的同党,经闻讯后立即逃往澳门。清廷与澳门的葡萄牙

总督多次交涉，要求引渡，但葡方坚决予以拒绝。[13]

与建储大计相比，山东的拳乱不过是一个小麻烦。当然，不是所有的守旧大臣从一开始就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因为此时义和团的性质尚不甚明了。荣禄和庆亲王奕劻等人对义和团的仇视主要是担心它的反清倾向。但他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建储问题上，无暇顾及山东。而洋人对山东的动乱十分关注，认为这是仇洋风暴的前奏，所以清廷与洋人对义和团担心的角度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此外，义和团的"灭洋"口号以"扶清"为前提，这对大清王朝的声誉并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扶清"口号并没有刻意区分光绪政权和太后政权，并无勤王色彩。由于戊戌政变后的政权本身就有篡权之嫌，义和团的口号对慈禧太后不无益处。

再者，清廷对义和团即使采取彻底进剿的政策，也不能平息此起彼伏的教案，更不能阻止中国被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趋势。德占胶州湾之后，瓜分势头已明显地愈演愈烈，所以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不能不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二、公使团面面观

1900年的驻京公使团由一批基本上不谙中国事务的外交官组成，这是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允许外交使团常驻北京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公使团团长是西班牙公使卡洛干伯爵。此人性格开朗，但缺乏领导能力。卡洛干当时已六十有七，在中国的时间比其他的公使都长。他本来早就应该奉调回国，但是西班牙女王坚持要他留任，因为他刚刚轮上公使团团长的职位。不久前爆发的美—西战争中，西班牙不仅惨败，而且忍痛割让统治多年的菲律宾，西班牙需要卡洛干留在东亚以期提高它的国际威望。这位在东亚最年长的西方外交官的视力极差，近乎半个盲人。但他生性乐观，在后来发生的围攻北京使馆区的事件中还是起了一定的镇定人心的作用的。另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是奥匈帝国的公使济坎伯爵，此人以过分注

重社交礼节出名，但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济坎曾担任过驻布达佩斯总领事的职务，这在奥匈帝国是一个要职。当他接到使华任务时，心情非常沮丧。据他的副手罗斯通后来的回忆，济坎从一开始就把驻节北京看作是"升迁的中转站"。济坎使华已达五年之久，罗斯通说他"对通商口岸和内陆省份的情况差不多是一无所知"。他整天无所事事，以打猎为最大的乐趣。[14]济坎的癖好是搜集各种鹿角，他的收藏在北京颇有名声。当然，卡洛干和济坎所代表的是两个在华没有多少利益的列强。所以，当其他国家的外交同行整天在瓜分中国的争斗中忙得疲于奔命之时，这两位公使乐得忙于改善自己的生活。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的人缘极差，这与他的个性有关。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在回忆录中称他为"十分粗鲁的日尔曼人"，英使窦纳乐也说他是一个"爱冲动的人"。问题是，克林德固然蔑视中国人，但他也看不起公使团的同事。他自诩是一群无知庸人之中惟一懂得中国事务的专家。克林德十年前担任过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但他还是用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中国，所以对 1900 年的中国并无多少了解。十年前，德帝国的国际声誉如日中天，当时列强在华的大规模争斗尚未展开，而中国国内政治也是风平浪静。克林德在 1899 年夏接替海靖公使再度使华，这时中国的变化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他用旧的眼光来看待变化过程中的中国，这对他的判断力不能不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克林德性格暴躁，为人刻薄，他的傲慢无礼、目中无人的姿态很快就让公使团的同事们侧目而视。前任海靖公使对调往墨西哥本来就有怨气，所以海靖夫妇在柏林述职期间听到克林德的孤立状态感到由衷的高兴。据海靖夫人伊丽莎白的回忆，德国外交部也开始为克林德的表现担忧。尚在柏林还没有赴任的贝娄参赞是克林德在华的副手，贝娄告诉海靖夫妇，外交部的实权人物霍尔斯坦常务副大臣对克林德公使的处境焦虑万分。[15]所幸的是，克林德夫人颇有人缘。莱蒂·克林德是美国底特律的铁路大王莱得亚的独生女，她容貌秀丽，风度优雅，是社交的一把好手。她年纪才 30 岁，比她的 47

岁的丈夫要年轻 17 岁，她的存在对克林德的无礼表现多少是一个补偿。这对夫妻相识于华盛顿，当时克林德是使馆参赞，后在墨西哥任上度过几年。来到北京后，克林德夫人对这里的生活条件大失所望。北京对她来说无异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中等城市，与东部纽约等地的社交圈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她也为丈夫的孤立状态感到难过，所以她常常把所有的思乡情绪和满腔怨恨撒在对中国的不满上。在一封写于 1900 年 3 月的家信中，她这样描写中国人："中国人种的最突出的特点，我认为是酷爱肮脏的东西、猎奇心理以及无休无止地大声喧哗。"[16]

窦纳乐是大英帝国的忠实仆役，但他没有在远东的经历。赫德爵士和《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对他的评价都不高。莫里逊于 1899 年向《泰晤士报》的远东编辑纪和这样报告说："我对窦纳乐的判断力和毅力深表怀疑，他的最大弱点是记忆力太差。"[17]窦纳乐是陆军少校，一个优秀的军人，热衷于行动，但是他经常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决策。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被清政府追捕之际，窦纳乐尽管对康有为的观点并不熟悉，也没有参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支持变法的活动，还是突然决定帮助康有为逃到英国军舰。而当清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时，他却在给索尔兹伯里首相的电文中表示出对清政府的不理解和不满："满族权贵显然认为外国人应对康有为的观点负责，所以他们对任何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都不信任。"[18]窦纳乐此时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帮助清政府头号敌人潜逃的事实。除了记忆不好以外，窦纳乐对彬彬有礼的外交手段也缺乏耐心，这种急躁武断的作风对维护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毫无裨益。窦纳乐夫人同大多数外交官夫人一样，厌恶在北京的生活，只要有机会出外度假，哪怕是几天，也会欣喜若狂。

法国公使毕盛人品不错，但是容易惊慌失措，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角色。毕盛来自法国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在京的各国外交官多是出身于贵族世家，所以他在一群伯爵和男爵中间常常感到不快。这些贵族子弟听说毕盛年轻时做过议员，并在国民议会里为巴黎公社

做过辩护演说，所以认定他是一个激进的左派政客，不适合在华的帝国主义竞争的大环境。海靖夫人在日记里写道，在某次复活节的天主教仪式上，毕盛以公使身份与北京主教樊国梁并肩骑马而行，在天主教北堂外面主持仪式。一个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代表，一个是教皇任命的主教，这个场面真是“滑稽透顶”。[19]毕盛夫人是里昂著名的餐馆“金房子”老板的千金，她的家庭是新教徒，所以对维护天主教在华利益不以为然。毕盛夫人为人热情，心地很好，但是因为出身低下，是公使团贵族圈子最热衷的讥笑对象。这些贵族夫妇对她的热情待客的习惯有一种恶毒的解释，因为她家庭以餐馆业为生，所以这是一种“生来具有的酒吧女风度”。[20]

日本外交官不善社交，并且常常讳莫如深，尽管满脸堆笑，却不大与同事来往交谈。而最令人捉摸不定的是俄国公使格尔思男爵。此人在社交场合非常活跃，但很少发表自己的高见，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他与李鸿章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消息来源很多，在外交姿态上常常与公使团的其他成员相左。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攻击甚烈，说他是搞两面外交的高手。格尔思夫人为人较宽厚，但他们的女儿则名声很坏，很多外交官夫妇私下里称这位姑娘（格尔思女儿）为“丑丫头”或“父母的错误”。格尔思小姐不仅长得难看，而且为人特别刻薄、自私。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在回忆录中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某日在公使团的网球场上，英国使馆的一位秘书的夫人带着新生儿在旁观看，后因牛奶不够了，孩子开始大吵大闹。萨瓦戈主动带着她和她的孩子到邻近使馆去要点食物。他们来到最近的俄使馆，格尔思小姐听到客人的来意后，立即开始煞有介事的谈判。孩子母亲不过是要个熟鸡蛋，而格尔思小姐既不愿意接受以一罐沙丁鱼来换，也不要牛排调汁，却坚持要法国的鹅干酱。萨瓦戈大怒，立即带着孩子母亲离开俄馆，到法使毕盛处寻求帮助。[21]

其他国家的公使对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颇有微词。荷兰公使克诺贝尔胆子很小，整日担惊受怕。在后来的围攻使馆事件中，他是惟一的躲在地窖里不肯出来参加护馆活动的公使，他的雅号是“围

馆事件的隐居人”。而意大利公使萨瓦戈本来就不想重返北京。由以上种种述说可以看出，1900年的公使团在文化上和礼仪上都与北京格格不入，成了自我孤立，与世隔绝的一群外国浪人。这些人在闲暇时无非互相邀请赴宴，久而久之，老是这么一些人，也不免开始生厌。此外就是打打网球，或到英国人建造的跑马场玩玩赛马。

社交活动也常常是无趣的。法使毕盛的葡萄酒窖在北京是最让人羡慕的，但毕盛有一个吝啬的坏习惯，请客时常常在酒里掺水。毕盛的一个来自共和体制的同事是美国公使康格。康格曾是陆军少校，与人交往态度生硬，一副典型的军人面孔。他与毕盛关系最好，但是法国人常常被美国人对欧洲又羡慕又无知的举措弄得啼笑皆非。某次，美使馆设午宴，毕盛向美使介绍一位新来的年轻的三等秘书。此人姓“公爵”(de Duc)，美使以为此人确是公爵身份，因此不顾外交礼仪，坚持让这个年轻人坐主宾席，这个错误让公使团贻笑大方。[22]

多数公使们在北京都过于繁忙，互相之间也有恶感，而夫人们都巴望早日离开中国，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海靖夫人对北京的生活可谓是深恶痛绝，即使像搜购古董这样有意思的活动也被视为是一次“与泥土和恶臭搏斗的探险”。每个星期日，当樊国梁主教在天主教教堂北堂主持弥撒之后都要有一个茶会，而每次茶会都成了外交官夫人抱怨北京生活的聚会。对外交官和他们的夫人来说，即使是参加清廷的正式社交活动也没有多大的意思。据萨瓦戈回忆，在总理衙门参加酒会实在是一种苦差事，“米酒”味道难以入口，而种种礼仪则更是令人难以忍受。克林德夫人在1900年3月8日参加了慈禧太后招待公使夫人的特别活动。对这次活动，她后来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 护送我们进宫的是步行和骑马的士兵，前呼后拥，吵吵嚷嚷，推推搡搡。这些乌合之众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军人”和“警察”的货色，魔鬼般的模样，浑身臭不可闻。

在宫中参观慈禧太后搜集的西洋钟表时，克林德夫人又写道：

和土耳其人一样，中国人显然对钟表非常狂热。我们看到几百种之多，有的确实很精巧漂亮，有的就不敢恭维了。后来由几位公主带我们去喝茶后，有人通报太后驾到……没想到她这么矮小。如果不是穿着高跟的绣鞋，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孩子。

克林德夫人甚至对丰盛的午宴也感到难以忍受：

我们就座于一个长条桌，面对的是公主和嫔妃。我们背后站着一位英文译员和一位法文译员。我们尽量客气地提一些问题："公主们的头发造型要花多少时间？"回答道："三四个小时。""多长时间做一次？""每三天一次。""你有多少孩子？"女主人们大笑不已（后来我们才知道有的尚未婚配）。女主人们非常兴奋，笑声不断，自己大吃大嚼，还要劝我们吃菜，居然用她们自己的叉子给我们搛菜。这些菜都叫不出名字，种种美食都上来了，什么"鱼翅汤"，燕窝，黑色的咸蛋（皮蛋）。餐具倒很精美，白色的玉杯，金制的盘子，但食品实在不敢恭维。中国的酒，加热后饮用，喝上去像浓缩的甲醇。整个午宴上，我连一点东西都不愿碰，将女主人搛的菜藏在玉杯里，假装已经吃了，以保持面子。

下午看戏，克林德夫人的情绪好一些：

这是典型的中国戏，噪音大，服装更换频繁，由太监参加表演。我们对剧情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欣赏那些炫丽的服装。前排正中，太后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包厢，皇帝和后妃坐在她的后面，大阿哥也在。他们对我们比对看戏还要有兴趣……最有趣的是，太后突然到来与我们攀谈。她对我们的衣着特别好奇，后来她将袖子撸起，让我们欣赏她戴的珍珠手链，她的胳膊圆润丰

满。她又坐下来让我们看她的脚，尽管满人不缠足，她的脚仍是很小，但没有变形。后来她想看我们之中一人的脚，我不幸被选中。与她的脚相比，我的脚从来没有显得如此的巨大。

整个活动持续了一天，克林德夫人下午4点钟才回到使馆，手上拿着太后送给每一位公使夫人的金戒指。此时她感觉"疲惫不堪，心情不错，不过肚子太饿"。[22]

总而言之，1900年在北京的外国人心情沮丧，厌恶那里的生活，脾气也很坏。这种心态由于关涉到清政府支持义和拳民反洋的传言而更加加剧。所以，列强外交官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外关系也日趋紧张。

三、中外沟通的障碍

到了1899年年底，中外沟通的障碍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在华外交官与清朝廷的沟通上。应该说，山东的拳乱与清朝的皇位继承危机没有任何牵连。然而，在华外交官对清廷和义和团的态度反而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公使们与清廷的基本思路开始分道扬镳。从清廷的角度来考虑，关键的问题是洋人是否接受立储的计划，所以它对拳民的态度从很大程度上以此为转移。外交官则一味强调镇压拳乱是中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又对戊戌政变后的新政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使清廷无所适从，处境艰难。

奇怪的是，列强外交官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要求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和政治上不承认主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新政府越不友好，则公使们的高压政策就越无效。而压力越大，清廷利用义和团的可能性就越增加，这个时刻是西方在华外交的非常危险的阶段。李鸿章赴两广任前，向朝廷报告过与英使窦纳乐的一段交锋。窦纳乐知道李鸿章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捕杀在香港的康有为，他正告李鸿章

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在港暗杀康有为是非法的。李坚称有中国朝廷的全权授予，他完全是合法行事，窦纳乐称现在的上谕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由此可见，窦纳乐对慈禧太后新政权的极端藐视态度昭然若揭。[24]据当时人的记载，清廷以一万两黄金悬赏捉拿康有为，但港英政府刻意对康严加保护，刺客无从近身。慈禧太后闻讯大怒，将手中玉杯掷碎于地，咬牙切齿地说："此仇必报！"[25]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公使团自行其是，不向清廷建储决定表示外交祝贺。据记载，端郡王载漪以为公使们要来朝贺，处心积虑地准备了一个星期，结果并无一个洋人上门。[26]这种做法确实违反了西方外交礼仪的要求，但公使们认为慈禧太后新政权没有资格接受朝贺。然而，公使团对戊戌政变不满可以理解，但是不承认新政权的态度要达到何种外交目的则并不清楚。一方面，公使团显然希望新政权垮台；而另一方面，又希望该政权采取强有力的手段镇压义和团运动。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恰恰对慈禧太后处理义和团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进退两难困境中的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惧怕义和团甚于中国政府，所以义和团有可能被利用以压制洋人，尽管慈禧太后对义和拳民并不信任。

最令人吃惊的是，朝廷不断收到信息，说列强有可能用武力恢复光绪政权。上海的经元善已明白地指出过这种危险，李鸿章和刘坤一也都暗示过这种可能性。1900年春，李鸿章从广东报告说，一些香港的制衣厂正在夜以继日地赶制军服，据说达3万套之多，这是为了新党北伐"勤王"之用。[27]慈禧太后和清廷闻讯大惊失色。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立即电告父亲"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28]尽管后来证明这不过是个谣言，但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西方援助下武力"勤王"的可能性，因为当时在中国海域已有外舰数十艘，而且公使团，特别是英使窦纳乐对新政权的敌对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中外沟通出现障碍的第二个层面，便是公使们与本国政府之间的沟通问题。可以说，这一层面为西方政府对华政策带来的问题更严重。首先，没有档案证据表明列强政府对恢复光绪政权向各自的

公使下达过明确指示。所以,公使团的不承认新政权的政策是公使们自己的即兴之作,并无本国政府授权。当然,出现这种严重现象的原因也不能全部归罪于公使们。多年以来,列强各国政府对两件事情缺乏兴趣:一是中国复杂的内政运作的细节;二是传教士问题。中国内政不可理喻,而且与列强在华的激烈竞争并无太大的关系。传教士问题多是牵涉教案,令有关国家政府十分头疼。列强在华的政策基础是如何与其他对手竞争,中国内政和传教士问题只要不是在牵动全局的情况下,列强政府乐意放手让在华的外交官即兴处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都未能看到公使团不承认主义的现实危险性,对公使并未加以严格的监督。而这一次公使团的态度无异于直接干涉清廷的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对这一偶然的重大疏忽为后来的中外交恶埋下了伏笔。公使团对新建皇储公开表示不满,而先前又有强迫清廷允许西医进宫为光绪帝看病之举。体检报告证明上体并无大恙,仍可处理朝政,所以更进一步地证实了公使团的猜测。这一系列动作向清廷转递了一个误导的信息,即列强政府有意联手推翻慈禧太后新政权,复辟光绪帝位。其实,列强政府并无此考虑。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公使们的行动却大大地刺激了清廷内部仇洋的守旧派的影响力并致使温和派的影响力下降。更糟糕的是,公使们既没有向本国政府详细报告他们抵制慈禧太后的行动,也没有及时报告山东义和团活动的情况。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公使意识到这种缺乏与本国政府在关键问题上及时沟通的重要性,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中一场巨大的反抗运动即将到来。赫德爵士对此看得较为清楚,应该是个例外。窦纳乐向英国政府报告建储一事时仅仅是例行通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分析。他也没有进一步提到山东拳乱的问题,或提出英国对建储问题的对策。总而言之,这个第二层面上的沟通障碍造成了一种非常奇怪而又特别危险的态势:中外交恶的根本原因是皇位继承问题,而各国政府对这个原因几乎是一无所知。不难理解,在北京的这种危险的外交态势将很容易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四、卜克斯事件

三门湾事件，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及皇位继承阴谋几乎是同时展开的。清政府此时已决定不再向外国提供租借权的机会，而北京公使团也仍然未能就拳乱问题达成一致立场。恰在这个关头，一个十分不寻常的教案在山东发生了。1899年的最后一天，英国国教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肥城的一个村子附近被杀。卜克斯牧师当然不是第一个在华殒命的传教士，但这个事件的特殊重要性在于他是非天主教教士，同时又是英国人。窦纳乐公使大怒，他的急躁脾气促使他立即向中国政府发难。在此之前，窦纳乐对天主教国家的教案很少涉及，也没有积极参加这些国家的公使针对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镇压义和团运动所提出的抗议，而此次他的态度的急剧转变对公使团达成共同立场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因为当时的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卡洛干年老眼花，不大管事，其他公使一般都把窦纳乐看作是实际的领导人。

拳乱爆发一年多来，卜克斯是英国传教士的第一个被害者。窦纳乐不得不向伦敦详细报告山东动乱的背景，因为英国政府至今对山东的局势没有什么了解。窦纳乐在1900年1月4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过去的几个月里，山东省北部受到叛乱者的骚扰，这些反叛分子的背后是秘密社团。他们蔑视朝廷的权威，到处抢掠。其中有一个组织叫'拳会'，声名最为恶劣。他们的破坏行为已波及直隶的南部，那里的中国教民饱受这些人的肆虐之苦。"窦纳乐接着又说："在这两个省份里，外国传教机构已面临威胁。这种形势的危险性已由我和其他的公使，特别是德美公使，向中国政府多次进行过交涉。"窦纳乐将卜克斯事件完全归罪于山东的反洋运动。[23]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窦纳乐在两个问题上有意混淆了伦敦的政策思路。第一对卜克斯事件的特殊性闭口不谈，而是将它混同于近期发生的一切教案之中的一个例案，是一场反洋大阴谋的一部分。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的中文助手白克浩司在当时就写道："很明显，卜克斯事先就接到警告不要进入那个村子，但他仍一意孤行，连卫兵都拒绝接受。"[30]卜克斯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在心理上早已做好了为传教事业献身的准备。英国驻烟台领事坎贝尔去肥城调查的第一份报告也证实了这个情况。坎贝尔说，当地一位地方官特地派员劝告卜克斯不要经过这一危险地区，但被他拒绝。而且，在那个村子里，他还主动到小酒店里去试图劝说村民皈依基督。几个地痞发现后，决定将他抓起来，目的是用卜克斯去敲诈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徒富户。敲诈不成后，卜克斯企图逃跑，才被这帮人杀害。[31]山东巡抚袁世凯的调查结果则比坎贝尔的报告更能说明问题。袁世凯的报告说，卡克斯在路上被刁民拦阻，而他先有意动武，去抢夺歹徒的刀子。[32]总而言之，当时的证据都说明卜克斯事件不是拳会组织精心策划的谋杀洋人事件，而是一个偶发的悲剧。

更要说明的是，窦纳乐本来没有过多参与德、法、美等国公使的抗议活动，而他给伦敦的报告中却说他一直与他国公使密切合作，外交统一战线在公使团已经形成。这样，索尔兹伯里首相的一贯反对列强在华合作、共同压制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得不因为北京公使团的统一战线已经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而被迫改变态度。窦纳乐要求采取的严厉措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伦敦的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山东巡抚袁世凯破案神速，也阻挡不了公使团在窦纳乐的领导下采取了集体行动，这种统一战线的产生对日后事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公使团的一致行动给清政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谈判的余地，双方都在互相猜测对方的意图，心理战也就从这个时刻正式开始。然而不久以后，公使们就发现，他们向清廷施加集体压力越大，越没有效果，双方的分歧也就因为卜克斯事件而急剧加深。

双方的第一次正式较量是在 1900 年 1 月中旬。早在 1 月 5 日，清廷曾颁布上谕对卜克斯事件表示道歉，并严饬地方官保护不力，要求他们今后不得玩忽职守，要对外国人随时保护，[33]此谕当然主要是

给外国人看的。清廷已经意识到，对传教士"随时保护"已成为不可能的事。1月11日，清廷又颁布谕旨，要求地方官在镇压拳民的时候要"分清良莠"，也就是说，再一次重申了传统的"曾国藩原则"，此谕的目的是安抚百姓。在此期间，清廷还专门派了军机处大学士王文韶赴英国使馆，代表慈禧太后对卜克斯事件表示惋惜。从清廷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上谕并无内在的矛盾，且卜克斯一案已有眉目。1月11日的上谕没有推翻1月5日上谕的意思，也没有仇洋的企图。它只反映了慈禧太后对全面剿拳的决心尚未下定而已。

档案资料表明，1900年1月11日上谕的起因是清廷收到了几封御史参劾山东巡抚袁世凯的上奏。这些御史指责袁世凯赴任后迅速加剧了山东的民、教冲突和官、民冲突。其中一人还明指袁的残酷镇压手段是造成卜克斯事件的直接原因，因为村民畏惧官府追究，只好将卜克斯杀掉以毁灭证据。[34]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御史建议鼓励义和团的抗洋活动。1月11日的上谕正是基于这些御史的观点："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诸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该谕接着批评了山东地方官员不懂区分良莠的重要性。[35]朝廷的做法与过去的政策并没有冲突，但此谕立即被公使们认为是政策的改变，而且有意煽动老百姓打击洋人。

五、公使同盟的成立

实际上，公使们认为1900的1月11日的上谕推翻了1月5日的上谕，目的是暗中鼓励拳民的活动。经过一番谈判，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决定向清政府公开指出它在支持义和团。因此，四国公使同盟正式成立，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四国公使对清廷所处的微妙地位完全不予考虑，而于1月27日向清廷发出了第一个联合照会。内称：1月11日的"上谕"所用的措词很不幸地表明中国政府支持"义

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已经对此上谕表示感激,而且在此谕的鼓励下继续攻击基督教徒。[36]。

清政府收到联合照会后大吃一惊,清廷对公使提交抗议照会已习以为常,但这一次是联合照会,说明窦纳乐公使正在组织一场列强的集体行动。清廷对联合照会的动机也不能不加以怀疑,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建储上谕颁布以后的第三天。很难想象清廷会认为这两件事情没有关联。在总理衙门大臣与公使们正式会见时,公使们的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他们指责清廷的 1 月 11 日上谕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窦纳乐的表现更加不安,窦纳乐一马当先,给予中国政府"最严重的警告"。他说:

> 尽管我认为朝廷向拳会已发出表示支持的秘密指示还不太可能,但是有这样的谣言在流传,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不是空穴来风,泰安知府向民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窦纳乐关于这个谣言的消息来源是在山东泰安地区的英国传教士提供的。他们在几天前曾给窦纳乐发过一封极其耸人听闻的电报,内说:"前景十分黯淡,拳民天天骚扰教民、教士,我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镇压拳民的告示虽然已颁布,政府也派兵入泰安,但毫无作用,泰安知府不让官员采取任何行动。拳民已接到朝廷的秘密指示,受到鼓舞。"[37]过去,传教士发来的信息常常被公使们认为过于夸张,并不可靠。但这一次,窦纳乐开始使用传教士的电报向清廷直接施压。从此以后,传教士的报告在公使团与清廷的争斗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公使团里,法使毕盛是第一个提出成立公使联盟的,这个建议本身也来自于耶稣会的一名传教士贝克神父。贝克于 1900 年 1 月 15 日给毕盛写过一封很长的信,说中国政府正在有计划地将基督教驱赶出中国,其手段是打击教民。这个计划的主谋是前山东巡抚李

秉衡和仇洋的董福祥将军。贝克称整个计划的实施步骤已定:第一步是清除四川的基督教徒,第二步是山东,然后是直隶。同时,地方的仇洋组织将成倍地扩大。如果这个计划得以继续发展,对基督徒的大屠杀便是指日可待了。贝克神父据此向公使团发出呼吁,请英、法、德、美四国公使采取联合行动,否则"中国的基督徒不可能抵抗得住来自异教徒的攻击"。[38]

毕盛接此报告后情绪十分激动,立即采取行动,促成了四国公使同盟的成立。但是,在此之前,毕盛并没有向本国外交部长德卡赛详细报告过义和团在山东的情况,他知道德卡赛对传教士问题的兴趣不大。实际上,直到1900年3月份,才由临时代办当都阿向巴黎报告了实情。在此报告中,当都阿说1月11日的上谕"直接地和间接地"由窦纳乐公使对卜克斯事件的反应所引起的。山东的局势在毓贤被解职后已经好转,但由于卜克斯事件和英国的敌对态度而一落千丈。当都阿对公使们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的解释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必要的而且是惟一的选择。"[39]

美国公使康格的行为特别肆无忌惮,他听说清廷最近向一批高官赐"福"字,其中包括毓贤,于是更加气愤。毓贤在山东丢官主要是康格活动的结果,清廷的做法在他看来是对他有意的侮辱。中国政府解释说,中国新年向朝廷高官赐"福"、"禄"等字是惯常的褒奖,并无政策的含义,但康格不愿接受这种解释。公使联合照会中本来没有提到军事威胁的可能性,而康格是公使团中第一个向本国政府提出采取"炮舰政策"的公使。联合照会提交后的第三天,康格向华盛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英、法、德、美的战舰同时出现在中国的海岸线上,这样就能强调我们的决心,并迫使中国接受我们的要求。"

海约翰国务卿收到此电后大为震惊,他立即指示康格说:"尽管美国公民可能面临某种危险,但迄今为止,并无人身和财产的损失。"海约翰建议康格最好让山东巡抚袁世凯继续发挥作用,现在谈"炮舰政策"并不合时宜。[40]

德国政府对山东的动乱并不像公使团其他成员那么担心。1899年,袁世凯与德国签订了保护德国传教士的特别协议。直到1900年夏,德国传教士与山东百姓之间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此外,德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保护传教士,并不保护教民。外交大臣布洛夫在1898年向首相的报告中曾提到:"幸运的是,中国秘密社团的打击目标并不是我们的传教士,而是教民。"[41]1899年间,德国政府收到安治泰主教的许多报告,说山东局势十分严峻。安治泰主教在1899年11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两条意见:第一,德国政府应将保护权延伸到教民,第二,德国在华的公使保护教士的措施十分不力。德国外交部对安治泰主教的信不予理会,只是到了1900年2月才做出礼节性的答复。[42]

事实上,德国政府内部对安治泰主教的要求并不感兴趣。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和史利芬将军都认为德国对华武装干涉只能在他国采取行动时才有必要。提尔皮茨多次指示在青岛的总督亚希克不要卷入中国的民、教冲突。他告诉亚希克,安治泰和《科隆大众报》正在动员一些头面人物,要求德国在青岛的军事当局出面保护中国教民,此举必不可为。[43]同时,霍亨洛赫首相和布洛夫外交大臣在帝国议会遭受诘难,社会民主党议员指责安治泰主教和德国在华的殖民政策,认为德国应为山东的动乱负责。柏林与伦敦、巴黎一样,尚未收到在华外交官关于中国局势的详细报告,所以对形势的严重性不甚了了。克林德也是直到1900年3月份才向外交部详细解释公使团与清廷的冲突,但此时事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外冲突已经难以控制。

由于列强政府的消息不灵,政府间的磋商和合作更是不可能,因此列强对中国的动乱应采取何种策略,迟迟没能达成一致的立场。在北京,公使团自行组织的四国同盟向清廷传递了一种误导的危险信息,公使们的联合行动迫使清廷开始怀疑列强之间已经事先达成过一致行动的协议。列强的目的要么是瓜分中国领土,要么是为了复辟光绪的地位,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解释。瓜分中国的势头已经很明显,而公使团对慈禧太后新政权的敌对态度,不能不让清廷感觉

到复辟阴谋正在展开，公使们不承认“大阿哥”便是一个明证。

六、中方的对策

四国公使的第一次联合照会所用的语言措词非常严厉，它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地发布镇压拳会的上谕，并要求禁止所有的拳会组织。同时，这个上谕还要明白无误地宣布任何加入拳会的人都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在正常的情况下，清廷一定会把镇压农民造反作为头等大事。但由于外国的干涉，这一次的形势与以往不同，只要洋人的意图没有摸清，清廷不可能轻易地放弃传统的“曾国藩原则”。

清王朝的重臣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清廷只能掌握变幻莫测的诸种变数中的一个方面，即决定何时发起全面剿拳的行动。在其他方面，清廷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无能为力，瓜分中国取决于列强争斗的结果，皇位继承问题已遇到外交官的直接对抗。按照恽毓鼎的说法，清廷在建储问题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44]只要剿拳行动仍然可行，清廷在此时采取安抚政策并无多少害处。清廷相信，不管形势如何严峻，只要动用军队，镇压一群乌合之众当然不成问题。所以，洋人对清廷生存的威胁要远大于国内的动乱，而剿拳的时机便成为与洋人交涉的一个重要筹码。当然在公开场合，这种意向是不能表达的。无论如何，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在组织上要弱得多，清廷对此不是特别担忧。

然而，公使们的第一个联合照会表明中国政府“以夷制夷”的惯用手段已不可能。如果复辟光绪的计划真的已经开始，清廷不得不对拳乱有意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清廷感到惊奇的是，洋人对拳民如此惧怕，也许这些练过功夫的反叛者真有什么奇术。所以毓贤和端郡王载漪等人一直鼓吹的奇术可以抗洋的说法开始有了市场。不管拳民有否奇术，他们对洋人是有一定制约力的。其实，洋人真正担心的是清廷在背后有仇洋的大阴谋。

当然,清政府并没有松懈对义和团反叛活动的警惕。1900 年 2 月中,拳会活动开始扩大到直隶,清廷立即下令禁止。但这一措施采取了“廷寄”而不是上谕的形式,洋人不得而知。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庆亲王奕劻向朝廷送交了一个奏折,内中叙说义和团以仇洋、抗教来行土匪之事,现已从山东扩大到直隶。奕劻强调义和拳民本是来自于非法民间组织,早在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以前就已存在,所以对这些组织要一并禁止,以绝后患。清廷根据庆亲王奕劻的奏折向各省督抚颁发了禁拳的“廷寄”。[45]山东和直隶的地方官收到“廷寄”后立即展开了围剿行动。然而,这一动作由于策略的原因,清政府没有通知公使团,因为清政府不愿让公使们感觉此举是在公使联合照会的压力下所致。

公使团从一开始就认定了清廷的动机不良,他们认为清廷的傲慢态度是抵制意大利谋取三门湾成功所造成的。他们对中国民众正在崛起的爱国情绪置若罔闻,而在这一点上,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自以为是的分析最有代表性。他在 1899 年年底向罗马外交部发了一份很长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中国老百姓仇洋情绪日益高涨,中国人并无“爱国”的心态。他还认为,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祖国”的概念一窍不通,“没有人愿意为中国做出哪怕是一点牺牲,爱国心在中国并不存在”。萨瓦戈接着说,满族王公为了自己的私利,对朝廷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设想。中外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文明毫无概念,总理衙门中有少数人了解欧洲的一些情况,但大多数官员连中国的通商口岸都没有去过。许景澄有在俄罗斯和德国的经历,但许景澄是少数派,在总理衙门里不敢多言。满族王公对懂外交的大臣,比如李鸿章等人都不甚喜欢,所以中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衰弱主要是内部的原因。萨瓦戈还向罗马当局抱怨说,慈禧太后新政权的强硬态度主要是因为在三门湾事件中大获全胜所造成的。清廷在日本、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压力下都曾做过让步,所以对意大利的抵抗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6]

萨瓦戈的分析在公使团是有代表性的。既然中国政府又无知,

又傲慢，对付它的惟一办法是不断地施加压力，这正是公使团的政策基础。实际上，清廷在心理上比表面上看起来要脆弱得多，皇位继承问题已经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在朝廷内部，对于卜克斯事件的处理上已产生分歧。1900年1月中旬，军机处大学士刚毅作为保守派的主要首领之一，居然派出秘密特使到山东去见英国福音布道会的主教斯考特的中文秘书余福。刚毅的特使告诉余福，刚毅希望卜克斯事件能够尽快地、妥善地解决。特使说刚毅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不信任："这些人大多数是汉人，他们可能会故意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给满族政权带来灾难。"特使还告诉余福，刚毅的死对头荣禄暂时不会成为障碍，因为他已奉旨到皇家的东陵去执行任务了。所以，如果英国方面能与刚毅达成协议，"他能够保证将它付于实施"。可是，这位神秘的特使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窦纳乐对这次秘密谈话极感兴趣，但没有具体的建议向伦敦汇报。他向索尔兹伯里首相报告说，刚毅关于"汉人大臣图谋不轨，意在推翻满族政权的说法，确实很有意思"。奇怪的是，窦纳乐与其他公使一样，对荣禄的背景一无所知，他在报告中称荣禄是"太后的一个亲戚"。[47]

山东巡抚袁世凯镇压拳乱比较得力，但此时德国人又给他添了新的麻烦。1900年初，山东民众与德国殖民当局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在高密县，民众组织了大规模的破坏德国铁路工程的行动。青岛的德国殖民当局派出300多名士兵，再一次远征。袁世凯迅速地平息了高密的暴乱，但是德国占领军这一次不愿撤走，袁世凯被迫与亚希克总督签订了《保路协定》，德兵才退回青岛。

袁世凯收到剿拳的"廷寄"，精神大振，他自行决定处决了卜克斯事件的两位主犯。尽管朝廷希望他延期执行，袁向北京报告说不杀此二犯，英国领事不愿意谈判。袁世凯没有料到的是，英使窦纳乐借卜克斯事件给他施加了难以忍受的压力。窦纳乐派坎贝尔领事到济南，表面上是为了处理卜克斯事件，但实际上他的秘密使命是绕过总理衙门，直接向袁世凯施压。坎贝尔提出的处理条件十分苛刻，其中包括要求袁世凯亲自参加审讯，并要求惩罚地方官员，还要提供大量

的赔款，不但要补偿传教士的损失还要补偿教民的损失。窦纳乐可能受到刚毅事件的鼓舞，认为处理卜克斯事件必须抛开总理衙门。袁世凯对这种做法大惊失色，感到难以接受。他向坎贝尔一再强调没有收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实难从命。坎贝尔则直言相告："总理衙门给不给你指示与我无关。"袁世凯坚持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在激烈的交锋之中，坎贝尔恐吓袁世凯说他"可能已经忘记了胶州湾事件的发展过程"，言下之意是说英国也可以借卜克斯事件采取类似的行动。袁世凯愤怒地回应道："我请领事先生不要再提那件惨痛的事件，因为这简直是纯粹的强盗行径。"袁世凯特别对英方要求严惩地方官表示不满，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残酷地追究这些可怜的小官？他们对此事并无直接的责任，而且像我一样，对这件事深感痛心。"袁世凯问坎贝尔为何在此时给他增添更多的麻烦，而对付德国人已经够受的了。坎贝尔不愿让步，但是袁世凯给他的印象不坏，因为他向坎贝尔透露了决心剿拳的信心，只不过需要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来。[48]

确实，据 1900 年 3 月朝廷收到的一份报告，袁世凯自上任以来剿拳特别积极。他派出大股兵力，多方围捕，收效甚大。就连坎贝尔都向窦纳乐报告说，袁在山东的行径已使他获得了"洋鬼子巡抚"的恶名。窦纳乐仍然不愿在严惩地方官的问题上让步。据意使萨瓦戈向罗马方面的外交部长报告中说，窦纳乐当面对军机大臣王文韶说，中国如果要避免再次割地，就必须接受英国的条件。萨瓦戈认为，窦纳乐的威胁是促使刚毅与英方秘密接触的原因。为此，刚毅又派来一个特使，询问窦纳乐所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说慈禧太后本人很想了解英国的真实意图。[49]

实际上，山东义和团已受到袁世凯的严重威慑，所以不少拳民从山东逃往直隶境内也就不奇怪了。1900 年 2 月，天津地区已经出现义和团的活动。天津署理县令在一次巡视中发现不少青少年在习拳，立即将他们逮捕，但据说这些青少年是受了父兄的鼓励开始练拳的。与此同时，义和团也开始向北京进发。

七、第二次联合照会

清廷对第一次照会没有予以理会，四国公使对这种态度极为不满。1900年2月21日，他们又联合要求中国政府做出明确的答复。他们不知道两天前，清廷已发出剿拳的"廷寄"。总理衙门于2月25日终于做出答复，说公使要求中国政府颁布剿拳上谕实在是没有必要，清廷已经发出了"廷寄"。公使认为这对他们是一种侮辱，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不在官方的《京报》正式发表上谕，表明清廷与义和团已有默契。但是，当窦纳乐看到2月19日的"廷寄"之后，承认其措词令他满意，只不过应该作为对公使的正式答复才有效。清廷的政策内容主要考虑自身利益，并不完全顾及公使们的态度，四国公使决定再次联名抗议。这一次，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也自行要求加入。法国公使毕盛此时正在国内度假，临时代办当都阿颇感不快。意大利公使的擅自加入意味着意大利有意单独行使法国长期独有的护教权，当都阿决意不让萨瓦戈进入公使同盟。窦纳乐公使不得不从中调解，谓意公使旨在保护意大利在华的公民，而且他已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类似四国公使联合照会的正式文本。当都阿正告公使团，联合行动的目的不是护教，而是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59]

这样，五国外交代表于1900年3月2日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第二次联合照会。该照会再次要求中国政府在《京报》上正式发表禁拳"上谕"，它还指控中国政府在剿拳的"廷寄"中有意忽略"大刀会"。清廷对第二次照会的反应十分强烈。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强调"廷寄"的目的在于禁止所有的秘密社团，而且"廷寄"比"上谕"更有实际效果。然而，总理衙门大臣们无法解释朝廷采用内部"廷寄"的方法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国百姓看到朝廷软弱的一面，因为"上谕"是公开颁布的。这样，公使团便更加认定清廷与义和团有合作阴谋。克林德男爵在与总理衙门大臣会面时，甚至公开指控前山东巡抚毓贤是"大刀会"的首领，清廷有意对他进行庇护。他嚷道："找到

义和团首领并不难,他们就在朝廷内部。"英使窦纳乐严词拒绝庆亲王奕劻对此事的辩解。他居然支持克林德的说法,并强调说:"如果不是为了1月11日上谕的真正作者,公使们今天是不会来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和总署大臣们极为震惊。他们一再解释说,公使团要求中国皇上颁布它所指定的"上谕"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因为公使们对1月11日的"上谕"有误解。但是,总署大臣们也无法向公使们明说,1月11日"上谕"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积极剿拳,采取不分良莠的血腥政策。总理衙门资深大臣徐用仪刻意强调说该"上谕"不过是为了缓解民、教冲突,防止拳会利用这些冲突来鱼肉乡民,达到自己的目的。徐用仪还直截了当地否认毓贤与该"上谕"有关,认为公使们的猜测毫无根据。[51]应当注意的是,总理衙门并未能合理地解释1月5日和1月11日两道"上谕"在表面上看来有矛盾的一面。清廷以为公使团应该对其所处的两难困境有所理解,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尽管此时清廷与义和团的合作并未开始,公使团已认定中国官方对义和团已经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所以,清廷与公使团之间的误解主要是心理上的。公使们本来对清廷的政治处境就漠不关心,也不理解。此起彼伏的民、教冲突总不能完全怪罪于中国政府,但是,在华外交官对民、教冲突却完全不肯承担任何责任,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条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因为根据这项条款,外国人在中国的任何行为都受到本国政府的法律保护,然而,一旦外国公民在华受到伤害,其责任则在中国政府。因此,清廷明白剿拳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总理衙门一再强调民、教两方积怨太深并不是欺骗洋人,而是实事求是地道出了苦衷。山东巡抚袁世凯本人对民、教冲突的实质也看得很清楚。他在1900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承认镇压拳民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他建议在积极剿拳的同时,也要着实处理民、教之间的积怨问题。[52]

其实,清廷此时更关心的是皇位继承问题。传统上,这类问题是绝不能公开讨论的,更不用说与洋人论理此事。然而,公使团的态度

越强硬,越趋向一致,清廷就越怀疑列强政府有联合推翻慈禧太后的计划。公使团对"大阿哥"的态度是清廷最为关心的问题,但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能流露。所以,清廷与公使团之间打的是互相猜测的心理战,而外交官与本国政府之间缺乏沟通则在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心理的问题。列强各国政府对中国的现状完全缺乏了解,窦纳乐公使直到 1900 年 3 月份才向索尔兹伯里首相报告说中国政府有意与拳民合作,而这一观点已被公使团所接受。3 月份之前,窦纳乐多次向伦敦报告说"形势已有好转",而且特别指出传教士的报告大多数是"言过其实。[53]列强政府所得到的最可靠的信息居然来自于《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莫理逊,而莫理逊从一开始就不把拳乱当作一回事。莫里逊发自中国的报道一向对列强在华的争夺把握得十分准确,但他对中国内政的报道则往往不得要领。然而,列强各国政府根本上关心的恰恰是列强的争夺战,对华政策也正是有赖于此。在这种非常情形下,在华外交官在实地对中国政府意图的判断就成了决定各国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不幸的是,此时的公使团恰恰是由一批门外汉所组成。尽管列强政府本来不愿意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但公使团却成了造成中外正面冲突的主要因素。

---

①关于吴可读的生平,见《清史稿》,卷 232,《吴可读传》,第 10211—10252 页。

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 26 页。

③《清实录》,卷 57,第 913 页。

④窦纳乐是否知道崇绮的背景尚不得而知。

⑤*China No. 3*, 1900, p. 24.

⑥《清史稿》,卷 437,《荣禄传》,第 10201 页。

⑦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 11 页。

⑧岑春煊:《乐斋漫笔》,见《近代稗海》,卷 1,第 274 页。

⑨赵凤仓:《经元善请去大阿哥的电报由来》,《近代史资料》,卷 60,第 120 页。赵当时是经元善的同谋。

⑩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卷 1,第 11 页。

⑪《清实录》,卷 57,第 1026 页。

⑫《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886页。

⑬同上,第888—889页。

⑭Kaminski, Gerd and Unterrieder, Else: *Wäre Ich Chinese, so wäre ich Boxer, Das Leben an der k. und k. Gesandtschaft in Peking*, p.26.

⑮Heyking: *Elisabeth von*, p. 310.

⑯Ketteler: *Maude von,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⑰Luo, G. E.: *Morrison Correspondence*, p. 62.

⑱*China No*. 1, 1899, pp. 306—307.

⑲Heyking: *Elisabeth von*, p.288.

⑳Salvago-Raggi, 见第四章注⑨,第353—354页。

㉑同上,第368页。

㉒同上,第331页。

㉓Ketteler, Mande von, 同上注⑮。

㉔《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898页。

㉕㉖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11页。

㉗《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898页。

㉘同上,第902页。

㉙*China No.3*, p. 3.

㉚Luo, 同上注⑰,第131—132页。

㉛FO 228/1343, 1348, FO 17/1411.

㉜《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66页。

㉝《清实录》,卷57,第1010页。

㉞《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48—54页。

㉟同上,第56页。

㊱*Paper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 96.

㊲*China No. 3*, p. 8.

㊳*DDF*, vol. XVI, pp. 159—161.

㊴同上,第154—159页。

㊵*Paper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 96.

㊶*GP*, vol. 14, p. 184.

㊷Rivinius,书,第512—513页。

㊸同上,第517页。

㊹《义和团》,卷1,第47页。

㊺《清实录》,卷58,第11页。

㊻M.E.A., Serie P-Cina, 407, 1899.

㊼FO 17/1411.

㊽FO 17/1412.

㊾M.E.A.: *Serie P-Cina*, 407, 1900.

㊿*DDF*, vol. 16, pp. 157—158.

(51)*China No.3*, p. 23.

(5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82页。

(53)FO 17/1412, January 17, 1900.

第七章 威胁动武

一、俄国、日本与"传教国同盟"

五国公使同盟又被称为"传教国同盟",但由于同盟之外的两个列强俄国和日本的态度不明确而受到削弱。俄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防止列强对华北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俄在华的利益。因为至1900年,俄罗斯在华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位。1896年以后,俄国获得了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力,这样就能大大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海参崴的连接。1898年后,俄国还获得了旅顺口军港地区的租借权。1900年俄国在华的影响力并不亚于英国。英资汇丰洋行的希利叶在1900年初哀叹道:"五年前,英国对北京的影响力独占鳌头,现在如果从实际效果来判断,英国已经成为在华的第二位的列强。"①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后,俄国的政策是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中东铁路的修建尚未峻工,但此时已有1000多公里的线路开始启用。俄国在中国拥有208节车头和5400节车厢,实力十分雄厚。②1897至1900年之间,俄中贸易也大幅度增长。尽管这个增长以修建铁路的建筑材料为主,俄国也开始积极

地参与大豆和豆饼的贸易，并进口大量的日本工业产品。

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俄华道胜银行的发展。1897 年到 1900 年间，道胜银行股份的红利增长了一倍，从 7.5 卢布增加到 15 卢布。在中国全境内，该银行已设立了 30 多个分行和 4 个办事处。[3]俄罗斯是列强中惟一与中国的陆上领土接壤的国家，所以它对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感兴趣，因为满洲实际上已成为俄帝国陆上延伸的势力范围。1899 年 9 月，海约翰向英、法、德、意、俄、日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它们遵守对华"门户开放"的三项原则：

（1）对通商口岸和租借权不能干涉；

（2）势力范围之内不能设立歧视性的港口税和铁路运输税；

（3）中国政府有权按照条约规定统一征收所有的关税。

这就是所谓的海约翰"门户开放主义"的第一个声明。

俄罗斯不愿在此事上明确表态，因为俄罗斯在华并无传教利益。但俄罗斯外交部从 1891 年就开始一直搜集在中国、特别是在满洲的反洋活动的细节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俄国政府对民、教冲突的实质和范围了如指掌。它一直确信中国的反洋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欧洲的传教士，并且因为列强在华的经济上、政治上的激烈争夺而日益恶化。俄罗斯与民、教冲突无涉，它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满洲。俄罗斯东正教在华有正式代表，但东正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传教、吸收中国教徒的习惯。1899 年底，在华的俄国公民不过 250 人而已。[4]所以，山东的拳乱对俄国人来说是一个漠不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欧洲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一直是深恶痛绝的，而且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称这些传教士是"邪恶的根源"，是以"基督的神圣名义建立商业暴政的始作俑者"。[5]

然而，俄国在满洲尽管没有传教活动，仍然要遭受反洋运动的打击。19 世纪末，中东铁路工程常常受到号称"红胡子"的土匪的破坏与干扰。所以，以护路的名义，俄国派遣了一支中东铁路护路部队。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 1899 年三门湾事件后曾向中方要求增建一条

从哈尔滨到旅顺口的铁路支线，中方予以拒绝。同时，在南满地区也有大规模的抗俄运动的爆发。

南满的抗俄运动与山东的拳会实际上是有关连的。长期以来，闯关东的多是山东籍人士，所以在19世纪末，南满人口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批山东贫苦农民舍家弃小，到满洲寻找生存的机会，他们与家乡的父老始终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1900年2月，南满大量出现拳会的习拳仪式。然而，俄国当局认为这些骚乱仍是小范围的，可控制的。旅顺口俄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的外交代表克洛斯托维兹回忆道，在1900年初，绝大多数在华的俄国人都保持着乐观的心态。[6]他们认为拳会的打击对象都是关内的欧洲传教士，俄国东正教在华只有3个特设机构，而且不参与传教活动，所以与俄国无关。

从1900年初开始，俄国公使格尔思男爵一直设法阻扰"传教国同盟"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同时，他也刻意回避与他国合作。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在多年后回忆道，格尔思是惟一一位不遵守公使团内部规定而单独在夜间与中国官员进行密谈的公使。公使团虽然无权干涉公使的行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达成君子协定，要求各公使在拳乱问题上保持一致口径，不给中方有机可乘。[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尔思发现公使中最难对付的是俄国的正式盟友、法国公使毕盛。格尔思多次向毕盛宣称，他可以参与在传教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先决条件是只同毕盛联手，而排斥"传教国同盟"的其他成员。格尔思在向俄国外交大臣莫拉维耶夫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只要法国拒绝与其他列强团结一致"，他愿意支持法国的立场。格尔思认为其他列强是在利用拳乱，"达到与保护基督徒和洋人生命毫不相干的目的"。不用说，格尔思一直坚定地相信"传教国同盟"的目标是推翻慈禧太后政府，恢复帝制。[8]毕盛认为格尔思的条件难以接受，因为这样就会瓦解"传教国同盟"。毕盛一直相信一致的外交行动能够奏效，而且此事牵涉到法国长期在华拥有的护教权。

"传教国同盟"的其他成员对格尔思的行为极为不满。1900年

底，围攻使馆事件结束后，窦纳乐奉调去东京。他的继任者萨托爵士赴北京时，发现整个公使团对格尔思的表现颇有微词。很多外交官都相信当时格尔思肯定向清廷建议让中国政府不要理会“传教国同盟”提出的要求。[9]窦纳乐则更是把矛头直指格尔思，指控他是造成“传教国同盟”联合行动失效的罪魁祸首。他在1901年从东京给外相兰斯当的电报中这样说：

在五国公使发出第二次联合照会时，俄国公使有意拒绝参与我们的行动，同时还极力劝阻法国公使甚至我本人。如果在当时俄公使加入我们的外交行动，并坚决要求中国政府对拳乱严肃处理，恐怕围攻北京使馆事件决不会发生。[10]

窦纳乐的说法实在是言过其实，不过是为“传教国同盟”的行为进行辩护而已。事实上，清廷与公使团的相互误解并不在拳乱问题上，而是皇位继承的问题。所以，当时即使格尔思积极参与五国同盟的活动，势难扭转大局。格尔思的行为当然是有影响力的：一方面，“传教国同盟”的公使们并没有得到干涉清廷皇位继承的授权，是他们的自行其是给清廷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另一方面，格尔思的超然姿态对清廷也是一个鼓励，使它感觉到没有必要接受洋人的条件，因为公使团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1900年初的观察更能说明问题。他认为：

一批列强正在告诉中国：“如果你不宣布拳民为匪，并消灭他们，我们就要自己动手，并打击中国政府！”同时，另一批列强则安抚中国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其他列强打击中国，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尽管这种要加以干涉的承诺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分得更多的好处，中国则错误地认为有同盟和获得外国保护的可能。所以，第一批列强提出的要求对中国政府不可能有很大的效果，一场争斗即将开始。[11]

赫德显然对俄国心存不满，他对俄国借甲午战争的机会在华的扩张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他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立场遭到公使团的冷眼，甚至连窦纳乐都对他表示怀疑。赫德受到冷遇之后，更不愿意向公使团表露他的真实思想，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他的心态只有他在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知晓。在1899年圣诞节给金登干的信中，赫德写道："我不需要任何公使馆的支持，我只希望公使团不要干涉我的事情，至少也不要他们与帝国海关作对或制造麻烦。"[12]

日本对拳乱和"传教国同盟"也持冷淡态度。西方外交官在处理教案时从来不加掩饰地运用"黄祸"论，日本外交官对这种种族偏见的论调十分不满，只能三缄其口，不发表意见。时任外相的青木周藏子爵在回忆录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问题，他认为在历史上西方国家一贯用宗教为幌子侵略或占领他国领土，这种做法从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开始。[13]

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心仍然在于遏制俄国。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俄国在满洲竞争的主要对手。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以后，日本在和平时期的常备军猛增了3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正在改变满洲的战略均势。这项铁路工程大大利用了满洲的资源，向俄国提供了从满洲到贝加尔湖的快速通道，同时又在满洲为俄国的远东驻军建立了粮食基地。所以，日本常备军在数量上对于俄国远东部队的优势已被俄国垄断中东铁路的现实所大大降低。在这种时候发生的拳乱，当然对日本在黄河以北的利益没有好处。然而，日本对俄国有意同"传教国同盟"拉开距离的动机深感疑虑。日本政府内部有一种普遍的但是不正确的看法，认为俄国之所以站在拳会一边，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希望看到中国的大动乱。外相青木周藏的想法更为离奇，他认为端郡王载漪是俄国人扶植的傀儡，他"受俄国资助"，因为"俄国人的企图是搞乱华北，然后可以乘虚而入"。[14]日本政府对俄国的极端恐惧症使得它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从而也未能把握清廷与公使团发生误解和冲突的实质。同时，反洋运动也没有放过日本。1899年，天津的《国闻报》被日本人买下，由此而掀

起一场抗日风波。当地士大夫认为这对中国是一大耻辱,《国闻报》馆舍因而成为民众的攻击对象。[15]

同时,日本还充分意识到,一旦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面竣工,将对英国在华的影响是一大打击。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兴建这项工程之初,就认为这条铁路能够"改变欧洲和东亚的交通路线"。铁路运输将大大缩短欧—亚运输的时间,所以中国今后将不会再依赖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海上贸易通道,英国的地位将大大下降。[16]日本意识到俄、英之战不可避免,所以仅仅是为了遏制俄国,日本也愿意站在"传教国同盟"一边,尽管不是为了护教的目的。但是,日本找不到任何能使自己加入"传教国同盟"的借口。此外,日本一直在觊觎福建的厦门港,以与俄国占领旅顺口相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中国和列强各国都没有能够发挥其影响力。中外冲突一天比一天恶化,日本在京的外交官却束手无策,任凭事态发展,西德二郎公使只能焦虑地坐观清廷与公使团的冲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列强的海军示威

"传教国同盟"第二次联合照会发出之后,中国政府仍然拒绝在官方的《京报》上颁布剿拳"上谕"。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于是陷入外交僵局。窦纳乐公使领导的"传教国同盟"决定诉诸武力迫使清廷就范,窦纳乐的行为更加使得清廷确信英国政府的不可靠。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英国是清廷的盟友,而现在成了推翻慈禧太后政权的排头军。正如历史学家爱德蒙·威勒所指出的:

> 1898年间,满清政府仍然相信自己的生存与否取决于严厉的剿拳行动。这种幻想是以能够获得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支持为前提的,因为英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确实助了清廷的一臂之力,清廷对英国的依赖心理并未消失。[17]

这一次确实大不相同，窦纳乐直接率领公使同盟与清廷公开对抗。当然，窦纳乐不肯让步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时，布尔战争已经在南非展开，而且英军一败再败，脸面尽失，窦纳乐在心理上不愿意向清廷示弱。在华的英国人都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保持强硬的姿态是由于受到了布尔战争的刺激，《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逊和在京的赫德爵士都感到抬不起头来。他们到处搜集著名的帝国主义狂热分子、诗人兼作家基普林的最新诗作，赫德在他珍贵的日记本里就夹了一首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剪下来的基普林新诗。这首诗写道：

当你们高呼"大英帝国一统天下"之时，

当你们高唱"上帝保佑女王"之后，

当你们用痛骂声扼杀克鲁格的性命，（注：克鲁格是布尔人的总统）

请不要忘记在我的铃鼓里丢下一个先令！

因为我们的士兵将要奉命南征。[18]

所以窦纳乐决不能让总理衙门因为布尔战争而幸灾乐祸。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英双方当时正在为英资的"福公司"而发生激烈的争执。1900 年 1 月以来，窦纳乐收到多次报告，说中国官员禀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对参与"福公司"活动的几名中国官员兴师问罪。中国董事吴士钊已被朝廷确认为犯了贪污罪。据"福公司"英国董事长的报告，慈禧太后曾亲自下令要山西地方官"阻扰福公司的业务活动"，而当时"福公司"成立时在开矿权协议上签字的官员已被解职。3 月初，窦纳乐公使又收到新的报告，说守旧的军机大臣刚毅和徐桐是弹劾吴士钊等人的主谋。果然，朝廷在 3 月份颁布的"上谕"中，对五位涉及"福公司"活动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员进行惩戒，吴士钊也在其中。[19]窦纳乐大怒，多次抗议未果，于是他想将此事与中国的反洋运动联系起来。但是，除了美使康格之外，支持窦纳乐的却寥寥无几。康格就此事向本国政府做了报告，内称："此事件表明太后和她

的亲信确有强烈的反洋情绪，这对中国将是非常不幸的。”[20]

1900年3月2日在总理衙门，五国公使与庆亲王奕劻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此后3天，中方仍然毫无反应。直到6日，总理衙门才向公使团提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释信。信中重申禁拳的“廷寄”已经发往地方督抚，传统上没有必要再发一道类似的“上谕”。该信同时指出，官方的《京报》只有很小的发行范围，要将禁拳命令传达到老百姓，“廷寄”更为合适，所以“上谕”不能起到公使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为了再次解释“廷寄”的优越性，总署大臣许景澄还特地造访了赫德，希望他能向公使团解释清楚。赫德表示无能为力，他实际上也不愿涉及这件事。[21]

五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回复不屑一顾，于是在3月7日又召开联席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公使们的脾气大发。美使康格声称：“中国政府或者是有意，或者是害怕全民造反，从一开始就对我们的要求持轻蔑的态度。中国人已经违背了条约所规定的义务。”[22]德使克林德火气更大，他建议将总理衙门的回复信原件退回，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嘲弄，意大利公使举双手赞成。然而，其他公使都认为此举太过分，没有同意。公使们意识到中国政府不会轻易就范，于是开始研究对策。他们一致认为不能让清廷开此先例，有意不按公使的联合要求去做。因此，大家一致同意请求本国政府用联合海军示威的方式向清廷施压。窦纳乐在3月10日又主持召开了一次公使会议，会上公使团决定再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一次联合照会，不但要求中国在《京报》上颁布禁拳“上谕”，而且还警告清廷，如果不从，“将采取其他手段”。于是，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交了这一份措词严厉的照会，声称公使的联合要求必须照办。照会强调：“除此之外，我们相信别无他法能平息山东和直隶地区迫害基督徒的活动。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我们这一合理要求，我们将被迫报告本国政府，请求采取正常的防范措施，免受这样一种最邪恶的反洋组织的伤害，而由此产生的动乱与不稳对中国政府将是极端不利的。”[23]

窦纳乐公使声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

要保护所有包括华人在内的基督徒，这显然不属于治外法权的范围，同时也与许多列强传统上的保洋人不保华人的政策相抵触。应该说，从窦纳乐的声明开始，中国的民、教冲突才算正式提上了国际政治的日程，因为每个列强都不得不在传教问题和海军示威问题上明确表态。

然而，各列强政府对中国的实情本来缺乏了解，此时突然收到在北京的公使要求诉诸武力的请求，不免感到大吃一惊。伦敦官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窦纳乐擅自担任公使同盟的领导人极为不妥，从1899年到1900年初，索尔兹伯里首相一直希望限制窦纳乐的活动，首相不愿意在传教问题上动用武力。英国外交部对窦纳乐在中外关系突然恶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不安，英国政府对传教问题的冷漠受到英国国教会的支持。当1899年天主教传教士有可能在华取得政府官员的地位时，坎特伯雷大主教坚决反对新教教士获取同样的权力。他在给首相的信中写道："我发现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罗马天主教士长期不断地干预中国的各级行政管理，特别是诉讼制度。这种干预的后果十分糟糕，尽管能帮助天主教传教士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但同时也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民中间降低了基督教的威望。"[24]所以，英国政府在收到有关教案的报告时，情绪并不激动。即使是卜克斯牧师被害案，外交部也认为这不过是这类职业的必要风险，不必小题大做。当窦纳乐向首相报告说两名山东地方官涉嫌此案时，索尔兹伯里首相批道："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为何他们对确认这些官员有罪时那么有自信心。"他命令窦纳乐不要再追究此事。[25]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伯蒂认为，窦纳乐在与中国政府对抗中不应当主动请缨担任领导人，索尔兹伯里完全同意这个说法。

然而，在1900年3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任命前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西巡抚时，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尽管中国政府自认在处理联合照会事情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毓贤的迁调山西巡抚却是给紧张的中外关系火上加油，因为总理衙门与公使团在毓贤是否对山东拳乱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从清廷的角度来看，毓

贤在山东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逾越北京的指示范围，他不过是公使团强烈抗议下的牺牲品。此外，毓贤早已在1月份就内定为担任山西巡抚，而且公使团对毓贤的前任李秉衡就任长江水师大臣并没有提出过抗议。窦纳乐一怒之下，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严重的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再不接受五国公使的要求，我将向女王政府报告，敦促它采取保护英国在华公民的其他措施。"[26]

1900年3月8日，慈禧太后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在紫禁城宴请公使夫人，她希望能像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的第一次类似宴请一样，让公使夫人们向她们的丈夫施加正面的压力。第一次宴会时，公使夫人们对慈禧太后的风度大为倾倒，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不久前发生的政变，气氛非常热烈。窦纳乐夫人作为公使夫人的代表举杯祝太后万寿无疆，慈禧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时自语："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那一次宴会加演戏闹了足足5个小时之久，公使夫人每人受太后赠送名贵戒指一枚，喜不胜收。[27]但这次慈禧太后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公使夫人们在上一次已受到自己丈夫的批评，因为这种热烈的气氛与公使团反对戊戌政变的态度不合拍，所以这一次气氛要冷清得多。克林德夫人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面，如前所述，她对该次宴请已做了详细的描述。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也向罗马当局报告说，与上次不同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慈禧太后只参加了听戏活动，并没有参加宴会。[28]

窦纳乐意欲动武的强硬姿态只获得美国公使康格一人的积极支持，康格在没有收到华盛顿的指示下就擅自赴总理衙门抗议中国政府对山东拳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甚至警告中国政府说，如果中方不按公使们的要求办，他将请自己的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29]康格对毓贤的新职位更是愤怒不已。其他国家的公使则对联合海军示威的主张口是心非，因为本国政府并不积极支持这类行动。德国军方对在华动武的想法是坚决抵制的，德帝国海军部和陆军总参谋部一直认为，只要青岛地区不受威胁，绝无大规模用兵的必要。德国政府在1900年3月份对德国在上海的报纸《东亚劳埃德》的一篇报道尤

为关注,该报道说上海的英文报纸有意误导欧洲的读者,夸张地渲染:"中国已处于革命的前夜,或者说满清制度即将崩溃。"[30]

法国政府也想避免在华动武。外交部收到临时代办当都阿在1900年3月份发回的一份报告,说军事威胁的时机并未到来,但是他又说其他公使意欲采取联合海军示威的措施,他不能与"传教国同盟"决裂,不得已而表示支持。[31]法国外长德卡赛从驻英大使保罗·坎朋那里得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对联合海军示威非常不热心时,德卡赛称其为危险的措施,法国将静观其发展。与此同时,法国在华行动还受到正式盟友俄国的制约。德卡赛指示驻彼得堡的蒙贝洛大使确切了解俄国的立场,经了解后确认,俄国对联合海军示威持否定态度。[32]因此,德卡赛在这种情况下否决了毕盛公使积极要求军事威胁措施的提议,要求他采取审慎的态度,至少在此事上法国不能出头。

意大利政府对海军示威更加谨慎。三门湾事件的政治余波尚未结束,意大利外交大臣威斯孔第·维诺斯塔早就决定意公使不能主动提议采取过激行动,尽管意大利愿意同其他国家的公使合作。萨瓦戈公使对海军示威非常热衷,他在三门湾事件以后一直敦促罗马当局寻找机会重振意大利在华的威望。他认为联合海军示威将能使中国政府改变其对意大利实力的蔑视态度。其实,在五国公使决定采取海军示威的两周前,萨瓦戈已向罗马外交部报告说:"不幸的是,意大利在华的威望已一落千丈……所以国王陛下在华的使馆对来华的工业家和投资者已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中国对我们的要求只会嗤之以鼻。"萨瓦戈认为拳乱给意大利提供了一次大好的机会,意大利应立即派遣二三艘兵舰,让中国人知道意大利人不是好惹的,外交大臣对这个建议没有予以理睬。[33]他声称,只有其他国家同意举行联合海军示威之后,他才会改变态度。

实际上,索尔兹伯里首相收到窦纳乐关于海军示威的请求后大为震惊。他在阅读窦纳乐提交的公使团与总理衙门大臣的谈话记录后批道:"照窦纳乐自己的说法,清廷已经发布了上谕(注:首相以为

廷寄与上谕是一回事)。”[34]他不明白为何公使团还要揪住此事不放，首相对窦纳乐所起的领导作用尤为不满。他批道：“窦纳乐这样做事先并未与我商量，真是愚蠢至极……参加海军示威的某一国(注：指俄国)将趁机从中渔利，而我们正在南非用兵，无暇顾及中国，只好陪着笑脸，说好话，任其为所欲为。”[35]首相认为要立即让窦纳乐明白无误地理解英国政府的真实意图，于是他在1900年3月11日指示窦纳乐：“只有在所有的措施已无效的情况下，才能采用海军示威的方法。”他还明告窦纳乐，英国在华的利益要求“不要过于张扬，关于海军示威一事尚有一段时间才可做出决定”。窦纳乐接到此电后很是不满，回电用毓贤就任晋抚一事再次向首相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他甚至告诉首相说，毓贤的任命是总理衙门对公使团的要求做出的“蓄意的一场反击”。[36]在后来的一份电报里，窦纳乐更进一步地说：“毓贤是拳乱的主谋，此人不受惩罚，我们就不可能要求惩罚那些听命于他的下属官员。”[37]

索尔兹伯里对窦纳乐的辩词并不愿意轻信。这时英国驻法大使芒森爵士报告说，德卡赛外长也不愿意卷入对华的军事行动，所以索尔兹伯里的态度更加坚定。据法国公使毕盛于1900年3月15日发给巴黎的电报说：“窦纳乐告诉我说他的政府对目前采取海军示威的建议深感厌恶。”[38]

美使康格虽然积极支持海军示威，但是华盛顿方面也不为他的建议所动。海约翰国务卿于3月22日电示康格，说国务院对他关于中国形势严峻的报告表示有疑问。海约翰说：

> 你前几次的电报中曾提到过所谓“义和拳会”至少在一次民、教冲突中，是先受到教民的攻击，而你最近的报告中又不再提到此类事件。国务院对此感到不安，因为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报告是否实事求是地确定了这些教案的谁是谁非尚值得怀疑。因此，我们认为仅仅根据你的报告，尚不能给你就下一步采取何种行动下达明确的指示。[39]

这样,"传教国同盟"的行动并没能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擅自向清廷威胁动武的做法更加没有效果。更主要的是,正如学者威勒所指出的:"窦纳乐公使在他第一次作为公使团实际领导人的过程中已经犯了一个最大的外交错误,他采取了威吓的手段时而并没有获得自己政府的实际的支撑。"[40]窦纳乐情绪容易激动,他主要是对清廷在英帝国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中丢丑之时对公使团不予理睬特别愤怒。当时英军在南非大败,国际舆论哗然。

即使是赫德爵士,也对布尔战争失利的消息传到北京而感到惶惶不安。他告诉在伦敦的金登干:"在北京的其他国家的公使和外国人都是亲布尔人的。"[41]赫德对中国人的反应更加关注,他注意到中国官员对此事极为关心。他的一位中国士大夫官僚朋友居然能说出"麦夫金"(Mafeking)、"金巴利"(Kimberley)、"莱第斯密"(Ladysmith)和"斯特朗伯格"(Stromberg)这些复杂的南非地名,这令赫德极为不快。他认为:"中国人在背后偷偷地耻笑我们,中国人认为'英国人在南非受挫,就像我们在朝鲜受挫一样(注:指甲午战争)。'他们的推论是:'如果这些英国人连布尔人都打不过,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42]实际上,中国官员确实比较关注布尔战争。一位御史在1900年3月份就上奏说:"我听说英人在特兰西瓦大肆用兵,他们何以能省出兵力以谋我?"[43]然而,3月中旬以后,布尔战争的形势大变。3月15日,赫德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我军攻占布鲁丰登(Bluemfontein)!"激动之情,溢于言表。18日,他又告诉金登干:"北京仍然很平静,但守旧大臣据说已开始与拳民合作,准备将洋人驱逐出境。我想我军最近在南非的捷报对他们是一个震撼。"[44]然而,英军在南非的转败为胜并没帮窦纳乐公使多少忙。

三、清廷重申"曾国藩原则"

中国政府觉得无论怎么去做,洋人也不会满意。清廷对拳会的政策应该说就和平年代来看已经是相当严厉的了。更重要的是,对

拳会成员采取"分清良莠,不一概而论"是朝廷的一贯政策,也就是曾国藩制定的孤立反叛分子的原则。此外,剿拳行动一直没有停过。从直隶到山东,裕禄和袁世凯接到"廷寄"后大动干戈,剿拳行动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直隶总督裕禄的镇压措施也是毫不含糊的,仅在1899年12月间,他出兵围剿了在景州、武强和献县的抗洋运动,击毙拳民数十人,拘捕100多人。1900年1月到2月,裕禄从保定调来正规军在各处剿灭骚乱。窦纳乐在1月份曾亲自到天津去面见裕禄,并对他的表现褒奖有加。他报告索尔兹伯里首相说:"总督阁下似乎对形势的严峻性非常清楚,他告诉我说剿匪的难处在于拳民忽分忽合,常常以二三十人的小股出没,在军事上围剿有一定的难处。"窦纳乐认为:"总督真心诚意地要恢复秩序,以惩罚不法之徒。"[45]

山东巡抚袁世凯的镇压手段之残酷使得公使团对他的表现没有一句怨言。1900年3月份,慈禧太后力排众议,将袁世凯正式任命为山东巡抚。同时,京城步军统领崇礼也宣布在京城地区拘捕所有的拳民,因为他们全是土匪。崇礼与赫德爵士私交甚好,经常在一起出席宴会。[46]所以,在这种严厉的剿拳行动之后,清廷不明白为什么公使团在"上谕"问题上抓住不放,因为政府的具体做法已经符合公使团的要求。于是清廷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公使团的攻击目标是慈禧太后新政权本身,同时公使团对慈禧太后新政权表示的敌对态度是从来不加掩饰的。事实上,"传教国同盟"所做的决定已越来越不符合常理,成为中外沟通出现巨大障碍的主要原因。关于"上谕"的无谓争斗是基于面子,而不是实质。

朝廷守旧派对中外沟通发生严重障碍不免沾沾自喜。1899年冬到1900年春,端郡王载漪在私下里大肆网罗支持他的皇亲贵戚。由于他作为"大阿哥"的父亲的特殊地位,他经常能伺候在西太后左右。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年轻的王公得以迅速擢升。新的恭亲王溥伟,端郡王的弟弟辅国公载澜和贝勒载滢等都得到了重用。据当时的记载,自从朝廷于1900年1月份宣布立"大阿哥"以后,端郡王载漪府成了满族权贵寻求一官半职的活动中心。很多趋炎附势的人居

然向端郡王载漪提前赠送玉如意,尽管“大阿哥”的登基还要有一段时间,[47]贵重礼品和金钱却大量涌入端王府。其实,“大阿哥”并不能算是正式皇太子。立储后不久,驻英公使罗丰禄曾向李鸿章发电请教:“朝廷建储,应奏贺否?”罗丰禄的意思是问是否要请英国政府向清廷发正式贺电。李鸿章回电说:“为毅皇立阿哥,并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48]满族王公贵族对“大阿哥”何时登基早已急不可待。他们认为阻扰登基的主要是洋人,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对慈禧太后施加压力,要求安抚拳民,并用拳民来抗洋。端郡王载漪在建储上受到公使团的冷遇,心中更是愤懑不平。他成为“用拳抗洋”的小集团领袖是势所必然,这批人既要报复洋人,又要达到私利。

然而,慈禧太后的政治感觉是灵敏的,她不会轻易地让皇室成员决定朝廷的重大政策。她的主要顾问仍然是心腹重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和礼亲王世铎这批老资格重臣,这些人一直强调要谨慎行事。同时,仇洋的大臣如刚毅和徐桐等人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公开站出来支持一场农民的造反运动。所以从1900年1月到5月初,朝廷对付拳乱的主导思想可以说有下列几个要点:

(1) 公开禁止攻打教堂和教民的拳会组织;

(2) 对拳会施以兵威,如不从则用实力进剿;

(3) 对没有参与攻打教堂和教民的拳会组织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

由于大多数的拳会组织都参与对教堂和教民的攻击,所以按照朝廷的标准,它们都属于禁止之列。地方政府组织的乡团并没有公开招募拳民入团,也就是说,朝廷的政策还是以镇压为主。事实上,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早已把“分清良莠”的“曾国藩原则”抛置脑后,朝廷并没有对他们的残酷手段横加干涉。但是,朝廷在这段时间里坚持认为全面剿拳实属不必要,它希望能够逐渐地分化瓦解这些拳民组织。

就当时情况看,皇室宗亲对拳民的偏爱尚不足以让慈禧太后信任那些汉人农民的造反分子。但是,慈禧太后开始注意到汉族士大

夫官僚对此事的态度。在北派守旧官僚中,确实也有一批主张“用拳抗洋”的人物。到1900年5月初为止,还没有一位高官公开站出来支持拳民的活动,以汉人为主的地方督抚则大多数是坚决反对安抚姑息政策的。然而,戊戌政变后,一批南方人出身的有改革倾向的官僚,包括李鸿章,已被调出京师,剩下的南派京官多是资浅位低的人物。于是,一批中下级的京官开始引起慈禧太后的注意。北派京官中有不少人确实相信拳民的“神力”,而且他们对洋人在华北的人侵早已深恶痛绝。同时,自然灾害也在肆虐黄河以北的地区,他们同拳民一样,也有责怪洋人破坏风水的心理。所以,这批人一旦有机会得以召见,不免要鼓吹“抚拳”的好处。有的人按捺不住,也直接上奏,请求“用拳抗洋”。

其中最典型的是直隶人六品官王培佑。王是工部官员,主要职责是负责京城的建设项目。1900年1月,他曾写过一道猛烈攻击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奏折,指责袁处理拳民事情不当。朝廷对他的激烈言辞有深刻印象,3月间,王培佑得到一次进官的机会。本来他是奉诏向慈禧太后汇报某个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而慈禧太后想起了王培佑的奏折,于是要求听听他对拳民的意见。王培佑借机发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言论,说拳民是朝廷赤子,既忠勇又爱国。他建议给拳民一段时间的正规军事训练,这批人即可开赴战场,成为抗击洋人的中坚力量。王培佑讲到得意之处,居然声称一旦战端开启,他愿意亲自率领拳民赴前线作战。几天后,当慈禧太后在决定提拔一个人担任京师顺天府署理府尹的要职时,突然想起了王培佑,于是抛开一长串的资深官员的名单,擢拔王培佑担任此职,于是王从六品一下进人四品的职位,显然王培佑的晋升与他在工部的工作成绩并无直接关系。[49]

五国公使威胁要采取联合海军示威,而中国政府不肯作出让步,于是这场争斗便演变成为一场心理战。但是这场心理战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双方的误解和沟通上的障碍,清廷态度强硬是形成“传教国同盟”的导火线,而五国公使实际上也明白传教士对拳乱的危险性确

实有夸大其词的一面。窦纳乐、毕盛和克林德都向本国政府报告过不能过于轻信传教士的说法，甚至连比较信任传教士的美使康格也在1900年3月份向华盛顿报告说，尽管传教士有夸张的倾向，他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还是希望得到美国政府实质性的、而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50]

在五国公使威胁动武之际，清廷仍不愿屈服。但是在1900年4月初，朝廷已感到拳乱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剿拳行动继续进行。4月9日，直隶总督裕禄从天津报告说拳民已进入直隶，并开始设坛习拳，他建议将拳会的坛、场一并禁绝，这个建议当然超出了"曾国藩原则"的范围。本来朝廷对不参与暴力的拳会坛、场是不加禁止的，但这一次批准了裕禄的建议。[51]

几天以后，外国兵舰开始在大沽口附近云集。美、法、德、意政府在本国公使的一再请求下，批准了在中国海域进行海军示威的行动。4月中旬，康格得到一艘美舰，萨瓦戈和毕盛各自获得两艘军舰的支持。克林德被授权可以动用驻在青岛的德国舰队，尽管外交大臣同时告诉克林德山东局势已"趋于平静"。窦纳乐于是以其他四国公使均获本国支持为由，向英国首相再次施压，英国政府在无奈之下，只好派遣两艘军舰赶赴大沽口。窦纳乐的报告对伦敦是一个误导，以为五国公使在北京已经采取了联合行动。其实各国政府都是互相观望，以在华维持均势为根本目标。[52]索尔兹伯里首相在与法国驻英大使坎朋谈话时，明确表示女王陛下政府并不认为在大沽口的英国军舰代表着海军进行示威，这只不过是表示："要让中国政府注意到其政策对己不利，同时又是为了保护英国公民的一项简单措施。"[53]实际上，法国政府是最后才批准这一行动的，法国的盟国俄罗斯对此大为不满。

清廷对联合海军示威非常不安，但同时又相信列强在此时还不至于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所以坚持不愿发布禁拳的"上谕"，外交僵局一时还难以打开。窦纳乐于4月2日给远东事务次官伯蒂写过一封私信，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政府如此顽固不化，自我感觉良

好。我并不认为南非(注:指布尔战争)一定与此有关。但是意大利去年在三门湾问题上失败必定与此有关。意大利军舰来到中国,滞留观望了一段时间,又悻悻地离开了,而且意大利公使被召回,这些猪尾巴(注:指辫子,即中国人)因此大获全胜。"窦纳乐显然想刺激英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他说:"如果总理衙门还在代表中国政府,它可能还会说话算数。然而,如果中国政府受到一次沉重的教训,它就会屈服。我诚心实意地希望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54]

在这个关键时刻,俄使格尔思突然采取了打破外交僵局的行动。1900年4月15日,格尔思面告总理衙门章京联芳,说拳匪已出现在京师附近,形势异常严峻。他劝告中国政府不要坐失剿拳的良机,并透露说列强确有武装干涉的企图。[55]格尔思强调说俄国在华并无传教活动,他的忠告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否则列强将趁机以此为借口动用武力。很明显,格尔思的动机是为了防止列强入侵华北。中方对格尔思的谈话非常重视。一方面,格尔思一直置身于"传教国同盟"之外,其观点被认为是较为客观的。另一方面,格尔思提到了洋人出兵的可能性。总理衙门立即将这个谈话记录发给直隶总督裕禄,并要求他严密注意义和团在京师周围的活动。[56]

格尔思的谈话迫使清廷在官方的《京报》上发表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其中明确指出拳民是叛匪。这个做法虽然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五国公使坚持要发布禁拳"上谕"的要求,公使团在长达数月的外交僵局之后,还是感觉到松了一口气,毕竟中方已开始做出让步。窦纳乐立即向英国首相报告,并称两艘英舰已奉命返航。[57]

清廷这时也认为自己已尽力而为,洋人应该立即改变对清政府的敌对态度。此外,由于剿拳行动一直在继续,到了1900年4月间,清廷认为拳乱很快将会平息。山东义和团到了3月底已基本得到控制,直隶义和团仍然被继续围剿,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就会销声匿迹。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剿拳实非难事,并不需要动用整个武卫军。所以,清廷和公使团在裕禄上奏发表之后所期待的结果完全不同。中方认为既然拳会已受到致命打击,现在要做的是安抚参加暴乱的一

般民众，事实证明朝廷用曾国藩"分清良莠"的原则是成功的。所以在裕禄上奏发布的第二天，《京报》上又发布了一个"上谕"，重申"曾国藩原则"，其中说道：

> 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义。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但其间良莠不齐，或藉端与教民为难。不知朝廷一视同仁，不分畛域，该民人等所当仰体此意，无得逞忿，致起衅端，自于咎戾。著各该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剀切晓谕，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庶无负谆谆告诫之意。[58]

1900年4月21日，清廷又颁布"上谕"，直接使用了曾国藩的言辞："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奇怪的是，这两个"上谕"不但与激起洋人震怒的1月11日"上谕"基本上如出一辙，而且更进一步提出了允许"乡民设团"的建议。[59]但这一次公使团对此两个"上谕"并无反感，可见朝廷从一开始就认为1月11日"上谕"不是煽动仇洋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今次的两个"上谕"在外交僵局被打破后发布，目的是消弭中外误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早在4月2日就向总署大臣许景澄提出建议，应将拳民的"狂热化为对国家有利的因素"。[60]总理衙门藉此以为洋人不再会对设立乡团的政策提出异议。

四、直隶义和团与神秘主义

清廷没有预料到的是，义和团运动从山东移植到直隶和北京地区后，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数山东义和团的成员从来没有离开过山东，义和拳首领赵三多一直在冠县和周围地区活动，而大刀会到1900年4月份时已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山东巡抚袁世凯的血腥政策确实将一些拳会的残余分子赶入直隶，但直隶义和团运动是以当地人为主的。直隶义和团的首领多是由于西方技术引进之后的牺牲品，很多成员确实是无业游民和盗匪。事实是，直隶义和团

首领中,真正懂武术、精习拳的人寥寥无几,装神弄鬼,请符念咒是他们设坛办场活动的主要特点。直隶义和团的领导人中不乏盐枭、马贼、渔帮、船会老大之类的人物。船民的生活自蒸汽船引进后已一落千丈,常常找不到顾客,看着船板一天天地烂在河滩上。很多车夫马夫已失去了生活依靠,因为铁路运输既快捷,又便利。传统的驿站信使,虽有驾驭快马的非凡骑术,但远远比不上现代邮政电报的速度。总而言之,这些直隶义和团成员与山东的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经济动机。但这些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的经济利益尚不足以煽动直隶农民参加造反,因为农民最心焦的是长期的干旱。于是,直隶义和团首领便借山东义和团的势头,自称是"山东老团",专以打击洋人洋教为己任,于是四乡风云而起,一呼百应。山东义和团对洋人直接入侵切齿痛恨,他们打击洋教的活动多由具体的教案所引起。直隶义和团从一开始就以驱逐所有的洋人为口号,他们的组织结构也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直隶义和团的首领多不谙武功,于是请神附体就成了他们吸引新成员的主要工具。据柯文的说法,请神附体是一种宗教仪式,"请神者面向东南下跪,一面磕头,一面烧香念咒"。[61]一旦神灵附体之后,便不能自制,精神恍惚,无所畏惧。很难说这些义和团首领自己也确信附体的鬼话,因为在后来的武装冲突中,不少首领并没有亲临前线,冒枪林弹雨,视死如归。但大多数直隶义和团成员被这种邪术所惑,以为可以刀枪不入。作为组织功能,请神附体在直隶地区最为流行。作为宣传工具,请神附体的活动也极重要,因为在这种热闹的场合,首领可以乘机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把所有的实际灾难,特别是自然灾害都归罪于洋人。1900 年开头的几个月天旱无雨,是因为洋人破坏了当地的风水。一份直隶义和团的揭帖说: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62]

1900年恰是阴历一个甲子的末年。因为洋人入侵中国是在1840年，于是就有六十年甲子一轮回，洋人将被赶出中国的说法。山东义和团首领中有不少受人尊敬的武功师傅，而直隶义和团的首领则多自称为上天派他们下凡的真人。来自直隶新城的张德成是一个船帮老大。1900年初，张德成自称是负有上天使命的神人，组织了所谓"天下第一团"，率领数千人在直隶到处打击洋人洋教。[63]在直隶，请神附体的表演能力成为证明自己是否是正宗义和团的主要标志。应该注意的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口述历史材料中，请神附体的活动发生最频繁的是直隶、天津和直鲁交界的鲁西北地区。在这种形势下，直隶的反洋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绝对主义的仇洋运动。其以暴力打击洋人、教民的手段也就有了浓厚的巫术色彩，因为骚扰教堂和打击教民不过是神秘宗教的一种仪式而已。

更有甚者，直隶义和团更加广泛地使用神秘主义的揭帖形式来传播信息。揭帖一般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神秘的、不容质疑的预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对这种东西一笑了之，但是普通农民却很容易上当。山东义和团有时运用这种形式唤起民众，但一般有具体的教案为背景。直隶义和团则大量使用揭帖来宣示宿命论。揭帖的语言一般比较简单，也没有多少文采，只要琅琅上口，就算成功，这样，揭帖就比较容易以口相传。当时有一份揭帖如是说：

> 天地怒，神仙惨，雷电收，霖雨敛。
> 红灯照，义和拳，力无穷，法无边。
> 烧铁道，拔线杆，枪无药，炮无弹。
> 洋人灭，尸相连，人神喜，鸡犬安。
> 歌大有，庆丰年。[64]

另一份流行于3月间的揭帖云：

> 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

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

谁是谁非两罢休。[65]

此帖据说预测了中外战端将开，因为“铁马”与“金戈”对应，实指战争。该帖的来源非常神秘，据说是两个盲人在沙盘上写下的。

直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新发展是以“八卦教”形式建立了一些组织。“八卦教”本是抗清的“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所以很多中外学者都认为义和团与反清的白莲教的关系不容置疑。白莲教有佛教的某些特点，很多直隶义和团也采用了白莲教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劫”、“真主”等。然而，正如美国学者周锡瑞所指出的，义和团的概念、仪式和组织形式是华北平原地区文化的一个综合表现，而不是偏向白莲教教义一个特定方面。柯文更进一步指出，义和团与白莲教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过于狭窄，不能涵盖义和团组织松散的现实。[66]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说法还远远不到位，因为直隶义和团首领的江湖骗子特性决定了他们对白莲教实质概念的引进也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张德成和另一个首领曹福田显然与白莲教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不能用“八卦教”的仪式来吸引新成员。

直隶义和团的打击目标不仅限于洋人和教民，他们还视清廷从国外引进的“洋设施”为更加容易攻击的目标。直隶地区是中国建设铁路和电话电报最早的地区之一，所以义和团在攻打教堂之余，也开始破坏这些设施。1900 年 4 月初，义和团的揭帖在铁路沿线鼓动民众，号召他们于 4 月 21 日一起行动拆毁铁路。时任督办铁路、电报电话的大臣盛宣怀焦急地向直隶总督裕禄发出请求，要他着力保护。[67]所幸的是，4 月 21 日的统一行动并没有发生，然而朝廷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裕禄报告说，义和拳民自称刀枪不入，很多村民是自愿加入这些拳会组织的。裕禄的军队曾抓获拳会首领刘德胜，经调查，发现此人虽提出要缴纳三百铜板作为入会费，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报名加入。[68]裕禄对直隶义和团采取忽分忽合，以小股机动部队为游

击战术的做法伤透脑筋，他一直抱怨兵力不足难以对付这类游击匪徒。

1900年4月份，山东义和团运动大势已去，所以直隶义和团的活动更加活跃。此时直隶义和团已有一种仇洋的绝对主义的特点，即不分清红皂白，对洋人和与洋人有关的一切人物和事物一概排斥。他们宣扬的大难大劫将要临头的观点，使得直隶的民心更加动荡，这是山东义和团所没有能够做到的。应该说，清廷对这种由汉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神秘排外主义诸种特点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是估计不足的，朝廷从一开始就对直隶义和团的破坏力估计过低。

五、警钟重鸣

1900年4月16日，官方《京报》发表裕禄的禁拳奏折之后，很多在京的外交官也认为此次风波已经平息。公使团一时沾沾自喜，以为联合海军示威已经奏效，所以公使们更加认为向清廷施加高压比正式有礼貌地进行外交谈判还要有效。窦纳乐一直笃信武力的作用，早在1899年2月，他就写道：

> 以我的看法，整个中国问题其实十分简单——只要给我一支部队（当然不是中国军队），比如像1882年在开罗驻扎的那支部队，我（或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年之内解决中国问题……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69]

美使康格在1900年4月16日以后得意地报告华盛顿："中国政府总算以自己的方法及时地按照五国公使的要求去做了。当然，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剿匪方面是否能成功。"[70]

就在公使团自鸣得意之际，法使毕盛从法国度假归来。他对事态仍持极度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不相信海军示威能起真正作用。毕

盛下车伊始就声称他已收到可靠情报，在华的所有外国人都将处于危险的境地。毕盛的消息来源显然是樊国梁主教和其他的天主教传教士。毕盛返回北京后向德卡赛外长写的第一份报告中如是说："总的形势看来有所改善，但无人可以确定实质上有变化。太后政权对外国人的极度仇视是显而易见的，太后身边的重臣都是从维护中国传统、对外洋一概无知的人中挑选的。太后倾向于支持那些要求拒绝公使们要求的官员。"

毕盛还指出军机处大学士刚毅目前最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向德卡赛建议考虑向北京派特遣部队，他承认这种激烈的行动必须要得到公使团的集体批准。[71]毕盛的悲观心态将公使团的喜气一扫而光，其实毕盛认为慈禧太后已下决心驱逐洋人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

据意使萨瓦戈的报告，毕盛当时十分紧张，声称直隶和山东的拳匪已超过十万人，所以有必要从天津调海军陆战队进京护卫使馆。萨瓦戈觉得毕盛的说法过于夸张，而其他公使对毕盛的看法也将信将疑。但此时在公使团又有谣言说使馆将成为攻击对象，于是萨瓦戈也心急慌忙地向罗马外交部请求运送武器装备。[72]

俄使格尔思当着毕盛的面，毫无掩饰地表示了对五国联合海军示威的憎恶。[73]但在私下里，格尔思对局势的担忧并不亚于毕盛。格尔思的关注点当然不在拳乱本身，而是对整个局势的担忧，特别对直隶义和团的发展惴惴不安。他向圣彼得堡的报告中说直隶义和团已在向北京进发，毕盛已正式要求他一起向中国政府施压，因为义和团对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威胁。[74]俄国外交部收到此电报后大吃一惊，对格尔思的态度变化大惑不解。

事实上，在华北居住的外国人对直隶地区的民众造反情绪是了解的。这个地区连续两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华北农民已损失了两季的收成。严重的饥荒遍布各地，干旱的同时，又引起了大规模的蝗灾，成千上万的家庭难以生存下去。在华中，大水吞没了数万顷田地，灾民流离失所，只要活下来而没有被淹死已算是庆幸了。政府的赈灾政策迟迟难以落实，而地方官又借自然灾害之机侵吞公款，老百

姓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造反的势头如火如荼，再加上洋人破坏风水的传言，仇洋的情绪更加上升。在华北地区居住的传教士们其实也和农民一样，企盼着华北地区早降甘霖。但雨水迟迟不到，人心更加惶惶不安。

直隶和山东从1900年年初到4月间仍无雨水，动乱自然加剧。山东任丘绝望的农民在抗教活动中公开声称，如果官兵胆敢来犯，将以武力抗拒之。在其他地区，也有数百民众持鸟枪抗击官兵的现象。一开始朝廷收到报告说农民手中有几百枝现代的后膛枪，极为震惊，后来才发现不过是土枪而已。

在华的外国人并不觉得自己对事态的恶化有任何责任，但他们也不能做出大家一致同意的解释。于是，有的外国人也变得迷信起来。赫德爵士对中国的六十年甲子轮回说十分重视，他尤其相信按中国阴历，1900年有一个闰八月是凶险象征的说法。直隶地区的不少义和团揭帖都以此大做文章，巧合的是，18世纪的临清大暴动所发生的那一年也有一个闰八月。当然赫德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认为民心浮动的根本原因是干旱，所以一场透雨就能把暴乱平息下去。《泰晤士报》的莫理逊在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拳民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真正的危险来自干旱，因为天不下雨被认为是洋人干扰风水所致。大雨一到，拳民自然消亡。"[75]

很明显，连这两位独具眼光的观察家在1900年4月间尚未能意识到危机正在眼前，他们都低估了清廷捍卫自己主权的决心。公使中也有不少人相信雨水会将拳民们送回家种田。窦纳乐受赫德和莫理逊的影响很大，他在5月份报告首相说，法使毕盛的说法言过其实："我相信几场透雨就能迅速解除旱情，不管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如下雨更能平息骚乱。"[76]

所以，在京的外国人中鲜有人意识到拳乱的根源远远超出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事实是，外族的连年入侵已经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身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集团却在洋人面前连连招架不住。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动乱是难以避免的。

一年后，义和团事件已经结束。赫德爵士很尴尬地对自己未能事先看到危机的苗头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说没有看到危险的迹象。"但是他对自己的失误辩解说，当时在京的洋人圈子不断有"狼来了"的呼叫，久而久之，已无人相信了。[77]老资格的"中国通"、同文馆的美国总教习丁韪良也承认他为当时的形势所迷惑，并曾告诉友人说："北京是中国最安全的城市。"[78]丁韪良在《北京被围记》一书中，并没有对外国人为何误判事态的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只是将主要的责任推到法使毕盛身上。他说：

尽管在误判形势上，我们不能说某个公使比另一个公使更差，但是法国公使对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有重大责任的。他如果提早动武，夺取中国的舰艇，对中国各口岸实行全面禁运，中国政府不至于会到利令智昏的地步。[79]

丁韪良这样批评毕盛实际是很不公平的，毕盛度假归来后第一个发出了"狼来了"的信号。至于公使团全体对清廷的内心世界和决策动机缺乏判断能力，也不能怪罪于毕盛一人。

---

①Public Record Office: FOCP 7464, p. 125.

②Avarin, V.I.: *Imperializm*, vol. 1, p. 48.

③Glatfelter, R.: *Russia in China*, p. 57.

④Malozemmoff, A.: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p. 125.

⑤Romanov, B.A.: *Russia in Manchuria*, p. 179.

⑥Korostovets, I.I.: *Dva mesiatsa osady v Pekine*, p. 519.

⑦Salvago-Raggi，见第四章注⑨，第367页。

⑧*Krastnyi Arhkiv*, vol. 14, p. 9.

⑨Wehrle, E.，见第五章注㊿，第152页。

⑩*China No. 7* (1901), p. 49.

⑪Fairbank, et al.: *The I. G. in Peking*, vol. 2, p. 1224.

⑫同上，第1210页。

⑬(日)青木周藏:《青木周藏自传》,第27章,《宗教问题》。

⑭Wehrle, E., 见第五章注㉚,第152页。

⑮《日本外交文书》,卷33,别册1,第15页。

⑯Romanov, B.A., 同上注⑤,第53页。

⑰Wehrle, E., 见第五章注㉚,第117-118页。

⑱*Hart Diaries*, vol. 50, Oct. 1899.

⑲FO 228/1343.

⑳*Paper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airs of China*, 1900, p. 109.

㉑*Hart Diaries*, March 15, 1900.

㉒*Paper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airs of China*, 1900, p. 102.

㉓*China No. 3*, p. 21.

㉔FO 228/1339.

㉕FO 17/1418.

㉖*China No. 3* (1900), pp. 25—26.

㉗Fleming, P., *The Siege at Peking*, p. 57.

㉘M.E.A. , Serie – P, Cina, 407.

㉙《筹笔偶存》,第188页。

㉚*China No. 3*, p. 12.

㉛*DDF*, vol. XVI, p. 158.

㉜Documents Diplomatiques Chine, 1899—1900, p. 12 and p. 10.

㉝M.E.A., 同上注㉘。

㉞FO 17/411.

㉟FO 17/1418; Also Young, L.K., p. 114.

㊱同上,p. 115.

㊲*China No. 3*, p. 13.

㊳*DDC*, p. 12.

㊴*Paper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airs of China*, 1900, p. 111.

㊵Wehrle, E., 见第五章注㉚,第153页。

㊶㊷Fairbank et al., vol. 2, p. 1223.

㊸《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第 70 页。

㊹ *The I. G. in Peking*, vol. 2, p. 1223.

㊺ *China No. 3*, p. 10.

㊻《义和团史料》(下),第 700 页。

㊼《梦蕉亭杂记》,第 19 页。

㊽《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 882 页。

㊾《梦蕉亭杂记》,作者陈夔龙当时名列第一,不幸被王培佑排挤出局。关于此事,还可见法国作者 Henri Cordier: *La Révolution en Chine*, pp. 41—42.

㊿ *DDC*, p. 13.

(5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第 72 - 73 页。

(52) *China No. 3*, p. 10.

(53) *DDC*, p. 14.

(54) FO 17/1412.

(55) Krastnyi Arhkiv, vol. 14, p. 9.

(56)《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 第 79 页。

(57) *China No. 3*, p. 23.

(58)《光绪朝东华录》,卷 4,第 4502 页。

(59)《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 第 80 页。

(60) *Hart Diaries*, April 2, 1900.

(61) Cohen, Paul: *History in Three Keys*, p. 98.

(62) Esherick, J.: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p. 299.

(63)《新城县志》,卷 22, 第 12 - 13 页。

(64)《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 第 10 页。

(65)《庚子记事》,第 10 页。

(66) Cohen, 见上注(61),第 38—39 页。

(67)《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卷, 第 587 页。

(6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 第 79 页。

(69) Wilgus: *Sir Claude MacDonald*, p.82.

(70) *Paper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airs of China*, 1900, p. 118.

(71) *DDC*, p. 18.

(72) M.E.A., Serie - P, Cina, p.408.

⑬*DDF*, vol. XVI, p. 233, footnote 2.

⑭Krastnyi Arhkit, vol. 14, p. 17.

⑮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p. 108.

⑯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 108.

⑰Hart, Sir Robert: *The Peking Legations*, p. 2.

⑱Covell, Ralph, Martin, W.A.P.: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p. 236.

⑲Martin, W.A.P.: *The Siege in Peking,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p. 71.

第八章

通往冲突之路

一、荣禄将军为何不露面

1900年4月到6月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慈禧太后的心腹重臣、军机处大学士和武卫军总统荣禄将军没有参与任何重大的决策，在中外外交冲突升级的过程中从不露面。如前所述，从3月到5月这段关键时期，朝廷对直隶义和团主要还是采取镇压的政策。3月份开始，朝廷的一些重臣已开始感到传统的"曾国藩原则"已不适用，因为直隶义和团运动比山东义和团运动似乎更加危险，剿抚并用的政策不能奏效。从直隶义和团的动机和行为来看，一意剿灭乃是上策。慈禧太后虽然被皇室贵胄敦促与洋人决裂，但此时她的决心尚未下定，所以剿拳行动得以继续到5月间。5月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充分暴露了主剿政策的得与失。赫德爵士在5月份对局势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官员知道义和团应该被镇压下去，但他们可能对义和团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兴趣，想看看义和团到底能闹出什么结果来。"[①]

这段时期的朝廷政策主要由满族王公贵族和汉人中的北方守旧派所把持。因为慈禧太后和朝廷枢臣都没有亲眼见过拳民和他们的技艺，所以对他们既非常好奇，也心存疑虑。应该说，1900 年初的清廷从整体上来说还没有倾向支持拳乱。除了王公贵族以外，守旧派重臣们认为时机尚未到来，所以不愿意豁出一切，公开打出支持义和团的旗号。但是，从 3 月份开始，总理衙门与公使团的矛盾不断加深，朝廷中支持义和团的呼声越来越高。南派大臣如大学士王文韶和总署大臣许景澄等人虽然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剿，然而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王文韶处事谨慎圆滑，外号为"水晶灯"，[②]他当然不愿冒风险，而他的门生许景澄则资历太浅。

在这种形势下，荣禄的作用更加凸现出来。戊戌政变后荣禄的地位大大上升，他虽然主剿，但在 1899 年冬和 1900 年春一直不动声色，不肯轻易表态。原因很简单，荣禄手中握有实权，尤其是兵权。戊戌政变后，荣禄被授权重新组建汉人的军事组织。可以说，清政府这是第一次在八旗之外，创建了统一指挥的军事体制。直到 1898 年间，清廷的正规军体制仍是太平天国战争中遗留下的以地域为区分的军事单位混合而成。李鸿章的淮军由合肥人聂士成统领，兵员多为皖人。董福祥的甘军也多从甘肃招募。宋庆的豫军也保持了地区的特色。只有袁世凯的"新军"较为现代化，其结构取之于德国陆军的体制。总之，这些军事单位在战略战术思想、训练方法和薪饷制度上都没有统一的、严格的规定。

甲午一役，中国军队受辱于日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域性的军事结构已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特别在战场上协调动作极为困难。从西方购买新式武器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提高战略和战术的水平。对汉人军队进行的改革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统一指挥，维护慈禧太后的新政权。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荣禄将原有的四支军队合并为一，再加上一支自己亲自掌握的"中军"，所以，前、后、左、右、中五军正式命名为"武卫军"。在这个新体制下，地域性特点并未完全消除。袁世凯新军成为武卫右军，宋庆军为左军，聂士成军为前军，

而董福祥军则为后军。荣禄设法在训练、薪饷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尽量达到规范化，并请德国顾问参与训练项目。这样，荣禄不但是八旗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成为武卫军的"总统"，他还担任军机处大臣，因此身兼数个要职，权倾一时。

更重要的是，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位高权重并不引起太后的疑虑。照理说，荣禄的地位使他更加能够影响慈禧太后的政策取向，对后来事态的发展会起到关键作用。不幸的是，荣禄的个性不允许他像恭亲王奕䜣一样，在国家利益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荣禄功于心计，过于投机。事实上，他对慈禧太后心态的洞悉能力恰恰是他最大的心理包袱。荣禄从一开始就明白慈禧太后对洋人强硬态度的忌恨以及对拳民造反的矛盾心理。所以，在这个时刻还是不发一言为上策，他决定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对王公权贵大肆吹嘘义和团拳民如何神勇的说法虽然不以为然，但也没有及时地加以驳斥，荣禄的表现不啻对清廷的命运来说是一大悲剧。

当然，荣禄也是讲究现实的人，他很早就感觉到山东拳乱的危险性。在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这件事上，他也出了力。同时，他与直隶总督裕禄在镇压拳乱上也是积极配合的，尽管他本人不大愿意出面。但他不愿向慈禧太后直言剿拳的绝对必要性，所以他在1900年上半年里不肯卷人朝廷关于剿、抚问题的大辩论，这段时间里他也没有向朝廷上过重要的奏折。

荣禄的含糊态度当然与他的政治生存有关。对朝政的看法，他与慈禧太后是一致的。他们两人都是戊戌政变的主谋，而他们的废帝阴谋受到洋人的挑战。荣禄的心态与慈禧太后一样，最惧怕的是光绪的复辟，而洋人似乎已有此意。洋人对义和团的强烈反应被不少守旧大臣认为是寻找军事干涉的借口，荣禄对此并不完全深信，但他也不敢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荣禄的心态恰恰是慈禧太后心态的一面镜子。荣禄对义和团如何能恐吓洋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兴趣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公开站出来要求坚决进剿义和团，他就会得罪端郡王载漪和"大阿哥"溥儁，长远来说，对他的政治前途是不利

的。恭亲王奕䜣是皇室贵胄，可以不顾及慈禧太后的微妙心态而直言坦陈自己的观点。荣禄既无皇室血统，又无恭亲王的坦荡胸怀，当然不可能在关键时刻抛头露面。

洋人也常常被荣禄的变色龙特征所迷惑。尽管他们搞不清楚他的背景和为人，但是对他的看法并不坏。在海靖夫人的日记中居然记有荣禄被公使团认为是"进步人士"，对外交事务熟谙，而且还在驻华盛顿使馆工作过。[③]西方外交官常常在给本国的报告中提到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外甥"云云。可见，荣禄在洋人面前很有一套，他的投机本性在围攻使馆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尽管在义和团战争之后，八国联军总部不愿接受他为议和大臣，但他的形象并没有被损害。西方的著作多将他描述为明攻暗保使馆区的有功之人，弗莱明的名著《北京使馆被围记》和好莱坞的经典名作《北京的五十五天》都把他描绘成守旧派的死敌。在电影中更是把他的角色美化为护馆的中坚，还是西人女主角爱丝特哈西男爵夫人的秘密情人。

荣禄在这段时间里决定不露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相信他的军事实力可以对付义和团这批乌合之众。与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力相比，义和团既缺乏严密的组织，又缺乏军事知识。荣禄拥精兵十余万人，不怕拳民滋扰。最后一个重要原因是荣禄确信义和团还不至于给他带来大灾难。他一生笃信相术，他的算命先生告诉他庚子年(1900年)并无大祸，没有想到这次却大错特错。1900年10月，荣禄在逃亡的路上给远在四川的叔叔奎俊写的信中抱怨说他的命相家算得太不准确，所有的算命先生都没有看出他今年的背运。信中说："凡子看八字者皆未看出今年如此之坏，惟有云后年壬寅有犯刑冲处……说六十七岁准破财，断弦，然竟在六十五岁上如此之糟；或系他们误推二年，亦未可知耶！"[④]当时荣禄在逃亡之中，连失妻女，狼狈至极。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荣禄在1900年1月至4月间公使团与总理衙门就"上谕"问题往返折冲之际，他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在外交危机日益加深，洋人于4月威胁动武以后，他居然向朝廷请长病

假,称治疗"手足之疾",这显然是请的"政治病假"。这样,为了避免与端郡王载漪等守旧派的正面冲突,军机大臣和武卫军总统荣禄居然从4月初起在家病休了60天之久。而恰恰就在此阶段,清廷逐渐倾向于安抚拳民的政策,其中一个原因是武卫军连续剿拳的血腥政策已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义和团战争爆发后,荣禄曾经给袁世凯写过一封密信,为自己的行为加以辩护,说他在家其实坐立不安,"身在斗室而心在直庐"。[5] 60天病假中,荣禄确实焦虑地看着事态的发展日益恶化,但他仍不愿意出头。他在家中收到很多信件和报告,一般都不发回函,只有一次例外。法国主教樊国梁在1900年4月给荣禄一封信中,说拳乱已经不可收拾。他还说中华帝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本主教业已确知四国欲以护教弭乱为名,仿效德国占据胶州之故事者。"荣禄见此信后,大为震惊,[6]立即回复樊主教,保证将此信上达。[7]据《荣禄行状》作者所言:"公屡陈于朝,力主剿乱党,保使馆,而一时强宗悍将,横行恣睢,无复令公置喙。"[8]如此说法,实在没有根据。事实是,荣禄直到5月底才重新出山。在此之前,他至多不过算是以沉默表示不同意见。5月底销假以后,他一反常态,接连上书7封,但已为时太晚,不可能力挽狂澜,因为此时的中外冲突已上升到非常严重的阶段。

二、"团练"的重提

将拳民招为政府支持的团练的想法由来已久,前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均向朝廷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慈禧太后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朝廷本身已分成两派,主流派以端郡王载漪为首,成员大多是王公贵戚。这些人一直主张"用拳抗洋",自然对官办团练的想法甚感兴趣。少数派多为南方出身的大臣,也有少数八旗出身的而对"用拳抗洋"表示怀疑。少数派不仅势单力薄,而且还缺乏有力的领导。主剿的军机大臣荣禄已称病不出,这批人群龙无首,但仍

坚持全面剿拳的政策。两派争执不休的情况下，慈禧太后的态度自然成了关键。直到1900年5月份，应该说慈禧太后还是竭力不让仇洋派的政策占上风。从3月到4月，她一直举棋不定，所以剿拳行动得以继续进行。

直隶剿拳的任务主要由武卫军来担任。聂士成的淮军，即武卫前军是剿拳行动的中坚。聂士成恐怕是中国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他是在李鸿章的庇荫之下成长起来的。聂军派往剿拳前线的将领是梅东益，由裕禄派来的张连分辅佐，两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梅、张行动果断，手段残酷，颇获裕督和聂军门的褒奖。梅、张的策略是集中兵力，随时奔赴出事地点，大肆进攻，力挫拳会的士气。然而直隶义和团的活动在4月份以后愈加频繁，梅，张的"救火队"式的战术已不能奏效，因为兵力已经严重不足。

拳民攻击教堂和教民多是主动出击，但是教民也不示弱，所以形势更加恶化。在许多情况下，是教民采取主动的挑衅行为。教民自恃有洋人支持，且武器较好，有时也蓄意制造事端。据林学瑊辑录的《直东剿匪电存》记载，这类事件也不断地发生。比如在1900年3月份，二千拳民准备攻打教堂，但在地方士绅的劝导下，放弃了进攻计划，返回故里。在路过一个村子时，教民以为拳民来攻，立即放枪，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据称有三十多拳民被杀，伤者也不少。梅东益闻讯率官兵到达，仍然一意围剿拳民。[9]在京的外交官一般对这类事件往往表示沉默，并很少向本国政府报告。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对康格带偏袒性的报告明确表示不满，康格才向他报告了5月初在山东临清发生的天主教民攻击杀害拳民的事件。[10]

有时教民在一些小事上也借机寻衅。1900年4月份，直隶姜庄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民、教冲突。一位村民从教民手中购买了一批火镰；但一时未能付清款项，教民居然组织起来，要求村民开宴请客50桌；修缮本村教堂，罚铜钱100吊。最后，令该村民忍无可忍的是，还要求他全家入教。该村民对这些要求严词拒绝后，教民手持枪械，在村中示威恫吓。在村民与教民的对峙中，教民首先开枪，造成一死三

伤的结局。当村民在教堂门外集聚时,教民再度开枪,打死二十余人。这下子村民怒火难以抑制,他们攻击教民,并将教堂夷为平地。法国的樊国梁主教要求中方立即镇压。梅东益率兵抵达姜庄后,不分青红皂白,再度惩治村民,而对教民的行动不置一词。据梅提督的电报称,他由于不能与教会取得联系,“惟教堂无人传话”,所以对教民无从下手。[11]

樊国梁主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有意歪曲姜庄事件的真相,他说数千拳民到姜庄抢劫教民财产乃事发的原因。教民不得已自卫,才造成这场血案,他并且说“教民死伤无数”。然而,法国驻天津的总领事杜士兰在几天后的说法已与樊国梁主教的信大相径庭。杜士兰向巴黎报告说姜庄事件只有“一名教民丧生,而拳民被杀害多达七十余”。[12]此外,樊国梁主教还特意派副主教雅兰到保定府与中国官员理论。在谈判中,雅兰坚称拳民主动挑起这场事件。保定官员对此说法绝不接受,并出示了有力的证据。雅兰哑口无言,被迫交出几名肇事的教民。总理衙门根据人证物证将调查结果送交樊国梁主教,但他拒不承认这个调查结果。[13]

梅东益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是一味偏袒教会教民方面的,他往往是应樊国梁的要求后派兵进剿。而直隶总督裕禄在首肯前并不做调查研究,对樊国梁主教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这样,官兵与百姓的关系就急剧恶化。清廷不断地接到报告,说梅东益的部队在执行镇压任务时从不分清良莠,很多无辜百姓惨遭屠戮。此外,梅军官兵的纪律极坏,常常以剿匪为名向当地村民敲诈勒索。

朝廷中的实权派对梅东益的表现十分不满。1900 年 4 月份,给事中胡孚辰上言说:“知府袁世敦剿之于平原,提督梅东益剿之于景州、任邱、新城。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每处残杀,不下数十人,戕害无辜,莫此为甚。”胡孚辰指出问题的症结出自吴桥县令劳乃宣的《义和拳门源流考》一书。劳在此书中将所有拳民都指为叛匪,而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正是借此大加杀戮。胡孚辰最后说:“岂知今日时势,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国之觊觎而不敢遽动者,亦不畏兵力

而畏民心。"他请求朝廷惩处梅东益,并下令烧掉劳乃宣的书。[14]胡的论点鲜明有力,但朝廷并不为其所动,既没有下令停止剿拳,也不愿意禁止劳乃宣的书,守旧派仍被慈禧太后钳制可见一斑。

清廷只在1900年5月中发布了一个"上谕",指出梅东益官兵在剿匪过程中有不当行为,着直隶总督裕禄严加管束。[15]实际上,梅军的"剿匪"行动确实引起民情愤怒,整个直隶被推向了大规模民众造反的边缘。

尽管此时剿拳的恶果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清廷已开始考虑不会激起民愤的办法。御史郑炳麟于1900年5月1日上奏正式请求采用"变拳为团"的方法。他认为梅东益的做法不啻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他指出:"请饬督抚因势利导,化私为公,以资官练而弭后患。……"他又说:"筹思至再,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患于无形耳。"他建议最好是"联数村为一小团,合一县为一大团……遇有教堂,共相捍卫,不宜与之为难,转致外人有所藉口。"对慈禧太后来说,她已经是第三次听到这样的建议。在剿抚两难的困境下,她开始对这个想法感兴趣了。[16]清廷立即向各省督抚发旨,要求他们对此发表看法。

裕禄和袁世凯反应很快。他两人都坚决反对私团官练的做法。裕禄回电中称:"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托之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诱惑乡愚……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说之人,穿凿附会,荒诞不经。"裕禄指出直隶官兵曾抓获数名拳首,将他们就地正法作为试验,这些人并无任何神术。他们的本事不过是闭眼装神弄鬼,连武术功夫都不到家。所以,裕禄认为对这种拳会"因其私而官练之,行之似非所宜"。[17]

袁世凯的反应更为激烈。他在回电中说:"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所以袁世凯斩钉截铁地说:"夫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资以御侮者,亦

断无行劫拒捕而日为良民者。勿论是会是团，以邪术掺杂其间，必酿后患……因其私团而官练之，实属必不可行。"[18]

可以看出，裕禄并不完全反对保留部分"曾国藩原则"，而袁世凯则坚决要求彻底放弃该原则。他深信义和团源于劳乃宣说的白莲邪教，所以应一概翦除，方能除去后患。慈禧太后为此两人的回电所动，决定将团练一事再次搁置起来，朝廷守旧大臣对太后的冷静处理十分恼火。

梅东益在1900年5月份的"剿匪"手段更加残忍，一时间直隶地区民情汹汹。拳会在百姓中获得了更大的支持，所以对官兵的抗拒更加激烈。直隶总督裕禄开始意识到梅东益提督的兵力不足，于是从天津专派武卫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前往接应。裕禄给聂士城的电报中称如剿拳不成功，"燎原大祸恐在目前"，[19]可见裕禄对天津城内拳民日益增多非常担忧。早在3月份，杨福同就向他报告在天津近郊抓获5名拳会首领。然而因为直隶继续大旱无雨，拳会首领抓住机会，以求雨的方式设坛摆场。这些求雨仪式并不奏效，于是他们开始宣传"赶走洋人，雨将至"之类的乱语。天津城内的第一个拳坛设于一个废置厂房中，官方求雨仪式中设坛的做法被拳首学去照样设坛。于是，信徒的人数大增，到了四五月间，满街都有拳民出没。[20]

从直隶到鲁北，义和团运动已向满洲发展。1900年2月在满洲已出现拳坛，大批年轻人参加习拳弄棒。在锦州附近的村落里，十有八九的农民相信义和团神术。[21]一位俄国军官在1900年春报告说义和团在铁路工人中间传播仇洋的思想，一位从山东乘船渡海而来的拳首公开宣称要"专与俄国老毛子作对"。[22]

最严重的是拳民已开始在京畿大量出没。京师出现义和团是从1900年4月份开始的，最早是在东单牌楼的一座小庙里。5月初，京城到处出现了揭帖。大部分揭帖语言粗鄙，神秘莫测。但也有少数直言宣传驱洋人的主张。其中一份如是说："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

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23]

三、涞水事件

1900年4月17日，裕禄的禁拳上奏在《京报》公开发表后，“传教国同盟”开始停止活动，公使团一度以为危机已经结束。然而，直隶的拳乱日益严重。4月29日，窦纳乐向英国首相报告说，京城地面发现一份义和团揭帖，其内容有：“号召民众先砍电线，后烧铁路，然后杀洋人，因为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洋人造成的。”该帖还说：“洋人被除之际，便是风调雨顺之时。”[24]这份揭帖是公使团最早见到的揭帖之一。《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逊在4月26日的日记中记道：“仇洋的宣传品当街兜售。”他的中国仆人告诉他：“八百万天兵天将下凡杀尽洋人，雨水才能下来。”

公使团还以为海军示威已经取得胜利，所以对清廷又开始重申“曾国藩原则”几乎没有注意。窦纳乐对清廷刚颁布的与1月11日“上谕”类似的新“上谕”的解释是，这是对前次“上谕”的修正。[25]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向外交部报告说，中国的叛匪认为新“上谕”对他们是一种保护措施。他说山东东阿县令本来已经张贴悬赏缉拿拳会首领的告示，新“上谕”公布后，立即把告示拿走了。贾礼士还报告说民间有流言，说慈禧太后和端郡王支持拳会。[26]

然而，各国外交官的注意力还是主要放在同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活动上，而不是在京师的拳民。各公使自有消息渠道，但各自收到的信息不一定与其他公使的相同。英使主要依靠赫德的分析，但赫德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心灰意冷，他整日在冥思苦想中国的前途，所提的看法便往往带有哲理性，这对窦纳乐来说毫无用处。在公开场合，赫德总是表现得比较乐观。他和《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逊都一再告诉窦纳乐，慈禧太后精明过人，不会轻易地上拳会的当。

法使毕盛越来越依靠樊国梁主教，但樊主教的特点是夸大其词，经常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高论。据樊国梁主教在5月18日的一封

信中说："拳会乃魔鬼的邪教，这些人的惯技是装神弄鬼，自称有神附体。有的人以为他们的非凡力量是催眠术的结果，还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宗教狂热的牺牲品。对我们来说，这些人是魔鬼直接使用的工具。"[27]所以，樊国梁主教给毕盛的信息一贯是悲观的。

俄使格尔思全神贯注地观察其他公使的动向。虽然他对直隶义和团深为担忧，但表面上不露声色，他不想使公使团更加惊慌，以至于引起列强的武装干涉。所以格尔思仍然采用两面手段：一方面，他私下里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全面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他又对其他公使声称局势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对格尔思最为戒备，但他对樊国梁的耸人听闻的信件也不以为然。他给青木周藏外相的一份电报中称樊国梁主教的说法没有说服力，形势并不像法国描绘的那么糟糕。[28]然而，出于遏制俄国的需要，西德二郎对法使的行动总是尽可能地表示支持。

德使克林德从不掩饰他对形势发展的悲观和愤怒，他尤其对公使团同仁的无效行动大为不满。窦纳乐对德国人一向反感，他怀疑克林德的悲观情绪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窦纳乐多次用法语告诉意使萨瓦戈："你知道，德国人总是在背后策划新的阴谋！"[29]萨瓦戈的信息来源比较少，他主要依靠意大利传教士、北京天主教区的达多西奥神父。达多西奥来自拿不勒斯，他常在意使面前批评他的主教樊国梁。他认为樊国梁主教没有原则性，只对权力感兴趣。他说樊国梁主教1900年初回欧洲时在巴黎和梵蒂冈大肆吹捧慈禧太后的英明，因为她决定给天主教士授予中国的官位品秩。几个月后，樊国梁主教居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现在称慈禧太后是"邪恶的女人，是魔鬼的代理人"云云。[30]达多西奥神父的说法更加促使萨瓦戈确信，在华天主教会既无诚信的品质，又不愿放弃私利。

同时，列强各国政府对中国的实情并不了解，以为海军示威之后，公使团大获全胜，中外冲突已经平息。列强政府大都没有对五国公使采用的联合照会的手段进行认真的检讨，对这种做法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足够的估计。五国"传教国同盟"在虚假的胜利之后，也

有必要继续保持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只有美国政府对联合照会的做法开始感到担忧。在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一再催促下，康格于1900年5月8日向海约翰这样解释自己参加五国同盟的原因：

> 关于五国公使采用同一照会的原因，我承认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做法都不是最明智、最有效的。但当时在我们看来危险即将到来，传教士都要求我们采取联合行动，而且其他的公使都催促我参加的情况下，我不能在将来危险真的到来时，让我本人和我国政府遭受指控，说我方拒绝参加联合行动应为造成危险局势负全部的责任，所以我支持了联合照会的做法。[31]

应该指出的是，康格的报告有意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他并不是迫于各方压力而参加五国公使同盟的，他一开始就是联合行动的积极支持者。康格的解释倒是道出了五国公使欺蒙本国外交部的天机，因为联合照会的做法旨在迫使五国政府承认和批准既成事实，因为每个国家都不愿受到康格所提出的那种指控。换句话说，联合照会行动是先斩后奏的外交行动，而各国政府一旦卷进去，就难以退出这个立场。公使们对欧洲国际政治非常了解，知道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往往取决于他国的行动。这样的联合照会方法是在华外交官自行采用的，而本国政府在事实上已成了在华外交代表的"心理人质"。列强政府和外交官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联合照会向清廷再一次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也就是说，清廷对它的理解是五国公使的目的并不在镇压拳会，而是在政权变更。

同时，在京的外国人在各自的圈子里生活依旧。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外交僵局，外交官和家属们最盼望的是暑期度假。日本使馆的武官柴五郎是一个果敢的军人。他参加了几次公使联席会议，却发现西方外交官对中国事情的看法非常幼稚，而且各自心怀鬼胎，打小算盘。他在给帝国陆军参谋总长大山岩的密电中报告说，他简直不能相信，公使们一方面表示对拳会的担忧，另一方面却饶有兴致地讨

论到何处度假的计划。他们大谈租度假房的问题，同时又说要将在大沽口外的海军抽调一批护馆卫队进京，这岂不是成了笑话？好像是请护馆卫队进京留守，而公使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度假。[32]

然而，京城地面的政治气候已大不如前，各地动乱加剧的报告频频传到北京。1900 年 5 月初，直隶涞水县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教案，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与前不久发生的姜庄事件不同，“涞水事件”是有预谋的。最初的起因是一位涞水高洛村村民在春节期间与教民发生过冲突，因为教民常常对这个传统的节日表示不敬。这个高洛村村民决定联络拳会，请他们到村里来攻打教民。这次攻打是有组织的，据目击者的记载，5 月初四乡的拳民从涞水各地向高洛村进发，他们手持大刀、长矛还有土枪。当地官员知道他们的行动目的，但惧怕拳民人多势众，不敢干涉。涞水县令祝芾赶到现场想驱散拳民，但势单力薄，只能逃之夭夭。5 月 12 日晚，暴力行动开始。对高洛事件的实情有不同的说法。樊国梁主教一开始就声称有 68 名教民遇难，教会、教民拥有的所有房屋均被焚烧殆尽。而中国政府的调查官员第二天赶到高洛时，报告说教堂、教民的住处确实被焚，但遇难者不过 5 人，另有 20 余人受伤，但“是拳是教”尚不清楚。5 月 12 日的暴力行动之后，拳民转移到邻县烧了几处教民房产，但没有杀人。樊国梁再次声称该处教民房产悉数被焚，教民被杀无数。[33]

樊国梁关于“高洛大屠杀”的说法对公使团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没有人怀疑樊主教说法的真实性。这样公使们就越过了在是否召集护馆卫队进京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大家开始克服不同意见，将这一问题正式摆到桌面上来。窦纳乐于 5 月 17 日报告首相：“法国公使今天告诉我，说在离北京九十英里的地方，义和团烧毁了三个村庄，杀死六十一名罗马天主教徒。这个地方在保定府附近。”他接着说：“我已下令让即将离开天津的海军陆战队不要开拔，直接听命于西摩海军上将的指挥。”[34]

毕盛也立即向巴黎请求派一艘战舰驶往北戴河，如果情况紧急，可以在那里登陆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他于 5 月 20 日给德卡赛外

长的电报中又说，高洛村有69名天主教徒被戕，并根据樊国梁的另一份详细报告说义和团在那里还高举一面大旗，上书“奉旨作战”，这样，拳民的活动第一次被描绘成有朝廷直接支持的背景。毕盛还指责中国政府在剿匪上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他说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曾多次与直隶总督交涉，但毫无结果。毕盛承认裕禄是个“好人”，但他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自主权受到限制。[⑧]

实际上，毕盛的报告并不符合事实。首先，中国方面的史料没有任何关于高洛事件中出现过“奉旨作战”或“奉旨灭洋”之类的旗帜的记载。中国政府在高洛事件中与拳民勾结的说法纯属樊国梁编造出来的。此外，裕禄的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他并没有在剿拳行动上受到直接限制。涞水地方官向直隶总督求援时，裕禄立即派兵前往，他的增兵措施已经得到朝廷的批准，而武卫军前军统帅聂士成还亲赴保定府地区指挥作战。而在5月16日，也就是毕盛向总理衙门请求派兵的当天，杨福同的骑兵已经出发。5月17日，杨军在高洛村捕获了20余名拳民。虽然拳民进行了反抗，并组织了一次伏击，但不成功，18名拳民被打死。

奇怪的是，樊国梁关于“高洛大屠杀”的报告和解释也让一向持怀疑态度的俄使格尔思深信不疑。5月15日，格尔思秘密约见总署章京联芳，向他透露说，60几名基督徒被杀后果严重，各国公使已向本国政府去电要求派兵保护。这次护馆卫兵的人数将不会是每馆二三十人，而是数百人。格尔思声称5月14日公使召开联席会议时，就想采取这一措施，“是我从中开导，极力劝阻，故暂作罢论”。[⑨]其实格尔思又在耍两面外交手段，因为公使联席会议此时并未正式召开。但他的这一做法确实把公使们的想法透露给中方，中国驻俄大使杨儒也来电证实沙皇政府对中国事态的极度担忧。杨儒与外交大臣莫拉维耶夫有一次密谈，莫说：“各国欲公筹自卫，调舰干预，情形吃紧，为中国计，亟应早筹办法，免人协以谋我等语。”[⑩]庆亲王奕劻立即将格尔思的谈话记录送达朝廷，并说俄使的机密信息证明各国确在协同行动，以达到既定的目的。

然而,俄国的外交动作也让总理衙门相信,只要剿拳行动仍未停止,公使团内部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入侵的战争眼下还不会发生。其实清廷对俄国的居心还是清楚的,早在4月份,就有御史攀桂上奏专门分析俄人的政策。据该奏云,与俄结盟以抵外患,“乃引虎自助,纵之出木匣”。攀桂认为俄国为列强中最贫穷者:“其地正当寒带,百物不生,常艳心于温、热二带物产之饶,如饥渴之求饮食,眈眈乎有南向之势。”他还说:“夫英、德、义〔意〕、法诸国,或民主,或君民共主……俄独为君权最重之国,以开疆拓土为事。”于是他认为,与俄结盟还不如与反俄同盟国结盟对中国更为有利。[38]

尽管朝廷对俄使不完全信任,但还是对涞水的拳乱非常重视,裕禄再一次要求增兵获得批准。同时杨福同开始采取剿拳行动,在1900年5月21日,杨福同率兵到涞水石亭村围剿,杀死1名拳民,捕获2人。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让30名士兵在石亭村留宿。当晚,四乡拳民开始集合,准备以数千人力攻打石亭的驻军。杨福同第二天早晨返回石亭时,又犯了轻敌的错误,只带了60余人贸然赴石亭增援。官兵在石亭附近遭遇伏击,战斗中,杨福同落马,立即被杀。官兵仓皇撤退,又死2名士兵,还有10余人受伤。[39]

涞水的这次事件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自剿拳行动开展以来,高级军官在战斗中丧命这还是第一次,清廷大惊。很明显,直隶拳民已经公开反叛,完全不把“上谕”和官军放在眼里。最让朝廷震惊的是,“涞水事件”表明拳民有严密的组织,并在战斗中学会了调兵、埋伏等战术。“涞水事件”传到北京时,朝廷守旧派更是对义和团有神术的说法深信不疑,于是趁机再次提出“用拳抗洋”的主张。

四、公使联席会议

清廷对“涞水事件”非常焦心,不得不考虑偏袒教民的剿拳政策是否已经开始逼民造反。公使团对“涞水事件”也很担忧,但它从这次事件中得出了与清廷相反的结论——更加相信中国政府故意在鼓

励拳民的抗洋行动。洋人只对"涞水事件"的第一阶段,即所谓"高洛大屠杀"感兴趣,而对第二阶段杨福同分统被杀一事非常冷漠。从5月10日到20日,樊国梁又向毕盛发来几封耸人听闻的报告。他声称一场打击外国人的大灾难就在眼前,因为清廷已下了决心,与义和团联手将洋人斩尽杀绝。樊国梁认为目前的局势与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前的情形非常相似:"一样的揭帖,一样的威胁,一样的警告,外国人方面对局势一样的无知。我向您,公使先生,恳求相信我的话。我的消息灵通,不会信口开河。"樊国梁还斩钉截铁地说:

> 中国政府对宗教的迫害只是一个表象,其最终目标是除去所有的洋人……义和团在北京的同伙正在等待他们进京,他们的计划是先攻教堂,再攻使馆。据我所知,义和团攻打我们北堂的日期已经定下,京城的百姓人人皆知。[40]

樊国梁强烈要求法国派遣海军陆战队保卫北堂,樊主教对局势的这种看法显然受到惊恐不安的中国教民的影响。毕盛注意到,樊国梁在年初返欧时的乐观心态与他现在的极度悲观心理简直是判若两人。不管其证据是否充足,樊国梁主教的说法为公使们解释当前的局势提供了一种看似有道理的思维方式:中国政府的种种表现并不显得复杂了,因为其背后有个除去洋人的按部就班的计划。所谓"高洛大屠杀"如果有政府支持的背景,就完全符合樊国梁主教的理论。毕盛决定以樊主教的报告为基础召开全体公使的联席会议。[41]

毕盛为何要迅速采取行动还有另一个原因。1900年四五月间,中国政府发现当法国在修建云南铁路的过程中其驻滇领事弗朗索瓦暗中向云南大量走私武器,于是要求法国政府将其召回。毕盛大怒,多次向法国外长请求在云南采取军事行动。德卡赛外长对这个建议根本不屑一顾。[42]愤怒之余,毕盛对中国政府成见日深,所以当樊国梁的并不符合事实的信件到达时,他就不加深思,立即采取主动,正如他在几个月前与窦纳乐公使一起创造"传教国同盟"的劲头一样

大。由此可见,整个公使团的联席会议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传教国同盟”。

第一次联席会议于1900年5月20日在法馆召开。公使们集中讨论了樊国梁信件,情绪十分激动。樊主教的中心论点是中方有个巨大的除洋阴谋,尽管他没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大家对樊国梁主教对中国的观察力还是信服的。樊的论点将一连串的事态发展用一根线索联系起来,公使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对清廷心态的误解才是造成目前形势的主要原因。俄使格尔思对慈禧太后的心情有一定的认识,他在公使会议上要求大家谨慎从事。但其他公使对他都不信任,甚至连毕盛也对这位盟国的公使表示不理解。他多次向外长报告说格尔思是公使团中最难说服的人:“他老是担心会上德国、美国,更不用说英国人设的圈套。他认为德、美、英的目标是推翻太后政权。”确实,格尔思担心列强借机搞军事政变,但他又不敢将此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因为其他公使必定要讥之为天方夜谭。[43]

公使们没有意识到清廷所担心的恰恰是洋人以护教为借口实行政权更迭。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相信它已为了符合洋人的要求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列强却开始联手,欲以军事干涉中国内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使们在请求本国政府批准使用武力威慑时,并没有顾及清廷政权变更的问题,他们着眼点是自保。而中国方面则愈加认为列强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复辟光绪帝,对满族权贵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公使团越是威胁要动武,清廷的态度反而更加强硬,因为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慈禧太后没有退缩的余地,只能一意备战。拳民不管有没有神术,总是可以被用来辅助正规军参加抗洋的战斗。

公使团则完全是另一个思路,他们一致同意加入法国公使提议的联合外交行动。公使团团长、西班牙的卡洛干伯爵受命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联合照会,其中要求:“将任何出版、印刷、散发威胁外国人的揭帖者一律正法。并要求处决将私房、庙宇供义和团使用的房主和有杀人、放火、抢劫行为的不法之徒。”最后,该照会再一次要

求:“在京城和华北地区公开颁布上述的要求。”[44]

朝廷接到此照会时倒是没有感到震惊,因为公使团的要求尚不算过分,但是其语言和语气则有一种最后通牒的味道。杨福同被杀事件使朝野震动,因为它表明拳民的人数在迅速增长,剿拳的兵力已大大不足,必须要动用大批的武卫军。但武卫军各部都驻扎在沿海地区,以防范外族入侵,所以清廷在剿拳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大规模剿拳行动将调用这些部队,海防前线必然空虚,洋人就可能乘虚而入。由于清廷对公使团的真实意图不明,而且深有疑虑,所以大规模剿拳是不可能的。在国内动乱和外族入侵的双重压力下,慈禧太后政权当然以外患为头等大事,因为在外族军事威胁不存在的情况下,平息国内动乱尚不是件难事。在这样的情形下,公使团联合照会的实际效果是反而把清廷向抚拳政策的方向上推了一把。

此外,1900 年 5 月 22 日的公使联席会议还决定在 5 天之内如果收不到中方的反应,则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当然总理衙门并不知道公使团这个内定的时限。关于进一步行动的具体措施,很多公使此时尚未决定是否从天津调护馆卫队。大多数人认为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联合海军示威更为妥当,只有毕盛积极主张立即调兵进京。[45]他向德卡赛外长报告说,公使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如果中方对照会没有积极反应,将立即调海军陆战队进京。[46]其实公使团并没有这样的决定,据毕盛的副手当都阿男爵的回忆录,毕盛确实在会上提出此建议,但其他公使不同意。当都阿认为其他公使对实情无知,他说:“我们法国是护教国,公使馆收到遍布各地的传教士发来的信息。其他使馆并无第一手的信息,而且对传教利益不够关心。”[47]很显然,毕盛擅自主张调卫队进京护馆完全是受了樊国梁的影响,被樊主教的说法吓得惊惶失措。

俄使格尔思则公开表示反对调卫队进京。窦纳乐报告首相说,格尔思在联席会议上对他进行了游说:“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国家有实质性的利益:英国和俄国。他认为调卫队入京护馆和联合海军示威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将不堪设想。”[48]法外长德卡

赛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其盟国俄罗斯的立场。毕盛在5月22日公使会议后的报告中居然说俄使与他合作默契，德卡赛信以为真，立即回电表示："如欧洲人在直隶的危险困境中，我批准你和俄使采取主动措施。"[49]这样，法国政府为毕盛调兵护馆开了临机处置的绿灯。

窦纳乐当然也积极支持采取强硬行动，以迫使中国政府就范。然而，他对樊国梁主教的理论还是将信将疑。他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说："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收到多少能够证明法国主教悲观看法的证据。"[50]《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在公使会议后的第二天日记中写道："窦使的中文秘书考克本也对樊主教的说法不以为然。我同意窦纳乐的看法，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大难将至。当然，在京城地面的刀剑价格上升了一倍，铁匠铺子连天加夜在赶制定货。"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的仇洋运动似乎已得到政府支持，拳民已在军营和王府里面操练。"莫理逊的说法毫无根据。当时确有一些拳民进入京师，但人数尚不多，在大街上和庙宇里活动，但还没有被政府正式招募成军，不可能在清军大营中操练。而且，大街上的拳民并没有对洋人造成直接的威胁。莫理逊记载了"北京饭店"瑞士老板沙莫的一段事：沙莫在街上看到一个约16岁的拳民在操练拳术，他看到沙莫后，将上衣解开，露出胸膛，说洋人的子弹打在这里不会伤我一根毫毛。沙莫大怒，一脚将那个少年踢开，那个小拳民望风而逃。[51]

窦纳乐知道伦敦对他的表现不满，所以这次他非常小心谨慎，不再报告夸大其词的事件。他对索尔兹伯里首相对他的判断能力有怀疑而十分不满。1900年5月中旬，当他得知英国驻法大使芒逊爵士在3月间与德卡赛外长有一段批评他的对话时，立即给远东事务次官伯蒂一连写了两封长信。3月份在巴黎的谈话记录显示，当德卡赛批评英国政府对在北京的"传教国同盟"的活动并不热心时，芒逊大使作了如下的回复：

原则上说，这批在华外交官是有经验的，但是，在远离欧洲

以外的国家任职的外交官有一个共同倾向——特别是在东方的外交官——他们常常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推行炮舰政策的机会，而他们为此提供的借口往往是想象中的危险。

窦纳乐见此谈话记录后当然怒不可遏，他感觉到芒逊的观点受到首相的支持。他给伯蒂的信中气愤地写道："如果这些话是首相本人或其他哪位大使向法国人讲的倒也罢了。尽管我对芒逊爵士的外交经验是敬佩的，但他的外交生涯中从来没有包括在中国的任职。我认为像他这种身居高位的人讲出这些话……实在是既不公平，又不合理，而且也没有必要。"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两封信里，窦纳乐把在1900年5月中旬的心态暴露无遗。他自认为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教诲中国政府，他认为他是在同一个不文明的政府和国家打交道。他认为，在文明国度里，在中国发生的这种事件和中国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早就会引起外交决裂了。他继而说："中国人正在变得非常顽固和不合作，我同他们的讲话是用的父亲般的口气进行教诲。当然，我并不希望事情闹大，正因为我们现在在南非有困难，我才强忍着怒火与他们打交道。两年前我是不会忍受的，我怀疑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否合理。现在不行动，将来后患无穷。"[9]

很明显，窦纳乐对自己的高压政策颇为欣赏，对中国政府所处的微妙地位毫无感觉。窦纳乐是公使团的实际领导人，他的行动对清廷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

公使团中最沮丧的还是德使克林德。他的看法既偏激，又古怪，常常让他的同事们难以接受。在公使会议上，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公使们就当前局势以及对策的讨论毫无用处。问题的实质是中华帝国已行将崩溃，公使们不应装模作样地讨论如何护卫使馆，内心里却在盘算如何得到最大可能的地盘。克林德正告公使团的成员，停止无谓的辩论，大家把瓜分中国的底牌亮出来，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其他公使听后大惊失色。克林德的表现进一步证实了窦纳乐对德国人的一贯怀疑。

如前所述,毕盛已经获得了外交部临机处置的授权,但他此时又在为云南事件伤脑筋。私运军火的法国弗朗索瓦领事终究被中国驱逐出境,毕盛趁机再提军事干涉,德卡赛一口回绝,说:"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局势,法国出兵云南的时机未到。"但德卡赛进一步授权给毕盛,让他在华北动用兵力的问题上相机行事。[63]这是德卡赛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日本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日本公使一开始对樊国梁信件持怀疑态度,但日本对向华北派兵是有兴趣的,1900 年 5 月 20 日公使会议使西德二郎公使深信列强出兵干涉是早晚的事,对此,日本不能甘于落在他人之后。日驻天津领事在 5 月 25 日向东京报告说,涞水发生的大屠杀对日本公民也将是个威胁,他请日本政府迅速派遣一艘重型巡洋舰来华。[64]此外,这一行动也有助于日本监视俄军的行动。总之,公使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各自心里在打小算盘。所以,公使会议后,大家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暂不调卫队进京,但举行联合海军示威。

"涞水事件"之后,直隶的动乱更进一步地加剧,杨福同分统被杀的消息传遍各个角落。裕禄在 1900 年 5 月 21 日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拳民已经公开反叛,而且一呼百应,如果不派重兵弹压,大祸恐在眼前,他请求增派二三营人马到保定地区参加剿拳行动。[65]朝廷知道天津—北京—保定三角通道的重要性,立即批准了裕禄的建议。5 月 22 日,庆亲王奕劻再次上奏请求全力保护使馆和教堂,他还建议缉捕所有明目张胆张贴义和团揭帖的不法之徒。京师九门提督府立即采取行动,公布了禁止拳会活动的十条规定:

一　查禁拳会
二　查办邪教
三　惩办奸民
四　查毁揭帖
五　张贴禁拳的简明告示

六　责成司坊加强巡视

七　派勇巡查

八　责成父兄自行禁止子弟习拳

九　有习拳者邻右同坐

十　严禁刻字铺刊刻刷印义和团揭帖

这些规定已超出了公使团的六条要求。[55]

总理衙门认为这些措施既已实行，便向公使团发出了对联合照会的正式答复。其中说："中方的措施与公使团的要求基本符合，总理衙门现在正在请求朝廷公开颁布禁拳有效措施的上谕。"然而，由于公使团与清廷之间的成见已经很深，总理衙门的回复被认为是蓄意推诿，不愿采取实际行动。窦纳乐向首相报告说他认为这个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中国人没有保证要采取有效的镇压措施。[57]英国外交部感觉到窦纳乐又有要采取激烈行动的趋势，立即回电指示说，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应采取主动，而应该让他国公使牵头。[58]所以，公使团在1900年5月26日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时，毕盛自恃有外长撑腰，所以慷慨激昂，要求迅速行动，而窦纳乐只是闷闷不乐，不敢再多言。毕盛称中国将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而按樊国梁的说法，即所有的外国人都是攻击目标，这是有道理的。毕盛还敦促其他公使立即下令调陆战队进京。公使们最后达成协议，用调兵进京的威胁方法再向中方施压。同时，还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具体的措施细节。中方对这个要求反应很快，将十条禁拳规定送给公使团，而且很快发表了禁拳"上谕"。

但是公使团在"涞水事件"上对清廷心态影响的另一方面却视而不见，即清廷看到直隶的反叛活动如火如荼，开始担心是否动武太甚的这一方面。所以，尽管双方的外交僵局有所松动，各自考虑问题的角度还是大相径庭的。公使们对"涞水事件"中杨福同被杀一事的后果毫无感觉，窦纳乐只向伦敦就事论事地作了汇报，并无分析。[59]西方史学家就这段时间的事态发展有个传统的看法，以弗莱明的著作

为代表，即是说，在1900年5月间各国公使都没有看到大屠杀将至的危险，于是樊国梁是惟一有远见卓识的在京外国人。此说并不准确，公使团此时已大致接受樊国梁主教的说法，但他们对清廷的心理困境没有任何考虑，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清廷剿抚两难的心态在5月25日的一份由军机处发给裕禄的电报中反映出来。该电云："查拏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该督务当严饬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是为至要。"也就是说，该电指示裕禄不要一意进剿，而应剿抚并用。[60]这份电报是清廷开始考虑剿抚并用政策的第一个清晰的信号。其目的不在蒙骗洋人，明剿暗抚，而确实是"涞水事件"所直接引起的政策困境，清廷不得已而为之。裕禄当然对朝廷的意思心知肚明，态度也开始变化。

赫德爵士在公开场合仍然一副乐观的样子。义和团战争后，许多西方人都因此讥讽他居然也未能看出任何危险的苗头。史学家弗莱明干脆说："人们不能不怀疑赫德爵士的观点对公使团当时的近视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攻击赫德："是中国文化的奴隶。"[61]在使馆被围事件中幸存的外交官常常将自己的"近视"与赫德相比，心里就平衡得多，因为并不是外交官对中国形势判断有误，即使是赫德这样的老牌"中国通"都没有看出名堂。意使萨瓦戈在回忆录中讥笑赫德"勉强算是一个中国问题的大专家"，但拳乱到来时，他不过"同我辈庸才一样，对局势发展的趋势一无所知"。[62]

实际上，赫德对局势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但他的立足点与公使团大为不同。史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即赫德在5月间不可能预料到事态的发展，因为正如本书所指出的，中外僵局的根源是双方的误解，而心理战的特点是不确定和多变。直到1900年5月中旬，形势并没有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护馆洋兵尚未入城。清廷也没有制定杀尽洋人的、如樊国梁主教所称的大屠杀计划。然而，国家之间的误解和心理战又非常危险，很可能走向不可逆转的境地。就赫德爵士来讲，他实在看不出双方的僵局有何实质性的意义。他知道

清廷"用拳抗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他看不出中国政府支持义和团的真实动机。此外,他虽然清楚公使团对慈禧太后新政权有敌对情绪,但他也不相信列强能够克服歧见,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复辟光绪。因此,赫德难以想象公使团与清廷之间的负气争吵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到5月下旬时,赫德才开始真正地紧张起来,因为中外僵局已有冲突的征兆,其中的重大转折点是公使团调卫队进京的危险决定。赫德在5月20日给金登干的信中说道:"如果我的夫人和孩子尚在此地,我就会立即将她们送往日本,本周护馆卫队将进京,我们将随时看到冲突的爆发。"但是赫德仍不相信慈禧太后此时已为拳民所惑。他与慈禧太后的年龄相仿,从年轻时来华服务以后,就一直在近距离观察这位中国的第一女强人。他不相信他一直佩服的精明强干的西太后已经年老昏庸,但1898年后中国局势的变化之大,连赫德也承认难以理解。他告诉金登干:

> 我们对中国官方的心态确实不大清楚,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深层。我遇事并不惊慌,但时时采取防范措施:中国人最重安全,然而北京城任何事都会随时发生。[8]

不管怎么说,赫德对打破中外僵局显得力不从心。他明白如果他开始恐慌,公使们就更加要采取过激的行动。他只能表面上安详自如,但内心非常痛苦,面对恶化的局势束手无策。所以,中外双方的沟通中存在的障碍得以继续下去,最终引发大冲突也是势所必然。

---

①*The I. G.: in Peking*, p.1129.

②高澍:《金銮琐记》,见《近代稗海》,卷1,第44页。

③Heyking,见第二章注⑦,第191页。

④《荣禄存札》,第408页。

⑤《荣禄集》,第38页。

⑥《荣禄存札》,第387页。

⑦《义和团》,卷 4,第 145 页。

⑧《荣禄行状》,见《近代史资料》,卷 54,第 29 页。

⑨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第 87 页。

⑩ *Paper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airs of China*, 1900, p. 120.

⑪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第 93—94 页。

⑫ *British Documents i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Vol. 24. p. 3.

⑬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第 105 页。

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第 83—84 页。

⑮《清实录》,卷 7,第 68。

⑯《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第 84—85 页。

⑰同上,第 90—92 页。

⑱同上,第 92—95 页。

⑲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第 109 页。

⑳刘孟扬:《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卷 2,第 8—9 页。

㉑艾声:《拳匪纪事》,第 1—2 页。

㉒李光等著:《东北义和团运动》,第 38—39 页。

㉓《近代史资料》,卷 1,第 15 页。

㉔ FO17, quoted from *Materials of Modern History*, vol. 2, p. 9.

㉕ 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p. 109.

㉖ FO17/1412, 1413.

㉗㉘ Favier: *The Heart of Peking*, p. 8.

㉙ Salvago-Raggi,见第二章注⑧,第 335 页。

㉚同上,第 356—357 页。

㉛ *Paper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airs of China*, 1900, p. 439.

㉜(日)《柴五郎大将生涯》,第 439 页。

㉝《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89 页。

㉞ *China No*. 3, p. 26.

㉟ *DDF*, vol. XVI, pp. 233—234.

㊱《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98 页。

㊲《杨儒庚子电稿》,第 122 页。

㊳《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卷,第581—585页。
㊴《义和团》,卷1,第448页;《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88页。
㊵Fleming, P.,见第五章注㉗,第64页。
㊶*DDF*, vol. XVI, pp. 233—236.
㊷同上,第239—240页。
㊸同上,第235页。
㊹*China No*. 3, p. 27.
㊺*DDF*,同上注㊶,第236页。
㊻*Livre jaune*, *Chine*, 1899—1900, p. 21.
㊼D'Anthouard, *Les Boxeurs*, p. 16.
㊽*China No*. 3, p. 27.
㊾*Livre jaune*,同上注㊻,第25页。
㊿Fleming, P.,见第五章注㉗,第64—65页。
51 Pearl,同上注㉕,第109页。
52 FO17/1412.
53 Pearl,同上注㉕,第182—183页。
54《日本外交文书》,卷33,别册一,第4—5页。
55《义和团史料》(下),第109页。
56同上,第701—702页。
57 *China No*. 3, p. 28.
58 FO17/1418.
59 *China No*. 3, p. 28.
60《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2页。
61 Fleming, P.,见第五章注㉗,第65—66页。
62 Salvago - Raggi,见第二章注⑧,第333页。
63 *The I. G. in Peking*, p. 1129.

第九章 护馆卫队进京与剿拳政策的结束

一、"拳乱"四起的华北

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西摩海军上将在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 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情形：我们是用暴力手段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进入中国的。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其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设想，如果任何外国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强行进入我国会怎样反应。①

西摩的这种在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对1900年在北京的外交官看来不过是无稽之谈。公使团决定向北京调兵护馆是导向战争的第一个决策错误。

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事件，就中国政府来说，是从"剿"变"抚"政策的转折点。而在华外交官对此事毫不重视，也没有及时向本国政府报告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清廷对全面剿拳的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大规模的民

众造反正在形成。朝廷剿抚两难的政策对拳民是个鼓励。地方官员到涞水张贴告示，要求当地村民交出杀官抗兵的祸首，村民们对这些告示不屑一顾。[②]聂士成增派了三营人马参加剿拳行动，拳民们避开锋芒，将主要精力放在拆铁路、拔电线杆的破坏活动上。

一时间，铁路沿线聚集了大批拳民和趁火打劫的不法之徒。1900 年 5 月 26 日，从芦台到保定的铁路在涿州附近的一整段都被拆毁，电线杆被拔光。第二天，离北京很近的琉璃河车站被大火夷为平地，铁路桥也被毁，这就造成了铁路运输的第一次中断。更严重的是，数万拳民攻进离北京 40 英里的涿州城。拳民称洋兵将至，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涿州。县令龚荫培自知无力抗拒拳民，只好绝食表示抗议。[③]拳民占据涿州这个大本营后，开始焚烧马家堡和高碑店之间的铁路，100 多公里沿线到处起火。

清廷此时仍未决定放弃剿拳，直隶总督裕禄下令军队在铁路沿线进行弹压，武卫军分统杨慕时率大队人马开始行动。杨慕时张贴的布告措词非常严厉："现在各省皆练新军，即如直隶一省，大兵已有十万；坚甲利兵，士饱马肥，即有神道，断非大军之敌。今本统领奉总督提宪之谕，愿与尔等约，如能自行解散，各保身家……如仍横肆抗拒，本统领惟以杀伐从事，并禀请飞调直隶各军，四面兜剿，则尔等无所逃命矣。"[④]然而，杨慕时的威胁语气在当时已没有多大作用，村民们全然不为之所惧。

拆铁路、拔电线杆的破坏行动对公使团的影响很大，但这时的破坏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至保定方向，天津与北京的交通和通讯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公使团再次提出调卫队进京的建议，清廷对洋人的这个企图早有所闻，但吃不准其目的究竟为何。不管怎么说，洋兵进行军事干涉不得不迫使清廷将剿拳问题放到次要地位上。1900 年 5 月 27 日到 29 日，慈禧太后连续三天召见武卫军后军统领董福祥。关乎召见的细节已不为外界所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董福祥大言不惭地向慈禧太后许诺能够打退洋人的进犯，朝廷大受鼓舞，于是开始悄悄地做备战准备。[⑤]

董福祥并非行伍出身的正统军人，他早年在甘肃固原以贩驴为业，后成为西北地区的一名悍匪首领。他被清廷招安之后，战功倒是很显赫，尤其在平定回乱的过程中崭露头角，升迁很快。在荣禄任西安将军时，董福祥投到荣禄的门下，两人结拜金兰，成为拜把兄弟。董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举止放肆，语言粗鄙，专以仇洋为己任。1898年戊戌政变时，董的甘军对洋人多有恫吓，所以公使团决定调卫队进京护馆，以备万一。董福祥不肯使用任何西式的器具，在战场上也从不肯用西式军乐队，而用古老的笙箫来鼓舞士气。他的甘军不像聂士成和袁世凯的部队，仍然身着传统的号衣，而决不肯穿西式的卡其布军服，尽管卡其布军服在战场上比较便利。当然，董福祥对进口的新式武器是不会拒绝的。

1900年初，董福祥母亲去世，按传统，他曾向朝廷请假丁母忧。当时建储的阴谋正在进行，荣禄不肯让这位把兄弟离开京城，于是向朝廷请求打破惯例，以国家利益为名，不准董丁忧之请。朝廷为此专下一道"上谕"，以防止董福祥受到正统士大夫的攻讦。[6]荣禄统率武卫军五支部队中，董军最受他的信任。袁世凯军队驻扎山东，远水不解近渴，而聂士成、宋庆两军未必听从他的随时调遣。荣禄只是在一年之后，才开始对他调甘军入京的决定感到后悔，因为董福祥在围攻使馆事件中进攻最力。

与此同时，拳民继续全面对抗政府的公告。直隶地区广泛流传的一份义和团公告出现于1900年5月28日，其中宣称："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公告还号召民众将所有教民赶出村子，去破坏铁路，烧教堂，没收教民的财产等等。[7]成千上万的直隶民众响应了号召，拆铁路、拔电线杆的行动迅速扩大。铁路电报电话大臣盛宣怀大惊失色，向总理衙门发急电，说铁路各处被毁，车站设施和车头车厢都被烧了不少，连慈禧太后的专列也在其中。总署大臣许景澄于5月28日报告说拳民已经破坏了卢沟桥。[8]

聂士成奉命紧急行动。1900年5月29日凌晨，杨慕时率大队人马来到高碑店。他们发现大批农民正在拆铁路，毁桥梁。杨立即命令部队开枪，拳民死伤十余人，铁路沿线的农民更加愤怒。当时杨慕时是奉命驱散铁路上的拳民，如果官兵被攻击，方可开枪还击。杨慕时在给聂士成的电报里为自己进行了辩解，说他本意是驱散拳民，但拳民中很多无知少年居然毫不理睬，他只好下令开枪，以求将他们吓走。杨慕时知道高碑店事件的严重后果，他在电报中坚持说："外人不察当时事机，易生议论。死伤十余人，外人以为杀百姓，慕时以为杀匪，即令非匪，而与匪相杂而烧铁道，则亦匪也。"[⑨]杨慕时开枪杀人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拆铁路行动。

但是朝廷尚未决定停止剿拳，所以杨慕时的行动并未受到诘责。相反，5月29日颁布的"上谕"确认对拳民动武的必要性。"上谕"中要求的政策正是裕禄提出的"查拏首要，解散胁从"，并特意指出："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⑩]应当注意的是，尽管洋兵入城对慈禧太后的压力很大，但朝廷并无抚拳的意思。从1900年1月11日引起中外争端的"上谕"颁布以来，此谕第一次没有重提曾国藩的"分清良莠"原则。朝廷对拳民破坏国家斥巨资兴修的铁路、电讯设施是不能容忍的。在这个时刻，中外应该有共同合作的基础，因为以护路名义剿拳，是双方都应该可以接受的。然而不幸的是，公使团的全副精力都在调卫队进京问题上。尽管调兵的动机是"自卫"，清廷对此深有怀疑，以为另有所图。所以，中外打破僵局的一个有利时机再一次被错过。

二、护馆卫队问题

1900年5月24日，英使馆召开了庆贺维多利亚女王81岁生日的盛大庆典，有60多位在京的外国要人出席。因为男宾比女宾人数多，每位女士可带两位男宾。窦纳乐夫人邀请的是两位在京的著名

单身男士，海关总税司赫德爵士和《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当大家看到这两位消息灵通人士在晚宴上谈笑风生，心情也开始舒坦起来，将什么"大屠杀"计划之类抛到脑后。赫德的心情特别好，英军近期在南非的节节胜利让他十分高兴。他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夫金城之围被解是我们在北京收到的最大喜讯，最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消息是在女王生日之前到来。"赫德还注意到莫理逊的心情："莫理逊一直闷闷不乐，整日阴沉沉的。这下可好了！我猜想没有任何一次的生日庆典能让他像这次一样高兴。"[11]

克林德男爵和夫人被邀请为特别嘉宾，因为他们代表的德皇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在喜气洋洋的晚会上，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心情被中国的拳乱所破坏。樊国梁主教仍一如既往，逢人就大谈危险将至，却遭人冷落，找不到谈话的对象。窦纳乐借一个机会把克林德拉到身边问他是否同意调卫队进京，克林德逃避了这个问题，说他尚未收到明确指示。奥匈帝国的临时代办罗斯通说所谓拳乱，不过是干旱造成的。窦纳乐同意此论，说有人对这件事太大惊小怪了。晚宴在一个小戏台上举行，宾主频频举杯，好像外面什么大事也没有发生。晚宴之后，男女嘉宾随着赫德爵士的私人铜管乐队翩翩起舞，尽兴而归。

两天后，公使团联席会议再次召开时，大家的心情都为之一变。公使们对总理衙门在5月21日的回复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在继续欺骗。法使毕盛认为中方不愿合作，使他更加确信樊国梁主教的理论。既然大难将至，应当"立即调足够数量的部队进京，以备不测"。俄使格尔思说他收到中方的可靠消息，说清廷即将迅速采取行动，形势并不像法使所说的那么严重。

克林德男爵对两人的意见都不表示同意。他宣称："期望中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或调兵进京护馆的想法都不现实，因为这是基于中国政府还能继续生存下去。"窦纳乐立即向索尔兹伯里首相报告说："克林德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12]其他公使对克林德的发言不置一词。大家最后同意，由

于窦纳乐和格尔思与庆亲王奕劻有约，等到他们会谈以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13]

第二天，窦纳乐与庆亲王在总署会谈。庆亲王奕劻保证："朝廷将开始有力的镇压措施，太后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已经高度警觉。"[14]窦纳乐告诉庆亲王说，公使团有意向要调兵进京护馆，而且这一次的人数要比上一次大得多。庆亲王并没有吃惊，声称对此已有所闻。窦纳乐错误地以为中方对洋兵入城并不十分在意，或许还希望洋兵帮助维持京城地区的秩序。[15]

格尔思与总理衙门大臣谈话的调子大不相同，他再次强调列强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他建议中国政府应采取措施，使公使团增强信心。他还具体提出："(一)禁止拳会操练，(二)抓捕和处决拳首。"格尔思刻意将自己与公使团其他成员区别而论，说："我本人处身目前的争端之外，中俄两国的关系甚好，而且两国都是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他最后说：

> 我只希望中国自己能够恢复秩序，而不至于给他国干涉提供机会，如果外国干涉发生，比义和团暴乱的更大灾难将会发生。[16]

格尔思显然又在暗示列强复辟光绪或瓜分中国的前景。

公使团在1900年5月28日再次开会，大家显然都认为庆亲王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但在采取一致行动上又出现分歧。俄使格尔思和德使克林德都不赞成法使毕盛提出的立即调兵进京的建议，但是毕盛在会前已擅自调动法国卫队进京。如前所述，毕盛在5月21日就获得了外交大臣"相机处置"的授权。格尔思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将开始认真剿拳，克林德则公开提出中国即将崩溃的理论，公使团不应进行这些无谓的争论，而应认真地谈判中国的前途。据法馆参赞当都阿的回忆录，克林德明确提出"剥夺太后的权力"。[17]

克林德的言论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从维也纳、巴黎、伦敦和彼得

堡传到柏林。外交大臣布洛夫闻讯大怒,立即命令克林德就他的未经官方许可的言论做出解释。克林德认为公使团同仁在联合陷害他,情绪非常激动。他花了整整两天起草给外交部的回电。在该电中他解释说他并没有发表其他外交官所说的那种言论,他只不过对调动卫队进京的提议表示疑问,因为"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他还辩解说,他与公使团意见不合是因为没有接到柏林的明确指示。外交大臣布洛夫接到此电后,回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告诉克林德,即使他的言论如回电中所说的那样,也会让他国认为德国将在中国采取比其他国家更为激烈的行动。[18]换句话说,克林德的言论完全歪曲了德国政府的本意。

克林德对自己的言论不予承认,并怪罪于公使团同仁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确实强调了中国行将崩溃,瓜分时机已经到来。不久,日本政府也收到西德二郎公使的电报,其中说到克林德的观点是:"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一场革命。公使们应该现在就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方案。"[19]柏林对克林德的言论做出迅速反应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德国政府对德皇威廉二世对军事干涉行动的狂热越来越感到麻烦,整肃克林德的不当言行也是做给德皇看的。但是,这一事件对克林德的打击太大,他心里更加忌恨公使团同仁。他的行为变得更加孤僻,这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当局势发生剧变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反映得更加清楚。

然而,俄、德公使都未能说服其他公使放弃调兵进京的想法。所以,既然法使已经采取行动,大家都不甘心落于人后,欧洲均势政策又一次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公使会议的第二天,即 1900 年 5 月 29 日,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被毁,京津铁路一时中断,公使们借此机会立即向总理衙门提出调卫队进京的要求。英、俄公使已同意这个措施,其他人亦步亦趋,谁也不想让北京的洋兵中没有自己部队的存在。窦纳乐电告天津领事贾礼士,特别强调说英国卫队人数绝不能少于法、俄的人数,并要求贾礼士将其他国家卫队的人数及时报告给他。[20]连意大利也不甘示弱,萨瓦戈致电意舰"爱尔巴号"和"加拉布

里亚号"的两位舰长，要求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一支卫队，人数不得少于他国的卫队人数。萨瓦戈的要求显然太离谱，意大利在中国海域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21]

所以，调兵人京成了欧洲均势政治的一次表演，谁也没有考虑此时洋兵人京是否有必要，更没有人考虑此举的严重后果如何。据义和团研究专家斯泰格的分析，当公使团决定调护馆卫队进京的时刻，拳民的暴乱自卜克斯事件之后尚未造成任何一名外国人丧失性命。在直隶，只有一位法国的铁路员工在丰台车站受伤。[22]

1900年5月21日到5月26日期间，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古约莱海军上将还率一批随从到北京观光。他们在北京到处游览，没有感到任何危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有传教士提供的信息说针对洋人的大屠杀行动即将到来；另一方面，在京的外国人的生活十分安详。这批海军军官认为，所谓义和团危险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神话。[23]

需要指出的是，公使团调兵进京的决策是一个不可低估的错误。英国学者普赛尔对此有一段分析：

> 我们至少可以说，调兵进京对仇洋运动来说不谛是火上加油，所以其实际效果是使得那些本来获得卫队保护的外国人的处境更加危险……后来，由于卫队兵力不足，又不得不决定增兵，而增兵却不成功(注：指西摩远征军，见第十一章)。为了帮助他们撤退，只好攻打大沽炮台，这就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开始。[24]

普赛尔对调动卫队进京的决定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他对清廷的心态还是没有正确地把握。实际上，受洋兵人京决定影响最大的倒不是民众的仇洋情绪，而是清廷的剿拳政策。当时在京的外国人并没有任何生命危险，清廷猜测公使团决定调兵人城既然不是"自卫"，那末就不得不考虑这是武装干涉清廷内政的第

一步措施。如果公使团的实际目的是政权变更,洋兵进城当然大大加强了公使团与中方谈判的实力。与联合海军示威不同,这次的行动等于在紫禁城的大门口进行军事示威。所以,护馆卫队进京的决定使公使团与清廷之间自 1900 年 1 月份以来展开的心理战迅速升级。总之,这个决定的基础是公使团对清廷的心态和局势的错误判断。

应当指出,护馆卫队进京已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 1898 年戊戌政变之后,董福祥甘军入京对公使团确实是一种威胁,而且当时公使团虽然对"百日维新"失败表示不满,但中外双方没有深层次的误解和心理战,所以清廷批准了洋兵进城的要求。此次调兵进京的时机和时局均极为不利,自 1900 年 4 月以来,列强已经派遣了十余艘兵舰云集大沽口外,这是和平年代中的最大一次海军示威行动。而公使团仍然要求立即调兵入京,清廷很难不把这个行动看作是武装干涉内政的前奏,俄使格尔思和其他外交官都在不同的场合暗示过这种可能性。所以,洋兵入京的行动迫使慈禧太后相信,外患已经比内忧更加严重。

美使康格认为公使团调兵进京对清廷来说是最难堪的一件事,因为它无异于向朝廷宣示中国政府已无能力守卫和控制京城,遑论整个中华帝国。[25]康格确实看到了这个决定对清廷的巨大影响,但他还是不明白实际影响之所在。这个决定的实际后果是迫使慈禧太后在剿抚两难的政策上做出明确的抉择,因为即使清廷采取全面剿拳的行动,洋人仍不会为之所动。在两害之间取其轻的思想指导下,清廷不能不考虑利用自己的臣民,即使是有反叛倾向的拳民,来增强抗击洋人的力量。

三、轻重缓急的决策

公使团的调兵决定反而使得清廷的决策思路更加清晰。慈禧太后从剿抚两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便开始考虑下一步决策的轻重缓

急。清廷第一优先的政策是设法阻止洋兵入城,所以对公使团要求予以拒绝。不久,1900年5月29日发生丰台车站被焚事件。丰台距北京不过6英里,是京津铁路的一个枢纽。此路一断,京津两地的外国人有可能被隔绝。美使康格的夫人莎拉在日记中写道:"丰台被焚。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毁,在京的外国人群情激动。"[25]

清廷意识到,丰台车站被焚,洋人入京难以避免,于是立即采取行动。朝廷命令京城九门提督府24小时在使馆区巡视,进行保护。此时在家请病假的荣禄突然销假回朝,荣禄的第一步行动是率军巡视被毁的车站,以五营人马赴丰台,两营驻扎马家堡。1900年5月30日,朝廷颁布上谕,明指拳民为无知愚民,并声称要对其实行弹压。该谕还要求步军统领崇礼采取有效措施,缉捕在京城地区闹事的拳民,"如再推诿,定惟崇礼等是问,决不宽贷"。很明显,荣禄在此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7]仇洋的王公贵族对朝廷的强硬政策非常不满。

公使团把此谕不当一回事,相反,他们更加确信以调兵进京的联合行动方式才能使清廷就范。公使团的一致行动旨在不给清廷以任何灵活变通和谈判的余地。5月30日,四国公使代表公使团与总理衙门会晤,他们颐指气使地警告总理衙门官员:如果中方"拒绝卫队入城,则卫队人数将大增,中国政府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如果立即答应,并提供方便,人数可以减少。"总署大臣对公使团一而再、再而三的"严重后果"的威胁已不再感到震惊,他们回答说,此事尚需几日方可决定,因为庆亲王不在宫里,而在颐和园。四国公使一口回绝,要求立即允许卫队进京。[28]窦纳乐报告首相说:他"对总理衙门的六位大臣直言相告……你们是一群愚笨之徒。卫队明日就要动身,如中国方面制造麻烦,我们将增派十倍之兵力。"[29]窦纳乐的骄横态度更加使中方意识到洋兵入城的目的不在自卫,而是另有他图,因为公使团没有提出为何调兵进京如此十万火急的理由。[30]

清廷指示直隶总督裕禄设法阻止洋兵进京,裕禄立即下令阻挡

第一批登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法国驻津总领事杜士兰还没有等到总理衙门的答复，就径自面见裕禄，称不管中方批准与否，卫队已经整装待发，明日启程。杜士兰还刻意告诉裕禄，洋兵进京不过为了保护使馆，没有"与中国政府为难的意思"。裕禄在这样的压力下，不能稳住阵脚，不敢用武力与洋兵对抗。他电告朝廷为自己辩解，说他实在难以阻止洋兵启程，他尽力劝导法领事杜士兰，但没有成功。[31]清廷百般无奈，只好允许放行。但总理衙门要求护馆卫队要受到公使团的严加管束，不得干预其他事务，一旦形势稳定，应自行撤退。最重要的是，中方要求各国卫队不得超过30人，这个数字是根据1898年的先例确定的。[32]清廷当然担心洋兵人数过多，会对朝政有直接影响。但是公使团不是这样考虑的。1900年5月31日，洋兵乘火车启程进京。外交官们完全不顾中方的人数限额，六国卫队的总人数达356人。只有日本卫队符合中方的要求，一共只有26人。英、法、俄、美各派60余人，是中方要求的两倍之多，而意大利也派了42人。[33]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因为派兵过少，立即受到外相青木周藏的批评。青木周藏指示西德二郎："大日本帝国政府认为，为了保持日本的威望，我方派出的卫队不得少于他国。"[34]很显然，调动卫队进京是国际政治的一次表现机会，与使馆是否面临危险关系不大。

洋兵进京后，清廷的剿拳政策已经不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因为拳民毕竟是中国公民。剿拳计划得以继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荣禄的突然复出，荣禄仍然认为剿拳为第一要务，但慈禧太后的思路开始起变化。荣禄作为主剿派首领令朝廷守旧大臣恨之入骨，端郡王载漪和他的同伙立即采取行动，企图限制荣禄的权力。他们说服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3日下达了一道不寻常的"廷寄"，矛头直指荣禄，其中说："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35]荣禄做事一贯小心谨慎，因此"孟浪从事"的说法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北京城里，大队洋兵的到达使清廷惶惶不安。王公贵族再也

按捺不住仇洋的心态，开始发出“用拳抗洋”的呼声。大学士赵书翘和顺天府尹何乃滢联名上书朝廷，要求采取改剿为抚的政策。他们刻意指出，义和团造反的根源在于教士、教民长期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地方官视主教为虎狼，不敢得罪，所以办案多有不公。如果朝廷视这些受欺压的百姓为匪，他们就会真的成为土匪。更重要的是，这份上奏还赞扬一些义和拳民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真有古侠士之风”。赵、何两人对解决“拳乱”的办法十分明确：

> 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特拳民以灭洋为名，洋人视如仇雠，我若收而用之，彼必谓不然。然各国练兵，所以自卫，例非他国所能干预，且约束不会滋事，于和局固无妨碍也。[36]

赵、何奏折中的内容并非全部创新，但分量不同。朝廷虽然常常收到御史和中层官员对“用拳抗洋”的提议，以赵、何此等高官提出这样明确的建议，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朝廷的守旧权贵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争取达到“用拳抗洋”的目的，在洋兵大队入城之际提出这个建议是最好的时机。

赵书翘是北方汉人，祖籍陕西。他长期以来在守旧派大学士刚毅的卵翼之下得到迅速升迁，他在阴谋建储时期得到慈禧太后的欢心。据史料载，当朝廷宣布立“大阿哥”的上谕时，满朝文武面面相觑，无人敢发一言，而赵书翘第一个站出来向朝廷表示庆贺。[37]何乃滢也是北方汉族官僚，他与赵书翘联合上书之后不久，就获迁升为左都御史。

地方大员对赵、何两人的上书反应十分强烈。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总署发电，说：“此等匪徒……按律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炮轰击。”张之洞对铁路的安全尤其担心，他说洋人早有自组护路队的想法，如中国剿拳不力，他们必将再提这个计划。一旦洋兵在中国国土

有永久立足之地,后果则不堪设想。[38]

此外,李鸿章、刘坤一和盛宣怀均各自向荣禄发电,谓"用拳抗洋"之不可行,请求立即用重兵弹压拳民。荣禄虽然忧心忡忡,但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从1900年5月29日到6月4日之间,短短6天时间,他接连上书七道。但他的上书仍是模棱两可,意在左右逢源。第一道上书中说:"查近来拳教滋事,论拳民本意,不过自卫身家,其仇教嫉洋尤见乃心……惟近闻拳会中颇有会匪、游勇盗贼之类,借习拳为名,以逞其为匪之技者。"他进一步指出,不管拳民性质如何,他们的做法将导致洋人的武装干涉,这是比拳乱还要危险的。荣禄的意思是,即使曾国藩"分清良莠"的原则不能抛弃,大力剿拳从大局着想还是必要的。荣禄显然对慈禧太后的真实心态把握得很准,因为太后此时对"用拳抗洋"还没有特别的偏好,而如何防止洋人的武装干涉则是令她头痛不已的事情。在后来的六道上书中,荣禄还报告了他在铁路沿线巡视的结果。总之,他的结论趋向于无条件地采取剿拳政策。[39]然而在他上书期间,突然收到6月3日的"不得孟浪从事"的指示,一下子把他的剿拳勇气打了下去。他在6月22日中外战端开始后,曾经给在四川的奎俊写过一封信,内称:"假中曾七上禀片,皆以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均为枢廷诸人以多事为词,竟将一切办法置之不理,皆不报。后来竟抬出廷寄,谓该大学士勿得孟浪云云。"[40]

应该说,荣禄的立场简直就是慈禧太后的影子,仍在剿抚两者之间徘徊。对荣禄来说,6月3日的"廷寄"表明他的剿拳政策的政治风险太大,所以他不愿在赵、何上奏所引起的争议中明确表态。

洋人卫队的到达迫使慈禧太后决定政策的轻重缓急。她最关心的是如何让洋兵撤退,这样"用拳抗洋"的建议就对她有一定的吸引力。荣禄在上书中说得很清楚:"若洋兵果来,其害又甚于拳匪。"[41]慈禧太后第二关心的是洋人不再增兵,所以剿拳问题已不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然而,慈禧太后对拳民并不了解,对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是否真有神助半信半疑。因此,批准部分洋兵进城护馆也反映了她

在剿抚问题上的悬而未决的态度。

四、黄村事件

赵书翘、何乃滢两人上奏之后，清廷面临着剿抚政策上的分歧。然而荣禄一心自保，不愿出面公开支持剿拳派，如奕劻、王文韶和许景澄等人。与此同时，京城的空气由于大队着装考究、耀武扬威的洋兵到来而陡然紧张起来，朝廷和百姓对洋兵的表现深为忧虑。更令朝廷担忧的是，各国在大沽口外继续增加军舰的数量，而日本、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前期没有出发的，这时也陆续到来。护馆卫队趾高气扬，与公使团的悲观情绪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洋兵在出发前都得到上级的指示，说义和拳民乃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据奥匈帝国海军舰长文特哈尔德的回忆录，他受命担任奥馆卫队长后，对卫队成员的训话是："每个人可以带回一条猪尾巴（注：指中国人的辫子）作为纪念品，只要我的兵舰不受污染即可。"[42]

朝廷内部对大队洋兵陆续到来惊恐不安，立即下令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居住的颐和园增派卫兵，严加防范。端郡王载漪此时已出任禁卫军虎神营的统领，与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平起平坐。神机营成立的历史很久，而虎神营才创建不到几年。据某些资料记载，"虎神营"得名于荣禄。荣禄用了"虎食羊（注：洋的谐音），神治鬼"之意。[43]当然此说不能完全被证实，端郡王此时以"大阿哥"父亲之尊统率虎神营，接近太后的机会更多。

荣禄的武卫军统领对朝廷剿拳政策的变化一无所知，所以仍在积极围剿拳民。1900年6月3日，御史许佑身上书朝廷称，杨福同涞水被杀及引发大规模暴乱的主因是武卫军剿拳太过。现在的重点应放在如何追使洋兵出城，"总期洋兵早退一日，则民心早定一日，肘腋之间，不可不慎之又慎也。"朝廷据此奏下发"廷寄"，警告荣禄和裕禄不得滥用武力，邀功请赏，部队的任务应是保护政府的财产。[44]这是朝廷为剿拳行动亮的第一盏红灯。荣禄接旨后，立即命令武卫前军

将部队撤到铁路沿线以专意护路。直东剿匪的负责官员张连分对这个命令感到吃惊,他向裕禄回电说荣中堂的撤军命令说明他"此实不知匪情之故"。他报告说拳匪已有3万之众,在各处抗击官军,如果不集中兵力大加围剿,是不可能将其驱散的。铁路沿线拳民势众,护路之事防不胜防。[45]

张连分当然不知道朝中政策的变故,前线官员对荣禄已接到警告的"廷寄"毫不知情。荣禄的决定是很聪明的,因为朝廷不让他在剿拳中"孟浪从事",他将部队调往铁路沿线,可以保卫国家财产之名继续打击拳民。总署大臣许景澄在6月8日给荣禄写信说京津铁路靠外资修建,仅贷款利息偿还一项每月就需白银六七万两,他恳请荣禄全力保护之。[46]

荣禄是一意剿拳派,但他在朝廷剿抚两派之间小心翼翼。不久,他借护路剿拳的想法又遭到一次打击。6月4日,朝廷再次发出停止剿拳的信号。在天津附近的黄村,聂士成军队与拳民发生了动乱以来最大的冲突。据裕禄的报告,当时数千拳民在黄村焚烧车站,拆毁铁路桥。聂军一到,奉命拘捕。但由于寡不敌众,官兵仓皇撤退,死伤80余人。拳民在黄村获胜让朝廷大惊,仇洋派愈加鼓吹拳民有神术的妄言。

"黄村事件"促使慈禧太后派赵书翘和何乃滢亲赴涿州与义和团首领见面。"上谕"称赵、何两人的使命是劝拳民自行解散,撤出涿州,如不听命,则面临严重后果。[47]赵、何使命的真正目的是探听义和团的实力。赵、何在涿州与团首会面后,赵书翘对拳民的表现非常失望。他意识到这批人不过是贫苦农民,身体虚弱,面无人色。他在回京后报告说:"拳民既无纪律,望之皆有死色,不可恃也。"[48]然而,朝廷对"用拳抗洋"的可能性仍然感兴趣。

赵、何尚在去涿州的路上,他们听说杨慕时率队正在剿拳。赵书翘立即寄信给杨,要他住手,待他回京之后听候命令。何乃滢在涿州与拳首会谈后态度倒没有变,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声称杨福同在涞水被杀的原因是由于聂士成和杨福同的官军有意向拳民挑衅。何乃滢

在给他的朋友于式枚的一封私信中居然说杨福同的部队身着西式卡其布军服，对拳民是个极大的刺激。而杨却下令向拳民开枪，是为酿成血案之根源。翰林院侍讲高枬亲眼见过这封信。他在日记中指出何乃滢的说法如此荒谬，他的实际目的在为拳民辩护："润甫(注：何乃滢字)以洋装致误，意在轻轻巧巧消去'戕官'二字。"[49]

公使团很少有人看到洋兵入城与清廷政策重点转移之间的联系。只有赫德爵士在1900年5月27日对局势有过精辟的分析。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说："公使团正在讨论拳民问题，我们有可能看到外国人占领北京的局面。"他进一步指出："朝廷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剿灭拳匪，公使团必然要威胁动武；如果彻底剿拳，义和团这个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组织将开展反清的运动，如何是好？"

赫德觉得前途渺茫，只好对局势做些带哲理性的思考："历史才能准确记载一个事件的'之前'和'之后'的界限在哪里。然而我们的先知们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我们只能继续生活在永远的'之前'阶段，然后突然掉进'将来'的阶段，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赫德自觉力不从心："因为总理衙门不需任何外人的忠告。"[50]其实，赫德的这些观点对公使团也是毫无用处的，他的思路太复杂。他既想护馆卫队保证他的安全，又看到这个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因为他根本不能在公开场合谈他的看法，所以他只能向上帝祈祷时来运转的结局。总之，这位老资格的"中国通"开始有了强烈的失败感。

《泰晤士报》的莫理逊对事态的发展趋势没有多少感觉。他在1900年5月下旬四处奔忙，做些舍己救人的善举。他曾将美国使馆的一等秘书斯基尔斯的家眷和孩子的家庭教师史密斯小姐从英使馆在西山的度假别墅中解救并护送回城。他们在路上看到了丰台车站被焚的场面，莫理逊在日记中写道：

> 我们到达丰台时，大团黑烟已经升起，引擎机房正在被烧毁，四周的村民都来参加抢劫。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尽管我们应

该向一名对我们挥刀威胁的村民开枪。我没有杀死此人,一辈子都会后悔。[51]

1900年6月初,莫理逊在日记中写道:"窦纳乐爵士已非常地警觉。"窦纳乐曾告诉莫理逊:"不能再小看那些看似耸人听闻的报告。"但窦纳乐也告诉莫理逊关于伦敦方面对这里局势非常"淡漠"的态度。他还告诉莫理逊,他接连收到三封来自伦敦方面的电报,内容是:第一,"欧洲公会"的方法最为理想;第二,不要出头领导;第三,如果真正需要保护英国公民,不要在派遣部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52]其实,窦纳乐至少在第一点上歪曲了英国政府的意思。索尔兹伯里首相对公使团联合行动的所谓"欧洲公会"方式明确表示过不满。他给窦纳乐的电报中曾清楚地表明:"女王陛下政府对所谓'欧洲公会'在中国的出现感到不安。"[53]当然,伦敦由于对中国的实际局势并不知情,所以这些指示,正如莫理逊的传记作者珀尔指出的:"对窦纳乐这样一位不太聪明的公使,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是没有多大帮助的。"[54]

事实是,列强政府都不明白中国局势的症结所在。虽然各国政府都同意授权让在京公使可以决定调动军队,究竟为何目的则不甚了然。但由于欧洲传统的均势政策,各列强政府都在派兵问题上不愿落在他国之后,尽管当时本国公民在华并没有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没有一国政府想到派兵进京可能会让清廷感觉到这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开始,在华公使本来就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法国政府对毕盛已作出派兵的决定都不甚清楚,德卡赛外长还是从英国驻法大使芒逊那里听到这一消息的。他在惊讶之余,告诉芒逊他相信毕盛是"一个头脑冷静,明智的人,不大会惊慌失措"。但他又说,"毕盛没有要求派兵保卫法馆"。他承认曾授权给法使,让他"在认为紧急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是否派兵"。[55]很明显,对"紧急"情况的解释权在北京而不在巴黎。意大利政府不断收到萨瓦戈的电报,说中国政府不愿采取任何有效行动。[56]尽管此说不确,但是威斯孔第·维诺斯塔外

交大臣的原则是，只要其他列强采取行动，萨瓦戈的同类要求都可以得到批准。

彼得堡接到的报告是中国政府将要增兵进行大规模剿拳。莫拉维耶夫外交大臣以为"危险已经下降"，而且"中国军队的行动可以避免护馆卫队进京"。格尔思在北京继续向清廷施加压力，1900 年 6 月 5 日，他提交给庆亲王奕劻一封信，并要求"一字不变"上呈慈禧太后。该信称："欧洲各邦必当设以绝计，以救其民。此计不仅危及中国国家，而其后患极为可忧。"格尔思不敢明说"后患"是什么，他知道光绪复辟问题是朝廷的忌讳之语。庆亲王在呈送太后前逐字逐句地审查了这封信，"臣等检阅原件，尚无违碍字样"。[57]格尔思的再次努力收效甚微，因为此时清廷已确信卫队进京来者不善。况且格尔思不过是重复了他过去的说法，并无新意。此外，洋兵大队入城已是既成事实，格尔思并无让其撤兵的良策。

克林德公使自从被本国外交大臣就他关于瓜分中国的言论严厉训斥以后，情绪极其低落，他变得非常谨慎，没有大事就不向柏林写报告。在 1900 年 5 月 29 日的一份电报中，他小心翼翼地说明中国的局势已非常严峻，各国公使都有意派卫队入京，他应该照样办理。他还就事论事地提到了杨福同被杀事件，但没有做任何分析，[58]他在内心里仍对公使团采取的措施不满，德国政府在 6 月初才授权让他调动兵力。德皇威廉二世对政府在中国的小心谨慎的政策一直不满，他认为这个授权来得太晚。他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愤愤地签上"可以"，以示不高兴，因为他的批文一般都很长。

然而，德国政府突然决定在华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也是源于欧洲政治。柏林在此之前收到有关法、俄在华政策上有密谋的报告。1900 年 6 月 7 日，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尔德与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伯蒂有一次密谈，他发现伯蒂也同样对法、俄在华的企图担忧。一方面，有情报说法国在华海军司令曾建议由俄国海军上将担任多国联合部队的司令；另一方面，伯蒂还透露德卡赛外长在巴黎故意与英使芒逊兜圈子，说法国对中国事件并不感兴趣。哈茨菲尔德报告

说,法、俄之间可能已达成密约,在中国推行共同的政策而不会顾及他国的利益。[59]

哈莱非尔德不知晓的是,伯蒂此时正在考虑是否要改变英国对华政策,公开支持维新党人,并帮助光绪复辟。伯蒂认为对慈禧太后已不抱希望,当窦纳乐向清廷建议要面见太后,陈说利害关系时,伯蒂认为此举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英国应当改变传统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设法除掉慈禧太后。然而,索尔兹伯里首相坚决不同意这个主张。伯蒂的幻想说明,慈禧太后担心英国人领头干涉中国内政的设想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60]

五、剿拳的终结

不管怎么说,公使团对清廷的心态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在第一线的外交官对所在国政府的心态有判断错误,而本国政府对该国的事态又缺乏真正的了解,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所造成的政策错误必然是致命的。可以说,列强对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失控,惟一可以依赖的决策准绳是观察其他列强的动作。在华外交官的合作却更加紧密,自联合行动以来,公使团越来越相信中国政府的政策背后有大阴谋,可是公使之间的相互猜疑并未减少。调卫队入京后,没有一个公使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希望他人牵头,采取主动,然后可以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必须仿效他国。更重要的是,如果卫队进京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够,继续增兵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摆在桌面上。

法使毕盛第一个提出使馆还将被围攻的可能性,他的猜测是基于中国政府可能垮台。1900 年 5 月底,他收到的情报说,慈禧太后对拳乱非常惧怕,正在准备逃往西安。[61]显然,毕盛认为京城局势一旦失控,义和团有可能攻打使馆。这个情报与公使团认为慈禧太后大权在握,准备"用拳抗洋"的看法大相径庭。毕盛的这个设想并不妨碍他要求继续增兵的决心,他在 6 月 3 日给外长的电报中说,使馆

必须要有应变的实力。如果北京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中国政府保护外国公民的能力就成问题,所以法国要做好军事干涉的准备。[52]

公使团于是绞尽脑汁想找到增兵的借口。这样,长达5个月的外交僵局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因为这场心理战随时都有被军事化的可能。公使团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外战端一开,使馆卫队的人数太少。如果没有战事,则卫队人数又过多。不管怎么说,要逼迫中国彻底就范,这点兵力远远不够。公使团一旦开始从军事上考虑问题,军事逻辑就开始占主导地位。从军事上讲,任何人都不会反对继续增兵,于是有西摩远征军和大沽炮台的战斗。虽然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由调兵入京的决定引起的。

当然,此时列强在华的政策还没有走上彻底与中国决裂的不归路。然而,卫队既已进京,就有一个如何护馆的技术性问题。在窦纳乐的提议下,各卫队司令于1900年6月6日在英馆召开联席会议。参加者有日本武官柴五郎、奥匈帝国的托曼舰长、德国的左敦舰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马耶斯上尉、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哈里迪上尉以及法国的达尔西舰长等人。会议开得很不顺利,各国军官在护馆的方式上意见不一。窦纳乐指出,保卫使馆区无非有两个方法:一是各馆自卫;二是将所有卫队编成一军,协调防卫,统一指挥。他希望大家接受后一种办法,成立国际联军的指挥部。大多数军官却倾向于各馆自卫,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又召开一次会议,奥匈帝国的托曼舰长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各馆自卫为佳。托曼是军阶最高的军官,大家都表示同意,所以联合指挥部的建议被暂时搁置起来。

1900年6月6日,北京到天津的铁路完全中断。拳民在落垡车站大肆焚烧破坏,并与聂士成军交战长达两个小时,官兵死伤数十人,拳民弃尸百余具,北京同外界的交通开始中断。实际上,公使团与中国政府的沟通也已名存实亡。由于中外关系已开始军事化,清廷对公使团的信件、信息已无暇顾及。落垡车站被焚的当天,慈禧太后召见近支王公和枢臣。会上明显地分为两派,双方争吵激烈,多数

人主张"用拳抗洋"。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仇洋派近支王公联合刚毅、徐桐、崇绮、启秀等在会上强烈要求太后承认义和拳民是国家赤子,如给予衣食和军事训练,他们将成为抗洋的生力军,因此剿拳行动必须立即停止。大学士王文韶在会上不敢发一言,大学士荣禄在会上稍稍表示异议,即被仇洋派大肆攻讦。据荣禄的回忆说:"诸王、贝勒大声疾呼,主战者(注:此处指主剿者)亦怯,谓不可知。"[63]所以,此次会议完全被仇洋派占据主导地位。

仇洋派还要求朝廷下一明旨,宣布剿拳结束。然而,慈禧太后的决心仍然未下,她不愿公开支持义和团而导致中外决裂。她知道朝廷秘密支持义和团是可行的,但公开支持则风险太大。荣禄在会上虽然表现懦弱,他的立场对太后仍有影响力。所以,朝廷继续颁布措辞严厉的禁拳"上谕"。从 1900 年 6 月 6 日到 8 日,两个"上谕"要求官军全力围剿义和团,并在京城搜捕拳民。[64]在朝廷内部,大家都明白剿拳行动即将结束。

可是,在前线的指挥官并不知情。聂士成在黄村失利后,开始亲自指挥剿拳行动,官兵与拳民的冲突仍在不断地发生。聂士成率军赴丰台的路上,在廊坊遭义和团伏击。他立即回师落垡,发现大批拳民还在拆毁铁路,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开枪,拳民伤亡惨重。同时,另一支聂军在定兴突袭拳民,拳民仓促应战,死伤甚多。据目击者的记载,聂军在战斗中也杀死不少无辜的村民。[65]

在南方的督抚对北方的局势极为关切,他们大都把希望寄托在荣禄身上。张之洞给总理衙门发电,说依靠拳民抗洋是绝不可行的,他告诉总署大臣许景澄将此电转交荣禄。刘坤一的态度更加鲜明,他在给总署的电报中说拳民均为叛匪,对他们仅用"驱散"的办法是不够的。他特别强调中外决裂的危险性:"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面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痛剿一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66]

盛宣怀也向总署发电,他强调主剿为惟一良策。他还推崇曾国藩当年治湘的经验,说曾的名言是每日杀数十人,湘省自然安宁。现

在拳势已炽，再不采取剿灭行动，后患无穷。他还认为中国现在内有叛匪，外有维新党人，危机重重，财政上也日益枯竭。他最后指出，使馆卫队进京的最大后患是洋人可以借此为先例，继而增兵以保教堂、保铁路、保商务的名义占领中国。[67]

李鸿章在广东，对北方事态的严重性尚缺乏了解。但在 1900 年 6 月 9 日，突然收到老朋友赫德爵士的一封急电，谓大难当头，"闻有密谕，裕(禄)勿进剿"。赫德吁请李鸿章将此电转交总理衙门，并设法让清廷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与张之洞和刘坤一的鲜明态度相比，李鸿章就表现出比较圆滑。他受贬广东，本来就心存不满，但他又对北方的动乱有点幸灾乐祸，认为没有他在京城主持，事情便弄到这种地步，他于是又喜又惊。当然他感觉到赫德的绝望情绪和事态的严重性，他立即将赫德电报转给总署，并刻意对盛宣怀强调说："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68]其实，李鸿章是希望朝廷在此困难时刻召他进京。

但是李鸿章暂时无此机会。端郡王载漪和近支王公对慈禧太后犹豫不决的态度早已失去耐心，他们在朝中散布流言说天神下凡，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当然是指光绪帝，二虎是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泛指所有的洋人。[69]同时，满族王公决定利用他们的现有地位抵制剿拳"上谕"。他们意识到太后至今对义和团没有感性认识，所以应当设法将"义和神术"引进北京，让老佛爷开开眼界。宫廷禁卫军和九门提督府都有仇洋势力，所以很容易将大批拳民导人京师。

1900 年 6 月 6 日的宫廷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派刚毅出城"巡视"拳民情况，尽管慈禧太后此前已派赵书翘和何乃滢赴涿州与拳首见面。但刚毅的使命很可能给仇洋派安排拳民进京的计划提供了良机，刚毅在赴涿州的路上立即采取停止剿拳行动。他出城的第二天，就给武卫中军的孙万林写信，说他现在是钦差大臣，掌管一切与拳民有关的事务。朝廷的政策是劝导，不是剿杀。与赵书翘不同，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70]据一些中方资料说，刚毅行前曾接受端郡王的指

示,鼓励拳民进京。此说虽无直接根据,恐怕是有道理的。[23]这样,在公使团设法增兵的同时,朝廷仇洋派则用拳民入城的办法来与洋兵对抗。

由于外患已经大于内忧,朝廷决定最后终止剿拳行动,并准备将义和团抚而用之。这样,中外冲突就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

---

①Seymour: *My Naval Career and Travels*, p. 342.

②《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卷2,第114页。

③柴萼:《庚子记事》,见《义和团》,卷1,第306页。

④《义和团》,卷4,第336页。

⑤《义和团运动史实要录》,第114页。

⑥《清实录》,卷58,第14页。

⑦《义和团》,卷4,第336页。

⑧《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4、117页。

⑨《义和团》,卷4,第338页。

⑩《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6页。

⑪*Hart Diaries*, May 20, 1900.

⑫*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 E, vol. 24, p. 12.

⑬Krastyni Artkiv, vol. 14, p.12.

⑭*China No*. 3, p. 29.

⑮*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 13.

⑯格尔思的这次谈话记录是使馆被围后被联军发现的,见 Glatfelter: *Russia in China*, p. 70, note 81.

⑰D'Anthouard, *Les Boxeurs*, p. 23.

⑱*GP*, vol. 16, pp. 4—7.

⑲《日本外交文书》,卷33,别册1,第36页。

⑳FO 228/1338.

㉑M.E.A., Rome, Serie Cina P., 408.

㉒Steiger: *China and the Occident*, p. 145.

㉓D'Anthouard, 同上注⑰,第23—24页。

㉔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 p. 248.

㉕同上,第245页。
㉖Conger, Sarah: *Letters from China*, p. 90.
㉗《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6页。
㉘*China No. 3*, p. 30.
㉙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p. 111.
㉚清廷对列强调兵的动机早有所闻,中国驻俄公使杨儒早在1900年5月19日就报告说,俄外相认为调兵之举是"协以谋我"。见《杨儒庚子电稿》,第112页。
㉛《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6—107页。
㉜*Papers Related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 138.
㉝《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11页。
㉞《日本外交文书》,卷33,第108—110页。
㉟《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1,第593页。
㊱《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08—110页。
㊲《义和团》,卷1,第33页。
㊳《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12页。
㊴关于荣禄连上的七道奏折,见《荣禄存札·附录》。
㊵同上,第405页。
㊶朝廷当时认为洋兵入城比拳乱更加危险。见《荣禄存札》,第396页;《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21—122页、第129—130页。关于近期研究,见林华国:《义和团史实考》,第81页。
㊷Winterhalder: *Kämpfe in China*, p. 29.
㊸《义和团大辞典》,第255页。
㊹《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15—116页。
㊺《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卷2,第155页。
㊻《荣禄存札》,第2页。
㊼《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18页。
㊽李文海等:《清代人物传稿》,卷5,第67页。
㊾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45页。
㊿Fairbank, et al.: *The I. G. in Peking*, p. 1230.
51 Pearl, 同上注㉙,第110页。
52 同上注㉙,第111页。
53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p. 117.

⑭Pearl，同上注㉙，第111页。

⑮*China No. 3*, p. 32.

⑯*DDI*, vol. XXXI, p. 5.

⑰《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25—126页。

⑱Bundesarchive-Militärarchive, Freiburg, RM5/5605.

⑲*G. P.*, vol. 17, p. 8.

⑳FO 17/1439.

㉑*China No. 3*, p. 32.

㉒*Livre jaune*, 1899—1900, Chine, p. 30.

㉓《荣禄存札》，第405页。

㉔《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18、126页。

㉕《义和团》，卷1，第445页。

㉖《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21页。

㉗同上，第117—118页。

㉘《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926页。

㉙路遥等：《义和团运动》，第368页。

㉚《义和团》，卷4，第348页。

㉛《义和团》，卷1，第12页。李希圣以为赵书翘、何乃滢两人的使命也有导致义和团进京的结果，这是不正确的。

第十章 走向战争

一、清廷与义和团的有限合作

拳民自1900年4月开始，就有一小部人陆续进京。他们进城后，没有参与暴力行动，组织结构也十分涣散。公使团作出调兵入京的决定时，拳民对外国人没有造成生命威胁。事实上，拳民并没有将“灭洋”口号付诸实施。从1899年底卜克斯事件以后直到1900年6月份，没有再发生外国人被杀事件。拳民的活动随着中外关系的紧张而日益活跃，护馆卫队进京之后，暴力事件才开始大规模发生。大学士刚毅巡视涿州之后，拳民进城人数明显增多。

1900年6月初，朝廷重臣与拳首正式接触时，有可能暗中鼓励拳民进入京城。刚毅在涿州等地一连待了10天，但是慈禧太后对近支王公引拳入城的计划是否知晓尚不得而知。

端郡王载漪身负京师地区、特别是禁宫防务的重任，他与董福祥的甘军合作甚欢。董军本来驻扎在京郊的南苑，使馆卫队进京后，奉调入城以与之对峙。董福祥从不讳言他的任务是灭洋，荣禄对此很是担心。

荣禄现在意识到,他的60天"病假"给仇洋派掌权提供了大好机会。更糟糕的是,载漪、董福祥等人滥用权力,无人制约,因为慈禧太后已经移居颐和园度夏,所以朝政就把持在近支王公手中。荣禄巡视铁路沿线后,觉得事态严重,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径往颐和园,声泪俱下地恳请太后起驾回宫主持朝政。太后被他的言辞打动,决定销假回宫。6月9日,太后重返紫禁城。[①]

但此时拳民已大量涌入城内,他们的入城是公开的,官军没有阻拦。从载漪等人的角度来看,拳民入城与董军汇成一气,实际上等于是向洋人护馆卫队的一次反示威,从此剿拳行动才算终结。据目击者言,大批拳民进城是从慈禧太后回銮的两天前,也就是6月7日开始的。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耀武扬威地从各城门进京。[②]董福祥的甘军和端郡王的虎神营都没有进行干涉,九门提督府在端郡王载漪的弟弟载澜的控制之下,据说他甚至向拳民发放了特别通行证,完全推翻了前几个禁拳的"上谕"。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6日的日记中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③]

大批义和团入京后,京城地面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活动。义和团似乎已被官方认可,所以更加活跃起来。老百姓也认为义和团已经合法化,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公开张贴告示、揭帖,并满街巡游,官方毫不干涉。义和团的大难将至的信息通过揭帖、口传、歌咏传遍大街小巷。居民受到警告不要加入教会,因为所有的教堂将被焚烧殆尽。义和团还说洋人和教民无一能够逃脱被杀的命运,因为天兵天将要下凡收拾他们,城内百姓被这些妄言弄得既激动又紧张。

大多数居民从来未看到穿着特殊服装的义和团,一时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在谈论义和团,从酒店、茶肆到商会学堂,甚至翰林院,义和团成了热门话题。京城地面既有洋人卫队和董福祥的正规军,又有大批义和团,百姓的生活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感觉到有不祥之兆,但无人知晓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街上形势开始紧张,居民提心吊胆,有人大喝一声也会造成某种混乱。目击

者记载，有人当街大喊一声“来了！”店铺老板便以为洋人或劫匪将至，纷纷关门谢客。某日午后，一个调皮少年大喊一声“泼水！”几条街的居民不知为何，纷纷向大街上泼水。义和团公开声称煤油是洋货不可用，于是不少人家将煤油泼洒在大街上，到处一片煤油味。义和团还要求家家户户每日按拳会仪式做礼拜，以为能消灾，于是不少人家每日起床必面向东南念咒磕头。义和团公开威胁要焚烧洋人的房屋时，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京城的铁匠铺生意红火，日夜打造刀剑。一位御史向朝廷报告说大刀长矛的价格成倍的增长，还是供不应求。京城四周的县乡也有大量的非法武器偷运进城，他警告说如果百姓能够自由地制造和拥有武器，政治后果就不堪设想。他还报告说，他听到谣言说拳民正在计划烧毁使馆区，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外大规模武装冲突就不可避免。他建议采取严厉手段查禁武器并盘问可疑的不法之徒，[4]但端郡王和仇洋派对这个建议根本不予考虑。

1900年6月初，天津的局势也大变。直隶总督裕禄对拳会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意识到朝廷已放弃剿拳，而对拳民采取安抚政策。他对义和团也开始采取宽容的姿态，成千上万的拳民涌入天津城设坛习拳。第一个合法拳坛是在6月8日由津郊地主杨寿臣所建，地方官不知内情，仍要求派官兵驱散杨寿臣和他的信徒，但裕禄不予批准。两天之后，各式拳坛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都是。天津居民比北京居民还要对安全担心，因为大沽口外洋舰云集。天津人特别痛恨日本人，不少反洋揭帖都是针被对日人购买去的《国闻报》。6月初，一份告示贴在报馆门口，云：“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谣谤诋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笔下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去不留情。”[5]不久，又有一份揭帖上有这样的诗作：“国闻报馆言语狂，戊戌年中归东洋。此后何人匪各论，天谴难容灰烬亡。”[6]

与裕禄不同的是，聂士成将军的政治敏感度不高。他是职业军人，以征战为己任，而且他在第一线，对义和团有直观的认识。他手

下有不少官兵在剿拳中伤亡，所以他坚持痛剿，以报仇雪恨。在京津一带连续剿拳的过程中，他下手残酷，从不姑息。聂士成没有收到朝廷停止剿拳的命令，因为荣禄对他并不信任，所以不会告诉他朝廷政策的变动情况。黄村事件之后，聂军开始在铁路沿线一带行动，数百名拳民死于他的枪口下，官兵与百姓的关系日趋紧张。

聂士成并不知道，朝廷仇洋派当时正在设法算计他。涿州的拳首已明告赵书翘和刚毅，义和团绝不同"鬼子聂"合作，聂士成不去，破坏铁路不止。朝廷内部激烈辩论是否应向聂士成发一训斥电，不少御史向朝廷报告聂军的表现令人堪忧，应当撤聂的职。其中一份上奏说，聂军滥杀无辜，大肆抢劫平民百姓。他说直隶地区流传一个民谣："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7]梅东益和范天贵都是聂军剿拳的悍将。1900年6月5日，聂士成突然收到荣禄发来的一份非常奇怪的电报：

> 贵军服色稍似洋队，未免乡愚误认为洋兵。而拳民究属中国赤子，总宜开诚晓谕，竭力劝散为要。[8]

聂士成这时才感觉到这是朝廷对他的表现不满的第一个信号。

同时朝廷下令将聂军调往芦台，这个调防对外国人来说是准备与洋兵开战的第一步。芦台地处大沽口附近，是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此外，芦台有庞大的武器弹药库，凭借此地可以开展大规模的防御作战。朝廷的这一决定表明中方已彻底停止剿拳，而把军事重心转移到抵抗列强入侵的准备上来了。聂士成对6月3日朝廷警告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的"廷寄"一无所知。[9]看来荣禄是有意把这个消息封锁起来，让聂士成继续剿拳。

荣禄在1900年6月6日再发急电给聂士成，让他率军开赴天津地区，命令他"按段迎护铁路，保护洋人，万毋稍迟，以免各国借口于助剿，是为至要。"荣禄接着再一次警告聂军应穿号衣，换下洋服，以消弭官民之间的误会和矛盾。[10]实际上，荣禄作为武卫军总统，他的

这种行为是极不老实的，因为他既希望不知情的聂士成继续剿拳，又要让聂负主要责任，必要时他可以撒手不管。而聂士成却错误地以为朝廷仍然一意主剿，所以大举开始行动。6月7日，聂军在杨村与拳民激战，大获全胜。他立即向荣禄发电，称打死百余名破坏铁路的拳民，如果再加上一把劲，可将这一地区的义和团一举打垮。他请求批准他乘胜追击："若乘机痛惩，大局可定。"他同时承认得不到百姓的支持："现因落垡村民从乱，柴草均无从购买。"[11]荣禄接此电后未作答复。

二、列强海军将领与公使的关系

在北京的外国人生活如常，没有受到多少干扰，但是公使团已越来越从军事逻辑上思考问题。大批拳民进城后，使馆卫兵的人数显得更加不够。在使馆区附近也出现大批的义和团揭帖，呼吁灭洋人，杀教民，毁教堂。于是，派遣远征军进京的想法在公使团中开始形成。应当指出的是，组织远征军的想法最初是在1900年6月3日，也就是大批拳民于6月7日开始进城之前就已经由法使毕盛提出。毕盛首次提出使馆被围攻的危险，窦纳乐基本同意毕盛的观点，并于6月4日向索尔兹伯里首相报告说："北京的形势严峻，一旦铁路电报中断，我们随时都有被围攻的可能。"他请求首相批准从大沽口调远征军解北京之围。但是英国驻法大使芒逊却报告说："德卡赛外长告诉他说毕盛报告表明护馆卫队进京后，形势已经好转。"索尔兹伯里首相大惑不解。[12]法国驻美大使甘朋报告德卡赛说，国务卿海约翰对在华北采取联合海军军事行动的想法没有兴趣。他告诉甘朋说康格公使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建议，所以美国不会参与这种军事行动。[13]

窦纳乐在1900年6月4日以后又有了向首相施压的新理由。当时两名英国传教士在距北京40英里的永清受到攻击，罗宾逊牧师被杀，诺曼牧师下落不明。窦纳乐报告首相说他曾去总理衙门抗议，但中方大臣"既没有表示惋惜，也对失踪的牧师漠不关心。整个会见

的场面非常冷漠，我认为与总理衙门会谈已无任何用处。"[14]第二天，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英国单方面增兵以保护教士、教堂，驻天津领事贾礼士立即采取行动。贾礼士"处于既紧张，又激动"的心态，[15]他试图用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高压方法达到增兵的目的。他前往总督府，告诉裕禄"七十五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明天上午十点钟启程"，如中国方面不允，他们也要出发。这一次，裕禄坚决予以拒绝，说这种做法，他国必然效尤。[16]裕禄称有一段铁路被毁，即使要启程，也须稍缓几天，贾礼士十分横蛮，根本不予理睬。但北京公使团得知此事后，对窦纳乐单独行动颇有微词，在毕盛的竭力劝阻下，此事方才作罢。

与此同时，天津地区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大批拳民涌入天津城后，也有大批的洋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津避难。他们当中既有铁路工程师和商人，也有大批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他们在逃难中数次受到拳民的攻击。1900 年 6 月 2 日，在天津附近发生了第一次洋兵与义和团的武装冲突。保定附近的一些外国人处境危险，请求公使团帮助。俄使格尔思批准一队哥萨克骑兵前往救援，途中遭遇义和团袭击，一名军官被杀，另一名被割了鼻子，救援行动不得不半途而废。这个事件对公使团震动不小，格尔思虽然批准了这一行动，但不想让这一行动被看作是军事远征。据窦纳乐说，格尔思刻意向他解释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完全从人道角度考虑。他请求公使团不要把它看成是向中国派遣远征军的先例。"窦纳乐向首相报告说，此次援救失利对外国人来说是不祥之兆。他说："欧洲军人在拳民面前不得不退却这个事实将引起极坏的影响，因为它将使中国百姓更加相信义和团的所谓神力。"[17]克林德公使向柏林当局报告中也同意窦纳乐的这种观点。但他披露了这个事件的细节，他讥讽哥萨克骑兵太过轻敌："他们一天劳累之后，狂饮伏特加，然后在一个农民家中呼呼大睡，连岗哨都没有设。"所以，哥萨克骑兵被袭击是不奇怪的。[18]

然而，在华的外国人面临的危机并没有使列强政府调整他们之

间的争斗关系。德卡赛对中国事务漠不关心这种态度颇让英国和德国起疑心，当然毕盛公使的观点与德卡赛外长并不一致。1900年6月5日，毕盛报告说公使会议一致决定从大沽调兵，准备军事远征，他故意强调俄国公使也没有异议。法国政府对毕盛前不久还报告说中国形势有好转，现在又突然要组织远征军则大惑不解。既然公使团已同意，德卡赛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应该说，俄国政府的立场对德卡赛影响很大，因为毕盛在6月6日又报告说，格尔思向他透露了一旦铁路电报中断、俄国将派大批部队进入华北的消息。彼得堡这时已意识到列强军事干涉在所难免，在格尔思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提议下，莫拉维耶夫外交大臣在6月7日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说，目前只有俄国有能力向华北派遣大批地面部队，既然列强军事干涉已很难避免，俄国应先下手为强，争取在华北拥有军事优势。他建议从旅顺口急调大批军队，这个行动也可向国内外宣示俄国拥有旅顺口军港的巨大价值。沙皇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并责成战争部长克鲁巴特金和总参谋长萨哈洛夫付诸实施。[19]因此，俄国在6月初决定放弃自我孤立的谨慎行事的对华政策。但是，这一决定与拳乱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从欧洲政治的角度考虑的。

同样，英国对俄国在对华军事干涉中占居主导地位是不可能接受的。早在1900年5月底，英国驻华武官布朗中校就向英国政府提出报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认为如果俄国向华北派遣大批部队，"英国也应立即登陆同样数量的军队，不是为了同俄国合作，而是为了在中国重建秩序，英军绝不能听命于俄方的指挥。"索尔兹伯里首相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立即电示窦纳乐，表明他对俄国组织远征军的极度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西摩海军上将应抢先占领北京城的一部分。[20]

日本方面对俄国的动作更是惶惶不安。外相青木周藏曾告诉英国驻日公使怀特海德说"相信俄国人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远征。他说有情报显示，俄国人最近从澳大利亚购买了数量巨大的咸牛肉和其他食品。"青木周藏又称中国政府同情义和团运动，所以他认为

中外武装冲突在所难免。怀特海德还特别注意到青木周藏用德语表达"中国全民族"的说法,原来青木周藏早年在德国和法国留过学。他接着向英方正式提议由日本在华北登陆大批部队,并说这个行动很快就能组织好。英国政府接到这个谈话记录,十分欣慰。因为英国在远东缺乏兵力,如果要组织大规模英军登陆,不得不使用在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的殖民军。[21]此外,英国的天然盟友美国不愿意加入联军远征行动,美国政府多次宣称其政策旨在"门户开放",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耿耿于怀。

在大沽口外,八国舰队的司令官都在各自的旗舰上做准备工作,但他们在如何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上争吵不休。1900年6月5日,在英国的"百人队长号"兵舰上召开了司令官联席会议。会上彼此意见相左,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最后勉强就远征军的性质达成如下协议:

(1) 保卫使馆;
(2) 八国政府不是同中国政府开战;
(3) 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采取军事行动;
(4) 行动必须是协调一致的。[22]

在远征行动的具体安排上,八国司令官又很难达成一致。此外,他们还没有接到公使批准远征行动的命令。

在天津的领事团在促成远征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英国领事贾礼士最积极,他认为拖延行动,后患无穷。他直接给首相发电说:"我们的消极等待的方针在每个小时都增加危险,我强烈敦促政府允许护馆卫队采取积极的进攻姿态。"[23]从1900年年初开始,贾礼士和法国总领事杜士兰就对义和团痛恨不已,他们有意对裕禄和聂士成采取的剿拳行动视而不见。贾礼士在6月初向窦纳乐报告说:"我坚信中方在镇压拳会中什么也没做。"杜士兰也一直把中方的表现概括成"无所作为"。[24]当然,贾礼士和杜士兰对裕禄本人的印象都很好,因

为裕禄生性怕事，好对付。

此时，在京的公使团仍希望在外交解决上做最后一次努力。1900年6月6日，清廷颁布"上谕"，既强调民、教失和的根源在于教士干预诉讼，地方官不能公平办理，也向公使团伸出了橄榄枝，说绝大多数教民也是国家赤子，朝廷不允许对他们持歧视态度。更重要的是，该谕还严斥拳民毁铁路，烧教堂，抢劫私人财产的行为。[24]窦纳乐向首相报告说："尽管关于民、教失和的原因，该上谕说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现在教民四处被杀之际，用这样的语言作为开头一段，如何能平息动乱。"[25]

在窦纳乐的推动下，公使团会议决定要求面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因为他们觉得太后和皇上或许对形势的严重性尚未察觉，而被仇洋派所误导。公使团将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列强动武的可能性。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伯蒂看到窦纳乐的电报后，对这个做法的有效性深表怀疑。他认为在华军事干涉的威胁可以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保证铁路畅通，但不可能迫使慈禧太后接见公使。他一直相信太后不除，时局不可能稳定。[27]英国首相不同意伯蒂的分析，他于1900年6月7日突然电告窦纳乐："时局艰难，政府向你授全权，在你认为必要的时刻采取任何行动。"索尔兹伯里首相实际上对北京的外交僵局产生的原因一无所知，他突然改变态度积极支持窦纳乐的行动，根本原因是由于俄国正在准备组织远征军。他明确指示窦纳乐："现在各种各样的危险都可能存在，但最危险的是俄国人得以占领整个或部分北京城。他们一旦成功，就很难迫使他们撤出。"首相还认为其他各国的动作已成为次等重要的问题。[28]这样，由于欧洲大国的政治逻辑，而不是中国的实情，对英国改变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伯蒂判断慈禧太后不肯接见是有道理的。清廷立即拒绝了公使团的请求，表面上的原因说是不合惯例，因为公使并没有大使的外交地位。实际上，清廷知道公使团无非要在太后面前威胁动武，这样的接见毫无益处。再者，中国皇帝接见公使往往是一个礼节性的仪式，不谈实质问题。此外，清廷已在1900年6月6日决定停止剿拳，即

使慈禧太后出面，她的决定也很难改变。

公使团非常失望。1900年6月9日，义和团焚烧了英国公使馆的赛马场。在那里，一批英馆的中文实习生也遭到攻击。窦纳乐怒火中烧，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极大侮辱。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义和团又在西山烧毁了英馆的度假别墅，窦纳乐再也不能忍受。这幢建筑是他最钟爱的度假点，此外，据他说他曾向总理衙门三次提出请求保护该别墅，并建议让义和团在附近的一座庙里习拳。于是，义和团对英国绅士最喜爱的两项活动：赛马和度假的打击比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窦纳乐的影响还要大。史学家弗莱明对窦纳乐迟迟不采取军事远征行动批评有加，他半开玩笑地写道："公使们最终觉醒过来，开始采取行动。其原因不过是英国文化象征，赛马场被焚。"[29]其实，窦纳乐一直在推动军事远征行动，其他公使也很积极，只不过一时还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批准。

赛马场被焚的当天，窦纳乐与总理衙门章京联芳进行了一次会谈。他直截了当地对联芳说，据他的消息来源，慈禧太后已经下决心要驱赶洋人，而且由董福祥将军执行。据窦纳乐的说法，联芳一言不发，似已默认。[30]窦纳乐立即回馆，向天津发了三封加急电报。其中一封说："形势极端险恶，如果不立即向北京进军，但恐太迟。"[31]

西摩海军上将的旗舰舰长杰里科6月9日正在塘沽。他在日记中说："我看到窦纳乐公使刚刚发来的一份电报，说如果不立即解北京之围，恐将太迟。……我立即请'爱尔吉兰'舰向旗舰打灯光信号，'重大消息！准备登陆！'（后一句是我加的）"[32]

西摩海军上将接到此电，立即开始行动。

三、远征计划的制定

很明显，英国人是远征军行动的始作俑者。由于伦敦方面对中国时局的不断变幻无从把握，首相只能放权让窦纳乐相机行事。但是，英国政府支持远征的目的是对抗俄国，而窦纳乐公使则出于要通

迫中国政府就范的企图。法国在华外交官对英国人占据主导地位很不以为然，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巴佐尔伯爵在1900年6月10日报告德卡赛外长，说华北局势的混乱都是英美造成的。他认为此次动乱的根源是英美新教传教士过于积极地发起维新运动，而1898年维新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同时，英美报纸都一致持反对慈禧太后的立场，所以满族王公乘机制造叛乱。巴佐尔报告说，盛宣怀曾私下里告诉他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是"醉汉"政策。盛宣怀还透露他在总理衙门的一位朋友，可能是袁昶，告诉他军机处大学士徐桐是义和团的狂热支持者，据说徐桐声称义和团都是国家赤子，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围剿。[33]

法国驻英大使保罗·甘朋身在伦敦，却对中国事务有独到的分析。他报告说，近来索尔兹伯里首相一天比一天对中国事务感兴趣。他居然兴致勃勃地对甘朋说："现在我们手头上有一场战争，不过这次英法是盟友。"甘朋不同意英首相的看法，他说：

>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运动(注：义和团)是纯粹中国化的——实际上是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太后是鞑靼人，她已不能控制局面，所以公使团怎样施加压力也无济于事。

甘朋报告说，英首相对此说不肯苟同。[34]甘朋的分析虽然不甚准确，但他抓住了问题的一个实质，即慈禧太后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存制定政策。公使团似乎一直有推翻她的意向，维新派仍在推动民族主义运动，而南方督抚大多数是汉人，他们也对太后的种种决策颇有微词。应该说，清朝廷比公使团更有四面受攻的感觉。相比之下，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己任，反而成为一支惟一可利用的民间势力。

法国政府总的来说不希望在华的远征行动付诸实施，但如果这次行动以俄国人为主导就比较理想。俄国虽然在旅顺口集结了四千兵力，但行动迟缓，到达大沽尚需时日。法国在远东兵力很少，所以

希望拖延一段时间，不让大沽口外现存的各国海军组织远征行动，因为现存的兵力中以英国人居多。但是，法国的态度恰恰是促使英国加快步伐开始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1900年6月8日在大沽口外，召开领事和司令官的联席会议。法、俄代表都明显倾向推迟行动，并称如无一万兵力，他们将不参加。此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多少部队登陆，谁将担任联军司令等，八国代表都争论不休，远未达成一致意见。法、俄合作的迹象十分明显，因为法军司令在会上直接推荐俄军上校沃加克担任联军司令。沃加克是俄军远东司令部的中国和日本事务专员，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人，除了日语不大好以外，他懂得所有参加会议国家的语言，他在会上到处担任口译，人缘极佳。法国代表认为，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指挥多国联合部队。其他代表则不肯接受这个提议，对法、俄的阴谋十分警惕。

八国司令官当中，资历和军阶最高的是英国的西摩海军上将，所以英国倾向于在司令官人选上论资排辈。西摩在会议当天电告海军部："一旦我们开始远征，司令官人选最好由我担任，俄军上校为参谋长。"首相当然乐观其成。[35]但是在会上，其他代表并不接受英国的建议，所以司令人选一事陷入僵局。

日本政府基本上支持英国的立即行动的建议。西德二郎公使已连发数电，请求本国政府速调兵力以防范俄国。[36]然而，只要指挥系统没有确定，远征军不可能开始行动。在各方坚持不下的困境中，美国人出面打破了僵局。美国海军上将坎卜夫1900年5月30日才到达天津。行前美国远东司令官莱梅海军上将指示他要避免"卷入对他国政府利益有利的麻烦之中"。[37]但是华盛顿海军部不久就推翻了这一指示，因为康格公使已来电要求对华增兵。在6月6日的司令官联席会议上，坎卜夫同意加入对华北的远征行动，但他刻意避免卷入英、俄关于司令官人选之争。

不久，康格又收到国务院电报，说："美国的利益只在保护自己的公民，不得参加任何同盟。"[38]康格进退两难，对驻天津的美方人员不

再做新的指示。坎卜夫并不知晓国务院的电报,在没有接到进一步指示的情况下,他只得返回菲律宾,只留下海军舰长马卡拉和112名水兵在大沽待命。马卡拉在会上对司令官人选出现的僵局大为不满,他宣布此事如不能解决,他将率兵自行进京。美国人要单独行动的态度迫使其他代表迅速达成妥协,看来只有论资排辈的做法比较合理,西摩海军上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二千多人的八国远征军司令。会上还一致同意,要求裕禄提供方便。[39]英国领事贾礼士会后报告说,"会议证实法俄之间有密约,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左。"[40]

俄国当时对联军行动由英人主导十分不满,莫拉维耶夫外交大臣已经要求四千俄军从旅顺港出发,"以避免日本和欧洲的军队以保护公民为名进行干涉"。但既然八国远征军已经组建,俄国别无选择,只得随之行动。旅顺口俄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联军中要有足够的俄军数量才能抵消他国的军事优势。[41]更重要的是,格尔思和毕盛终于能够联手合作了。格尔思对总理衙门对他的信件持冷淡态度仍然耿耿于怀。1900年6月初,满洲和华北的反俄运动也日益高涨,不少俄国东正教教堂被焚,华北的俄国商人也报告说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格尔思于6月9日报告外交部:"我的看法是,公使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海军将领必须控制局势,所以只有大批军队到达北京才能拯救外国臣民。"[42]

德国人不愿卷入英俄竞争。他们在1900年6月8日的大沽会议上不明确表态,但内心里却支持法俄立场,而对英人主导远征军心怀不满。在柏林,德皇威廉二世听到俄国将派遣大批部队登陆感到高兴。德国驻俄使馆临时代办切尔斯基6月9日报告说,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认为现时组建国际联军的时机尚不成熟,俄国将在两日内运兵到华北。德皇在谈话记录上批道:"好极了,这样就能解决问题。"[43]然而,柏林外交部仍然保持谨慎态度。克林德公使在5月下旬犯的错误迫使德国尽量采取温和的政策,所以克林德一直没有收到外交部的明确指示,而给德国在华海军司令的指示也只是要求他尽量随大流。

四、中方的战争准备

列强要在和平时期组织远征军的消息让裕禄大惊失色。他在1900年6月9日给朝廷的电报中说："刻下各领事等蛮横情形，已属不受商量，不服稽查；观其举止，恐有进兵剿匪之势。其时敝处必不能阻止。"[44]清廷当然明白形势的严重性，护馆卫队进京已有先例，而且只是暂时现象。这一次的远征军不同，来了以后就不太可能仅仅采取守势，而不采取攻势。八国远征军将要出发，清廷乱成一团，不知如何回应是好。

清廷对西摩远征军的直接反应，就是将总理衙门的大臣撤换人马。1900年6月10日，西摩海军上将率近千名联军的先头部队从天津出发，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包括不很情愿的法、俄部队。同一天，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端郡王载漪被任命为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庆亲王奕劻虽然没有被赶出总理衙门，但已失去实权。端郡王将率三名新人一同进入总署，其中有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和礼部侍郎那桐，清廷仇洋派似乎已大获全胜。这四位新任大臣对外交事务都不懂，于是很明显，这次的任命是有意助长仇洋派的势力。启秀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他在慈禧太后面前居然宣称自己从小练过拳术，本身就是义和团。[45]对外国人来说，清廷这一举动无异于中外关系的决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公使团一直相信清廷在秘密支持义和团，端郡王等人的任命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公使们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是，慈禧太后在颁布此项任命过程中仍在犹豫，并没有下决心与列强决裂。其实，慈禧太后这一招是很聪明的。端郡王不但不懂外交，而且厌恶外交，但他又想影响外交政策。他的立场一贯是鲜明的，要把洋人驱逐出境。所以太后借此项任命向西摩远征军进行反示威，同时又把端郡王推到前台，让他担当主要责任。此外，作为领班大臣的端郡王载漪实权仍然有限。所以，这道"上谕"使用的语言是非常有意思的，内称："现在时事艰难，该王

大臣等务当实心任事,以付委任。"然后还特别加上一句:"不准固辞。"[46]这是典型的太后语言。她的意思是说,既然载漪一心要掌夷务,他就得亲自出马,责任自负。

公使团无人看出这项任命的微妙之处,他们对载漪的个人情况也知之甚少,公使团中无人见过载漪。毕盛向德卡赛外长报告此事时称他为"光绪皇帝的叔叔",连辈分都没搞清楚。端郡王载漪是光绪帝载湉的叔伯兄弟。[47]

然而,外国人中,只有赫德爵士却对这件事看得一清二楚。他在载漪人主总署以后写信给窦纳乐说:

> 过去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一些极端的仇洋派在进入总理衙门之后,由于责任重大,在对外交更加熟悉之后,反而变得友善起来。所以我认为端王入总署未必是件坏事。[48]

赫德的这个出名的观点在1900年后大受嘲讽,但他在使馆解围之后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不肯收回。在1901年出版的《北京被围记》一书中,赫德坚持说:"绝大多数在北京的外国人都因为端王的仇洋立场而对他的任命不满,但我认为这是太后的一步佳棋。"他接着说:

> 太后很可能在对端王说:"你和你的同党坚持走一条路,庆亲王和他的同党坚持走另一条路。我夹在中间能怎么办?但是,你是下一个皇帝的父亲,需要考虑你儿子的利益。你同时是义和团的领袖之一,而且是北京禁卫军的统领,你应该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我才将你任命为总理衙门领班大臣。你在相机行事时必须把你儿子能够顺利承继大统这件事放在心上,务必要让大清的江山不受损害。你有大权,你也有责任,而最关键的是你自己的利益!"[49]

赫德的这些言论被那些经历了围攻使馆事件的外国人和后来的

评论家们大加鞭挞，认为他竟然在大难临头之际还是如此糊涂。弗莱明等人的著作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年老昏庸、受中国文化毒害太深的人。实际上，赫德完全抓住了慈禧太后的心态，而且在中外开战之际又是最早承认他是过于乐观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载漪的任命这件事判断有误，而是因为此后一连串事件的发展让他始料不及。他的分析在逻辑上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看出慈禧太后仍在中外决裂的问题上游移不定。

因此，载漪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中外战端不可避免，慈禧太后仍然心中有数。然而，西摩远征军在行动中所带来的问题却是引发战争的重要环节。在载漪进入总署的当天，清廷切断了北京同外界的电报通讯，形势高度紧张。清廷此举的目的多年来在西方只有一种说法，即将在京的洋人与外界隔绝开来，以便展开大屠杀的既定计划。其实此说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清廷切断北京与天津方面的电报通讯是从军事上考虑的。西摩联军已经出发，北京很快将面对兵临城下的危险，让公使团与西摩保持通讯联络，引导联军行动是不可能的。公使团一致认为清廷自己仍保留电报联络的渠道，这个说法也不准确。1900 年 6 月 10 日以后，清廷对外联络是靠旧式方法，用三百里至八百里日速的快马传递信息。当然，外国人连这个方法也不能使用。

当然，载漪的任命意味着公使团与总理衙门之间正常交涉的终结。载漪上任伊始，就异想天开地要改变外交惯例。他要求取消正式照会制度，而采取向洋人发布诏书、敕令的办法。据当时的一位官员日记所载，载漪打算向公使团下令，从今往后，不准洋人在华传教。[53]载漪想回到 1840 年以前的中国，这种态度反映出他的无知和不现实，因为无人愿意执行这样的命令。

电报铁路中断的同时，更有大批的拳民涌入北京，在京的外国人真正开始感到四面受围攻。目击者记载，1900 年 6 月 11 日又有拳民进城。他们大多是青少年，20 至 50 人一伙，多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官兵无人上前阻挡，这

就给好事者创造了一个制造谣言的机会，说这些人穿墙而入，神力无边，并无需走城门。[51]

京城地面谣言满天飞，拳民开始用种种渠道传播信息和乱语。他们利用街头叫卖的小贩穿街走巷，比如卖火烧饼的沿街高喊"大火烧！"暗示烧洋人房屋的行动即将开始。卖炒豆的则大喊"卖铁豆"，暗指喂洋人的子弹。[52]不少王公贵族开始请拳民到府中习拳，有的拳民还被请去做保镖，紫禁城内据说也有拳民表演武功的活动。慈禧太后最关注的是西摩联军的动向，她曾电令裕禄要全力禁阻洋兵进京。裕禄根本不敢执行，他不过表示不愿为洋兵提供交通方便。当德军和法军强行抢夺车皮和修理铁路的物资时，裕禄吓得束手无策。他报告总署对洋兵强行登车无能为力，他已告诉各车站，照准放行，以免冲突。[53]

慈禧太后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拳民在京师已越来越难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欲迫她就范。权衡之下，还是阻挡洋兵更为重要。她一面备战，一面又不愿与列强彻底决裂，因为她对洋人进兵的目的深有疑虑，但不能确定。因此，她的政策才显得犹豫不决。清廷没有向武卫军发指示要用实力阻挡洋兵，造成前线军队不知所从。同时，清廷的上谕又互相矛盾，一会要军队进京剿拳，一会又要武卫军从各地集中去保卫天津和大沽。

在华北的中国军力还是可观的：武卫军共有 10 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 16 营 10000 人马，董福祥后军 11000 人马，共 25 营驻扎北京。荣禄实际上直接听命于慈禧太后和端郡王载漪。宋庆左军 12000 人在山海关一带防范俄军，袁世凯右军 7000 多人在山东，共 7 营。直隶地区主要是聂士成前军，20 营，16000 人，指挥部设在芦台。京师有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 1 万人。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由庄亲王和载澜统领。

可以说，自 1895 年中日战争以来，这是中国正规军实力最强的阶段，但是武卫军兵力分散，不易组织大规模的防御作战。所以慈禧

太后决定厚集兵力，将武卫军宋庆部和袁世凯部调往京津一带。朝廷颁布的“上谕”中称调兵的目的是剿拳，但政府内部明白其主要目的是阻挡洋军。

这样，在兵力分散尚未集中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对西摩联军束手无策。聂士成军恰好在联军进京路线上，但聂没有收到任何指示，他连联军进京的消息都不知道。1900年6月10日，聂发急电给裕禄：

> 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车直赴北京。正欲诘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饬办理等语。伏思外人纷来，海防吃紧，敝军久驻杨村毫无稗益，当饬营队回芦，以备不虞。[54]

聂士成心里很不高兴，但他不知道裕禄实际上在惊恐之下，违令放洋人通行。裕禄在最后关头用铁路线路已受到破坏为由，劝西摩暂缓出发，但联军坚持自带修理工具和材料，执意成行。在军事上，聂士成意识到他已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他向裕禄发急电，称：“本军逼处洋兵拳匪之间，尤犯兵家之忌。”他说他既然不能按原命令分段保护铁路，还不如撤军回芦台，但裕禄又不肯回电。[55]

1900年6月11日，清廷改变不与洋人交涉的态度，开始向公使团示好，请公使们阻止西摩联军进城。两位与外国人友善的总署大臣——许景澄和袁昶求见窦纳乐。他们恳请窦纳乐重新考虑西摩联军进城是否有必要，因为在京的洋兵已经不少。这两位南方人一直是主剿官员，但他们地位不高，窦纳乐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相反，窦纳乐窃喜，认为西摩联军已让中方惊惶失措，他此时更不可能让步。他明告许、袁两人，西摩远征军是中方政策所造成的。其实，许、袁不了解的是，恰恰是由于欧洲政治的逻辑在推动远征行动，窦纳乐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英国人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行动半途而废。两天后，许景澄再度来访，并带来三位重臣，内有中方主要发言人兵部尚书、宗

室敬信。窦纳乐对他们仍然不屑一顾，说退兵毫无可能。另一位中方大臣未发一言，他是军机大臣赵书翘。赵肯定对窦纳乐公使的骄横态度印象很深，他刚从义和团地区巡视回京不久。窦纳乐在给首相的报告中提及这两次会面，说敬信是"中国官僚中自视甚高的那一种最低劣的小人"。[56]

其时，中方的外交动作表明端郡王载漪并没有独揽外交大权。但是这次外交的失败对朝廷的温和派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无力阻止洋人进京。洋兵在京城内已引起民众的不安，再有大批增援到来，后果不堪设想。一位翰林院官员向朝廷提出了一种可怕的前景，说洋人在四面被围之际，有可能冲进紫禁城，捕获皇室成员作为人质，因为使馆区与皇室离得很近，这种可能性不能小视。[57]慈禧太后立即下令增加宫外防务，急调兵员以捍宫墙。既然外交不起作用，她的主要精力开始放在备战上。

1900年6月13日，清廷发布命令，语言十分强硬，说："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同时还特别指出："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注：大沽炮台守军提督〕是问。"[58]这道"上谕"是至今为止意向最明确的指示，说明清廷已决心抗洋，尽管具体怎么办尚不明确。

五、杉山彬事件

1900年6月11日，北京的局势发生突变，日本使馆的参赞杉山彬在永定门附近遭董福祥甘军士兵的残杀。

6月10日，公使团得知西摩联军已经出发，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远征军一两日即可到达，因为天津到北京不过70英里左右的距离。"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和他的美国妻子在11日自愿出城去迎接洋兵的到来。他们请法国使馆卫队司令达尔希舰长提供卫兵保护。达尔希应允，但没有通知公使毕盛。沙莫夫妇虽然空手而归，

但没有发生任何不快的事情。当日还有一些到马家堡车站去接联军的志愿者。[59]

出城的公使团外交官中有日本的杉山彬参赞，还有史家没有记载的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萨瓦戈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壮举非常得意，因为其他公使都不敢出城，但他为何要这样做的动机却没有明确交待。三门湾事件之后，萨瓦戈的情绪一直非常低落，可以想象，他想成为迎接联军进城的第一位驻华公使，对他本人和国家的威望都有利。他同秘书加依塔诺出发前没有通知公使团的同事，幸运的是，他们随身带了4个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分乘两辆车在上午到达马家堡车站，看到一个中国军官坐在候车室里。11点钟左右，中国的炮队突然展开队形进入阵地。车站站长告诉萨瓦戈，联军被阻挡在20公里以外。这个消息虽然不准确，萨瓦戈决定乘坐一列4节车厢的火车前往迎接，但没有司机愿意开车，因为在车站附近的中国军队流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萨瓦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美国火车司机，答应驾驶这列火车。但当4节车厢连接好以后，那个美国人突然不愿干了。车站站长小声地说："这家伙醉得一塌糊涂！"萨瓦戈无奈，只好打道回府。行前，他给意大利参加西摩联军的分遣队长斯里亚尼留了一张便条。

意大利公使的行动显然对下一个到达的外交官的命运有直接影响。杉山彬受西德二郎公使之命前往马家堡，他于6月11日12点左右到达车站，看到萨瓦戈一行正要离开。他告诉意公使他要在此再等一会，并请他转告日本使馆他可能要晚回。萨瓦戈一行在回城的路上，看到中国军队已经虎视眈眈，在道旁怒视意大利人的车队。这是董福祥的甘军，该日上午刚刚奉命驻防永定门。甘军的任务是阻止洋兵进城，而在洋兵未到之前，突然看到洋人外交官的马车疾驰而来，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意大利人的两辆马车在穿过甘军防线的过程中，已有甘军官兵开始刁难他们。4名士兵乘坐的车子曾一度被他们喝令停下，但驾车的中国马夫非常灵活，他见势不妙，立即弃路奔入田野绕了一大圈才躲过甘军的骚扰。萨瓦戈一行有惊无险，

下午2点回到了使馆。[60]

杉山彬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他在车站等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无望，也打道回府。杉山彬并没有带卫兵，在路上碰到甘军马队，他不肯让道，甘军士兵大怒，将他从车中拖出。杉山彬竭力抵抗，终被制服并杀害，甘军还残忍地用马刀和佩剑挑碎尸首。[61]杉山彬被杀案是否中方有预谋，史家历来有争议。甘军的行为尽管令人发指，但是不大可能事先有准备，没有证据表明董福祥当时在永定门亲自下达杀害外国使臣的命令。萨瓦戈在事后猜测肯定有这样的命令，但他的车队通过甘军防线时，命令尚未到达。其实，在中外战端未开的形势下，清廷不可能下达杀使臣的命令。萨瓦戈自己也承认他不同公使团打招呼，自行出城的行动在杉山彬事件发生后是有争议的。有的在京外国人赞扬意公使勇气可嘉，有的则认为是鲁莽，不必要的过失。[62]由此证明，甘军杀害杉山彬纯粹是即兴的行动，官兵多年受董福祥仇洋的教诲，在意使通过之后，更加气愤不已。杉山彬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刻死于非命，此事件与清廷的决策没有直接关联。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是外交官殒命的第一例，公使团并没有受到巨大的震撼。窦纳乐的报告非常轻描淡写，就事论事，而英国首相则直接询问日本政府是否考虑军事报复。也许因为杉山彬是黄种人，国际反应也不强烈，如果是白人外交官被戕，国际舆论恐怕大不相同。日本使馆本身也非常克制，西德二郎公使冷静地要求中方归还尸首，没有用动武来做威胁。中国一开始对这一基本要求也不太合作，称身首不全，无法寻找，经日公使再三要求，才将尸首从永定门附近的一座庙中找到，送回日本使馆。日本青木周藏外相也不想就此事小题大做，他告诉英国公使怀特海德，他已听说杉山彬被害一事，但没有提及报复措施。他还刻意透露，日本天皇的意见是，日本不应当采取任何英国尚未采取的行动。[63]

当然，在事件发生后，中方的反应对日使馆的态度也有影响。大学士荣禄亲赴日使馆道歉，称自己对部下管束不严，并代表慈禧太后向杉山彬家人致哀。同时，荣禄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京师地面的局

势，力图避免中外正式决裂。他冒着个人风险，向朝廷建议调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以图挽救。荣禄这个想法来自于盛宣怀。几日前，盛去电张之洞和刘坤一说：

> (李)傅相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目前惟有傅相回北，内乱外衅，或可渐弭。

荣禄向军机处荐言调李回京，以杜乱萌。[64]慈禧太后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可见太后并不真心希望中外决裂。李鸿章在受贬广东后郁郁不得志，得此消息后，据说仰天大笑："舍我者其予谁？"但其子经方立即去电，警告父亲此次和局比以往都要难以谈判，还是谨慎小心为好。李鸿章接受这个意见，暂时不露声色，耐心等待。[65]

所以，杉山彬事件是偶发事故，并不是中外关系导致战争的转折点，列强仅凭此事还没有足够的开战理由。而荣禄开始觉得董军留在北京对和局非常不利。公使团就这一事件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寻常的抗议照会，朝廷于 1990 年 6 月 13 日发布"上谕"，对杉山彬之死表示遗憾，但同时说此事由"匪徒"所为。[66]不管怎么说，公使团这时的心态还好，因为西摩联军即将到达，没有必要再次提出抗议。杉山彬之死很快就成了被忘却的事件。不幸的是，西摩联军迟迟没有到来，公使团一天比一天焦虑不安。

---

①《义和团史料》，卷 1，第 38—39 页。

②《义和团》，卷 2，第 184 页。

③《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史料丛编》，卷 2，第 184 页。

④《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21—122 页。

⑤《义和团》，卷 1，第 120 页。

⑥《日本外交文书》，卷 33，别册 1，第 15 页。

⑦《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23—124 页。

⑧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见《史料丛编》，第 167 页。

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 1，第 593 页。

⑩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见《史料丛编》,第 169 页。

⑪同上,第 175 页。

⑫*China No*. 3, 1900, p. 35.

⑬*DDF*, vol. XVI, p. 257.

⑭*China No*. 3, 1900, p. 35.

⑮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p. 120.

⑯《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 第 120 页。

⑰*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BDE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5, p. 184.

⑱Glatfelter: *Russia in China*, p. 72.

⑲*Krasnyi Artkhiv*, vol. 14, p. 126.

⑳Glatfelter,同上注⑱,第 74 页。

㉑*BDEA*, vol. 24, p. 35.

㉒Korostovets: *Russiia na Dal'nem Vostoke*, p. 16.

㉓*BDEA*, vol. 24, p. 35.

㉔*BDEA*, ,vol. 25, p. 15.

㉕《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18 页。

㉖*BDEA*, vol. 25, p. 186.

㉗Wehrle, 见第二章注⑳,第 166—167 页。

㉘FO 17/1439.

㉙Fleming, P., 见第七章注㉗,第 71—72 页。

㉚*China No*. *4*, p. 5.

㉛*China No*. *3*,p. 45.

㉜Jellicoe: *The Boxer Rebellion*, p. 14.

㉝*DDF*, vol. XVI, pp. 265—271. 这份报告中关于盛宣怀的内容是准确的,盛在电文中有"未梦醒"之说法。

㉞*DDF*, vol. XVI, pp. 265—271.

㉟*China No*. *3*, 1900, pp. 41—42.

㊱《日本外交文书》,卷 33,别册 1,第 23 页。

㊲*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US), RG 59.45, Remey Cables.

㊳*FRUS*, 1900, p. 143.

㊴*NAUS*, RG 45, Area 10 File.

㊵Glatfelter, p. 76.

㊶KA, vol. 14, pp. 13-14.

㊷Malozemoff, 见第三章注②,第 127 页。

㊸*GP*, vol. 16, p. 9.

㊹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见《史料丛编》,第 185 页。

㊺《庚子记事》,第 251 页。

㊻《清实录》,卷 58,第 69 页。

㊼*Livre jaune*, 1899—1900 Chine, p. 37.

㊽Fleming, P., 见第七章注㉗,第 66 页。

㊾Hart: *The Peking Legations*, p. 16.

㊿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见《义和团》,卷 2,第 442 页。

51《庚子记事》,第 12 页。

52同上,第 11 页。

53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见《史料丛编》,第 188 页。

54同上,第 187 页。

55汪声龄:《枕戈偶录》,第 96—97 页。汪是聂士成的指挥部参谋。

56窦纳乐把敬信的名字拼错为"Chi Hsin",见,*China No. 4*, p. 20.

57《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 第 129 页。

58同上,第 142 页。

59朴南威尔(真名 Bertram Lennox Simpson)在其可疑的《北京使馆被围记》中称杉山彬是整个公使团派出的迎接联军的代表,此说不确。见该书:*The Indiscrete Letters from Peking*, p. 48.

60柴五郎:《北京笼城日记》,第 8 页。

61战后,光绪皇帝给天皇就杉山彬事件的道歉信中仍称此事的起因是"口舌细故",日方并无异议。见王彦威:《西巡大事记》,第 60 页。

62Salvago-Raggi, p. 361.

63*BDFA*, vol. 24, pp. 19—20.

64《义和团》,卷 3,第 326 页。

65《李鸿章全集・电稿 一》,第 946 页。

66《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33 页。

第十一章 西摩联军何处寻

一、义和团与西摩联军

西摩联军被清廷从一开始就认为可能与干涉中国内政有关，但这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是一个忌讳的话题。这是和平时期第一次向中国派遣远征军，远征的目的据说是替使馆"解围"，但这时使馆尚未被围。在清廷内部，很多人都明白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光绪的复辟，所以大家都三缄其口，不敢多言。1900年开春时，李鸿章电报中用过"新党勤王"四字，已引起"内意甚忌"。官员上奏时多用比较隐晦的语言。直隶总督裕禄在1900年6月6日的一份电报中，请求加大剿拳的力度，并说如果外人借口助剿，而不是中国自剿，洋人有可能"干我国体"，[1]荣禄一直认为列强干涉是中国最大的危险。御史吴鸿甲在6月8日的奏折中说：

> 现各国入城洋兵，数已不少，万一拳勇滋生事端，交哄于辇毂之下，致彼族藉口，续调大队，肆行蹂躏，臣不知计所从出矣。[2]

翰林院学士朱祖谋在 1900 年 6 月 11 日的奏折中说得更明白：洋兵"尤恐侵寻迫胁，干我政权，时事愈难收拾。为今之计，惟有设法禁阻，总以使馆不再增兵，为防患之要著。"③毫无疑问，西摩远征军所将带来的种种可怕的前景使清廷坐立不安，也是慈禧太后心中的真正担忧之所在。尽管中国史料中缺乏反映慈禧太后心态的详细资料，但不能掩盖她一直忧虑的情景。可是，官员们不能就光绪复辟这个违禁话题进行辩论，尽管多数人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中外关系破裂的症结所在。从下面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的真实目的深为怀疑，但只是到了紧急关头她才完全确信自己的判断，即洋人的目的在于干涉内政。所以，还是由慈禧太后自己挑明这个违禁话题，并以此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

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列强派远征军的真实目的，但是中方绝不能就此事向公使团进行公开交涉。其实，清廷不知道的是，列强各国没有一个政府愿意考虑推翻太后政权的政策。列强之间的争斗激烈，不可能就谁在中国掌大权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大家都情愿维持现状。因此，在各国档案中，也很少有关光绪复辟和推翻太后政权的文件记录。比如，英国远东事务次官伯蒂一度希望采取这样的政策，但首相根本不愿考虑此事，首相给窦纳乐的指示中多次批评他在北京带头与总理衙门过不去。电报通讯中断后，首相还说："尽管我必须支持他，但我对他的行动表示遗憾。我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欧洲公会'。"④所以，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最为关切的问题完全被在京外交官和他们的政府所忽视了。

慈禧太后尽管将端郡王载漪任命为总署领班大臣，她并不准备与洋人决裂。然而，西摩联军在军事上的惨重失败却使清廷对中外决战有了一点信心。从一开始，清廷并没有制定一套战略计划。裕禄未能阻挡住西摩联军的出发，慈禧太后非常不快。1900 年 6 月 14 日发出的"上谕"称："当此多事之时，该督宜如何统筹全局，实力维持。乃近来遇事因循，且不免意存推诿，殊属非是。""上谕"最后说："裕禄著传旨申饬，仍当振作精神，任劳任怨。倘仍然泄沓，贻误事

机,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曲宥也。"[5]然而,裕禄已放手让洋兵乘车进京,清廷束手无策,因为战争准备远远没有头绪,而且清廷还没有在中外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做出最后的决策。

有意思的是,义和团在铁路沿线抵抗西摩联军完全是自发的,但他们的行动对阻止联军进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联军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又使得清廷对抵抗洋人有了信心,而且第一次提供了官军与义和团合作的机会。

在联军方面,首先,司令官人选就是失败的开始。联军以海军为主,海军官兵进行陆战的经验本来就不多。离开了军舰,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西摩海军上将一开始就坚持要乘火车进京。五列火车排成一字长蛇阵,四列运兵,一列装弹药给养。他们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完全不把路上的危险放在眼里。西摩已被告知路状不好,但他急于进京,所以决定边修路边前进,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陆战经验较多,在西摩上将率先遣队千余人出发时,其他几个欧洲的分遣队不愿及时跟进,法国分遣队尤其对远征的前景担心。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认为这种远征方式太"幼稚",希望推迟行动。但西摩坚持说"铁路可修",[6]执意先行。法国人最希望大批俄军到达,以减少英国对远征军的主导作用。但是西摩急于成行的目的正在于此,不愿等到俄军大队人马的到来。索尔兹伯里首相已有明确指示,不能让俄人在华北占主导地位。所以联军的匆忙行动是欧洲政治造成的,英国政府为了防俄,完全改变了不让窦纳乐出头组织"欧洲公会"的一贯立场。应该说,这个决定与义和团运动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其目的也不是真心地出于保护在北京的外交官的安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这种政策就很不理解,认为如果外交官在华有生命危险,应当立即召回。女王在 1900 年 6 月 9 日写信给首相,对窦纳乐公使的安全表示极度关切。她认为既然联军已经采取军事行动,就没有必要让窦纳乐继续呆在北京。首相明确告诉女王陛下,窦纳乐绝不能离开,否则北京将成为俄国人的一统天下,而法国人势必要助俄一臂之力。[7]

在这种背景下,西摩上将慌忙登上第一列火车,率500余人先行出发,其中有300人是英国士兵,100余名美军和40名意大利水兵。既然西摩已经出发,各国的分遣队不得不随后跟上。[8]法、俄、德不能让英人独占鳌头,对西摩抢头功的心态颇有微词。联军总人数为2000余人,他们出发时信心十足,对路上可能发生的危险缺乏足够的估计。与北京不过70英里的距离,所以联军士兵每个人只携带了两天的口粮。

西摩海军上将对同中国打交道有些经验,但他的思路仍是传统的英国式的,对1900年的中国缺乏了解。他在40年前曾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他的叔叔迈克尔·西摩海军上将是远东舰队司令。当时登陆的英法联军人数并不多,但一路打到北京城,所向披靡,中方毫无招架之力。联军在北京大肆烧杀,将著名的圆明园付之一炬。西摩的这个经历使他对中国军队一直是嗤之以鼻,这就助长了他的轻敌倾向。他急于抢头功还有另一个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中间突然病倒,没有自始至终参加英法联军的行动,而在他叔叔的司令部里休息养病,所以这一次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况且,这一次的行动不但规模大,而且敌方不是正规军队,是一帮在他看来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联军出发的第一天上午,一切顺利。火车在华北平原上一路畅通无阻,下午已到落垡车站,也就是说,已完成了约一半的路程。但是落垡车站附近的路状很差,联军不得不停车修路。然而,铁路被破坏的程度远远比联军想象的要严重。有的地方数百米铁轨被掀翻,枕木被焚,电线杆被拔出,电线被砍断。联军修路过程中看到少数拳民在附近观望,但没有靠近。英国士兵在第一列车厢周围与拳民交上手,拳民手里只有大刀,长矛,但非常勇猛。英军用机枪和步枪猛烈扫射,50多拳民当场毙命。联军在列车四周清除拳民之后,顺便去附近村子里抢劫了一番。当晚在落垡宿营,并没有发现大批拳民的迹象。

第二天继续修路,但进展缓慢。拳民掀起的铁轨要一段一段地

重新铺设。当天下午，英舰“百人队长号”的约翰斯顿少校率一支陆战队士兵到前方侦察，突然遭到2000余名拳民的攻击，有的拳民还骑着马。英军且战且退，没有伤亡，而拳民损失20多人。但这以后，拳民似乎越来越多。两日来，拳民已有70多人死于联军手中，所以他们开始酝酿新的计划。

落垡一带的拳会首领叫倪瓒青，他是当地的名人。倪生于1862年，是落垡地区最大的地主之一。他年轻时习武功，1886年曾获朝廷武进士。他没有在北京任职，回到家乡打点家业。倪瓒青组织拳会抗洋是出于爱国动机，他名声很大，所以四乡风起响应。其领导的拳众据说有2万之多。倪的组织以山东义和团为楷模，不搞打砸抢，纪律比较严明。他于1900年4月份开始设坛亮拳，并在5月间攻打教堂数处。

1900年5月中旬，倪的拳会开始与天津的拳会有合作关系。他的拳民有不少死于聂士成的枪口之下，损失惨重，所以他们决定以破坏铁路为主要活动。6月10日，他从天津方面得知西摩联军已经出发，立即组织人马在落垡车站聚集。中国政府对他的活动既没有支持，也不知晓，这是一次自发的抗洋运动。西摩联军在落垡宿营，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千拳民就在附近的村庄和庙宇里商量作战方案。[9]

1900年6月11日上午，联军修好落垡车站东南的铁路桥，又开始以长蛇队形前进。西摩上将特地命令各列车将从义和拳民尸首旁捡到的团旗插在车上，作为装饰。这些死去的拳民大多数是倒在聂士成军的枪口下。倪瓒青率拳民伏在铁路两旁，他一声令下，拳民跳上铁路桥开始突袭列车。拳民虽然勇敢，但终究敌不过马克沁机关枪的火力，伤亡很大。倪命人抬上土炮进行轰击，但效果并不大。倪的进攻虽然不能奏效，但使联军失去了大半天的前进机会。应该说，联军的攻击势头此时已被挫。

倪的人马突然撤出以后，联军继续开始修路。西摩意识到车站落入拳民手中的危险，于是命令30名英国水兵守卫落垡站。英军称落垡据点为“爱得米雍堡”，因为这些水兵都来自同名的战舰。1900

年6月12日，西摩上将决定继续前进，列车行驶得很慢。下午到达廊坊车站，距北京尚有30英里。在廊坊车站，联军发现铁路设施已全部被毁，连水箱也一只不剩。西摩毫不气馁，仍然傲慢自信。他知道部队士气已经不高，于是在第二天召集各分遣队司令官会议。在会上，他拿出事先拟好的给各国公使的信，请各司令官签字。这封手写的信读来十分有趣：

公使阁下，我有幸通知您，当我接到您要求我们立即进京，否则将为时过晚的电报后，我们已经派出了一支由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和美国军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刻下已到达北京城外。我请公使阁下下达下一步行动的指示。[10]

不幸的是，廊坊竟然是西摩联军北上的最后一站。倪瓒青的人马这时已经将廊坊前面的铁路拆毁，他们烧了大批的枕木，并运来很多石块，堆在铁路上。西摩这时候才明白，继续乘车北上的把握不大。1900年6月14日下午，拳民开始进攻西摩上将的一号车。据西摩的参谋长杰利科舰长的回忆："拳民奋勇无比，一度攻到一号车旁边。"参加战斗的英军中尉卢特瑞尔这样描述当时的战斗场面：

杰利科舰长非常果断，他在拳民大举进攻之前已将马克沁机关枪架在车前。拳民勇猛顽强，但他们的原始武器终不能敌现代科学的枪炮。他们挥舞着大刀和长矛，在阳光下悄悄地冲上来，但都一排排地被机枪和步枪像割草一样打倒在地上。他们毫不畏惧，因为他们的首领使他们确信为国捐躯是光荣无比的事情。此外，那些首领也树立了榜样，在进攻中冲在前面，边唱边跳，装神弄鬼。[11]

拳民在白天的进攻没有使联军有任何损失，当晚，联军的士气开

始受挫。5名意大利水兵在站岗时玩牌，被拳民袭击，5人均被剁成碎块。[12]同时，二千拳民趁夜进攻，但是没有取得效果。

第二天(6月15日)上午，天津方面传来的消息说拳民拆毁了天津和落垡之间的铁路，西摩上将立即随一号车返回查视。廊坊车站的防守交给德国舰长乌斯多姆。德国水兵将一个加煤站改建成防御工事，并以乌斯多姆的军舰命名其为"格非永堡"。

西摩上将在途中发现落垡前后的铁路都再次被毁，由于电线中断，联军已与天津和大沽失去了联系。也就是说，从6月14日开始，天津领事团和大沽口外的海军将领对西摩联军的行踪一无所知。同时，在北京的公使们也在焦急地等待联军的到来。

从军事上讲，联军的处境非常危险。用弗莱明的话说，联军现在如同一条两头蛇，不管是继续前进还是撤退回天津都同样困难。[13]更糟糕的是，落垡至天津的铁路已经完全中断，几天前联军修好的铁路桥又成了一片废墟。这就是说，联军连原路乘车返回都不可能。如果继续北上，则必须放弃火车。对西摩上将和其他分遣队的海军军官来说，放弃火车就像在海上弃舰而逃那样是一种绝望之举。拳民人数之众，使联军对离开火车、在愤怒的人海中漂流感到不寒而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弃车步行作战。

二、廊坊大战

联军指挥官不愿放弃火车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正规军并没有介入攻击联军的战斗，当西摩上将率四列火车向杨村进发时，他们发现情况有了变化。他们在6月10日出发的当天曾与聂士成的部队在杨村擦肩而过，双方十分友善。而现在聂军已不知去向，所以不少联军指挥官担心聂已奉命阻击增援的联军北上。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仇洋将军董福祥将派军与拳民联合作战。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聂士成确实于6月14日接到命令，要他在天津与大沽之间的铁路线上集结待命，以防洋人再次进犯。朝廷的"廷寄"特别强调：

"如有外兵深入畿辅,惟该提督是问。"[14]在北京,董福祥也奉命到城外修筑工事,准备迎战联军。等了几天,联军并无踪影。于是,董福祥派分统姚旺率几千人出城巡查,借机迎战,这就给官军和义和团合作提供了机会。聂士成剿拳甚力,拳民绝不肯与他合作,董的甘军则一直有仇洋的名声,倪赞青等会首自然乐意与姚旺携手抵抗联军。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廊坊车站是理想的攻击目标,于是姚旺和拳首开始集中三千官兵和二千拳民参加战斗。

同时,西摩上将终于开始意识到依靠火车向北京进军已经不大可能,但他不愿意放弃远征,撤兵回津。1900年6月16日,驻守廊坊车站的乌斯多姆舰长托人捎来部分公使给他们分遣队指挥官的信。这些信由一名中国人在公使团付给他一百美元的条件下,冒险带到联军在廊坊的"格菲永堡"。公使们抱怨联军迟迟不到,并警告西摩海军上将,董福祥已经准备迎战。这些信的语气是绝望的,悲观的,也带有责备的意思。[15]赫德爵士在6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窦纳乐爵士已经于昨天凌晨五点钟写信给在廊坊的西摩海军上将……进兵速度太慢!"[16]

西摩收到此信后,更加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挥兵北上。但他认为应当先回杨村,然后沿白河北上,这是当年英法联军的进攻路线。但分遣队指挥官们大都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水兵下地作战本来就无把握。而且,沿白河北上,他们就必须放弃大炮等重武器,同时还要抬着伤病员。眼下,每个士兵只有300多发子弹,就算打到北京,没有大炮,如何攻得下城墙?由于联军每人只带了两天的给养,现在粮食已严重短缺,步行行军所需时日更多。最后,西摩决定还是乘车回杨村,然后设法找到船只,从水路北上。6月17日晚,在廊坊的守军又累又紧张,不想发生事故。约11点左右,几个俄国水兵在给机车加完水以后,回去休息。一个英军岗哨突然失控,大喊"有拳匪!"联军士兵在月光下向这几个俄军士兵开枪,当场打死2人,伤5人,廊坊驻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真正的打击还在第二天,6月18日。这一天,董福祥甘军在姚

旺的指挥下，联合义和团向廊坊联军发动了进攻。先是由拳民冲锋，以人海战术轮番进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有时还进行了肉搏。拳民各种年龄都有，但一样视死如归。他们在进攻前还要搞一下拳会的仪式，冲在前面的倒下了，后面迅速跟上，场面十分惨烈。义和团停止冲锋后，姚旺的正规军开始进攻，而义和团此时则用种种手段打击联军的士气，比如大放鞭炮让敌人惊魂不定。然而，德军阵地一直没有失守。

但是甘军的火力和军事素养对廊坊联军还是一个巨大打击。乌斯多姆舰长在后来的报告中说：这时他开始意识到对方是正规军，"我们在战斗中缴获的旗帜证明，向我们进攻的是董福祥将军的部队，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我交战。"在战斗中，德军的右翼防线差一点被攻破。[17]在紧急关头，一批英法水兵来到廊坊进行增援，防线才得以保住。战斗时间很长，结束时据联军方面的统计，联军当场死亡10人，重伤50余人。而中方死伤400多人，其中一半是官军。

廊坊战斗是迫使联军改变进军方向的关键一步，而董军的参战改变了战斗的性质。联军已受到严重的打击，西摩上将解北京之围的使命此时已经不可能完成。当德军从廊坊开着弹痕累累的列车，载着尸体和伤员徐徐进入杨村车站时，西摩远征军的大势已去。他的惟一选择是如何顺利返回天津，而不是进军北京。联军从1900年6月14日起已同天津失去了联系，他们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大沽炮台的争夺战和第一次天津战役。杨村距北京50英里，而且董军已修好工事，以逸待劳。再者，北上必须通过四处都是拳民和部分官军的危险地带。天津离杨村只有20英里，那个方向虽然有聂士成的部队，但也有数千名外国兵，所以向天津方向进军的生存希望最大。但是联军指挥官对被拳民阻挡，又被官军所创感到非常难堪。他们知道中国人在京津线上第一次成功地抗击列强的远征军意味着人民仇洋情绪会更加高涨，同时老百姓会更加相信义和团的非凡神力。确实，联军雇佣的一些中国苦力看到义和团的作战表现后，纷纷逃离，他们相信拳民战无不胜。有的苦力公开声称地上的拳民尸首

会转而复生。所以，联军在向天津方向进发时，特意不把这些尸首掩埋，以让老百姓看看到底有没有死而复生这回事。

撤军回天津是联军的惟一选择。大队人马行动之前，德军在白河上掳获了4只木船，用以载炮。联军决定沿白河左岸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打前站，法军担任前锋，意军由法军司令指挥。英、奥、日、俄部队居中，而由德国水兵殿后。这样，经过10天的行动，西摩联军终于放弃了5列火车，两个防御工事，现在只剩下4只木船。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傲慢轻敌，联军出发时，伦敦的《观察家报》曾有报道，说八国联军的行动基础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上："再小的欧洲军队都可以打败不管多大的中国佬的军队。"[18]

从军事上讲，联军的最大失误是依赖火车运输，加上西摩海军上将在战略计划和战场的战术指导上都没有能力。他迟迟到不了北京，于是公使团有人把他称为"找不到的海军上将"(Admiral See-No-More)。西摩的一位参谋贝提在战后给他姐姐的一封信中说，这次远征军行动是世界上"最疯狂，最原始，最糟糕的计划造成的。任何人的大脑能够想出这种计划真是不可思议"。[19]公平地说，西摩海军上将虽有重大指挥过失，远征的失败远远不能归罪于他一个人。杰利科舰长在这次远征中负了重伤，他在1935年去世前有过这样一段比较公允的回忆：

> 西摩远征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选择铁路，而没有选择陆路或水路，甚至水陆兼用……我与驻津领事贾礼士和其他人都商量过这个意见，但他们都说走陆路和水路所需要做准备的时间太长。因为窦纳乐公使发急电要我们即刻进京，而且说铁路仍然完好，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这个最快的进军方法。[20]

因此，由欧洲大国政治原因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联军的准备工作远远不足，但西摩海军上将为了抢占先机，执意要行动，失败是并不奇怪的。让西摩联军最难堪的是二千多人居然被拳民阻挡在京津

线上。而董军的加入不过是促使远征失败的最后一击。远征行动在1900年6月19日正式取消，联军的惟一希望是能够突围返回天津。

三、"猎取拳民行动"——黑色星期五

西摩联军的行动对北京和天津两地的事态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影响，清廷在联军于1900年6月10日出发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而在京津两地的公使团和领事团也由于对西摩远征的成功估计过高而采取了一些重大的错误决策。西摩远征军是和平年代的第一次远征，而且没有任何与中国开战的理由。清廷虽然决定进行抵抗，然而除命令董福祥军抵抗外，没有对军民进行战争总动员。所以西摩在京津线上受义和团阻挡不得进京，使得义和团的名声大振，同时清廷的抵抗心态也大大加强。

对天津地区外国人的影响是：西摩联军的失败迫使他们要考虑挽救手段，于是军事决策开始占主导地位。早在1900年6月12日，伦敦就收到联军失利的消息。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伯蒂报告首相说："贾礼士领事相信西摩海军上将的联军已被孤立。我不知道贾礼士是否过分紧张，但今天的晚报证实贾礼士所言不虚。"伯蒂建议立即与俄国和日本联手，组织一支万人部队解西摩之围，首相对这个建议完全不赞同。他给负责与议会联络的外交副大臣布劳德里克写信说，关于俄国出兵的那一部分计划很糟糕，他认为："这样做对我们是否有利还很难说……我们对西摩联军的消息来自贾礼士所搜集的中国报纸的小道消息。这个贾礼士是何许人也？他大概是中文翻译见习生出身，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首相接着指出："如果在同俄军合作时，我们的行动意见与他们不一致将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限制。确实，我们有可能撤军，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俄国人将占领北京的最主要的位置。"当然，首相承认如果这个建议直接来自窦纳乐或西摩则另当别论，而他遗憾地指出："但是他们两位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想法。我们最后一次与窦纳乐联络时，他最担心的是，如果英、俄齐头

并进进入北京，我方实力恐怕不如俄军。我们已经给窦纳乐和西摩最大可能的决策权力，但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采取独立的行动。"[21]

因此，索尔兹伯里首相对俄国意图的一贯怀疑使他对中国事务的判断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当然他对华北的军事形势确实也缺乏了解。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华外交使团的行为极大程度上受到西摩联军"消失"的影响。在天津，领事团和军方对西摩联军的出发本来就寄予厚望，而北京的公使团更加乐观地认为西摩至多两日可以到达。然而，联军的突然消失，促使天津的外国人采取更为激烈的军事行动，从而直接引发战争。而在北京的外国人则在预计联军将要到达的开始几天里在京城地面大打出手，四处剿杀义和拳民，这就是所谓的"猎取拳民行动"，京城秩序大乱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御史吴鸿甲在1900年6月11日的上奏中，已表示过对中国居民和外国人难免发生摩擦，从而酿成事端的极度担心。可以说，在京外国人剿杀义和拳民的擅自行为是最终导向围攻使馆的初始原因。

西摩联军出发后的几天之内发生了很多大事件。京津之间的电报通讯的中断，使得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北京，护馆卫队刚来的时候，由于人数不够多，所以外交官和在京外国人的信心仍不够足。外交官对洋兵的管教也比较严，惟恐引起争端。西摩远征军出发的消息使得外国人的心情为之一变，行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赫德在日记中写道："我担心续调外国军队进京可能会永久增加我们的麻烦！"[22]赫德的感觉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因为西摩远征军鼓舞了外国人的士气，他们开始冲出使馆区，公开兜捕和剿杀中国的公民，这在世界外交史上还是少有的现象。其实，到6月13日为止，拳民对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没有造成多少危险，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少骚扰，他们的打击目标主要是教民。6月13日正好是星期五，在基督教传统上是个不祥的日子，而这一天正是"猎取拳民行动"开始的日子。

公使团与拳民的大规模冲突是由德国人首先挑起的。13日中午，有三个拳民坐着大车在使馆附近路过，其中一人用鞋底在磨刀。克林德公使正在街上散步，看到拳民，立即勃然大怒，举起文明棍在

后面追打。三人之中两人逃脱，德国卫兵抓住第三个身穿义和团标志的小拳民，送到公使面前。克林德下令痛殴，然后派人将他的大刀和衣着送交总理衙门，说这个小拳民将在两小时内被处决。中国政府闻讯立即派三位高官赴德使馆交涉，其中有端郡王载漪的弟弟载澜，还有英年和崇礼。他们要求德使放人，因为这个拳民并没有犯法，也没有招惹洋人。克林德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不愿释放被绑在大树上的小拳民。他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剿拳行动，[23]中方大员对这种说法极为吃惊。

少年无故被绑被殴的消息不胫而走。到了傍晚，使馆区附近已经聚集了数百民众。当晚，拳民焚烧了在哈德门大街的洋教堂，北京的大乱正式开场。使馆卫队对聚集的民众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开枪射击，意使馆士兵还用机关枪对附近民众进行疯狂扫射，奥使馆和法使馆的巡逻队只要见到人影立即开枪。愤怒的民众开始越聚越多，当晚奥使馆卫队索性将马克沁重机枪在街心一字排开，连射了几百发子弹。但奇怪的是，民众被驱散后，居然没有留下一具尸体，后来才知道奥兵的准星调得太高而造成胡乱扫射。但是民众中间开始流传义和团能拒枪弹的神话，[24]当时在东交民巷聚集的民众当中既有拳民，也有旁观的市民。

德国人挑起的这场冲突是北京局势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据比利时使馆的随员德麦洛特在战后的报告说：

> 直到六月十三日为止，对中国教民的袭击尚未开始。杉山彬事件和梅格林克〔注：比馆一等秘书〕被殴都是孤立的事件。但自十三日那一天开始，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25]

愤怒的中国民众对公使团的暴行忍无可忍，开始以焚烧教堂和大规模袭击教民的方式来进行报复。京城上下，拳民到处捕杀“二毛子”(即教民)。任何一幢与外国人有关的建筑都成了攻击的对象，教堂、卖洋货的商店、西药店、医院乃至海关都被付之一炬。海关被烧

时，赫德爵士匆忙间拎着一只箱子出逃，他的珍贵的日记也差点被焚，幸由旁人将它及时带出。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上午，法馆卫队长达尔希舰长带人赶到东堂时，整个建筑已被夷为平地，只剩下被烧死的教士教民的遗骸，其中有法国教士多雷。

从1900年6月13日开始，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开始四处出击，很多外国公民也自愿加入。“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和夫人组织在旅店长期包房的房客冲出皇城，到中国居民地区去援救教民。在一次出击中，就打死数十名拳民，很多死者是青少年。法馆卫队长达尔希对沙莫的行动非常担忧，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些“志愿者”都不是军人，他们的擅自行动很容易失控。㉕《泰晤士报》的莫理逊也大开杀戒，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次行动：他们冲进距奥馆30米外的一座小庙，“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四十五人……我自己至少干掉六个”。㉗奥使馆卫队的柯拉中尉后来得意地说：“我用左轮枪击毙五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逃脱的‘天兵天将’。”㉘公使们也亲自参加屠杀行动。6月14日，克林德公使觉得在皇城地面杀拳民还不过瘾，他登上城墙，看到拳民在皇城根下习拳操练，立即命令卫队放枪，20多名拳民当场毙命。吉尔斯当时是英馆的中文见习翻译，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 傍晚七时许，德国人在城墙上看到不少拳民在下面操练，他们立即开枪，击毙十数人。晚上，从前门方向传来愤怒的大喊声，直到半夜还不停息，一大批拳民正试图冲进皇城。㉙

据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在1900年6月17日写的报告，仅6月15日晚上，法使馆和美使馆的卫兵为了援救400名教民，杀死拳民60多人。㉚其他公使也大开杀戒，据中方目击者记载，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在东单牌楼附近参加剿拳行动，杀死拳民数十人。姚士登5月份刚到北京上任，他的心脏不好，身体孱弱，但参加杀人却也是如此积极。㉛

洋人的挑衅开始进一步升级。德使馆卫队决定将住在使馆区附近的大学士徐桐堵在家里，随时准备捉拿他作为人质。徐桐夜里曾试图出逃，被克林德下令抓获。窦纳乐看到德使的表现实在太过分，他立即给克林德捎信，劝他"不要给中国人过分的刺激"，[32]故而徐桐最后才得以释放。可以想象，他在宫里论及此事，必然对洋人更加痛恨不已。应该指出，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任何所在国家的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文明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猎取拳民行动"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此，中国官方对洋人在京城地面的突击行动并没有直接干涉和谴责，拳民对洋人也毫无招架之力。拳民死伤无数，而洋人并无一人伤亡，北京的民众群情激愤是不难理解的。在京的洋人为何要采取这种极为冒险的行动，难道他们对这个行动在民众中造成的后果一点也不在乎吗？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上尉在1902年有这样一种说法：

> 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33]

迈耶斯上尉的说法显然是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但是他有意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对教民和教堂的大规模攻击是发生在1900年6月13日以后。此外，他也有意掩饰了在京洋人的心态：由于大家都以为西摩联军即将进京，中方对他们采取的任何激烈行动都会无可奈何。"猎取拳民行动"已大大地超过了治外法权的范围。在中国首都滥杀中国公民对很多外国人都是一个刺激，外交官、新闻记者、商人、传教士和卫兵都将这个凶残行动作为过杀人瘾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不幸的是，在京的外国人对西摩联军的困境并不知晓，窦纳乐在1900年6月13日收到的信息是联军在落垡附近与拳民有一场小小

的交火。既然大家都对联军的到来有信心，屠杀行动乐得继续进行。几日后，剿拳行动正在高潮上，毕盛收到法国分遣队的司令德马罗舰长的一封信，说四天行军之后，联军在廊坊难以前进，故联军在几日内尚不能到达。这个消息对在京的外国人是一个打击，但头脑已极度发热的公使团仍然不相信西摩远征会失败，于是继续四处剿杀。几日后，联军仍无踪影，这时候外国人才开始惊慌起来。朴南威尔在书中说："现在是十六日的子夜，我们的形势没有任何好转。而两星期前护馆卫队到达时，我们感到多么安全。"[34]洋人剿杀行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整个北京城在咆哮，大街小巷到处是"杀"、"烧"的喊声。

更严重的是，公使团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克林德挑起事端的时刻，清廷刚准备下令在京师地面控制义和团行动。[35]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给荣禄的幕僚樊云去信，要求在西摩联军到京之前，及时剿办城内拳民，荣禄亦在考虑剿拳策略。袁昶住在比利时使馆附近，他在 1900 年 6 月 13 日当晚听到一片喊杀声，并彻夜不停，而比馆卫队则不断放枪。[36]第二天他就上书庆亲王奕劻，说步军统领已准备自剿，但德使突然擅自采取暴力行动，以致酿成巨患。[37]美使康格估计，从 13 日晚到 15 日，光是护馆卫兵就至少杀了近百人，其他志愿者的杀人记录则无从查证。他给海约翰的报告中这样说："我们不过是想在增援部队到达前，悄悄地保卫自己，但是各使馆卫兵至今已杀了近百人。如果我们对卫兵的人数满意，有安全感的话，恐怕至少要惩罚数百人。"[38]

英使馆见习翻译吉尔斯在 6 月 16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二十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十名美军和五名日本兵在使馆区东面包围了一座庙，冲将进去。差不多有五十个拳民在庙里，他们没有抵抗，全部被杀。"[39]外交官等人到底杀了多少人是难以统计的，被杀的人中也有不少是京城的普通居民。一位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向中国人开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非常放肆。"[40]大开杀戒让士兵们兴奋不已，传教士爱伦牧师在日记中记载，陆战队士兵从城门里走出来，

大家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一名士兵说："我真希望能用刺刀杀他们，这样感觉会好极了。"[41]

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上尉在1902年回忆道："我们的这些突击行动非常顺利，救出了大批教民，给拳匪和抢劫犯们以沉重的打击，而我方无一伤亡。"[42]

洋人的"猎取拳民行动"，直接导致了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围攻使馆事件。6月14日，数千民众围住使馆区，但中方军队并没有介入。窦纳乐报告说："六月十四日晚上，几千暴民在使馆周围彻夜呼喊野蛮的口号，威胁要杀尽洋鬼子。"民众几次试图冲破卫队的防线，但被打回。窦纳乐并没有详细报告外国人的暴力行为。[43]显然，民众自发的抗洋行动对清廷有很大影响，因为清廷最关心的是民心，也许这次围攻使馆的事件对日后官兵围攻使馆是一个启发。

洋人的行动使得在京的外国人与中国百姓的关系急剧地恶化。奇怪的是，即使在义和团战争后，外交官对这一段历史基本上是讳莫如深的。窦纳乐和其他公使都没有将剿拳行动的细节如实向本国政府汇报。赫德爵士在日记里也没有详细地记载杀人的过程，他只在一年后出版的书中提到："六月十三日，哈德门的教堂被焚，是拳民大规模摧毁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建筑的开始。"[44]事实上，据目击者记载，64岁的赫德在剿拳行动中也是莫名兴奋，他常常"在瘦小的身躯上一边挂一枝巨大的柯特左轮枪"。

从外国人在战争结束后的角度来看，"猎取拳民行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将肃王府加以占用。由于大批教民的涌入，使馆区已不能容得下这些难民，莫理逊和柴五郎中校前往肃王府，商得暂时征用该府作为难民营。因为肃王府毗邻英使馆，所以在后来发生的围攻使馆事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防御作用。

尽管京城由于洋人挑衅已经大乱，清廷在1900年6月中旬还是想尽办法进行控制。义和团在6月14日宣布要攻打天主教北堂，朝廷命令载澜亲自到北堂去阻止这个事件发生，[45]但载澜很不情愿。在总理衙门官员的劝说下，义和团放弃攻打计划。北堂是樊国梁主

教的布道堂,樊主教亲自率领 30 名意大利和法国的水兵在那里防守。朝廷于 6 月 15 日又发布"上谕",该谕显然受荣禄的影响,要求将携带武器、到处喊杀的拳民就地正法。[46]步军统领崇礼再次被斥责,崇礼、载澜和英年这三位负责京师地面安全的主管官被撤职。[47]翰林院学士朱祖谋在 14 日上了一封很有见地的奏折,他直接批评了仇洋派的观点。他认为:"纵将现在中国之洋官、洋商以及兵卒区区数千人一时歼尽,其能使此数国者畏慑中国之威,不图报复耶?"他认为所谓义和团神术并不存在,因为聂士成、梅东益和袁世凯在剿拳过程中已证实拳民也是凡人,所以依靠义和团保国抗洋是十分危险的。朱祖谋还建议,设法让使馆安心,因为公使们越是不紧张,各国公使间的合作就越困难。[48]

清廷立即派人与使馆交涉,商量如何调荣禄的武卫中军为使馆区设防。但此时公使团对中国政府已经完全不信任,谈判的结果只是让荣禄的部队在使馆区外围布防,不得接近使馆。然而,清廷的禁拳"上谕"效果十分有限,洋人的擅自剿拳行动已使秩序大乱,有一次俄军还射杀一名救火队成员。更糟糕的是,使馆卫队也开始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据吉尔斯 6 月 17 日的日记载:

> 奥地利人(他们特别喜欢开枪)和德国人向董福祥的士兵开枪,这些士兵早先向欧洲人扔了石块。这样一来,董军大怒,一时间子弹纷飞,我们在吊桥北面的岗哨不得不暂时撤离。

1900 年 6 月 16 日,端郡王载漪的另一个弟弟载濂就朝廷的禁拳"上谕"提出不同看法。他请慈禧太后撤销此谕,因为它刺伤了民心。太后对此不予理会,命令官军与洋人合作共同维持京城秩序。[49]吉尔斯在 18 日的日记中证实:"公使团决定,而且中国政府也同意,任何中国人(不管是兵是民)在晚上七时到第二天凌晨四时在使馆设防的地区出现,一概格杀勿论。"[50]显然,慈禧太后仍然不想闹到中外决裂的地步。然而,拳民仍大批涌进京师。大学士刚毅在涿州等地与义

和团接触10天之后回到北京，据荣禄的部下邢长春的报告，刚毅的使命使得义和团的胆子更大，人数更多。新城的县令在去见刚毅的途中被义和团扣留，后来由于刚毅的介入才得以释放。[51]清廷仍然希望义和团与洋人不要发生新的争端，但义和团对洋人的态度越来越仇视，不过到此为止，还没有发生直接攻击洋人的事件。教民是主要打击对象，"洋房"是主要焚烧目标。但是在16日那天，烧洋房的行动酿成了巨祸。当时义和团准备焚烧老德记西药房，在作法念咒之后，义和团首领向附近大栅栏一带的商家保证，义和团神术只会烧洋人的房子，不会烧掉中国人的店铺和住宅。但事与愿违，结果一场大火把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区烧得精光，火势完全失控，约一千家民宅和大批商铺均被夷为平地，饭店，古玩铺，银铺，妓馆，应有尽有，一律不能幸免。在这场大火中，著名的翰林院藏书阁也毁于一旦。[52]

朝廷被这场大火所震撼，由于火势开始向紫禁城蔓延，慈禧太后怀疑有人在背后搞阴谋。然而大火烧到宫门附近时，突然风向大变，于是没有触及紫禁城。朝廷守旧派暗自庆幸，很多人更加相信义和团神术。

荣禄对这场大火非常愤怒，但是他影响局势的能力已越来越有限。杉山彬被戕案发生后，他曾下令将董福祥甘军调防万寿山，以防董军继续在京城与使馆卫队为难。董福祥不肯听命，称他的任务是守住京师大门，没有朝廷的直接命令，他不能放弃他的原定任务。大火之后，荣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朝廷上大骂仇洋分子是一群"王八蛋"，京城将毁在他们的手中。[53]

有趣的是，火烧大栅栏也让一些守旧大臣遭受经济损失，因为不少人在大栅栏的店铺中有股份。京城最大的四恒钱庄被毁，市面上银根吃紧。顺天府尹陈夔龙奉诏进宫，慈禧太后问他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陈答道，应让所有的钱庄和当铺向四恒钱庄提供一笔贷款，使它渡过难关，市面物价自然平稳。大学士刚毅在一旁听得惶惶不安，因为刚毅在典当业中投有巨资。于是他在宫外等着陈夔龙，警告他不要触动当铺的利益："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54]

火烧大栅栏使北京繁华的商业气氛嘎然冻结,但这场大火带来的心理效应更大,北京居民开始日夜不安。大火虽然没有波及使馆区,但使馆区连续三天处在大火的威胁之中。教会和教士的房屋、财产大部被焚,教士和教民中不少人还葬身火海。莫理逊在日记中说:“这个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公使团在大火期间也参与了放火,目的是将使馆周围的房屋主动烧掉,形成一圈空地,以切断火源,防止使馆毁于火灾。赫德写道:“为了自卫,我们将周围的东西一并烧光,使馆里面起火则是最糟糕的事情,每个小时都有意外发生。”[55]

四、大乱中的天津

天津的动乱与北京的有所不同。1900年6月初,义和团已经开始控制天津城。聂士成奉调到津沽线上后不受义和团的欢迎,他们称“鬼子聂”受洋人的贿赂才积极剿拳的。直隶总督裕禄不久成为义和团的朋友。在裕禄的下属、保定府的廷庸和臬司廷懋等人的撺掇下,裕禄也开始相信义和团神术。在裕禄的贴心心腹中,也有候补道台谭文焕之流的主抚派。天津的领事团对裕禄的转变并不知晓,以为他仍然是对洋人友善的。6月15日,英国领事贾礼士报告首相:“天津城已在拳民和暴徒手中,他们大烧教堂,并逼迫地方官员当街下轿。”贾礼士接着说:“总督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索尔兹伯里首相因此对裕禄的印象极佳。他命令伯蒂向贾礼士下指示,说总督先生一旦发现自己处境危险,“只要他愿意,可以让他到一艘英国兵舰上避难”。[56]英国政府对裕禄的期望如此之高,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天津的拳会首领有足够的时间来从容地展示他们的所谓神术。[57]拳首的一种伎俩是自称能够念咒起火,而且专烧洋人的房子。在他当众演示之前,已经做了手脚。拳首在半夜派人潜人空无一人的教堂,铺好柴草,一旦听到拳首在念咒请神附体的过程中发出的暗号,就开始放火。旁观者不知有诈,当然深信不疑。[58]

还有一次,拳首张德成命人在地里埋藏一把刀,然后他宣布此地

有凶杀之气。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又命人将这把刀挖出，以显示他有神术。张德成在1900年6月上旬到天津径奔总督府，他自称是“天下第一团”的首领。裕禄热情接待他，还向他提供金钱和武器的帮助。由于裕禄秘密支持拳会，天津义和团不久就发展得如火如荼。他们于14日开始焚烧两座教堂，幸运的是大火没有蔓延开来。然而在烧第三座教堂时出了问题，一批民宅毁于一旦。但是拳首却辩称焚烧期间，有某妇人出来倒了内有经血的污水。据说义和团神术非阴气不能破，所以无知街民反而怪罪那位妇人。

6月15日，义和团开始捣毁政府办公地点，据目击者的记载：“十九日辰刻，团人官电局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招乞丐负去。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执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9]

天津的女士也很活跃，组织了一支全由女性参加的“红灯照”，会员必须是黄花姑娘或洁身自好的寡妇。“红灯照”的坛场都与义和团的分开。为何“红灯照”成为时髦的女性组织？很多成员都被家庭礼教管得甚严，口述历史表明，很多“红灯照”成员对家长包办的婚姻不满，还有在家中受婆婆欺负的媳妇。[10]“红灯照”的领导结构参照义和团，首领称大师姐。但她们练功方法与义和拳术不同，“红灯照”一般是白天在家中静坐练功，晚上披红袍，举红灯，据说能飞檐走壁，空中取敌首级等等。有的人自称是董福祥或抗洋英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的妹妹，所以立即被接受为大师姐。很多民众都相信“红灯照”能够以神术让敌军的枪炮卡壳。更有甚者，宣称义和团神术阴气可破，而“红灯照”神术则天下无敌，无术可破。这类妄言，居然很有市场。

在天津的租界，外国人的财产尚未受到很大的损失，但驻扎在天津一带的外国士兵也开始大肆剿杀拳民。由于天津局势基本已经失控，所以双方冲突的规模比北京更大。冲突的导火线是6月初的静海事件。当时有一批外国人从保定逃难到天津，途中有部分人失散。领事团派洋兵前往接应；在静海县，洋兵看到不少青少年在习拳，以为是义和团，立即开枪，打死30多人。当地村民愤怒已极，开始攻击

教民以示报复。天津县令阮国桢面见裕禄请求调两营人马助他剿拳,裕禄没有批准,拳会势力在天津日炽。[61]

与北京不同,外国人在天津剿杀义和团根本不需要用拯救教民作为理由。大沽口外已有洋舰数十艘,洋兵可以有恃无恐,不把法律和秩序放在眼里。洋兵不惜使用各种重武器来对付义和团,在老龙头车站,俄军直接向人群发炮。据法国海军军官达乌拉的回忆,一个日军连队见人就开枪,毫无顾忌。达乌拉惊异地发现拳民并不畏惧死亡,有一次,一群放火的拳民被洋兵击毙,马上又有一批人重新上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62]在紫竹林租界巡逻的洋兵,在夜晚只要看到手中不提灯者就开枪射击。

天津地方官根本不能恢复秩序,天津海关道台和县令只能逃到总督府去避难。义和团将海关设施捣毁,而且从大狱中放出罪犯,他们还开始抢劫军火库。裕禄听说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采取任何行动。

天津居民对洋兵滥杀无辜愤恨不已,地方士绅数百人曾联名上书总督要求他与洋人交涉,因为天津租界在中国城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洋兵控制在租界以内,但裕禄毫无动作。洋人担心武器落入拳民手中,当时有谣言说紫竹林租界将是义和团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据当时记载:“天津人心之乱,更甚于北京,以匪党声言欲与租界为难,故居租界者心尤惴惴。”[63]

裕禄一方面秘密支持义和团,另一方面又在关注西摩联军的动向。他在1900年6月14日向领事团发出照会,请他们召回联军,领事团断然予以拒绝,并说如果中国保证使馆和家庭安全撤出北京,便不再增兵,但西摩还是一定要进京的。[64]裕禄对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接受,他对西摩联军的去向也不甚了了。但有大批拳民在天津,他还是感到多少有点安全。

领事团和大沽外的列强军事当局都与西摩失去了联系,他们整日焦虑不安。这样,在情况不明的背景下,军事逻辑必然占主导地位。领事团和军方开始考虑再增派部队去解救西摩,这样就一定要

攻占中国最重要的要塞——大沽炮台。6月14日以后，西摩联军从地平线上消失，二千多人不知去向。领事团和军方都觉得内疚，因为是他们在联席会议上做出的仓促决定，责任绝不可以互相推诿。

法国海军中尉达乌拉此时随侍总领事杜士兰左右。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杜士兰整日惶惶不安，对西摩联军的失败深感痛心，后悔当初未能全力阻止联军仓促成行的"幼稚"做法。各国海军官兵也认为此事是奇耻大辱，不少战友可能已经丧命。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下，寻求报复是最为大家接受的决策。领事团和军方都在头脑发热之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即强攻大沽炮台是否构成事实上的中外交战状态？多数人对这一问题根本不愿多加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外开战是在所难免的。

---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20页。

②同上，第122页。

③同上，第129页。

④Wehrle, E.，见第五章注㊿，第163页。

⑤《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1，第598—599页。

⑥Ruffi de Pontevès: *Les Marins en Chine*, p. 27.

⑦Wehrle, E.，见第五章注㊿，第167页。

⑧Seymour: *My Navy Career and Travels*, p. 75.

⑨王广运等：《廊坊大捷》，第一章。

⑩Pontevès, p. 62.

⑪Jellico: *The Boxer Rebellion*, pp. 14—15.

⑫Dix: *The World's Navies in Boxer Rebellion*, p. 75.

⑬Fleming, P.，见第五章注㉗，第78页。

⑭刘凤翰：《武卫军》，第662页。

⑮Pontevès, pp. 106—107.

⑯Hart Diaries, June 15, 1900.

⑰Militärarchiv, Freiburg, RM5, 5605. 又见 Scheibert: *Der Krieg in China*, p. 119.

⑱Fleming, P.，见第五章注㉗，第74页。

⑲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p. 115.

⑳Jellico，同上注⑪，第18—19页。

㉑*PRO*, 30/67/5.

㉒*Hart Diaries*, June 11, 1900.

㉓Fleming, P.，见第五章注㉗，第92—93页。von Soden, Freiburg, RM2/1861, p. 184.

㉔*Hart Diaries*, June 15, 1900; See also Francis Lauer, *Siége de Pékin*, pp. 220—221.

㉕*Belgi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Class* B 172.

㉖Lauer, p. 220.

㉗Pearl，同上注⑲，第114页。

㉘Plaschka: *Matrosen Offiziere*, *Rebellen*, p. 86.

㉙Giles: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p. 113.

㉚《日本外交文书》，卷33，别册1，第33页。

㉛《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史料》，卷1，第75页。

㉜O'Connor: *The Boxer Uprising*, p. 77.

㉝Myer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Defenses of the Siege of Peking*,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02, p. 544.

㉞Weale: *Indiscrete Letters from Peking*, p. 83.

㉟《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36—137页；《义和团史料续编》，卷1，第598页。

㊱《义和团》，卷1，第337页。

㊲同上，卷4，第194页。

㊳*Papers Related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 155.

㊴Giles，同上注㉙，第115页。

㊵Fleming, P.，见第五章注㉒，第95页。

㊶Allen: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p.79.

㊷Myers，同上注㉝，第54页。

㊸*China No. 4*, p. 21.

㊹Hart: *The Peking Legation*, p. 17.

㊺《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1，第598页。

㊻《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40页。

㊼《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1，第602页。

㊽同上，第599—601页。

㊾《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44—146页。

㊿Giles，同上注㉙，第118—120页。
51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第198页。
52《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史料》，卷1，第6页；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卷1，第338、348页。
53《高枬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46页。
54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23—24页。
55Hart，同上注⑯，第17页。
56 *China No. 3*, pp. 56—57.
57刘梦扬：《天津拳乱记闻》，见《义和团》，卷2，第12—13页。
58同上，第68页。
59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卷2，第142—143页。
60《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43—144页。
61《义和团》，卷2，第177—178页。
62Daoulas: *Le Siege de Tien-Tsin*, p. 37.
63佚名：《庸扰录》，见《庚子记事》，第249页。
64《义和团》，卷3，第180页。

第十二章

大沽之战——未宣布的战争

一、夺取炮台的决定

联军外交和军事当局终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西摩远征军。一天一天过去，远征军杳无信息。领事团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于是将挽救计划全部交给军事当局。因此，中外关系从此开始进入军事化阶段。然而，各国军事当局之间的争斗也未停止。1900 年 6 月 14 日，法国海军中尉达乌拉抵达大沽时，发现各国舰只停泊的位置非常有趣。法国舰队居中，右边紧靠着的是俄国舰队，也就是说"协约国"停在一起。左边是"三国同盟"，即德、奥、意的舰队。英、美则和日本舰队停泊成一个圆圈。[①]尽管矛盾重重，各国指挥官不得不进行合作，因为西摩联军中各国都有分遣队。从 6 月 15 日到 16 日，海军指挥官在俄国旗舰"罗西亚号"上召开联席会议。海军将领们意识到联军的军事形势并不妙，八国部队已经分成三个互相分割的集团。一个集团是西摩联军，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去向不明；另一个集团也是二千多人，在天津城郊的紫竹林保卫租界，而紫竹林距市区尚有5英里距离，所以这支部队也处

于孤立状态，并受到义和拳民的骚扰。如果中国正规军全面攻击租界，紫竹林很难抵御。所以，第三个集团，即大沽口外在军舰上的官兵的处境最好，而且他们对地面的情形尚没有直接的接触，对“中国佬”不屑一顾，士气仍很高昂。更重要的是，西摩联军的失利对海军官兵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促使他们一定要寻求报复。海军官兵在舰上待的时间也太长，急于上岸。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在大沽的海军将领们做出了一个“非凡”的决定：不惜一切拿下大沽炮台。

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来讲，攻击大沽炮台的行动将自动地使列强海军处于与中国交战的地位。实际上，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布朗中校已经接到伦敦方面的明确建议，要他不要在大沽登陆，而应选择北戴河，这样距离北京较远，政治上不会太过敏感，又对清政权有足够的威胁。很多在华的传教士们也认为攻击大沽炮台，只能起到使中国人团结一致抗洋的效果。[②]

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讲，攻取大沽炮台当时是一个必要的举措。1900 年 6 月 15 日的联席会议上，各方争吵不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德国的班德曼海军上将第一个提出控制天津和大沽之间铁路线的绝对必要性，没有这一条件，西摩联军和天津租界都难以挽救。然而，攻取大沽炮台又是控制铁路的绝对必要条件，俄国的希尔得布兰特海军上将说他不否认攻取大沽的重要性。但他又认为，这在国际法上无法解释：“如果我方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此类行动很难实行。”法国的古乐约尔海军上将支持俄国的看法，并说攻取大沽的兵源本身就不够，他建议将紫竹林守卫租界的洋兵撤回参战。所以，法、俄双方都认为公开开战将会给西摩联军和北京的公使团带来更大的危险。德国的班德曼再次反驳说西摩联军同公使团不是一回事，应当分别处理。他接着警告说，他已命令德国的“伊尔提斯号”炮舰做好准备，一旦大沽附近的联军控制的塘沽车站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就立即参战，法国海军上将并不反对这样做。最后，联席会议没有就攻取大沽达成共识。[③]

第二天，联席会议再次召开。这时有消息说中国政府正在从山

海关调兵增援大沽，班德曼再次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其他海军将领也开始对他的建议感兴趣。大家这时都将国际法的问题抛在一边，讨论纯军事问题。英国海军少将布鲁斯仍然对兵力表示怀疑，但法、俄指挥官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立场，支持班德曼的提议。法国的古乐约尔甚至提出明晚动手，因为气象报告判断6月17日潮水上涨，便于行动。日本指挥官表示同意，并说："如果我们不动手，中国人就会先下手。"英国的布鲁斯少将仍然心存疑虑，说他从天津某领事那里听到一个说法，"攻取大沽等于给在中国的外国人判死刑"。但他不再反对这个行动，因为英国在中国的经验表明动武是必要的。这样，各国指挥官都开始趋于一致。只有美国的坎卜夫海军上将再次提及这个行动对中国的政治后果，他说这样做是满族王朝灭亡的开始。但其他将领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感兴趣，因为这个决策纯粹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将领们知道在国际法上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大家开始关注天津领事团的态度。英国的布鲁斯认为领事团会理解这个决定，而德国指挥官说德国领事以他的意见为准。他同时建议，为了证明这是集体负责的决定，应当在攻击命令上按资历顺序一一签字。

最后一个难题是，如何能做到既能保证攻取大沽的奇袭效果，又能掩盖偷袭的性质，且在日后又可以自圆其说。法国的古乐约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应当事先通知中方？"商量的结果是，向大沽炮台中国守军司令递交一份最后通牒。班德曼上将进一步建议，该通牒需明确要求中方解释他们对外国人敌对行动的准备工作，而且要在6月17日午夜之前派信使送交正式答复。如果中方不交出炮台和对其行动做出满意的解释，联军将在夜里两点钟发动进攻。[4]

从军事上讲，夺取大沽炮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沽炮台是四座堡垒结合形成的一个现代防御体系，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来犯的敌舰从海上进入白河口。在几十年前，这个炮台就有相当的防御能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守军曾将英舰阻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英、法联军于1860年登陆夺取炮台，从而打开了通往

北京的道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方雇请德国技术人员，花巨资重新改造大沽炮台。到了19世纪末，它已被普遍认为是攻不破的堡垒。中国在炮台的守军有3000多人。炮台的武器装备也不断被更新，采用的多是比较现代的技术，其中有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快炮多门。在快炮之下，还有一个军事码头，里面停泊着不久前从德国买回的4艘崭新的鱼雷舰。炮台的正面是一大片开阔地，上面布满尖桩，没有掩护体，易守难攻。

在联军方面，自1900年3月份开始共有30来艘军舰停在大沽地区，但只有9艘可以参加行动，因为白河口的水位太低，面积太窄，大型舰只无法靠近。河口宽度不到200米，水深在2英尺和17英尺之间，要看潮水的涨落情况。联军参加的部队如下：

英国皇家的"费姆号"和"怀亭号"驱逐舰，时速30海里；

英国皇家的"爱尔杰林号"，三桅舰，速度慢，装备陈旧；

德国的"伊尔提次号"与英国的"爱尔杰林号"属同一类型，但前者速度稍快；

俄国的"吉里亚克号"炮舰，体积较小，但比较先进；

俄国的"鲍布尔号"，老式钢板炮舰，非常笨重，不灵活；

德国的"克里茨号"炮舰，比"鲍布尔号"的装备要好；

法国的"狮子号"老式炮舰，两门大炮，数挺老式机枪；

日本的"爱宕号"老式铁甲舰，一门大炮和一些机枪；

美国的"莫瑙克西号"，本板蒸汽轮舰，两天前刚到大沽。

这9艘军舰中，美舰"莫瑙克西号"不能参战，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在中国与他国结盟。日本的"爱宕号"携带大量弹药，参战太危险。所以联军方面参战的只有5艘炮舰和2艘驱逐舰。参战的水兵有900余人，由除了美国和奥匈帝国外的6个国家的兵力组成。官兵士气高昂，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局势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作战能力非常轻蔑。英国海军上尉迪克斯回忆说，当时在英舰上最流行的笑话是：一位面色黝黑的水兵看到大量的麻布绳，问做何用，他的同伴回答道："绑中国佬。"他说："这远远不够，再给我一

打。”[5]

联军制定的战术是先炮击大沽炮台，然后在中方无力招架时让攻击部队迅速登陆。联军这时已万事俱备，作战计划既定，舰只已经集中，攻击部队人选已确定，惟一剩下的事情是要找到攻打大沽炮台的借口，但这十分困难。中国军队处于守势，而且在天津没有与洋兵发生冲突，而这时西摩联军在廊坊受董福祥军队攻击的事件尚未发生。于是，联军方面绞尽脑汁，最后只得以中方试图关闭白河口为理由发动攻击。

然而，中国守军如果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大沽炮台对联军并不形成直接的威胁，因为塘沽车站已在联军手中，运输线已经畅通无阻。如果中国军队关闭白河口，联军的运输线就要有随时被切断的可能。所以，联军利用中方在白河口布置水雷的传闻作为向中方抗议的正式理由。驻津的领事团对军方的这种做法表示完全支持，因为外交官此时已经一筹莫展，只能让军事逻辑来取代外交逻辑。

八国的开战决定还不能算是一致通过，美国的坎卜夫海军上将鉴于政府的政策，拒绝在联军给中方的最后通牒上签字。法国和俄国的将领在私下里也认为此举等于宣战，坎卜夫对法、俄的态度从反对开战到参战的变化大惑不解。他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说他相信法、俄参战的动机是担心英国人单独行动，因为西摩联军是以英人为主导的行动，攻取大沽炮台的主要原因是解救去向不明的远征军。[6]

坎卜夫从他的旗舰上收到旗语信号，说中方正在试图封锁白河口。坎卜夫不大相信，他向海军部的报告中提及此事，说中国方面不是在布雷，而是在布航标。在开战前的 6 月 16 日下午，坎卜夫向海军部发电，请求给予明确指示，美国海军是否参加当晚的攻击行动。但是海军部长约翰·朗是政客出身，曾任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当时正在忙于争取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所以，坎卜夫的电报直到 8 天以后才送到约翰·朗的手中。坎卜夫没有办法，只好在一旁观战。[7]

西摩远征军出发以后，大沽联军将领中军阶最高的是俄国海军上将希尔得布兰特，所有的命令都以他的名义发出。希尔得布兰特于6月15日发布一道命令：第一，中国军队正在试图占领塘沽车站，切断铁路运输线；第二，中方试图用鱼雷舰封锁白河口。值得注意的是，这道命令并没有提及中方在布水雷这件事。[8]而鱼雷舰一直就在大沽炮台停泊待命，并无新的动作。可见联军方面直到6月15日还没有找到可以自圆其说的开战理由。

《中国与联军》一书的作者亨利·萨维奇·兰道猜测说，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的决定是由1900年6月10日载漪被任命为总理衙门领班大臣这件事引起的，因为天津的领事团和大沽口的联军当局认为对中国再采用外交手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它假设联军的决定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其实不然。萨维奇·兰道还说，联军给大沽炮台的中国守军极为有限的时间撤出炮台的做法是由于中方已在做"战争准备"，此说也同样没有根据。[9]

从军事上来看，攻取炮台的部队比西摩远征军有长处，对付中国军队也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很多官兵已经有过多国联合协调作战、攻取海岸堡垒的经验。1897年攻占希腊克里特岛的各列强的海军联合登陆行动便是一例。此外，海军在陆上进行远征作战不是它的长处，而攻打海岸防御工事则往往得心应手，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炮火支援。总而言之，联军攻取大沽炮台的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胆大、运气和外交计谋。对中国来说，大沽攻防战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三、"杜士兰最后通牒"的真相

直到1900年6月16日上午，联军方面还没有找到能够说得通的开战理由，所以领事团和联军当局只能用一个肮脏的外交计谋来达到目的。他们决定以领事团团长杜士兰的名义，向中方提交正式的最后通牒，要求中方守军在17日凌晨2时以前撤出，如不允许，列

强将动武。奇怪的是，这份"杜士兰最后通牒"并没有立即送交直隶总督裕禄。据中方的史料，最后通牒直到17日清晨5点钟才到达总督府，而此时中外在大沽的激战已经开始了数小时之久。领事团和联军当局是否有意拖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史家也鲜有人注意。但是从杜士兰的侍从武官、法国海军中尉达乌拉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达乌拉回忆道，一开始杜士兰对向中方开战还有疑虑。16日上午，他和达乌拉一起在领事馆楼上观看天津城内的一场大火，他笑着对达乌拉说："这把火可要把裕禄总督好好烤一烤了。"达乌拉突然发现法国的天主教堂、著名的望海楼也在被焚烧的建筑之中，这时杜士兰勃然大怒。望海楼是法国文化在天津的象征，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曾被烧毁，后来根据《天津条约》重建。杜士兰感到忍无可忍，立即改变主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告诉达乌拉说裕禄今晨刚刚送信来说要保护望海楼，"他得用脑袋来进行补偿！"杜士兰说完后立即拿起电话，与在大沽口的古乐约尔海军上将通话。因此，正在参加联军将领联席会议的古乐约尔上将立即与俄军将领进行紧急协商，这就是法、俄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德国指挥官建议的由来。几个小时以后，领事团与军方代表在俄国领事馆召开了会议。会议结束时，杜士兰告诉达乌拉他们已经决定向裕禄提交一份要求占领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达乌拉对这个仓促的军事行动计划表示不安，说攻击部队没有后援是危险的。杜士兰不过哼了一声："那又怎么样？"[10]

裕禄在6月17日清晨5时才收到最后通牒，他气愤地向朝廷报告说，这份通牒的发出时间居然写明为十六日，"此文二十（注：指阴历五月二十）发，二十一日卯刻始行送到。"他认为这不合国际惯例，分明是外交欺诈。[11]法国使馆的一等秘书当都阿男爵当时正在天津，他在回忆录中试图解释为何16日发出的最后通牒在17日才送到。他说杜士兰将该通牒交给一位中国仆人，要他送往总督府。但此时已经是半夜12点钟，大沽炮台战端已开，由于路上危险，该仆人要求

付给6个法郎。当都阿仍然没法解释送信人何以在5个小时的时间内都没有送到。[12]很明显，领事团和联军当局本来就不打算过早地通知中方，不给裕禄有足够的协调备战的时间。攻取大沽的战斗是奇袭，所以从外交惯例上来讲，最后通牒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任何国际法基础。

但是联军的运气很好，因为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最后通牒，这就是海军将领直接送交大沽炮台指挥官罗荣光的那一份。根据中外史料，即使这份通牒也仅仅在联军准备动武的5个小时前送达的。罗荣光的报告表明，6月16日晚9时许，一名俄国海军军官由两名英文翻译陪同，突然来到炮台。他们首先声称中国军队在白河口布置水雷，继而又指责中国政府在剿拳中无所作为，最后他向罗荣光递交了一份由希尔得布兰特海军上将签署的最后通牒。该通牒称中国政府已经与义和团勾结；在铁路沿线布重兵，并用鱼雷舰封锁白河，它要求中方守军在凌晨2时之前撤离。罗荣光欲与之争辩，说时间如此之急，他需要与上级联系，所以凌晨2时之前不可能有回答。俄国军官不予理睬，拂袖而去。[13]

罗荣光的说法在联军方面的史料中也被证实，德国帝国军事档案馆中有一份关于大沽之战的日志。该日志是用法文写成的，所以表明这是联军中间散发的标准作战记录。该文件记载，最后通牒在6月16日上午就已经拟就，但到晚上9点多钟才由俄海军上尉巴赫梅提耶夫送交罗荣光的。罗荣光称他一定要接到上级指示才能行事，他对联军发起攻击将不负责任。巴赫梅提耶夫指责罗荣光制造借口，有意掩盖中国政府的真实企图，然后离开炮台，于11时左右回到他的炮舰上。[14]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罗荣光接到最后通牒的时候，联军舰队早已起锚，并到达指定的位置。整个军事行动是从6月16日下午3点25分开始的。[15]综上所述，攻打大沽炮台的行动绝不是事先向中方宣布，以真正的最后通牒为基础的。中方政府事先根本不知道，而大沽守军只有极短暂的时间来考虑最后通牒，而且中国守军指挥官不可

能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所以这是一场突然袭击，是联军方面有意这样设计的。

联军的行动时间非常从容，中方守军连仓促应战的时间都不够。不幸的是，“最后通牒”在凌晨2时的限期还未到时，大沽炮台突然在凌晨1点钟先发了一炮，战争正式开始。西方的史料都指证第一炮来自炮台，而中方的一些当事人报告，包括罗荣光的报告，都称洋舰先行开炮。应该说，炮台先开一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说中方在紧张备战之际，管带封得胜手燃炮身误发一炮。[16]实际上，在当时的气氛下，谁先开炮本身并不重要，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联军本来就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进攻的。但从道义上讲，大沽炮台先发一炮反而给联军方面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最佳借口。不管怎么说，中方在最后通牒尚未过期之前就开炮，对联军是件幸运的事，因为这样就可以被解释为是中方挑衅的结果，从而掩盖联军的真实意图。

西方的史料对大沽攻防战的记载多有偏颇，一般认为中方不堪一击，官兵素质太低。实际上，尽管中国守军仓促应战，大沽的防守还是可圈可点的。罗荣光不能与上级及时取得联系，他知道增援部队不可能到来，但他仍能依靠现有兵力，坚持抵抗联军达6个小时之久。

在战斗中，除美舰以外，各舰的登陆部队都能及时上岸。他们登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的两艘驱逐舰在基斯少校的率领下，抢先夺取了中方停泊在炮台下码头的4艘鱼雷舰，英方无一伤亡。后来才发现，中国鱼雷舰官兵刚刚准备就绪，鱼雷已经进入发射位置，再晚一步，对联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联军进攻的顺利还有偶然因素。在双方交火激烈的时刻，联军的舰队曾一度受到中方强有力的火力压制，但联军的一发炮弹居然打中了炮台的弹药库，引起巨大的爆炸。不久联军又击中另一个弹药库。中方守军在爆炸中伤亡惨重，军心开始动摇。天亮时，中方的抵抗已被削弱，联军部队攻占第一座炮台以后，防守已开始崩溃。但罗荣光仍然坚守岗位进行指挥，

到17日上午8时才命令残部撤出炮台，至此大沽炮台完全沦陷。

在战斗中，中方的火力既猛又准。守军炮火打沉俄舰"吉里亚克号"，重创德舰"克里茨号"和"伊尔提斯号"，击中法舰"狮子号"和英舰"爱尔杰林号"。美舰虽未参战，也受到一枚炮弹的轻创。该舰长不敢贸然回击，怕战后受坎卜夫上将的处分。联军方面战死172人，其中包括德国的赫尔曼上尉，"伊尔提斯号"舰长兰斯受重伤。在开战的前一段时期，中方处于有利形势。罗荣光在报告中说，在17日早晨4点钟左右，他查看形势，觉得胜利在望。但在5点钟，弹药库被击中以后，中方开始一蹶不振。中国官兵的抵抗还是很勇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达千人左右，不少人在弹药库爆炸中丧生。

尽管联军方面不愿意承认，但是大沽战斗是中外交战的正式开始，不宣而战的事实不容抵赖。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贝倍尔在帝国会议中称"大沽的占领是宣战"。[17]西摩海军上将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毫无疑问，我们攻取中国军队防守的大沽炮台的行动是对华的战争行为。这个说法既不过分，又不是不到位。"[18]英国驻华武官布朗上校认为攻占大沽实属没有必要，他给国防部的报告中称："联军完全可以选择北戴河作为登陆地点，那里有通往天津的铁路。"[19]然而，在华的外交官和军事当局做出此等决策完全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其直接目标是拯救西摩联军。正如一年以后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所承认的："攻取大沽炮台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挽救西摩远征军和改善总的形势。"[20]大沽战役的政治和外交后果被联军方面有意识地忽略了。

应该注意的是，在天津的领事团在决策过程中也可能犯了一定程度的判断错误。杜士兰就以为裕禄一向态度软弱，会接受最后通牒的要求的。据达乌拉中尉的回忆，6月17日上午，总领事的中文秘书李某从总督府捎回裕禄不能接受通牒的信时，杜士兰大吃一惊，立即命令达乌拉派人夺取裕禄的专用汽船。[21]

对清廷来说，占领大沽炮台是战争的开始，但中方并没有立即对列强宣战。大沽炮台在17日上午沦陷，中方的宣战却在20日。为

何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多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中最流行的一种理论来源于当时在华的外交官，他们认为慈禧太后一方面有意不让公使团知道大沽被陷的事实，另一方面她的备战尚未完全就绪。其他还有种种神秘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神秘的、不可告人的因素。清廷未能下决心开战的原因是对大沽的情况不明，中外史家都没有搞清这个关键问题。津京之间的现代通讯已经中断，而裕禄又不愿及时向朝廷报告大沽的实情。战后有不少列强的政府报告中都称大沽炮台先开一炮是慈禧太后直接命令的。美国战争部在1901年的正式报告中称：

> 中方的先行开火据说是收到了太后的紧急命令。中方认为最后通牒是宣战照会，而且认为列强已经决定要瓜分中国。如果这第一炮是太后的命令，这就证明中方在切断公使团的通讯渠道以后，自己保留了一条电报联络渠道。[22]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实际上，从6月10日以后，中方采用的是快马传信的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通讯手段的中断给清廷的决策和判断也带来了极大的障碍。从17日到20日的3天中，慈禧太后的决策也开始出现种种失误。

三、御前会议的争论

从1900年5月份开始，慈禧太后对直隶和北京地区的危机一直是被动的反应，大多数的决策是即时做出的。很多"上谕"和"廷寄"互相矛盾，对列强是否开战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桌面上来讨论。到了6月中旬，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促使清廷讨论和战问题的是西摩远征军的行动，因为这一行动直接危及太后政权的生存。京城地面被洋人和拳民引发的大乱使得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6月16日，

津沽地区的联军当局在计划攻取大沽炮台的同时，慈禧太后召集所有在京的高官出席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在这个近百人参加的会议上，太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对付西摩联军的问题上。但是，失去了权力，行动也不自由的光绪皇帝率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于是引发了一场朝廷仇洋权贵与汉族南方士大夫的激烈辩论。主和派坚称义和团是朝廷的叛逆，"用拳抗洋"绝不可行。端郡王载漪打断他们的发言，并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侍讲学士刘永亨请求朝廷命令董福祥甘军将京城的拳民一律清剿，载漪举起大拇指，大呼："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太常寺卿袁昶不畏权贵与诸王等力争，他说拳民法术不足恃，即使他们有法术，也不能靠他们保卫国家。此时慈禧太后突然介入，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这样一表态，多数主和派吓得不敢出声。翰林学士朱祖谋提出谁能统领义和团上前线抵御洋兵？太后答道："我恃董福祥。"朱祖谋说："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汝言董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朱祖谋无言以对。这样，义和团问题被暂时搁置一边，但慈禧太后想"用拳抗洋"的心态已经暴露无遗。

慈禧太后接着转到如何阻挡西摩联军的问题上。她虽然最担心联军进京的真实目的在于推翻她的政权，但她不能在这样的场合公开说出来。所以大家开始讨论如何阻止洋兵的策略问题，人人各持己见，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最终的决定权在联军当局手中。大家都明白，只要朝廷不大力剿拳，公使团不肯做出任何让步。值得注意的是太学士荣禄在这次会上基本没有表态，他明白太后"用拳抗洋"的真正用心，所以不愿在御前会上公开与她的意见不合。荣禄习惯于在幕后活动，他只是在调兵问题上参与了讨论。在调派刘坤一还是袁世凯到直隶来主持的问题上，他认为袁世凯更加合适。[23]

新任总理衙门大臣那桐是属于太后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后裔。慈禧太后指着天上烟痕曰："你看这样如何办？"当时火烧大栅栏正在进行。那桐的回答令所有的人都吃一惊，他坚决地说："须先保使馆，而

后剿抚兼施。"太后又问他："洋军要来，你能阻之否？"他答道："能，还有许景澄亦能，乞同派往。"于是，那桐和许景澄立即奉命出城劝阻洋兵。[24]

由于会上的气氛因此为之一变，清廷做出了几项较为温和的决策。第一，那桐、许景澄出城劝说联军返回天津。当时清廷并不知道洋兵在何处，以为已快到北京。第二，大学士荣禄负责全力保护使馆。清廷为此特颁一"上谕"。[25]同时，又有一谕发给直隶总督裕禄，告诉他荣禄已负责保卫使馆，他应向杜士兰总领事说明应按先前承诺，不再续派洋兵北上。如果杜士兰不听，"则衅自彼开"。该谕还要求直隶、天津地区的官兵不能再放洋兵进京。[26]

第三个决定是用拳民参加防御作战，责成大学士刚毅和董福祥将青壮年拳民"招募成军，严加约束"，同时遣散年老体弱的拳民。实际上，慈禧太后此时对"用拳抗洋"仍不放心，在给刚毅等人的"上谕"中特别提出："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严加察验，谋定后动。"[27]载漪的弟弟载濂在同一天上奏，他对不少大臣怀疑"用拳抗洋"的政策表示不满。他说："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趁势扰乱。"贝勒载濂接着强调："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倘饬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28]

会议的最后一个决策是调兵入卫，命令袁世凯立即亲率其武卫右军开赴直隶。御前会议的结果表明，尽管仇洋派得到了"用拳抗洋"的机会，慈禧太后的关注重点在于阻挡洋兵，稳定局势，积极备战。当然，最佳的解决方法仍是劝阻西摩联军撤退，太后在和战问题上还未下定决心与洋人彻底决裂，所以宣战与否在会议上没有被提及。

第二天，即1900年6月17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桐和许景澄出城劝阻洋兵的使命被拳民阻止，两位大臣被扣留，遭谩骂，只好折回北京。此时京城已经大乱，大栅栏地区被熊熊大火焚烧

殆尽。

然而,朝廷在这一天收到的最震惊的消息是联军当局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对慈禧太后来说,大沽炮台在四十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守是最揪心的一段往事,当时英法联军自海入侵,直取北京,二十几岁的她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到热河。英法联军在北京大肆烧杀,圆明园毁于一旦。咸丰帝不久死在热河,没有看到北京的惨景,而她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四十年前,中外处于正式交战状态,而现在战端尚未开启,洋人就已经强行索要大沽炮台,意图打开通往北京的门户,其中必有叵测居心。尽管她对此感到忍无可忍,但她还是竭力控制自己,因为裕禄在6月17日的报告中只说洋人索要炮台,守军准备抵抗,并未提及炮台已陷的事实。

整个朝廷上下一片混乱,慈禧太后立即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会议上大臣们更是争吵不休,情绪非常激动。由于洋人欲强占大沽炮台,和战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心议题。慈禧太后知道一旦炮台失陷,战争不可避免,于是她决定在会上亮出底牌,将大家都不敢提及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据恽毓鼎的记载,太后拿出一份洋人照会,内称:(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太后归政。

慈禧太后本来宣布洋人照会的四条内容,但她有意没有宣布最后一条,大家都很纳闷。然而,即使是前三条,洋人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2]在这种情形下,御前会议上的主和派被彻底削弱了。慈禧太后在会上搬出一个所谓照会,终于道出了她积压在心里已久的心声。

长期以来,恽毓鼎的说法被认为最有权威性;然而其他当事人没有类似的详细记载。关于照会的由来,恽的解释也不十分清楚,洋人并没有发出这样一个照会是毫无疑问的。恽称此照会来自江苏粮道罗嘉杰。罗是荣禄的门人,他在6月16日半夜遣其子到荣府传递了这个照会。荣禄阅读照会以后,终夜不眠,最后决定呈交慈禧太后。[3]从逻辑上讲,荣禄既为主和派,他完全可以将此照会隐瞒下来,因为他不能不明白该照会对慈禧太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荣禄为

何将此件上呈,尚难以解释。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有端郡王载漪伪造照会一说,据称载漪的目的是有意刺激太后,迫她下开战的决心。此说既无根据,也不符合逻辑。载漪即使伪造洋人照会,也不会启用荣禄的亲信罗嘉杰传递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罗嘉杰在战后并未受到处分,如果他直接参与了这一阴谋,必然难逃法网。

近年来,有的学者如林华国干脆对这次御前会议有没有出现假照会一事表示怀疑。林的论证在某些方面是有道理的,比如对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的部分涉及照会的内容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后人加进去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假照会当廷宣读一事根本没有发生,那只能说是恽毓鼎本人伪造了这段关键历史。但恽的动机何在?恽的《崇陵传信录》发表于 1911 年,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是反满的,他完全没有必要加进假照会一节为慈禧太后在宣战上的责任作了部分的开脱。[31]

林华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假照会的内容在当时已有流传。盛宣怀在 1900 年 6 月 23 日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就提及此事,他说:"洋人照会,中国信用乱民,地丁、兵权归洋人主政,两宫不允,决计开仗。"[32]盛宣怀的消息来源肯定与某个与会者有关,因为"太后归政"这一条不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家属在他于 1901 年死后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中,认为盛宣怀的电报中有忌讳的内容,所以把这一段刻意删除。

此外,叶昌炽的日记中也提到他的一位参加御前会议的朋友告诉他有洋人照会一事,内容是代管兵权和钱粮,没有提及另外两条与"太后归政"和"光绪地位"有关的内容:"风石(注:陆润庠)自内廷急召归,喘息未定,云皇太后皇上六部九卿云:洋人要约二条,一,天下兵权尽归节制;二,天下钱粮尽归征收,将不国矣。"[33]

西方史料当中,惟一提及假照会的是白克浩司伪造的《景善日记》。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已被英国学者特莱沃·罗柏的《北京隐士白克浩司》一书彻底揭露。尽管如此,白克浩司是北京使馆被围的幸存

者,在中国圈子里有很多朋友,他的《景善日记》固然不可靠,但他完全有可能听说过假照会一事。不管怎么说,如果假照会确实在会上出现,其来源仍不清楚,笔者在此也不妨做一种推测。很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恽毓鼎关于罗嘉杰传信一说的另一个方面,即假照会的来源不在北京,而在上海。在上海江苏地区的地方官大都是主和派和剿拳派,他们当中不可能有人伪造直接能够引发战争的照会。但是在上海还有一批著名的同情"维新变法"的外国人,他们当中很多人直接参与过康梁变法,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是康梁的主要支持者和顾问,他有一个特点,喜欢提出一些气势宏大,但并不现实的改革方案。英国外交部对他非常反感,常常敬而远之,认为他的主张完全是幻想。在华北地区陷入混乱,中外冲突一触即发之际,李提摩太这样的人很可能又开始设计未来中国的蓝图。假照会中关于代管中国兵权和钱粮的两条,在 1897—1898 年维新运动中就被李提摩太提出过。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帮助列强瓜分中国,而是为了以国际共管的方式防止列强在华的冲突升级。关于"太后归政"和"光绪地位"的两点当然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有关,维新派都认为光绪复辟是继续推行变法的惟一保证。更值得注意的是,1900 年 7 月间在使馆被围、八国联军开始组建的时候,李提摩太向各列强政府发过一封信,再次强调国际共管中国事务的必要性。[39]

因此,笔者推断,李提摩太的几条建议虽然不构成外交照会,但这样内容的东西被在上海的江苏粮道罗嘉杰获取后,罗以为这份东西代表列强政府的共同立场,感到事关重大,立即遣子将其内容报告荣禄。荣禄虽然不至于把这份东西看作是正式照会,但他明白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洋人派兵的真实意图。他本人对皇位继承问题也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他不得不将此件面呈太后。

不管假照会的来源如何,它在御前会议上的出现是没有疑问的,它的内容正是朝廷从 1900 年 1 月份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对慈禧太后来说,形势已经明朗,西摩联军和强索大沽炮台的动机都是要推翻她的政权。她对洋人意图的猜测由此得到证明,既然已无退路,她

惟有选择开战。慈禧太后的个性刚强,办事果断,她绝不会坐以待毙。罗嘉杰的信来得恰是时机,因为慈禧太后已经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拼,保住她的地位,而将此信宣布为洋人照会更加能够使她的开战决定合法化。

仇洋派的皇亲国戚知道他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已经到来,一起在御前会上声泪俱下,坚决主战。袁昶在日记中记载至少有20余人和崇绮一起大哭大喊,请求立即对洋人开战。[35]大学士荣禄在给奎俊的信中说,皇亲国戚当廷大喊:"奴才等近支子孙,总以社稷为重,若不战,白白给他们,断不能甘心。"[36]这些人还指责荣禄惧怕洋人,荣禄也当廷痛哭,说愿以死为国效劳。光绪帝见状大恸,也痛哭不已。在这种气氛下,主和派噤若寒蝉,不敢再发一言。毫无疑问,外国人要求交出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对慈禧太后的态度起了根本的影响,她不得不明确表示她的主战立场。她在一片主战声中高声宣布:

>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37]

朝廷仇洋派情绪十分激动,其中一人竟然用义和团揭帖的说法来证明洋人必败。据他说:"缘庚子至庚子,渠等在中国搅扰已一甲子,此时正天收时也。"[38]但是,主战派主导的这次御前会议突然发生了变化,两位满族大臣站出来与仇洋派抗争。一位是内阁学士联元,另一位是户部尚书立山,这两个人与皇室的关系密切。联元是庄亲王载勋的家臣,立山曾任内务府大臣,颇受慈禧太后的欢心。立山生活奢侈,喜欢搜集古玩,听京戏,玩女人。据说他在京城的"八大胡同"为了名妓赛金花与王公贵族子弟争风吃醋。[39]立山为何突然站出来,其原因并不清楚。

联元是一个品性端正的学者,他曾经一直坚持保守思想,反对任何改革措施。他这次的态度使得不少人都吃惊,很可能联元受到女

婿寿富的影响。寿富是皇族血统爱新觉罗氏后裔,但他的经历比较特殊,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改革派人物,他写过不少文章鼓吹维新和重振皇族子弟的事业心。在寿富的影响下,联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甲午战争以后,他逐渐开始同情维新思想。

在联元、立山两位的带动下,守旧大臣、汉人兵部尚书徐用仪也决定站出来与主战派抗争。徐用仪认为中国的军力太弱,根本不是洋人的对手。慈禧太后看到新出现的主和派实力很大,她决定让他们再试一次,命他们去公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炮台,否则便"下旗回国"。慈禧太后虽然已经倾向主战,但是天津方面关于大沽的后续消息未到,她仍然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争取给和平解决一个机会。

但是裕禄迟迟不肯续报大沽和天津方面的实情。1900 年 6 月 17 日上午大沽已经沦陷,但清廷只知道洋人递交了最后通牒。应当再一次指出的是,清廷并没有保持一条单独的电报渠道,天津方面来的消息完全依靠快马传递。裕禄不愿及时报忧,朝廷没有其他的信息渠道。[40]

三位新主和派大臣立即被慈禧太后命令去与公使见面,立山突然怯场,声称他对外交不熟悉。慈禧太后很不高兴,指出他在 1898 年曾接待过率舰队来华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立山实际上是害怕今后落下私通洋人的罪名,他的政治嗅觉力是很强的。几周之后,中外业已开战,这三位和许景澄、袁昶都以通洋罪名在菜市口被斩。6 月 18 日上午,联元、立山、徐用仪三大臣去英使馆面见窦纳乐,会谈的气氛甚好。据窦纳乐于 1900 年 9 月 20 日的报告:"立山给我的印象极佳。"中方大臣关心的重点是西摩联军的去向,并强调联军在铁路沿线受拳民骚扰不代表官方的政策。窦纳乐说,如果中国官军参战,性质将大不相同,立山保证向慈禧太后面呈实情。窦纳乐觉得立山强调"中外不应失和是真心诚意的",但他对三大臣的来访目的仍不能够理解。他推测道:"最简单而又可能的原因是仇洋派假意允许这些主和派大臣前来谈判,但主战派是绝不会在谈判的

条件上做出任何让步的，所以这次来访形同儿戏。”[41]

应该指出，窦纳乐在三位大臣造访的三个月之后仍不认为这次访问有多少重要性。三大臣提出的一条要求是请西摩联军在黄村暂住，窦纳乐一口回绝。三大臣接着又到其他使馆造访。据美使康格的回忆，陪同他们的许景澄对美公使说：“使馆卫队已在京城造成人心惶惶，再续派洋兵实无必要。”康格的态度更加骄横，他警告说如果他手中有一千洋兵，他将杀尽全城的拳匪。他接着强调说：“如果我的家人或使馆任何成员受到伤害，美国军队将毁掉北京城。”其实康格的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他对外国人在北京的“猎取拳民行动”甚感忧虑。在 1900 年 6 月 18 日写给海约翰的报告中，他描述了 6 月 17 日中国士兵与德国水兵的一场冲突：“外国士兵所表现的技术和勇气虽然可嘉，但使得中国的士兵和老百姓更加仇视洋人，这就使得我们人数有限的使馆卫队处于更危险的境地。”[42]

法使毕盛也开始变得较为谨慎起来，因为联军迟迟不到，毕盛不愿制造新的麻烦。6 月 18 日，法海军舰长拉布鲁斯在街上看到大学士徐桐，他决定将其抓获，于是率人把徐桐堵在街口，他捎信给毕盛请求把徐桐看押起来作为“最佳的人质”。毕盛很不高兴，命令拉布鲁斯不可放肆，中国不是印度支那，徐桐是朝廷大员，拉布鲁斯只得悻悻作罢。[43]

本来三大臣访问使馆时还想告诉公使不要在大沽进行军事挑衅，窦纳乐显然对此事一无所知，所以中方大臣在大沽战事不明的情况下没有提及最后通牒一事。这样，在裕禄缓报实情和清廷最终得知大沽被陷的几天中出现了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对清廷是一种危险的误导，因为慈禧太后仍然对保住大沽怀有一定的希望，所以在这关键的几天里做出一些不寻常的决定是不奇怪的。

1900 年 6 月 17 日的御前会议，还决定了统率义和团大员的头衔为“京师义和团练大臣”。[44]由于新的主和派的出现，和战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于是太后决定在 18 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由于主和大臣赴使馆会谈一无所获，会议开始讨论如何对付骄横的公使团。载

漪立即抓住机会,要求攻打使馆。联元再次站出来与载漪抗争,他认为攻打使馆只能带来洋兵入城烧杀抢劫的恶果。载漪之弟载澜于脆说联元私通洋人当斩,多亏庄亲王载勋出面保驾,联元得以生还。

大学士王文韶一向胆小,这时也起来支持联元。但慈禧太后愤怒地拍桌大喝,逼问王文韶有没有办法阻挡洋兵?王文韶吓得无言以对。王文韶的门生许景澄用国际法的道理来说明攻打使馆不可行。光绪帝非常激动,一时忘了君臣之间的礼仪,一把抓住许景澄的手,请太后放弃开战的念头。慈禧太后大怒,喝令"皇帝放手!"攻打使馆一事虽被认可,但具体时间和计划都未确定。同时,清廷也不打算颁布"上谕",来解释从"实力保护使馆"到攻打使馆的政策变化。[45]这样,连续三次御前会议在和战问题上仍未做出明确的决定。仇洋派希望进攻使馆是中方宣战的开始,但进攻的时间并没有定下来。很显然,即使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慈禧太后的头脑并没有发昏。她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和平解决中外争端,她仍不愿意放过这种机会。所以,大沽炮台失陷与否成了她下一步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

四、第一次天津战役

在清廷激烈辩论和战问题的同时,不宣而战的天津战役已经开始。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开战理由是充分的,因为联军以突然袭击方式攻占了大沽炮台。天津战役的重点是紫竹林租界攻防战,史称"第一次天津战役"。"第二次天津战役"是指联军防守成功以后开始攻打天津城的战斗。天津分为两部分,一是城墙以内的城区,一是城墙以外的郊区。紫竹林租界在郊区,以德、法、英三个租界划分约 500 公顷地面。租界内经济比较发达,各种设施完备,有医院、学校、旅店和教堂。

1900 年 6 月 17 日大沽炮台失陷时,租界守军有 2500 多人,其中 1800 人是俄国部队。大沽失守的当天,攻打紫竹林的战斗就开始打

响。聂士成军奉命在津沽线上阻击前来增援的洋兵，聂士成率3000人在军粮城成功地截住了联军。双方交战激烈，乘坐火车的联军在军粮城被困。

与此同时，裕禄亲自指挥天津的部队于6月17日下午开始进攻紫竹林。进攻以炮击开始，所以租界守军立即明白是在与中方的正规军作战。中方炮火虽然凶猛，但对租界内坚固的西洋建筑损害不大，妇女和儿童在里面避难安然无恙。但租界内的中式建筑则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法租界损失尤其大，因为中方炮火首先打击法租界以报复杜士兰的最后通牒。

据裕禄日后的报告，3万拳民也参加了战斗。他们的首领非常勇敢，坚决表示要为朝廷效力，并"义形于色"。[46]在战斗中对租界威胁最大的是紫竹林对岸河边的一排3英寸克虏伯快炮，火力直指英租界。由于这条河只有12英尺宽，所以很容易击中目标。租界守军后悔当初没有把这个炮群敲掉，该炮群架设在天津的武备学堂的校园里。当时傍晚，一支由德国和英国官兵组成的突击队越过小河，向武备学堂发起了突袭。当时学堂里半数的学生都已逃走，剩下90余名坚守阵地。学堂的官兵们拉下窗帘，从黑暗中不断向洋兵开枪，有时双方还开展了肉搏战。联军方面伤亡很大，但最终得以控制武备学堂，全体中国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租界守军熟悉的会讲德语的武备学堂的总教习。

第二天，中方的炮火更加激烈。据法国上尉达乌拉的回忆，命中率也很高。俄军上校沃尔加克认为"中国人打得很好，比过去大有进步"。[47]租界守军士气高昂的原因之一是增援部队将要到来，有消息说英国的"无畏号"战舰已从香港运来皇家香港团，另有消息说德军一千人即将到达大沽。租界守军对拳民的人海战术并不惧怕，他们毕竟不是马克沁机关枪的对手。一位参战的英军士兵回忆道："在双方交火非常激烈的关头，突然有一个着义和团服装的拳民首领单人冲到俄军阵地的前面……他手持红巾，开始念咒做法，但仪式未完，已成枪下之鬼。"[48]租界守军弹药充足，但缺乏大炮。然而，中国军队

和义和团的大举进攻吓跑了大多数在租界受雇的中国人，除了一些仆佣和车夫以外，呆在租界不愿走的只有教民、买办和有西学底子的中国人。

中方的进攻者过于自信，以为紫竹林指日可下。裕禄命聂士成分兵一部去歼灭逃到天津附近的西摩联军，当时联军已到达天津以北10英里处的北仓。聂士成在军粮城布置完毕后，亲率一支部队北上。西摩联军虽然疲惫不堪，面子尽失，但仍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聂士成将重心放在歼灭北上之敌，当然希望裕禄能够尽快地解决紫竹林的战斗。但是裕禄久攻不下，聂士成又已分兵，所以攻打租界的刀锋已钝，势头锐减。

裕禄统兵作战的能力很差，但又好大喜功。在向朝廷报告紫竹林战斗的情况时，他居然大言不惭地称洋人已经"巢穴难保"，企图仓皇逃窜。而官军和拳民则通力合作，予敌以"合力痛击"，"良久，敌势力渐不支"等等。[49]实际上，裕禄的进攻战术并没有奏效，紫竹林租界守军并未"力渐不支"。裕禄依靠大批拳民冒死硬冲，以壮声威，但损失惨重，于事无补。

在联军方面，虽然大沽口的援军不断到达，要打通津沽线增援紫竹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联军多次企图打破聂士成军的防线都未成功。6月19日，一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大沽登陆，营长是沃勒少校，曾是美西战争中的英雄。沃勒率130名美军和400名俄军再度出发，想打通津沽线，但在距天津12英里处再次被阻击，激烈战斗之后，联军被迫撤退。这样反复争夺，直到6月22日，在2000多名联军的再次进攻下，中国的防线才彻底崩溃。[50]

在天津方向的联军部队在军粮城受到近万人中国士兵的围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4个小时之多。防守军粮城车站的俄军损失很大，中方差一点击垮俄军的左翼防线，幸亏英国的增援部队及时到来。据参战军官的回忆，俄军炮群曾被中方的炮火"精确地打中三次"，不得不撤下阵地。在这个紧急关头下，英国水兵将他们从"奥兰多号"炮舰上拆下来的9磅大炮架起来，才保住了军粮城阵地。

与此同时,聂士成在北仓与西摩联军交上火。远征军逃到北仓附近时,于6月21日幸运地发现了一座中方的弹药库。这个称为西沽的弹药库实际也是一个有600多米坚固城墙的堡垒,内有700多万发子弹,还有各种大炮枪枝和食物。西摩联军决定据西沽之险进行死守,以待援军到达。聂士成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他决定围困联军。但4天之后,津沽线已被联军打通,西摩远征军的位置也被探明,聂士成不得不撤退。

同时,裕禄仍在攻打紫竹林。租界派出一位英国年轻人骑马到大沽送信,告诉紫竹林面临危险。大沽的联军指挥官再一次组织进攻,终于打破中方的防线,紫竹林攻防战正式结束。联军派俄军上校希林斯基率2000人解救在西沽被困的远征军,这样长达两周的西摩远征行动才算正式结束。西摩联军死伤300余人,其余部如不经过休整已不能继续作战。有趣的是,西摩海军上将一回到津沽地区,又成了军阶最高的联军将领。他虽然蒙羞受辱,仍然是当地的最高司令官。联军解救紫竹林以后,白河通道已在他们手中,这样,天津到北京的门户已被打开。

联军立即进行了第二次天津战役,但北京的形势仍不明朗。有消息说使馆区已完全被毁,外交官已被杀戮。清廷对天津的战斗也不甚了解,自1900年6月13日使馆开始"猎取拳民行动"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对京城地面的安全问题已漠不关心。但是中国官兵并没有攻击使馆,直到6月19日,清廷也没有对外宣战,其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还在等待裕禄的进一步报告。但到19日之前,裕禄没有发来续报,这个时间差对清廷的判断力是一个致命的误导。

---

①Daoulas: *Le Siege de Tien-Tsin*, p. 10.

②Wehrle,见第二章注⑳,第174页。

③*Admiralstab*, *Militärarchiv*, *Freiburg*, *Wirren*, 238 f.

④*Deutsches Kreuzergeschwader Taku*, 16. VI. 1900, RM38v. p. 50.

⑤Dix, *The World's Navies in the Boxer Rebellion*, p. 32.

⑥ *Bombardment of Taku Forts in Chin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oc. 645, 5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pp. 4—7.

⑦NAUS, RG45, Area 10 File, June 1900, Also see, 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1909, Chapter 2.

⑧M.E.A. (Rome), Serie P, Cine 408, June 1900.

⑨Savage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vol. 1, p. 114.

⑩Daoulas,同上注①,第 62—66 页。

⑪《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 第 147 页。中外学者都对最后通牒的来龙去脉和性质不甚了解,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疑问,西方学者均认为最后通牒确实是为了给中方足够的时间考虑是否接受。

⑫D'Anthouard: *Les Boxeurs*, p. 44.

⑬《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64—165 页。

⑭ *Vorgänge in Taku - Tientsin Sommer 1900*, Militärarchiv, RM38v/52, Freiburg.

⑮Dix,同上注⑤,第 32 页。

⑯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卷 1,第 17 页。

⑰STB (《德帝国议会记录》),1900—1902, vol. 179, p. 32.

⑱Seymour,见第十一章注⑧,第 347 页。

⑲Wehrle,见第二章注⑳,第 174 页。

⑳ *B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6, p. 242.

㉑Daoulas,同上注①,第 67 页。

㉒War Department, *Report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i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p. 533.

㉓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卷 1,第 47—48 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卷 1,第 13 页。恽参加会议,李不参加会议。

㉔高枬:《高枬日记》,见《庚子记事》,第 146—147 页。

㉕《清实录》,卷 58,第 75 页。

㉖《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44 页。

㉗同上,第 145—146 页。

㉘同上,第 146 页。

㉙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卷 1,第 48—49 页。

㉚同上,第 146 页。

㉛林华国:《义和团史实考》,第 74—80 页。

㉜《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 949 页。

㉝叶昌炽:《义和团》,卷2,第444页。

㉞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8页。

㉟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卷1,第338页。

㊱《荣禄存札》,第405页。

㊲恽毓鼎,同上注㉙,第49页。

㊳《荣禄存札》,第406页。

㊴恽毓鼎,同上注㉙,第51页。

㊵在此后的"上谕"中有400里和800里加急之类的等级区别。

㊶ *China No. 4*, pp. 21—22.

㊷ *Papers Related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p. 151—153.

㊸Mabire: *L'Eté Rouge de Pekin*, p. 91.

㊹恽毓鼎和李希圣的叙述最详。

㊺恽毓鼎,同上注㉙,第49页。

㊻《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57—158页。

㊼㊽ *Rasmussen, Tientsin*, pp. 136—137.

㊾《义和团档案史料》,卷1,第157—158页。

㊿Glickert: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the Boxer Rebellion*, pp. 36—40.

第十三章

驱逐洋人出京

一、中方的驱逐照会

清廷内部的辩论仍在继续进行。既然慈禧太后已决心"用拳抗洋",如果再对义和团的性质发表不同意见是有政治风险的。许景澄和袁昶是主和派中坚持剿拳的极少数几个人,他们合写了一份上奏,内称:"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他们还提出具体的办法:"凡遇头系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缚献匪首……赏银二万两……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还建议:"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①]但是袁、许两人对洋兵的到来也是束手无策,况且联军已经威胁大沽,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建议没有多大兴趣。这份联名上奏在日后却成了定他们死罪的主要证据之一。

在清廷急剧地向宣战立场迈进的关键时刻,原先的一些主张安抚义和团的御史开始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郑炳麟在1900年5月份曾积极主张将拳民招为团练,他在6月19日的上奏中说他亲眼见到拳民被杀

的情形,他们并无任何法术。他说:"月之十九日午刻,亲见其全被洋人杀毙。此其未可深恃者一也。"郑又说,即便少数拳首确有神术,但在战场上先要念咒请神附体,往往贻误战机。郑参加了所有的御前会议,他对仇洋派不顾一切地主战表示不同意见,他提出以下几点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 我中华财赋,全视海关入款,若一失欢,则饷源立绌,此其不可失和者一。甲午之役,仅一倭国,尚不能与敌,若合数大国之师,协以谋我,众怒难犯,此其不可失和者二。义和团神术即足以敌洋人,然直隶有义和团,岂各海口、各直省均有义和团乎?此其不可失和者三。传教载在条约,义和团擅杀教民,焚烧教堂,本有不合,是彼之理直,我之理曲,此其不可失和者四。②

总而言之,开战对中国有弊无利。此时,义和团民已大量被招募成军,进京的团民更多。目击者记载:"二十二日,外州县各村庄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③在北京中城门负责守卫的一名官员向朝廷急报说形势已经完全失控,他所管理的一大片地区,只有二百人巡视,他要求派武卫军帮他弹压地面。朝廷对此置之不理。④

另一位满人官员于6月19日上奏说义和拳民:"竟敢白昼持械,横行街市,三五成群,任意劫杀抢掠。夜则庙宇、民居聚集成党,铺肆几至关闭,家居日夜不安。"他建议恢复保甲制度,以及时发现歹徒,绥靖地方。⑤朝廷同样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

由于大沽、天津地区战事不明,清廷在6月17日御前会议上虽然决定宣战,但仍未采取具体行动。到了19日,慈禧太后对裕禄迟迟没有新的报告感到不安。清廷发了八百里加急"廷寄"到天津,该信命令裕禄放手招募义和团民。该"廷寄"还指出:"该督……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并给予裕禄最大的授权:"兵机顷刻万变,朝廷不为遥制。"最后,"廷寄"再一次强调说:"该督若再贻误,试问能

当此重咎乎?"[6]很明显,清廷到6月19日对大沽失陷一事仍不知晓。据军机处小军机继昌的记载:"是日(注:指6月18日)裕帅奏报各国水师已攻炮台,罗荣光与之接仗,闻药库被焚云云。实炮台已失,不敢遽言,迟之二日始奏耳。"[7]也就是说,裕禄在18日的报告中虚假之词甚多,朝廷受到蒙蔽。这"迟之二日"的时间给朝廷一种虚幻的设想,兴许大沽炮台还有救。于是,为了帮助裕禄保住大沽炮台,慈禧太后采取了非凡的行动。她在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宣布将洋人驱逐出京,并限令24小时之内执行。她的逻辑很简单:"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此时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国了。"中方的驱逐照会将以列强在大沽的挑衅为理由,并将通知各国公使,如果他们拒绝出京,中方将不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中方的驱逐照会中并没有提及宣战,只是宣布各国驻京公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总署大臣许景澄奉命携带12份照会前往公使团。除了11位公使以外,赫德爵士也将收到1份。光绪帝在会上看到情况紧急,不顾一切地站起来,抓住许景澄的手,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商量。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

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主和派的内阁学士联元是站出来反对开战的惟一一位大臣。早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他已冒过生命危险,这次他再次慷慨陈词:"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据恽毓鼎的记载,联元此时已声泪俱下。但是仇洋王公不让他再说下去,慈禧太后随即命令:"载澜等加意捍卫宫墙,备不虞。"战争到这个时候已一触即发。[8]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次御前会议上,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没有对限令洋人离京这个措施提出异议,这个做法显然是两派妥协的产物。慈禧太后仍然以为大沽尚未失陷,于是将洋人送到天津,不啻是为了使联军方面失去开战的理由,因为西摩远征军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保使馆,护洋人。而主战派却希望直接攻打使馆以拉开战争的序幕,端郡王载漪在上一次会上已经明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据载,载漪的主要顾问之一是翰林学士王龙文。王曾上过一个奏折,坚称杀使臣是

最佳方案。他说:"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含璧舆榇何异? 则下策矣。"[9]而主和派则担心各列强公使留京会进一步激化冲突,不如送他们出京。所以,两派对送交"不受欢迎的人"的驱逐照会没有太大的不同意见。

大学士荣禄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在御前会议期间,他表现得痛心疾首,但又不敢多言。参加6月19日会议的满族官员荣庆,在休息期间曾与荣禄交谈。据他的日记记载,他告诉荣禄一国向十一国宣战是断无道理的。荣禄回答道:"子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辩,视为叛逆矣。"荣禄说完,"洒泪而散"。[10]其实,荣禄又在玩两面三刀的游戏。他与仇洋王公的最大矛盾在于剿拳问题,不在于和战本身。他不赞成"用拳抗洋",但并不是绝对反对抗洋。联军欲夺大沽炮台已是事实,他不能不考虑光绪复辟或太后下台对他今后政治生涯的影响,他在开战后的第三天,即6月22日给四川总督奎俊写信说,他反对"用拳抗洋"的观点总是被王公大臣以民心不可失为由所驳回。他无可奈何地说:"侄仍复详陈办法,苦于总以天命为是,奈何万不可有失民心,即似上次余蛮子(栋臣)之意。"既然朝廷不愿明确表示义和团是民或是匪,荣禄只得打击公开犯法的拳民。[11]然而,荣禄与慈禧太后一样与大沽炮台的命运休戚相关。既然炮台尚未失去,他认为用军事手段或许能保住炮台。事实上,荣禄的反战立场从来都不鲜明,据当时的一封私信,荣禄似乎更倾向于抗洋。这封信是已故大学士、清流派首领李鸿藻的儿子李符曾写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他告诉张之洞:"荣立五军,本以主战为名,曾上语云,胶州之事恭邸所误。彼时曾请带兵赴战,不许。为今之计,与其不战而失地,不如战而失地。"[12]应该说,荣禄的心态与太后极为相似,但他们真正关心的倒不是"失地",而是自身的保全。恽毓鼎有一段很重要的说法:

> 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有所不恤,无如一胜之不可悻邀也,天也。[13]

再者，荣禄并不反对护送洋人出京。从1900年6月初开始，荣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全力保护使馆，清廷驱逐洋人的决定仍然以荣禄武卫中军作为护送卫队，荣禄绝不会让董福祥插手这件事。6月19日，荣禄得到批准于第二天面见使臣，商量护卫出京的具体安排。荣禄在开战后不久给袁世凯的信中提到此事，他说自从6月18日接到裕禄关于洋人强索大沽炮台的第一份报告后，主和派已噤若寒蝉，不敢多言："稍有知利害者，略陈梗概，以为不可与各国因此起衅，众皆以为汉奸。"而他心态是："只复婉转其词力陈之，始许与各国使臣会晤，冀可转圜。"[14]毫无疑问，荣禄是真心实意地想让使臣平安到达天津。

与此同时，军机章京连文冲奋笔疾书，很快就拟好宣战诏书。连文冲的文笔极佳，大气磅礴，他用的是"离骚"体，历数洋人的种种不是，鼓动全国军民奋力一拼。

二、东南互保的密谋

地方督抚此时尚不知朝廷已决意宣战，长江流域的地方大员实际上从1900年5月份就开始做应急准备。他们一方面竭力劝阻朝廷不要"用拳抗洋"，但效果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与外国领事馆频频接触，商量中外一旦失和的转圜办法。朝廷对他们主剿的态度早已明白，但没有精力对南方大员进行整肃。5月到6月间，南方督抚意识到中外开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加紧与外交官密商妥善办法。

宣战诏书下来时，他们都大为震惊。张之洞给荣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说：

> 从古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况中国兵力甚弱，岂可激众召速祸。查拳匪乃刁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矣。董军仅五千，勇而无谋，断不能敌各国。[15]

张之洞在给两广总督李鸿章的电报中则进一步批驳了中国别无选择、惟有一战的观点。他说："京师时论云，不战必亡，战尚可不速亡。敝处见京来人语亦同，此大误也。不战何至必亡？怪极！利害所系，大病根在此，病根不去，无药可医。"张之洞又接着分析："纵每战必胜，一战必伤兵数百，耗弹数十万，连战一月，兵械俱尽。各国兵械，永无穷期，孤注有输有赢，此则有输无赢，并非孤注矣。此时紧要关键，须将不战可以不亡之确据说透，自然转圜。"⑯

在东南互保活动中最活跃的是盛宣怀，盛是督抚与外交官之间的桥梁。他的目的是在长江流域地区与列强政府达成互保协议，如有可能，在中外开战之时，保持在东南一带的和平。盛宣怀很可能早就得到某些朝廷枢臣的首肯，比如荣禄和王文韶。据《王文韶日记》载，盛宣怀在1900年四五月间是他家的常客。⑰与列强签订互保条约的主意最早是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张謇、沈曾植等人提出来的。张謇是状元及第，后来弃官从商，成为著名的实业家。张、沈等人认为盛宣怀是中外沟通的最佳人选。盛宣怀在洋务中获利颇多，对东南一带的和平有切身利益。同时，盛的人脉极广，尤其与李鸿章友善，与东南大员的关系都很紧密。

6月初，盛宣怀曾向他的恩师李鸿章表示过对时局的极度担忧。他说："洋人入京保护使馆，清议主抚，养痈成患，各国生心……荣相、王相甚明白，但须借疆吏多持正论，以破迂谈。"很明显，盛宣怀企图联络地方大员，集体向朝廷施压。李鸿章受贬广东以后，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愿轻易抛头露面。他回电说："清议不以铁路为然，正快其意。时事尚可问予？似非外臣所能匡救。"⑱

6月8日，李鸿章收到赫德的紧急呼救信件之后，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将此信转给总理衙门。但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仍在静观事态的变化，不愿轻易表态。盛宣怀非常失望，他开始转向长江地区的总督进行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反应最快，他立即向李鸿章发电，请他与其他督抚联署发一电报，请求朝廷加速剿匪。李婉拒之，尽管他承认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李的门人，安徽巡抚王之春也来电询问李对朝廷政策的看法。王之春说拳民不可用，他接到一份电报说大学士刚毅不赞成剿拳行动。来电呼称："大局危在旦暮已可想见。"李答复道："鄙人知内意主抚，电奏无益……荣拥兵数万，当无坐视。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奈何！"李还是不愿主动采取行动。[19]

荣禄听从盛宣怀的意见，向朝廷建议调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谈判，朝廷予以批准。李既成为全权议和大臣，他就更不愿意直接加入东南督抚的互保活动。6 月 18 日，李鸿章突然接到盛宣怀来电，说大沽炮台已失。李震惊之余，他回电询问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是否从俄国人那里传来的。盛复电说该消息来自于英国驻芝罘领事，英领事还说大沽炮台之战是由中方首先开炮的。李立即按照盛的建议，向中国各驻外公使发电，要求他们向各国政府解释大沽开炮并非圣意，因此中外并没有处于交战状态。李而且表示，如各列强政府对他这个解释不愿接受，那么他奉命北上的使命就毫无意义。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本来就对列强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不太热心，他立即向中国驻英的罗丰禄公使表示接受李的解释，俄国新任外交大臣兰姆斯多夫也表示赞同。不久，美国和法国政府都表示支持英俄的立场。但是李鸿章对列强的最终目的还是心存疑虑，他渴望了解列强是否真的打算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此时中外业已开战，他不再忌讳这个问题。于是罗丰禄奉命于 1900 年 6 月 22 日面见英国首相时，代表李鸿章直截了当地询问列强在联军进入北京以后"试图做出哪些变革？"英首相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含糊其词，说他不能代表他国政府进行表态。[20]

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英国政府这时有意在光绪复辟的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对各国的意图尚不了解。在下院的一次辩论中，负责议会事务的外交副大臣布劳德里克被议员沃尔顿质询道："女王陛下政府是否将与其他国家合作，推翻太后政权，复辟光绪帝制？"布劳德里克答复道："女王陛下在北京的公使与俄国公使对这个问题做过协商。英国公使被授权支持任何能够恢复中国的秩序和

法治的政府,俄国公使也接到同样的指示。”另一位议员非常敏感,立即提问,说这是否意味着英、俄在华的合作超过了与任何他国的合作,布劳德里克赶紧予以否认。[21]远东事务次官伯蒂一贯主张除掉慈禧太后,因为太后政权过于亲俄。

法国政府也在思考这一问题。1900 年 6 月 21 日的一份外交部秘密备忘录中指出列强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旨在推翻慈禧太后政权,然后复辟光绪帝位,用庆亲王和李鸿章加以辅佐。法国的政策应当是:一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被推翻,应当支持庆亲王奕劻继承皇位。[22]

德国政府此时对皇位继承问题尚无兴趣,但是西摩联军的消失以及与北京使馆联系中断使柏林惶惶不安。德皇威廉二世对同中国开战的前景兴奋异常,他不管皇位由谁来继承,他满脑子是“黄祸”思想。他想象这是一种亚洲和欧洲的大战,打击黄种人的机会已经到来,德国应当立即采取军事行动。[23]但德国政府则主张静观其变,再做决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 1900 年 6 月下旬为止,没有一个列强政府正式采纳推翻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皇帝的政策。6 月 22 日在大沽的联军将领几经磋商,发布了一项共同政策声明,其中说:

> 联军海军将领希望中国各地的督抚理解:他们在华用兵的目的是打击义和团和阻挡联军进京的人,以期拯救在华的外国公民。[24]

这是联军方面首次明确地就出兵的目的进行正式表态,很可惜这份声明为时过晚,清廷很难为之所动。

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一方面要向朝廷表示效忠,另一方面对朝廷的政策又不赞同。6 月 18 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去电说,拳民在 14 日曾攻打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北京的商业中心已被夷为平地,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李闻讯大惊,说:“董坚不剿拳,独敌

洋,岂十营能敌耶? 庸谬误国,可恨!"[25]袁世凯明白了李的态度之后,决定不按朝廷的命令执行调兵北上的计划。他在19日给朝廷的上奏中强调,不能随军北上,因为英、德两国都对山东虎视眈眈,有可能趁机在山东沿海登陆,他愿意派三千人马北上,但自己必须留在山东。[26]朝廷找不出反对的理由,这样袁世凯就从与列强开仗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很想知道东南督抚的真实态度,于是发密电给盛宣怀了解情况,并请他"随时教我"。[27]

与此同时,清廷命令李鸿章立即兼程北上。李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离开广东先到上海,然后在沪上观望。刘坤一和张之洞一直得不到李鸿章的积极支持,他们于6月14日联名给直隶总督裕禄发电,请他联署后送交总理衙门。刘、张的拟文称:"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28]裕禄此时已为义和团所惑,当然不愿参加其事。他只是回电说他自己的上奏与刘、张的意思差不多,但他同意将此电送往北京。[29]东南督抚深知他们对北事已经无能为力,只好一心经营东南互保条约。

订约的机会突然到来。英驻沪代理总领事霍必澜错误地认为,长江督抚不会反对英舰进入长江水域,帮助他们维持地方秩序,在伦敦的"中国协会"也是这个看法。这个影响颇大的由英商组成的"中国协会"上海分会,于6月14日通过决议说:"要求英国政府支持南京和汉口的总督,我们认为他们倾向于接受这种支持。"[30]霍必澜积极推动此事的动机不在畏惧义和团,而是担心他国,特别是德国趁乱打进英人占主导地位的长江流域。他电告首相,请求派一艘重型战舰开往南京和汉口,并说:"我相信,一旦长江流域地区与北京决裂,我们必须同两位总督达成谅解。"[31]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曾经设想过裕禄有可能向英舰寻求庇护,霍必澜幻想长江流域的督抚会领导一场独立运动同样是不现实的。

索尔兹伯里首相非常积极,立即复电批准。霍必澜与刘、张接触了几次之后才发现事情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刘坤一、张之洞对派英舰入长江口坚决表示拒绝,霍必澜报告说:"他们极力维

护中国的独立地位。"张之洞明告英驻汉口领事弗雷泽,英国在长江口外已有足够的舰只,"一旦进入长江,老百姓就会恐慌,其他列强也会立即仿效"。盛宣怀本人也对英人的企图感到吃惊,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他指出英人意图控制整个长江流域,外人不可能坐视英人得逞,因为条约规定了"机会均等"的原则。他建议两位总督立即宣布整个长江流域为自保地区,以防外人擅入,刘坤一表示赞同。[52]

刘坤一、张之洞虽然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但还是需要与英人合作达到东南互保的目标。英国在沪的外交官不理解的一个问题是东南总督的矛盾心态。刘、张一开始就反对设立"大阿哥"的计划,他们曾经一度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同情心。他们不能不设想,一旦联军攻入北京,光绪皇帝有可能南下继续正统帝位,重振维新大计。英国人对变法是积极支持的,窦纳乐公使曾帮助康有为逃到香港。所以,刘、张觉得同英、美合作的胜算机会比较多,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向霍必澜提交了互保的建议。他们表示愿意接受英国的支持,但不能让长江流域置于英人控制之下。霍必澜当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签订东南互保条约至少能够防止他国寻找借口派兵入侵长江流域。

刘、张还有另一个心理困境,作为总督与外国单独签订和约几乎等于是叛国罪。中外业已开战,他们的职责应是出兵,筹饷,选将,支持华北战场。所以,他们在谈判互保条约期间极度小心,生怕消息外泄。主要的谈判在上海道台余联沅和霍必澜之间进行,进展十分顺利,因为伦敦给予霍必澜全面支持。张之洞告诉汉口英领事弗雷泽,感谢索尔兹伯里首相在后面的大力支撑。[53]这样,在清廷与列强开战之际,东南地区的和约已经谈成。《东南互保条约》共九条,其要点是允许列强领事馆组织力量保卫租界,而非租界地区的秩序则由东南总督负责。外舰可以在东南沿海港口停泊,但士兵不得随意上岸,对内陆进行远征。东南总督确保洋人的传教和工商利益,在紧急情况下,派特别警卫保护洋人的安全,等等。

刘坤一、张之洞对华北的局势十分焦虑。1900 年整个 6 月份,

北方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要糟。6月下旬，特命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终于到达上海。李本人没有直接介入《东南互保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但他在私下里是支持的。与此同时，心情忐忑不安的刘、张突然接到荣禄通过袁世凯转发来的电报，内称战端已开，但劝告他们对北京日后的诏书不要予以理会。[34]李鸿章接此电时狂喜，得意之余，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称朝廷宣战诏书为“矫诏”，并称朝廷为“乱命”。[35]荣禄的电报内容很快透露给霍必澜，霍在给伦敦的电报中居然说李鸿章和东南总督“已同意不再承认北京政权”。[36]他的这一判断又是想当然的。不管怎么说，朝廷的宣战从一开始就遭到《东南互保条约》的破坏，华北在军事上已经不可能得到南方的帮助。

三、公使团的混乱

1900年6月19日下午5时，中方的最后通牒送到使馆区。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德使馆中文翻译柯达士还去过总理衙门办公事。柯达士与一位姓宋的章京进行了交谈，发现这位老熟人说话“吞吞吐吐，神情异常紧张”。宋告诉他“大局要变”，柯达士不懂这是何意思，[37]后来才知道中方已决定下达要洋人出京的最后通牒。通牒的主要内容是说杜士兰索要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表明列强已开启战端，中方要求所有洋人在24小时之内离京前往天津，否则中方不能再保证洋人的安全。中方还提出用武卫军护送的建议，通牒上面明白无误地签注了时间：“十九日下午四时正。”也就是说，20日下午4时是期限。通牒并没有提及宣战一事。[38]

这十二份通牒像炸弹一样在使馆区炸开。朴南威尔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十二份文件像十二份炮弹在公使团的防线以内向十二个方向轰击，在浓烟开始聚集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到窒息。”“到底是谁的责任？大家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盯着十一国公使，是这批人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每个人都惊惶失措地要求他们想想办法。”[39]公使团受到的打击当然最大。前不久，立山、联元、徐用仪等大臣来

访时还表露出和解的气氛。据赫德爵士在17日的日记中说:"窦纳乐仍然认为庆亲王和荣禄已受太后信任,中国政府将对外国人示好。"[40]最令人沮丧的是,公使团对大沽炮台发生的事情和杜士兰发出的"最后通牒"一无所知。意使萨瓦戈在8月底当使馆解围后写的第一份报告中如是说:"当时太后已有意做出让步,聂将军已奉命向拳民开枪,三位大臣被安排出城迎接西摩海军上将。突然在十七日,攻占大沽炮台的事件发生,这个行动(其合理性我尚不能判断,因为手头缺乏详细的资料)是我们被驱逐的决定性原因。或者,这与西摩联军在十九日放弃进北京的计划有关。"[41]

作为当事人,萨瓦戈对大沽事件和北京的政策之间的联系是看得很清楚的。公使团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根据中方的通牒,大沽是否已被攻占尚不清楚。赫德在战后这样描述当时外国人的心情:"假定大沽炮台在十八日已被联军攻占,我们就可以设想几天后从天津将有一支大部队开始出发来解救我们,那么两周内就能进入北京城——如若不然,为何联军当局在大沽采取过早的行动而使我们陷在北京。"[42]

外国人之间对中方通牒的含义也发生分歧。大多数人认为联军方面对大沽炮台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中方已予以拒绝,所以才会有驱逐洋人之举。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西摩联军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天津租界的命运也难以确定,因为战端已开,租界能否守住还是个问题。不管怎么说,中方在保证外国人安全这一点上已经放弃了任何责任是很清楚的。窦纳乐认为:这是"用一种礼貌的语言告诉我们,他们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43]所以,外国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要么被杀。

公使团在团长卡洛干的西班牙使馆召开紧急会议。使馆区内一片混乱,大家都在埋怨外交官对中国政府刺激太大。公使们则怪罪在天津的领事团和军事当局。有人形容当时情况:"人人都已失去自我控制,行为都开始不正常。"[44]大家一致同意联军在大沽的行动是不成熟的,或用窦纳乐当时的话说:"对中国进行的不必要的刺

激。"[45]窦纳乐当晚坐下来给天津领事贾礼士写了一封未能发出的信,信中对贾礼士进行了严厉的训斥。他告诉贾礼士公使团已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照会,指出:"对大沽这件事公使团表示完全不理解,因为公使团是政府的代表,而天津领事团能做出这种交战的决定是不大可能的。"[46]北京使馆解围后,窦纳乐对领事团决策的批评有所缓和,其他公使也都不再提及此事是否恰当。其实,公使团在当时确实认为大沽的行动使他们变成了集体人质。

紧急会议上仍然争吵不休,大多数公使认为既然有大沽这件事,只好采取和解的态度,下旗出京。但大家都觉得24小时限期过于仓促,交通工具也远远不够。法使毕盛和美使康格的观点最明确:除了接受最后通牒之外别无更好的办法。然而,中方提供的护卫部队究竟是否可靠还是一个大问题。毕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最希望的是劝说中国政府允许西摩联军进京来接送洋人赴天津。[47]

窦纳乐的心情比较矛盾。他私下里告诉英国护馆卫队的斯特拉茨上尉,他"连一码都不愿移动"。但他同时意识到,公使团撤去后,他和英使馆单独留下是十分危险的。在紧急会议召开之前,他收到赫德爵士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从来不赞成举手投降,但我一想到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就不断地思考怎样才能使他们得到安全的保障。"赫德的倾向性已很明显,除了接受中方最后通牒之外别无退路。[48]清廷对赫德也没有特别眷顾,只是单独给了他一份照会,赫德心灵受到震撼。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大事不好!舰队恐已占大沽炮台,衙门已与公使团断交,我们大家都要完了!"[49]赫德在华工作四十余年,落到这个下场,心境自然十分悲凉。另一位在华工作多年的是"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他这样描述在使馆被围开始后在英馆同赫德的第一次会面:"我俩互相端详对方的脸色,都为我们一辈子的工作毫无成就感到脸红。这位把中国海关收入从三百万两银子提高到三千万两的人成了中国人的屠杀对象。而我在华教了三十年的国际法,中国人到头来却对外国使节的生命视如草芥!"[50]

传教士们和莫理逊都竭力劝说窦纳乐不要放弃二千多名中国教

民。在北京大乱之后，这批人纷纷逃到使馆区寻求避难。一旦被拳民抓住，其命运可以想象。窦纳乐心里也很矛盾，他找毕盛商量，问他作为护教国的代表如何处理教民的问题。毕盛激烈地争辩道，他不是愿意投降，但在这种时候他只能考虑法国公民、妇女和儿童的安全。有人提醒，天主教北堂尚有樊国梁主教和三十余名法、意卫兵在坚守，毕盛对此问题显然不感兴趣。法使馆卫队长达尔希舰长面见毕盛，说我的水手昂利等人不走，我绝不离开。毕盛无法，只得答应捎信给北堂说，在他们未过来集中之前，法使馆不会撤走。[51]

平常对传教事业甚为关心的美使康格，此时也顾不上中国教民的命运。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夫人尤恩太太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康格少校一再强调说美国士兵只能保护外国人，对中国教民是管不了的。"尤恩太太听说康格的立场受到了英使的影响。[52]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对公使们的胆小怕事非常愤怒。就在几天前，他同日使馆武官柴五郎还与肃亲王谈判，请他暂时让出肃王府给大批来避难的中国教民栖身。现在公使团要把教民弃之不顾，他当然非常不满。他找到公使团团长卡洛干伯爵询问此事，老伯爵耸耸肩膀说："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莫理逊自认为是非外交官中外国人群体的领袖，代表传教士、商人、医生和工程师说话，他竭力劝说公使团务必等到西摩联军进京再做撤离的考虑，他不相信联军会失败，公使们对他的游说并不感兴趣。第二天清晨，莫理逊与康格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康格对他的观点完全不赞同，莫里逊说："整个世界将同意我的看法。"康格以为他说的是纽约出版的《世界报》，便冷冷地答道："我对《世界报》如何看待这件事毫不在乎。"[53]

按照中外条约，公使团放弃教民的行动是符合国际法的。此外，人人都知道用外交使馆来保护大批的中国教民，只会给中国政府进攻使馆造成合理的借口。实际上，公使团自 1900 年 6 月 13 日"猎取拳民行动"之后，自愿地承担了保护中国教民的责任，现在又要抛弃教民，在道德上说不过去。6 月 15 日以后，多数天主教堂被焚，除了北堂以外，天主教民无处可去。在北京的新教机构不接受天主教民，

美国浸礼会的建筑非常坚固，很快就被新教教民占满。在这种情况下，使馆才批准柴五郎和莫理逊借用肃王府的建议。其实借用肃王府作为难民营就已经违反了条约的规定。

公使团对当时接受教民的决定开始后悔，因为保护教民的结果可能导致本国公民的人身危险。据朴南威尔的记载：公使们"称拯救教民的行动将使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使馆将受攻击，外国人的生命危在旦夕。"[54]

在这种情况下，公使们收到最后通牒后只关心保护本国公民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一旦离京的决心已下，教民的命运只好让他们自己掌握。即使公使团允许数千教民跟随在外国人的车队后面，他们的命运也掌握在中国的护卫部队手中。

在绝大多数公使同意下旗出京之时，德使克林德站出来表示反对。克林德要求公使团不要被中国人所吓唬，他的观点与莫理逊相同。他指责公使们胆小怕事，同时又指出中国提供的卫队不可靠，对外国人十分危险。其他公使对克林德一贯的粗野作风早已习惯，同时对他的动机时有怀疑。窦纳乐和格尔思从来不大相信克林德的话，认为他不诚实。据萨瓦戈在使馆解围之后的第一份报告，英使和俄使都认为克林德不愿意离京是因为他认为推翻慈禧太后、瓜分中国的机会已经到来，他对保护外国人并不感兴趣。[55]克林德在公使团会议上建议立即请求端郡王载漪和庆亲王奕劻的召见。如果中方不允，公使团应集体行动，到总理衙门去施加压力。公使团倾巢出动的想法立即被否决，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太危险。萨瓦戈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西摩联军入城接应公使团和其他外国公民，但联军并不在京城驻扎，大家认为这个显然很幼稚的想法是有道理的。[56]

会议期间的气氛十分紧张，荷兰公使克诺贝尔居然哭了起来。克诺贝尔胆子极小，在会上一言不发。在后来的围攻使馆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躲在英使馆的地窖里，没有参加任何战斗。有趣的是，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里出来察看联军有否到达，被一颗流弹打中大腿。因为他是公使中惟一的受伤者，回到荷兰以后，成为国家的

英雄。

公使会议最终决定向总理衙门提交相同的照会，接受最后通牒，但要求延长期限。虽然准备行装和征集交通工具是惟一要求延长期限的理由，公使们还想争取再等几天，或许西摩联军有望兵临城下。康格当天给美国传教士盖姆维尔写了一封信，解释公使团为何做出离京的决定：

> 如果我们手头有一千士兵，或者知道西摩联军现在何处，我们就有可能拒绝中方的要求。目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当然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做离京的准备，或许局势会发生变化。[57]

此外，公使照会还要求第二天与总理衙门的主要大臣会晤，讨论中方提供的卫队的具体细节。公使们认为这次会晤将有助于了解中方的真实想法，俄使和日使都赞成大多数人的意见。莫理逊对格尔思尤其反感，他在日记里说："格尔思积极要求离京，并说他相信中方的最后通牒是文明国家的表现，因为战端已由列强所开，中国别无选择，只得这样做。"[58]萨瓦戈也愿意出京，但对中方的护送部队不放心。

公使团的辩论长达6个小时，最后决定各自向总署递交"十二份相同的照会"，因为中方的最后通牒也是"一式十二份"的。照会要求第二天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同时要求中方提供足够的运输工具，并要有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外国人到天津。然而，德使克林德的照会在一个关键之点上与他国的照会不同。其他公使的照会都提出希望中方对照会迅速做出答复，而克林德的照会却明确地说德使明日上午9点将到总署会晤中方大臣，不管中方答复与否。萨瓦戈在后来的报告中也说德使的照会"与我们的大不相同"。[59]这个照会的措辞究竟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尚不清楚，但是很多西方学者和当事人都认为这个照会是克林德遇刺身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

是说，克林德把自己的行踪明确通知了中方，所以中方有时间从容地安排刺杀行动。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外国人都知道公使团已决定离京。莫理逊说那天晚上他不敢看他的中国仆人的眼睛，第二天上午他"为自己是白人感到羞耻"。不少外国人不同意公使团的决定，他们对公使团抛弃中国教民和相信中方的护卫尤其感到不安。很多传教士都认为中方的最后通牒的目的是为了分离教士和教民，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再次与康格商谈，康格坚决地告诉他们准备行装，第二天出发。

使馆区内部的混乱进一步加剧，多数外国人连夜打点行装，很少有人顾及吃晚饭。日本使馆最平静，西德二郎公使召集所有的日本人，告诉他们离京是必要的，明天将是对大和民族男子汉的一次严峻考验。[60]当然，日本人同俄罗斯人一样，对中国教民的命运并不感兴趣。

准备工作的最大难处是缺乏运输工具，所有的中国仆人都被派出去四处寻找任何可用的交通工具。他们回来说大车的租金成倍地增长，大家都知道战争将要来临。因为不仅外国人需要车，中国官员也在忙着安顿家小，避开京城战祸。中国仆人报告说，不少马车夫虽然已答应下来明天出车，但又说明天能否成行还要看安全与否，大家都各想各的办法。"北京饭店"老板沙莫在北京的行踪连他自己的政府都不十分清楚。[61]但他最有办法，他在夜里组织人冲进大学士徐桐的府上抢夺了一批车马。

然而，大家对明日的长途跋涉仍是心有余悸。据估计，所有外国人组成的车队得有1英里长。使馆卫队只有500余人，能否安全护送这支车队通过拳民控制的村庄和市镇还是个问题。既然西摩联军2000多大兵都过不来，这支有很多妇女和儿童的车队又怎能通过。此外，大家尤其担心的是中国的护卫部队会不会成为大屠杀的凶手。外交官夫人们对70英里的旅途感到惶惶不安，有的人还担心路途上如厕不便的问题。最后，大家对天津方向的局势心里也没有底，战争是否已经爆发？紫竹林租界情形又如何？这些问题更使他们担心。[62]

莫理逊继续游说公使团不要出京。他在日记里写道:"康格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居然要求一百辆大车,他还告诉我中国方面会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反驳道:"如果你这么信任中国人,干吗还派卫队保护使馆。"[63]第二天清晨,中方对公使的照会没有任何反应。法使毕盛彻夜未眠,到7点钟的时候,他已草拟了一封给总理衙门的信。信中说他将保证西摩联军不进城,而且公使团保证将大沽炮台交还给中方。[64]他实际上是在做实质性的让步,这两个条件对中国朝廷来说肯定有极大的吸引力。不幸的是,此信尚未发出,局势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1900年6月20日上午8点,公使团在法使馆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到了9点钟,也就是公使与总署约定会晤的时间,中方仍无反应。窦纳乐的解释是,中国的官僚从来没有开夜车的习惯,所以没有及时答复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公使则怨气冲天,有的人过于神经紧张,有的人失去控制力,他们认为中方有意对外交官刁难。克林德更是怒火中烧,说这里面有大阴谋。他大声疾呼,要公使团在危险面前不能退缩,应集体到总理衙门去抗议。

其实,克林德认为中方有预谋,故意不回复公使照会是没有根据的。正如窦纳乐猜测的那样,19日晚上,总理衙门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不在署。19日下午5点最后通牒发出后,他们都回家安顿家小去了。洋人强索大沽炮台的消息也在京城不胫而走,大家都知道一战不可避免。总理衙门的工作已暂告结束,军队将控制局势。据当时在署的总理衙门左姓章京(自号石涛山人)的回忆,当晚只有几个小官在总署值班,连应该值班的责任章京都回家去了。他记得19日晚上"十二国照会"一封接一封地送到总署里,内容都差不多,即要求宽限时间和与总署大臣约见,他显然连德使照会与别的照会有什么区别都没有注意。由于这天晚上特别辛苦,当班的几位每人获赏50两银子。[65]在这种情况下,总署大臣在19日晚上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照会的内容,也没有时间向紫禁城上呈。所以,人们常常设想的仇洋派根据德使的照会连夜制定刺杀计划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四、裕禄谎报军情

外交官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方的最后通牒是疯狂的，失去理智的行为。战后更多的人认为这是大规模屠杀洋人计划的前奏曲，窦纳乐在使馆解围后的报告中如是说：

> 所有在北京的欧洲人都没有料到中国政府如此笃信义和团的"神力"，以为依靠它可以蔑视全世界……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政府会发疯，做出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所做不出的事情。

克林德对最后通牒的第一反应也是认为中国政府要么发了疯，要么就是言不由衷，吓唬吓唬外国人而已。他相信后者，所以他坚持要面见总署大臣。[66]事实上，克林德根本就不接受中国政府有同外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权力。

然而窦纳乐和其他公使即使在战后也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清廷的最后通牒是基于裕禄谎报军情引起的错误判断之上的。裕禄到 1900 年 6 月 20 日下午之前的报告还说大沽战斗尚未结束，而他攻打紫竹林的行动已使洋人"巢穴难保"。作为中国当局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用驱逐洋人到天津的做法是为了助裕禄一臂之力，尽力用外交手段保住大沽炮台，这是惟一的一个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因为整个中外军事冲突起于驻京外交官的安全问题。俄国外交大臣莫拉维耶夫在 6 月 20 日，也就是他突然去世的前一天，告诉英国大使斯考特爵士，他认为联军夺取大沽炮台对慈禧太后有正面的影响，慈禧太后一直在畏惧洋人还是畏惧拳匪之间游移不定。[67]莫拉维耶夫虽然比较理解慈禧太后的心情，但他也没有意识到她尚不知晓大沽炮台已失。慈禧太后的逻辑是，只要大沽炮台不陷，宣战也无必要，所以只要外交官能安全到达天津就有一点希望。

因此，西方最流行的说法，即慈禧太后命洋人离京的目的是为了

组织一场在荒郊野地的大屠杀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而这种看法恰恰是6月20日上午公使团会议上大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的，于是在走还是留的问题上又开始犹豫不定。历来的学者都不大注意慈禧太后何时才知道大沽炮台失陷的重要问题，窦纳乐一直认为太后早已知晓，他在给首相的报告中如是说："当'不受欢迎的人'的最后通牒在被起草之时，中国政府肯定已经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不是在十八号，而是在十七号，但中国人显然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个事实。"[68]

事实是，清廷在6月20日还去信给裕禄："裕禄于二十一日(即西历六月十七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69]

显而易见，真正的悲剧是，慈禧太后作出驱逐洋人的决定是基于情报的缺陷和不完整，她想在大沽未陷之时，与洋人断交。这样，最后通牒就可能有两个目的：其一，除去洋人自西摩远征到杜士兰最后通谍这段时期动武的惟一借口，即保护使臣。其二，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中方宣战在道义上也站得住，因为衅自彼开。所以，清廷为达到这些目的不可能在洋人赴天津的路上制造大屠杀，安全到达天津是最后通牒的关键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中方的卫队不是仇洋的董福祥甘军，而是大学士荣禄的武卫中军。总而言之，最后通牒的决策是头脑清醒的决策，但其基础不牢靠，因为裕禄一直在谎报军情。

朝廷在1900年6月20日终于收到裕禄的续报，报告中裕禄仍然有意夸大抗击联军的成果。他仅仅说大沽炮台保卫战已经开始，没有报告炮台已陷的事实。很明显，裕禄谎报军情的目的是减少自己的责任，同时他以为紫竹林租界指日可下，待胜利后再报详情。报告说洋舰率先开火，"该提督(罗荣光)现在竭力抵御"。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吹嘘自己指挥的攻打租界战斗，"拟即一鼓作气使洋兵巢穴尽没"。他实际在为自己不能分兵援助罗荣光寻找理由，同时希望朝廷立即增兵津沽地区。他说："但彼族经此大创，断不甘心，各国之兵，势必尚有大举。以一服八，军事万分棘手。"[70]

这份谎报进一步让慈禧太后感到她驱逐洋人出京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裕禄的意思是说罗荣光尚有可能抗御洋兵的进攻。既然公使团对大沽炮战并不知晓，他们到天津以后就可辨明利弊，停止对中国的战争行动。也就是说，是和是战将由列强决定，彼方理曲，我方理直。

同时，朝廷仍旧继续备战，并连下几道"上谕"。其中一谕要求地方督抚"选将，练兵，筹饷"。同时又说："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多数督抚都对"选将，练兵，筹饷"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而对"联络一气，共挽危局"则积极响应，特别是东南督抚认为这正是他们订立《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据。河南巡抚裕长是裕禄之弟，他和山西巡抚毓贤是少数几位愿意忠实地执行朝廷的备战命令的地方大员。四川总督奎俊则因为受荣禄的影响，不愿有所动作。地方大员都已知道大沽失陷，而且衅自中方开，所以刘坤一和张之洞认为《东南互保条约》是合法的。

朝廷的另一道"上谕"强调积极招募拳民，并命令各部停止剿拳行动。[11]在这种情况下，中外战端会不会全面爆发完全取决于公使团能否立即出京，并顺利到达天津。

---

①《义和团》，卷 4，第 161 页。关于这份上奏的真实性有争议，但是许景澄、袁昶的主剿态度是一贯的。详见戴玄之：《义和团研究》。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56 页。

③《庚子记事》，第 14 页。

④《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50 页。

⑤《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 1，第 606 页。

⑥《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53 页。

⑦继昌：《拳乱记闻》，见《义和团史料》，卷 2，第 559 页。

⑧《义和团》，卷 1，第 49 页；《恽毓鼎庚子日记》，第 51 页。

⑨《义和团》，卷 1，第 14—15 页。

⑩《荣庆日记》，第 37—38 页。

⑪《荣禄存札》，第 406 页。

⑫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见《历史研究》,卷 5(1988 年),第 32 页。
⑬《义和团》,卷 1,第 50 页。
⑭《荣禄存札》,第 412 页。
⑮《张文襄公全集》,卷 160,《电稿》,第 39 号。
⑯同上,第 42 号。
⑰《王文韶日记》,第 1007 页(西方曾出过一本伪《王文韶日记》[英文])。在这本真的日记里,1900 年 6 月份的记载已不存在。
⑱《李鸿章全集 · 电稿一》,第 927—928 页。
⑲同上,第 933 页。
⑳*China No. 3*, p. 70.
㉑《日本外交文书》,卷 33,别册 1,第 364—365 页。
㉒*DDF*, vol. XVI, pp. 193—194.
㉓*GP*, vol. 17, p. 14.
㉔《日本外交文书》,卷 33,别册 1,第 366—367 页。
㉕《李鸿章全集 · 电稿一》,第 934—935 页。
㉖《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53—154 页。
㉗《义和团》,卷 3,第 326 页。
㉘《义和团史料》,卷 2,第 196 页。
㉙同上,第 198 页。
㉚*BDFA*, vol. 24, p. 31.
㉛*China No. 3*, pp. 55—56.
㉜《义和团》,卷 3,第 327—328 页。
㉝*BDEA*,见第十章注㉑,第 24 页。
㉞China No. 3, p. 85. 中方档案中此件已不存在。
㉟《李鸿章全集 · 电稿一》,第 955 页。《李文忠公全集》中已将"矫诏"、"乱命"等字眼除去,因为宣战诏书确实是慈禧太后亲自批准的。
㊱*China No. 3*, p. 85.
㊲Heinze: *Die Belagerung der Pekinger Gesandtschaften*, pp. 36—37.
㊳《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52 页。
㊴Weale: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p. 90.
㊵*Hart Diaries*, June 17, 1900.
㊶*DDI*, vol. IV, p. 165.

㊷Hart: *The Peking Legations*, p. 22.
㊸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 103 页。
㊹Weale, 见第十一章注㉞,第 90 页。
㊺*China No. 4*, p. 22.
㊻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 102 页。
㊼*Livre jaune*, p. 199.
㊽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 103 页。
㊾*Hart Diaries*, June 19, 1900.
㊿Martin: *The Siege of Peking*, pp. 96—97.
51Henry: *Le Siege du Pe-t' ang*, p. 195.
52Ruoff, ed.: *Death Throes of a Dynasty, Letters and Diaries of Charles and Bessie Ewing*, p. 83.
53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p. 116.
54Weale,见第十一章注㉞,第 181 页。
55 56M.E.A.: *Salvago-Raggi Report*, Serie P., Cina, 409, August 16, 1900.
57Tuttle: *Mary Porter Gamewell and Her Story of the Siege in Peking*, p. 208.
58Pearl, 见第十一章注⑲,第 117 页。
59*Salvago-Raggi*, 见第二章注⑧,第 335 页。
60柴五郎:《北京笼城日记》,第 15 页。
61Documents diplomatique suisse, 1848—1945, vol. 4. 瑞士政府当时只知道管理"北京饭店"的有 3 个瑞士公民。
62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 104—105 页。
63Pearl, 见第十一章注⑲,第 115 页。
64Pichon, *Dans la Bataille*, pp. 243—244.
65《义和团史料》,卷 1,第 78 页。
66Heinze, 同上注57,第 37 页。
67*China No. 3*, p. 65.
68*China No. 4*, p. 22.
69《义和团档案史料》,卷 1,第 157 页。
70同上,第 158 页。
71同上,第 156、161—164 页。

第十四章

克林德男爵暴死之谜

一、"大人死也!"

1900年6月20日上午,公使团会议在法使馆召开。整个会议中,德使克林德男爵争辩最为激烈,他显然比平时还要激动。其他公使建议等中方对公使照会的答复收到后再采取行动。克林德感到不可容忍,要立即去总理衙门理论。法使毕盛提醒他京城地面混乱,有生命危险,克林德反驳道:"大街上并无危险。昨日和前日我都派翻译官赴总署办事,他并未受到任何骚扰。"[①]这位翻译官正是柯达士。但是克林德并未说老实话,昨晚(6月19日)柯达士在德使馆花园里与克林德有一番长谈,他也劝公使不要自行去总署。克林德也承认形势严峻,外面并不安全,但他主意已定,不愿收回。在20日上午公使团会议之前,克林德已经安排柯达士准备轿子和护兵。[②]他以为公使团会议时间不长,于是命令柯达士在20分钟内做好出发的准备。克林德夫人在战后也证实,不顾一切去总署交涉确实是克林德自己的主张。这位夫人在战后回到家乡底特律,曾说过她也竭力劝说丈夫不要冒此风险,但克林

德“出于公心”,一定要以身试探中国政府究竟在打什么算盘。[3]克林德夫人此说当然有夸大其词之嫌。实际上，克林德公使此时在面子上进退两难,他多次攻击其他公使为懦夫,他不得不亲自出马证明他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他从接到总理衙门的限期24小时出京的照会时,就一直认为中国人是在虚张声势,并不敢把公使团怎么样。克林德在公使团里非常孤立,因为他常常我行我素,不把他国公使放在眼里。5月间在一次公使会议上,他居然提出要大家亮出底牌,为如何瓜分中国进行正式谈判。各国公使大惊,纷纷报告本国政府,以为这是德国的既定方针。结果布洛夫外交大臣大怒,对克林德严词训斥。此后,克林德对公使团的同事们一直耿耿于怀。6月中,克林德带头在京城地面屠杀义和团,使北京陷人前所未有的混乱,同事们对他十分不满。眼下,在面临被中国政府强令离京的关键时刻,公使团士气沮丧,克林德认为这是他报复同事的大好时机。此外,他于6月19日给总理衙门的照会本来就与其他公使的照会不同。其他公使请中国政府宽限时间,并要求集体面谈;而克林德有意提出,不管中方答复与否,他都要赴总署理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认为如不成行,则脸面失尽,他在华工作多年,知道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

在这种形势下,公使团要劝他改变主意是不可能的。克林德的副手贝娄在战后向柏林的第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公使一旦作出决定,任何人都不可能让他改变主意。[4]克林德其实知道外面并不安全,所以他也希望公使团能够集体行动,声势浩大，中方不敢有所动作。然而,在公使团会议上,他沮丧地发现没有人支持他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公使们又在暗中算计他。面对克林德的咆哮和无礼,公使中无人愿意与他辩论所谓“懦夫”还是“勇士”的论调。大家只关心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公使集体出动,总署大臣并不在署怎么办? 克林德闻此言暴跳如雷,用拳头敲打桌面说:“我一定要坐在那里等到大臣的到来,即使坐一晚上也在所不惜!”公使们觉得与他已无法沟通。最后,俄使格尔思提出:“为什么你不派翻译官跑一趟,而非要亲自去呢?”克林德似乎对此建议倒不反对,说:“此主意不错,我将这么做。”

然后很快就离开了公使会议，留下来的公使们以为他真的会这么做。英使窦纳乐在战后向伦敦的报告中说道："克林德离开后，我以为他不会亲自到总署去了。"[5]意使萨瓦戈则认为，让克林德亲自去探听虚实也好，如果成功，公使团可以随后跟进。[6]

公使会议在6月20日上午9点半休会，[7]据荷兰公使克诺贝尔回忆，毕盛宣布休息30分钟，10点钟再开会。[8]颇感孤立而忿忿不平的克林德一出会议室就寻找柯达士，见出发准备工作已完成。弗莱明在他的书中说德使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自己去，而不是派柯达士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上所述，从19日下午起，克林德根本就没有改变主意。《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逊亲眼看到克林德和柯达士乘轿出了使馆区，轿顶以猩红和绿色绒布为装饰，显示外交官的地位。随行的有两名中国的骑马侍从，但德国卫兵却没有护送。

不到半小时以后，一名骑马侍从不顾一切地飞奔而来，满身大汗，大叫大嚷。意使萨瓦戈和奥使馆临时代办罗斯通正在一起散步，听到他在大喊"Tajen Tokta！"萨瓦戈不解何意，罗斯通听明白了这是洋泾浜德语"大人死也！"在场的人无人相信，莫理逊对骑马侍从大喊"别胡说八道"。然而，大家很快就知道克林德公使确实在距离总理衙门不远的东单牌楼被打死，柯达士的命运尚不得知。公使团日后才知道柯达士的大腿也中了一枪，但他挣扎着逃出几个街区，在美国浸礼会传教点获救。

克林德之死对使馆区的外国人是一场巨大的震撼。大家都感到克林德过于莽撞，但认为他的死也说明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克林德对京城地面安全的判断是错的，二是说明克林德坚决反对接受中国政府的限期离京的通牒是正确的。这个情况说明，中国政府既然敢于谋杀外国公使，那么在离京赴天津的路上必有埋伏。克林德之死实际上是让外国人避免了一场大屠杀，而公使团主张接受中国的条件出京则已显得荒谬无知。几乎所有的在京外国人都相信中国政府是德公使之死背后的主谋。在翻译官柯达士恢复知觉的那一刻起，对中国政府有罪的结论就已定下。由于柯达士是惟一的见证人，百年

以来，无人敢对此定论进行挑战。

在使馆被围的日子里，柯达士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能证明刺杀德国公使事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是中国最高当局下令，由一位满族军官执行的。"[9]柯达士还说，使馆解围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不久确实抓到一位满人军官，其对杀死公使供认不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中国政府不得不俯首认罪，并史无前例地派遣醇亲王载沣为赴德谢罪大臣。此案已于一百多年前了结，似乎不容置疑。

克林德之死是义和团事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迅速改变了中外双方对冲突的判断。中国方面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因而中国史学家一般都接受柯达士的证词。此外，中外学者多年来都被白克浩司爵士伪造的《景善日记》所蒙蔽。《景善日记》称中方确有杀使臣、屠洋人的阴谋。多年以来，即使是对义和团事件精于考证的学者也都不愿重新质疑柯达士的说法。然而笔者以为，此事件恰恰是解释义和团战争起源的一个根本问题，其重要性绝对不可忽视。[10]

其实，柯达士的结论中有不少重要的疑点，连柯达士本人都无法将他的种种说法与他对全世界的解释完全吻合起来。当然，他不想对他的最初解释加以否认，他个人也对此事有利害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克林德之死是谋杀。今天我们要质疑柯达士的定论只能是基于两种可能性：一是发现新的史料，这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是极其困难的；二是在逻辑推理上对柯达士的说法根据现有史料从各方面进行推敲。

二、柯达士解释的质疑

柯达士是惟一的当事人和证人，因此在华的外国人在使馆解围后不愿对他的说法提出疑问。德使馆的临时代办贝娄在克林德死后主持馆务，使馆解围后，他的第一份报告就指出，当时无西人在场，柯达士的说法必然具有权威性。围攻使馆期间，柯达士躺在床上对《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作了详细的描述，其描述于 1900 年 10 月 13 日

发表在该报上。柯达士对"谋杀"的细节如是说：

> 当时我们快到哈德门左边的警察所，我正在观察公使的轿子前面的一辆大车，边上有手持长矛的护兵，突然我看到的一幕令我的心跳骤然停止。公使的轿子离我的轿子不过三步之遥，我看到一个满族军人，全副武装，穿着制服，头戴蓝翎军帽，正举起步枪，向前跨了一步，将枪伸到离公使的轿帘约一码之处，然后瞄准公使的头部，开始扣扳机，我惊恐地大叫"停！"。与此同时，枪声已响，轿夫将轿子扔下便逃。我从轿子里跳起来，大腿已中一枪，其他士兵也纷纷向我开枪。我向公使的轿子看了一眼，里面毫无动静。[11]

柯达士如此描述的场景当然是预谋杀人的绝妙写照。以后的西方作家还要加油添醋，说大街上安安静静，而公使神态自若，毫无觉察。弗莱明则更说公使手持雪茄，夹着一本书，"好像是去野餐"。[12]这些场景的添加剂试图加强柯达士的基本说法：即中方士兵向轿子开枪完全是自发的，有预谋的，刺杀公使的那一枪是在近距离平射，公使完全没有反应。

首先，我们应该看一看克林德公使当时的心境究竟如何？在使馆解围后，柯达士的第一份报告中没有说公使神态安详，心境平和。相反，他说他看到公使从会议室走出来时的表情是："他显得有点紧张。我们向轿子走去时，他问我是否最好不用德国卫队护送。我回答说……在过去两天里我都单独去过总理衙门，并没有受到任何骚扰。现在让卫队护送，恐怕会对中国士兵，特别是对董福祥的甘肃兵刺激太大，有可能引发事端。"

据柯达士说，德国卫兵此时已准备就绪，在奥地利使馆门前等候，克林德在出发的最后一刻还是犹豫不决。后来他突然对卫队军官说："你们在此目送我们走出视线，然后回去，我不需要你们护送。"[13]

值得注意的是，克林德公使当时心情紧张。此外，柯达士并未说克林德公使手持雪茄，夹着一本书，神态安详。但柯达士吃不准公使是否随身携带了一个重要物件，他最心爱的左轮枪。克林德曾当过军人，是东普鲁士第41团的中尉，他在外散步总是左轮枪不离身。[14]柯达士最早的说法是他们两人都是手无寸铁，但在使馆解围后的报告中又说他没有看到公使披挂他的左轮枪的皮肩带，以为他没有带枪，所以柯达士自己也把他的"温切斯特"手枪放在使馆。但柯达士接着又说公使是否将枪放在身上，带进轿子里，则不得而知。这个说法刊登在1900年11月柏林出版的政府报告里。此说一出，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克林德公使携带手枪，在途中会不会出事？克林德嗜好打枪，也有军人的训练背景。柯达士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又开始强调"公使绝对没有打第一枪"，[15]可见此说漏洞百出。即使公使打了第二枪，也会使柯达士的公之于众的权威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他最早的说法是公使毫无觉察，而满族军官是在近距离平射，所以是谋杀无疑。

当时尚有另一证人，尽管他不像柯达士那样是直接目击者，此人就是中国骑马侍从之一的刘玉成。刘玉成策马在轿前开路，忽然听到几声枪响。他在给战后德国占领军的证词上画有手印。在这份证词里，刘的回忆与柯达士的说法相去甚远。刘说克林德公使的轿子行至东单牌楼大街时，他听到几声差不多同时的枪响。他回头看到一队中国士兵，手持步枪，在愤怒地推撞公使的轿子，公使在轿子里面一动不动。而柯达士则跳出轿子，显然已受伤。[16]刘玉成既然说听到几声同时的枪响，这说明中国士兵显然对几秒钟以前发生的事情表示气愤，所以才会去推搡克林德的轿子。如果刘的证词属实，则柯达士的说法也就成了问题，因为当时显然有双方的交火，而不是一人悄悄地放枪射杀公使。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柯达士自称在看到满族军官举枪放枪的几秒钟内，已看清了这个军官的军阶，所谓"六品军官"，"顶戴蓝翎"。事实上，那天早上满街都是士兵，柯达士何以看得如此一清二楚？在

战后的正式报告中，柯达士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试图将事件发生的时间稍加延长。他说这位满族军官端着枪跟着公使的轿子走了一段，这正与他早先的说法相左。最重要的疑点是柯达士对他自己逃生过程的解释。首先，他无法说明中国士兵在击伤他的大腿以后，居然能放他逃生，而且他能在半小时内穿街走巷，并未受到任何攻击，最终获救。如果中方真有谋杀计划，士兵们不可能让这惟一的洋证人逃脱。柯达士事后辩解说，打他的第一枪肯定也是瞄准头部的，只不过人已跳起来，才击中大腿。此说就算有理，也未能说明中方放他逃走的原因。他的逃脱经过更是耸人听闻：柯达士说当时"子弹横飞"，而且有一群手持长矛的魔鬼般的士兵在身后追赶，而带伤的他竟能在一小巷中逃脱。他说这肯定是历史上的奇迹，有上天保佑。[17]其实，他之所以能逃脱，只能是因为中方并无谋杀计划，公使之死是一个偶发事件。

三、恩海审讯实录（柯达士从中做了手脚）

另一个直接当事人是神机营霆字队的章京，满人军官恩海。恩海是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已无疑问，问题是恩海的供词是否完全可靠？恩海被抓捕后立即落入德军手中，此中大有名堂。恩海是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章京。克林德公使被杀的80天以后，恩海在京城被捕。最先发现恩海可疑的是一个日本记者。他在日军占领区的一间当铺中发现了克林德公使的银质怀表，上有"K"的刻字。日公使馆武官柴五郎中校顺藤摸瓜，追到恩海。柴五郎并未对他进行仔细的审讯，因为德军当局听说后，立即要求引渡。因此，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德国人手中进行的。恩海于9月8日被捕，而9月13日，德国在华的海军上将班得曼已向正在海上驶往中国的联军统帅瓦德西报告，说恩海已经全部招供，并承认刺杀克林德的命令来自清廷最高层。[18]由此可见，所谓的恩海供词是以闪电般的速度获取的。

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北京的占领区的行政主管正是柯达士本人，

而审讯恩海的任务也由他主持,连翻译也是他。德国现存的"恩海证词"表明,恩海对此案的解释与柯达士的定论很接近。审讯中所提的问题都是精心设计的,以证实柯达士的说法为目标,所以"恩海证词"的可靠性应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柯达士在为证词定稿时恐怕没有意识到,"恩海证词"中还是有几个重大的疑点线索。首先,关于恩海证实柯达士所谓"高层阴谋"的说法,但在细节上大有问题。柯达士最关心的是谁是背后主谋,而恩海从头至尾都不愿说他是受命于端郡王载漪,他坚持说他的上司是庆亲王奕劻,这就令德国当局非常尴尬。庆亲王是著名的主和派,而且是德国最愿意接受的留京谈判大臣,恩海的说法对谈判进程不利。

据证词记录,恩海说"亲王"的命令于6月19日下午4点到5点之间收到。上面说:"看到洋人,格杀勿论。"柯达士立即问道,当日下午在这一时间他正好去总理衙门办事,你们为何没有动手?恩海马上说,当时他本人还没有拿到命令。柯达士又问,哪一位"亲王",恩海说我的上司只是庆亲王,端郡王统率的是虎神营,不是神机营。

这个证词记录本身已有重大疑点。即使某"亲王"确实下达过此命令,也只能算是屠杀所有洋人的命令,绝对没有特定的目标,更不用说以德国公使为刺杀对象了。6月20日上午,在证词记录上恩海说他和部下奉命等待攻击的目标。不久在东单牌楼附近突然出现两顶洋人的轿子,于是他命令部下进人战斗状态,由他先发一枪作为信号,然后开始攻击。令审讯者柯达士最为难堪的是,恩海接着披露克林德公使也打了一枪。而且在搜查公使的轿子时,恩海发现一枝左轮手枪,膛内尚有5发子弹,第6发子弹刚刚被射出。至于柯达士何以能逃生,恩海说是他命令下属不要追击"您行政官大人",因为他的任务是守卫这一街区。[19]

可见,这个证词与柯达士的说法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矛盾:第一,"亲王"的命令(假定有此命令)决不是阴谋杀害德公使的命令。此时清廷已经准备宣战,并发出了限令出京的照会,以武力将洋人加以

控制是势所必然。更重要的是，对洋人一向谨慎小心的庆亲王奕劻不大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20]几个月后，被德军关押已久的恩海在北京被德军正法。据说在临刑前，恩海突然开始真正地招供，他说：

> 我不过是遵上级命令行事，不然我一个小人物怎敢刺杀尊贵的德国公使？我的上司答应赏给70两银子，还有晋升一级，我同意执行这一任务。我完成了任务后，只收到40两银子，但并未被晋升。所以我留在北京等待晋升，这样才被捕的。[21]

此处恩海的说法与证词完全不同了，亲王的“格杀勿论”的命令又变成了谋杀合同，而德国公使也成了合同的惟一目标。[22]

事实上，清廷的高层根本没有可能在19日晚上知道德国公使要出来。因为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已知道当晚各公使照会中国政府时，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都已回家。即使到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大臣到署。《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对6月20日总署无高官上班作出了想人非非的解释。他认为：“总署无高官上班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怀疑。一般来说，大臣不在上班，总署会派人送信，请公使不要来署。但那一天无人送信，而德国公使却在路上受到暗算，这只能证明中国政府是有预谋的。”[23]其实中国政府并不知道6月20日上午的公使会议上，德使被孤立，因而坚持要来。即便有的公使要来，中方也不可能确认必是德使。所以，针对德使的暗杀“合同”很难执行。因此，恩海的所谓“最后的坦白”肯定是不可靠的。要么他在撒谎，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做这样的坦白，不能排除德军当局伪造这一坦白的可能性。从个性上讲，恩海不是一个懦夫。恩海刚被捕时，贝娄临时代办向柏林方面报告说此人骨头很硬，对杀公使一事“供认不讳”，并“自请立即受极刑”。既然德国当局以极快的速度获取了恩海的证词，为何一直将他关押？恩海已全部招供了，继续关押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恩海被捕后不久，清廷任命的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曾于1900年9月中向西巡的慈禧太后发电，报告说：“闻德员在京拿获戕德使之

旗兵,供认不讳。"李建议把先前"上谕"中的德使"为乱民所害"的说法加以修改,承认为官兵所杀,才好息德国之怒。[24]恩海的上司庆亲王奕劻于10月也向朝廷报告,说德国人最难对付,因为有公使被杀一事。他建议朝廷向德国解释说,此事实为偶发事件,"俾知变起仓猝,实系保护不及,非出自朝廷本意"。[25]庆亲王在这里恐怕不会撒谎。

恩海受刑前表现倒底如何?据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日记于1901年1月1日载:

> 杀害克林德的凶手终于被正法。几个月来,这个背运的歹徒一直都要求早日受刑。今日的行刑地点在北京的一个人口密集的市场,但只有几个人在旁观看。50码以外,集市贸易照常进行,在饭铺吃饭的中国人不愿中断他们的进食,一个说书人在讲他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他吸引的听众比恩海受刑吸引的人要多得多。[26]

瓦德西日记并未提及恩海"最后坦白"时的可怜相,恩海骨气很硬,关押数月不太可能把他变成一个懦夫。

第二个方面,"恩海证词"也与柯达士的说法有矛盾,因为克林德公使确实打了一枪。问题是如何解释克林德公使的动机,公使很可能观察到某种危险迹象,因而开枪,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战后德国当局对此事绝口不提。德军远征军司令莱瑟尔将军甚至编出一个新的故事,说恩海看到德使的轿子后,居然有时间请示上级。莱瑟尔将军称恩海请示上司要不要杀"这位中国人非常尊敬的德国公使?"上司立即首肯。[27]这种说法只能是胡编乱造而已。总之,如果公使发过一枪,就不可能证明柯达士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公使不可能对当时发生的事毫无察觉,不明不白地死去。有可能柯达士并没有目击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或者他是有意隐瞒这一重要事实。

莱瑟尔将军是恩海受刑的主持人,他关于恩海被处死的细节也

令人注意。在此之前,德国外交部曾询问是否有处恩海死刑的必要,因为恩海不过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军人。莱瑟尔回答说,作为军人,他同意外交部的观点。但他又征求瓦德西元帅的意见,瓦德西认为应处以极刑,否则中国人会将释放恩海视为德国的软弱。莱瑟尔对执刑现场的记载与瓦德西日记相似,恩海"神态自若,保持尊严",没有做出任何求饶的表示。[28]

四、非目击者的种种说法

如上所述,两位直接当事人的说法互相矛盾,而柯达士说法的可靠性尤其值得怀疑。事件发生以后不久,各种不同的解释已开始产生。一种说法是义和团杀了公使,但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当时京城地面的治安由军队掌握,而不是义和团。另一种说法则将矛头指向董福祥的甘军,但也毫无证据。西北高原来的甘军肤色黝黑,很容易辨认,没有证据表明在公使被戕现场出现过甘军士兵。此外,还有一些想入非非的奇谈怪论。《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坚持认为中国政府高层事先确有预谋。据称,李鸿章的美国幕僚佩希克告诉莫理逊,吏部尚书徐郙曾亲口跟他说:"二十日上午确有杀害所有公使的计划,而德使自行外出被杀将此计划提前打乱,致使其他公使得以幸存。"此说也毫无根据,佩希克一贯喜欢吹牛,连莫理逊都认为他常常自称通晓清廷内幕,难以置信。[29]

另一种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柯达士本人,柯达士认为京城步军统领崇礼嫌疑最大。他说德国公使馆当时有崇礼反洋活动的证据,因而崇礼组织暗杀公使活动是为了灭口。[30]柯达士不遗余力地想将中方的谋杀计划与德国公使联系起来,然而他缺乏任何证据。首先,京城警方不在现场。其次,在 6 月 20 日,崇礼已被解职。从所有的史料来看,事件的现场只有一支部队,即神机营的霆字队。崇礼在战后被任命为留京谈判大臣之一,当时奥地利公使馆已毁于战火,所以奥馆暂时征用崇礼的私宅为馆址。柯达士对自己的说法坚信不疑,因

而设法诱捕了崇礼。柯达士通过奥馆通知崇礼来商谈退还住宅一事,崇礼一到 就立即被事先埋伏好的德兵逮捕。崇礼坚决不承认德方的指控,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赫德爵士一开始就不相信崇礼是主谋。在一封手写的信中,他告诉窦纳乐公使,庆亲王奕劻和其他大臣对崇礼被捕一事极为关切。中国大臣告诉赫德,在那个不幸的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崇礼已被解职,由他人代替,崇礼与此事毫无关系。中国大臣还"极力恳求德方释放崇礼"。赫德接着说:"我不明白为何崇礼被捕,在何处被捕。我听说他受邀到奥馆商谈事宜,被德军抓走,而奥馆是崇礼的私宅。"赫德还说崇礼与他有私交,他对崇礼比较了解:"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信崇礼与此事有任何关联,他不是做这种事的人。"赫德自己的判断是:"最有可能的主谋是怡亲王。怡王府恰在神机营和比利时公使馆中间。怡亲王做此事的动机是为其府上被洋人杀害的义和拳民报仇。"[31]

赫德此处也是在猜测,并无任何证据,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赫德对中国政府高层是主谋一说不大相信。

其实,德国政府在恩海被捕后不久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密谋杀害德公使的证据。据意大利外交文件,意驻德大使兰扎报告说,德外交部副大臣里希特霍芬亲口告诉他,杀害公使的凶犯已经被擒。这名凶犯称奉上峰命令杀死"任何公使馆的成员"。[32]所以柯达士硬要将德国公使说成是中方既定的杀害目标的说法很难成立。德国政府不愿将此事牵连庆亲王奕劻是有目的的,庆亲王是留京善后大臣,牵连庆亲王将危及德国的利益。战后的其他列强,特别是英、法,对更换中国的政府没有任何顾虑,而德国则一定要保全慈禧太后的权威。原因很简单,联军最高统帅、德国的瓦德西元帅此时正在海上,抵华还需时日。如果在瓦德西到达前中国现政府倒台,换上新人,瓦德西就将会发现新政权已在各列强的股掌之中,他作为联军统帅的地位就将失去重要性。瓦德西在旗舰上收到两宫西逃的电报,十分高兴。因为联军如擒获慈禧太后,则政府更迭无疑。外交部顾问、前驻华公

使巴兰德于1900年9月写给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对德国的利益做出如下判断：

> 太后是受人挑唆还是自主决定与洋人为敌，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太后仍是中国的第一要人。如果将太后除去，光绪必被他人玩于股掌之间，对我国没有任何好处。[33]

正因为如此，柯达士关于克林德被杀的说法已足以为德国利益服务，没有必要深究下去。所以，德国政府在瓦德西到来之前态度强硬，不肯开始议和，有意拖延时间。而瓦德西到北京后，态度立即软化下来，因为如果按柯达士的想法将此事一追到底，只能危及庆亲王奕劻的地位。

大多数的公使在使馆解围之后对克林德被杀事件不愿置评，更不愿公开表示异议，因为无人有证据批驳柯达士的说法。私下里，有的公使对此事多少有些个人的看法，窦纳乐勉强相信柯达士的说法，但他对克林德本人也不敢恭维。在给东亚事务助理外交大臣的一封私信里，窦纳乐说道：

> 关于克林德事件的事实是：我们于十九日下午收到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要求我们二十日下午四点钟以前整装离京。我们当天下午立即开会讨论。我们决定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第二天上午九点与庆亲王和端王会面。直到二十日上午九点半，中方仍无反应。绝大多数的公使决定再等下去，因为到总署去坐等中国大臣有失我等尊严。此时克林德大怒，用拳头敲击桌面，他本来就是一个喜爱激动的人。

窦纳乐认为克林德不听众人劝告，是咎由自取。他还说，俄使格尔思甚至提出过由卫兵武装护送，因为京城地面拳匪太多，十分危险，克林德对此建议也无兴趣。[34]

意使萨瓦戈的看法也很重要。他于1900年10月18日给他的朋友,时任意大利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潘萨的一封私信中提到所有的在京外国人,"包括赫德爵士"都未能料到中国是何居心:"我坦白地说,即使在最后一刻,我仍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动用正规军向我们进攻。"萨瓦戈对克林德事件的判断是:

>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夺取大沽炮台。当时西摩联军仍有可能抵京,而在华的海军将领已无登陆作战的足够兵源。我相信,如果没有夺取大沽炮台的事件,可怜的克林德恐怕在今天还活着,而我们将处于正规军的保护之下,一起对付拳民。[35]

在克林德事件中,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插曲,多年来无人能加以解释,因而成为西方学者认定是中方预谋杀公使的证据之一。在克林德被害的几天前,西方电讯社从中国发来两个报道,说克林德可能已死,或被囚禁。1900年6月14日,也就是克林德公使被杀的6天前,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报道说在京公使中已有一人死亡。欧洲报界纷纷予以转载,并有报道特指克林德即为其人。[36]两天以后,"不列颠电报公司"收到另一个电讯,说公使馆区已被中国占领,德使被杀。德国外交部立即向驻芝罘的德领事询问,德领事对此全然不知。但报告说,从一艘日本鱼雷舰收到的消息,说所有在京的公使都已成为阶下囚。[37]这些无法证实的报道使欧洲外交界一片恐慌,但德皇威廉二世正相反,他认为德国成为列强远征军领袖的机会已经到来。他认为此战是两个种族之间的"亚欧之战"。布洛夫外交大臣知道德皇最爱轻举妄动,便立即设法让他平静下来。布洛夫告诉德皇,德国参与在华军事干涉的两个条件均未成熟。其一,俄军的动员令是受日本派遣远征军的影响,其二,克林德公使之死尚未被证实。布洛夫用巴兰德的一封信来劝说德皇。巴兰德在信中说,他绝不相信公使团在京有危险,控制北京只需几百洋兵即可。巴兰德认为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是欧洲新闻界的"商业性的欺诈"。德皇对布

洛夫的判断大为光火,在他的报告上写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38]

对克林德之死为何提前被报道的传统解释,是证明中方有预谋的重要根据之一。阿瑟·史密斯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像这样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居然在它发生的四天前已为全球的新闻界获悉,而它真正发生以后却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为外界所知。这种现象必不寻常。"因此,此事件背后必有密谋。史密斯本人认为,克林德在进剿京城义和团中所起的作用使他成为中国人的刺杀目标。[39]关于义和团事件的一本早期学术著作的作者乔治·斯泰格则认为,德国护馆卫兵的滥杀行为使德国公使最受中国人痛恨。[4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本巨著的作者摩尔斯相信克林德之所以被选为谋杀的对象,是因为他在5月的公使会议上公开提出要瓜分中国。[41]

在很多当事人中,也不乏各种各样的猜测。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有一封华俄道胜银行总裁波科提洛夫给维特财政大臣的信。波科提洛夫在使馆解围后写的这封信里说,5月份的公使会议上,克林德公开提出要瓜分中国。中国的仆役听到后,添油加醋地报告了总理衙门。波科提洛夫实际上认为中国政府在5月下旬就已经决定干掉克林德,此说实在太过勉强。但波科提洛夫又证实德使在赴总署的路上非常生气,不断地用手势并大声咆哮。这种行为很可能刺激了街上的士兵,当时京城地面的气氛已极度紧张,所以克林德被杀是在所难免。[42]

上述种种理论和猜测大致都是一个意思,正如弗莱明所总结的,对克林德之死的提前报道说明:"某些密谋的证据表明,在克林德死前的几天里,朝廷的权臣已做出了杀害他的邪恶决定。"按照这种说法,提前报道克林德公使之死只能被解释为朝廷中有人在得知暗害决定之后,向报界秘密透露了这一消息。

上述的这类猜测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中国政府确实要选择某公使作为暗杀的目标,很可能会选法使毕盛。法国是天主教护教国,是此次动乱的祸源之一。而且,向大沽炮台发最后通

牒的是法国总领事杜士兰。关于中国方面获得了5月20日公使会议的详细内容因而决定干掉要瓜分中国的德使，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即使中方有杀德使的计划，执行者也只能等待偶然的机会，因为他们无从事先知道德使在6月20日上午的动向，所以此计划本来就无胜算的把握。再者，当时北京与外界的电讯通信已经中断，清廷不可能有人能提前将暗杀计划泄露给欧洲报纸。

总之，这些关于克林德被杀的提前报道，只能是如同巴兰德所说的"商业欺诈"，无非是为了造成轰动效果，并无任何事实根据。很有可能，在6月13日以后，在京的洋人大肆自行追剿义和团的行为被一些目击者传到了外界，而德公使在此事件中最为突出。另外，这些提前报道都来自英文报纸，反映出英国人对德国公使一贯厌恶的心情。当时从日本鱼雷艇发出的所有公使已成阶下囚的消息显然并不准确，但不像英文报纸那样带有浓厚的反德情绪的感情色彩。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所有从西方来的理论，都没有能够确定杀死克林德公使的动机和现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非目击者的记载中寻找线索，而非目击者的种种说法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所忽略。纵观中方人士在当时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克林德公使之死的说法与西方一贯接受的观点大不相同，几乎所有的解释都倾向于"偶发事件"说。当然，也有一种说法与西方的理论相吻合，这就是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李的说法是"端王伺于道"，令他的虎神营击杀克林德公使。[9]此论最合德国的心意，但是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李希圣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地位很低，居然知道端郡王载漪当时亲自在大街上指挥虎神营执行暗杀德使的任务，此说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如前所述，虎神营当时并不在现场。

最权威的中方说法来自于大学士荣禄。围攻使馆开始后不久，荣禄给南方督抚发了一封密电，说他竭尽全力阻止形势的恶化，但不能成功。他说："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他又说："嗣再竭力设法转圜，

以冀万一之计，始暂许在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神机营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时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笔难尽述。"荣禄在 1900 年 6 月 19 日，确实被授权与公使们讨论关于护卫洋人出京的具体安排。然而，荣禄的护送计划尚未开始实行，克林德公使已被杀。荣禄明确指出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是神机营而不是虎神营。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家人在李去世后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刻意将荣禄的这份密电内容加以篡改，即把"神机营"变成"拳匪"，不然的话，要得罪当朝权贵庆亲王奕劻。[44]

遗憾的是，荣禄在此密电中没有提供德使被杀一案的细节。在《庚子大事记》中，关于当时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

> 当公使之乘轿而出也，适值神机营霆字队章京恩海，率领部下数十人巡街，见洋人乘轿而来，亟让在北首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将发，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45]

此文作者显然不在现场。但此说与德国获取的"恩海证词"的说法已十分接近，也就是说，克林德确实在死前曾发过一枪。

其他的中方记载也都说德使之死是偶发事件。一位总理衙门章京记载道："未到 9 点钟，德国克林德乘轿偕同翻译来总署会晤，行至东单牌楼大街，不知谁先开枪，神机各兵均开枪轰击，将该使同翻译均皆击毙。"[46]此人当时正在总理衙门当班，所以一开始收到的消息是两名洋人被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此时谁也不知道柯达士的命运如何。军机处的满人章京继昌是这样记载当时情景的：

> 且德使独赴总署，止之不听。街市汹汹，旗兵列队弹压。德使生疑，在轿内放枪，兵团激怒，致戕德使于途。[47]

另一个军机处的汉人章京王彦威是最后通牒的起草人之一。他的回忆是："德使克林德乘四人肩舆诣总署面商前事。行至东单牌楼，适京兵以会操归由崇文门入，猝遇之，以为义和团也。于轿内发手枪，京兵遂一拥而上，杀克使而势成骑虎，祸临于此点。"[48]

总之，中方的很多记载都大同小异。当时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说法，说德国人的轿子来到东单牌楼时，克林德公使的左轮枪不小心走火，引起一场混战，比利时使馆的卫兵与中国士兵开始对射，公使和柯达士被夹在中间，中了枪弹。[49]

日本驻沪记者佐原笃介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 当公使和他的翻译……到达东单牌楼时，突然从轿子那边传来一声枪响。这是公使的左轮枪走火造成的。比利时公使馆就在附近，卫兵们以为是中国士兵开的枪。他们立即关闭了大门并开始向中国士兵们射击，士兵们也向他们回击，这时两顶轿子之一被射中了。至此，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始彻底破裂。[50]

还有其他类似的说法在当时见诸报端。比如 1900 年 7 月 24 日，上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个中国官员的日记，此人刚从北京携家南下。据他说，克林德的手枪走火，比馆卫兵开枪，中方士兵还击，所以有此事故。[51]

上述的说法虽无确切证据，但也有一定道理。比利时使馆是惟一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外的使馆，而且恰恰在出事的地点。事实上，当某公使在京被杀的消息第一次传到南方督抚那里时，说的是比利时公使，而不是德国公使被杀。山东巡抚袁世凯于 6 月 27 日致李鸿章的电报中也说："6 月 22 日从北京来的人告诉我，董部队杀了比利时的公使，并在 6 月 21 日攻击了其使馆。"[52]袁的消息来源显然是在比馆附近目击混乱局面的人。应该指出的是，比馆卫队由法国和奥国水兵组成，比使姚士登并无比利时的卫兵。

很清楚，中方的记载大多与"恩海证词"在两点上相吻合：其一，

德使曾发射一弹；其二，并无杀德使的预谋。当然，“恩海证词”中关于收到“亲王”命令一节，只能说明恩海强调他是军人，在执行命令。但他很有骨气，不管德方多大的压力，绝不无故牵连端郡王。翰林学士高枬在整个义和团事件中都在北京，他对事件的过程有逐日的日记，且有大气情况的记录，极为可靠。关于恩海，高枬记有他坚持“供庆不供端”。[53]

五、克林德是如何被杀的

如果说，在克林德公使被杀事件的当事人中，有人以谎言愚弄了天下，他只能是柯达士。但柯达士为何要说谎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的负疚感。当时一片混乱，柯达士跳出轿子，便夺路而逃，并未顾及公使。事后，他有负疚感，所以要把他并未看清的事件发生过程说成是冷血的谋杀现场，这样就显得他完全无助。

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 1900 年 6 月 20 日上午，仔细来推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克林德公使从公使会议出来时，非常生气，而且相当紧张。为了掩饰他的恐慌，他将左轮枪携在身上，未戴佩带。他对是否要德兵护送犹豫良久，然后听从柯达士的意见，不要卫队护送，以免节外生枝。坐进轿子以后，德使为了观察外面情形，破例地命令轿夫不要把帘子放下。柯达士的报告中说，他当时对公使的“大丈夫气概非常佩服”，所以也让轿夫卷起帘子。其实公使当时心情紧张，缺乏安全感。柯达士以为公使未带枪，所以也未拿他的“温切斯特”手枪。出了使馆区以后，大街上都是士兵，每个街角都有军人把守。这些士兵对洋人的轿子很好奇，但没有做出敌对动作。公使手拿左轮枪，紧张地观察地面。

此时，宫廷精锐部队神机营霆字队负责把守东单牌楼一带。他们有可能收到过庆亲王奕劻准备打仗的命令，因为中方的最后通牒将在 6 月 20 日下午 4 点到限。此外，他们已知道中方已准备对洋人宣战，所以在东单牌楼的士兵处于高度戒备之中。章京恩海和他的

下属负责街角的那一段。他们突然发现两顶洋人的轿子出现在拐弯处。恩海命令属下回到临战岗位。克林德公使是军人出身，对恩海等人的动作有条件反射，也举枪准备。此时，公使的左轮枪有可能走火，也有可能他下意识地先发枪。满族士兵立即还击，而对面的比利时使馆卫队也开枪自卫，以为中方攻击，所有这一切不过发生在数秒之内。柯达士在公使的轿子后面并未看清发生了什么事，他跳起来时，大腿中了一弹。神机营士兵见洋人的轿子里不再还击，便停止射击，到轿前审视。他们对轿子中发出的一枪很愤怒，所以推推搡搡，但发现轿内的洋人已濒临死亡。柯达士跳出轿子后夺路而逃，恩海等人对他并不注意。他们将公使抬到附近的一个胡同中，发现他已死去。恩海守着尸体，一面命人向上级报告。在守尸的时间里，他发现公使的银怀表，于是便顺手牵羊。

与此同时，柯达士拖着伤腿，穿街走巷，并无任何人追赶和骚扰。最后他找到美国浸礼会传教点，受到美国传教士的急救，并晕了过去。醒来之后，他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也对自己落荒而逃感到内疚。但他很快听说公使已死，他的说法就成了孤证，因此心情好转，于是开始编撰事情的经过，将他并未看清的事件描绘成颇有戏剧效果的谋杀案。他的最早说法已被全球报纸报道以后，他绝不愿意对此加以修正。在战后给柏林政府的报告中，他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如实汇报，这就产生了一个与他最早的说法有矛盾的可能。捕获恩海以后，柯达士竭尽全力想从恩海口中套出一个完善无缺的证词。恩海也意识到，如果坚持说此事是一个意外事故，他就失去了奉命行事、执行天职的军人气概，所以他不否认有“亲王”的命令。然而，恩海的个性和为人都比较正直，所以他的证词完全没有达到柯达士的要求，对柯达士和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帮助。

总理衙门官员在事发之后，一时也搞不清事故的原因。克林德的另一个骑马侍卫飞马到总署报案时，发现只有一个章京在当班。此章京与他一起勘察了现场之后，立即认定是德国人先开的枪。于是当日下午向德馆发了一个照会，抗议两个德国人首先挑衅，致使中

方还击，杀其一人。[54]在这个时刻，公使团鉴于德使被杀，已决定拒绝中方的最后通牒，所有的外交官都已认定清廷是克林德之死的主谋。清廷此时也进退两难，不管克林德被杀是否是意外事故，他死在中国领土，且在最后通牒到限之前，中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廷意识到，克林德之死已使得将在京洋人护送出京的计划成为不可能。但是最后通牒既已发出，不可能收回，所以有围攻使馆之举。应该注意的是，当日下午慈禧太后已收到大沽炮台失陷的报告。这就是说，原来将公使护送到天津以堵各国之口实，并挫其攻打炮台的设想现在已经毫无意义。

克林德被杀后不久，中国政府正式答复公使团，表示同意延期离京，但京城地面不靖，请公使勿往总署商议。英使窦纳乐刚接此信时还觉得乐观，他认为："德使被戕一事迫使中国政府提高警惕，将政策向和平方向引导。"然而，他继续道："当时的这种乐观想法没有把朝廷存在的强大的主战派考虑进去。而总理衙门从六月初开始已不能代表政府，所以总署与我们的通信不过表明了一些温和派的态度而已。"[55]这封信是攻打使馆前的最后一次沟通。当日（6月20日）下午4时正，最后通牒到期，中国军队立即开火。一位英国军士长向斯特劳斯上尉敬礼，报告说："进攻已经开始。"斯特劳斯上尉回答道："谢谢，墨菲军士长。"于是，闹剧般的围攻使馆事件正式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战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它至少结束了难以忍受的心理悬念。德国公使之死使外国人觉得差点上了中国政府的当，现在无别的选择，只有拼死一战。中方也感到解脱，大沽炮台已陷的消息下午已到达，最后通牒本身已失去作用。不管怎么说，开战之责来自洋人，中方已别无选择，惟有一战。

关于围攻使馆是什么目的，中方并不清楚。似乎是要将洋人作为人质，日后可图转圜，并无斩尽杀绝之意图。宣战诏书倒是让民情振奋，尽管其说法极其荒谬，但宣战诏书本身是一篇佳作，不过其离骚文体英文很难译出。多年以后，在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重

读了这篇诏书，对慈禧太后很是佩服，说："太后至少有勇气宣战！"其实，慈禧太后从宣战伊始，围攻使馆之初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

①英国国家档案馆，FO17/1413.

②弗莱堡德国军事档案馆，《柯达士报告》(Bericht Cordes)，RM 5 v.5620.

③Heinze, Wolfgang: *Die Belagerung der Pekinger Gesandschaften*, pp. 36—38 and footnote on p. 36. 克林德的行为见《柯达士报告》。

④Fischer, Per: *Chinas geopferter Freund Clemens von Ketteler*, *in Deutsche unter Anderen Völkern*, vol. VI, p. 175.

⑤*China*, No. 4, p. 23.

⑥*Salvago-Raggi Memoirs*, p. 362.

⑦柯达士说公使会议8:30分结束，其他人的回忆中，会议到9点多才结束。参见 Pichon: *Dans la Bataille*, p. 244; MacDonald: *China* No. 4, p. 23.

⑧荷兰外交档案，*Knobel Report*, No. 7, p. 2.

⑨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107页。

⑩见林华国：《义和团史实考》；还见柯文：《历史三调》。两书均未涉及克林德被杀一节。

⑪*The Times*,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October 13, 1900.

⑫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106页。

⑬《柯达士报告》，同上注②。

⑭关于克林德的早期生活，见 Fischer，同上注④，第179—187页。

⑮⑯《柯达士报告》，同上注②。

⑰*Besonder Beilage zum Deutschen Reichs*, No. 272; Berlin, November 14, 1900. Also Heinze, pp. 38—43.

⑱德国军事档案馆，RM 38/v.64, p. 139.

⑲《柯达士报告》，同上注②。

⑳Henry Keown-Boyd 认为，庆亲王奕劻命令杀克林德是为了迫使洋人出京，以避免大屠杀，此说毫无根据。见他的著作：*The Fists of Righteous Harmony*, pp. 87—88.

㉑㉒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108页。

㉓《泰晤士报》，1900年10月13日。

㉔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第46页。

㉕同上,第 59 页。

㉖普鲁士中央档案馆,《瓦德西在华日记》。

㉗Lessel, Emil von: *Böhmen, Frankreich, China, 1866—1901*, p. 237.

㉘同上,第 238 页。

㉙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p. 117.

㉚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 108 页。

㉛(PRO)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1343.

㉜*DDI*, September 15, 1900, Terza Serie, vol. I, pp. 135—136.

㉝*The Holstein Papers*, vol. 4, p. 203.

㉞PRO, FO 17/1413.格尔思是否有此豪言壮语,值得怀疑。

㉟*DDI*,同上注㉜,第 229—230 页。

㊱Fleming, P.,见第七章注㉗,第 107 页。

㊲*GP*, vol. 16, p. 12.

㊳*GP*, vol, pp. 15—18.

㊴Smith, Arthur: *China in Convulsion*, p. 103.

㊵Steiger, George: *China and the Occident*, p. 222.

㊶Morse, H.B.: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I, p. 224.

㊷法国外交部档案馆:"*Delcassé Papers, Lettres de diplomates*", vol. M – T, p. 52.

㊸《义和团》,卷 1,第 16 页。

㊹《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 975 页注①。

㊺《义和团史料》,卷 1,第 7 页。

㊻《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史料》(上),第 78—79 页。

㊼继昌:《拳变纪略》,见《义和团史料》(下), 第 559 页。

㊽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 1,第 4 页。

㊾柴萼:《庚子记事》,见《义和团》,卷 1,第 309 页。

㊿佐原笃介:《拳匪记事》,卷 2,第 23—24 页。

51《日本外交文书》,卷 33,第 58—60 页。

5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 959 页。

53《高枏日记》,第 195 页。

54Smith,同上注㊴,第 256 页。

55*China*, No 4, 1900, p. 23.

结论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在1901年,也就是义和团战争的一年后给美国传教士学者阿瑟·史密斯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 如果能得到中国方面关于1900年朝廷内部和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将是很有意思的。眼下我们都在猜测、推理,将各种线索拼在一起,但我们至今没有实证。这一切都是尚待回答的问题。[①]

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赫德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被彻底解决。

其实,中国方面的资料来源远远不够解开这个谜,所以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仍然让学者们争论不休。只依靠中方材料的最大缺点是视野过于狭窄,对国外的一手和二手材料缺乏重视。直到今天,中国关于义和团研究方面的专家,对西方材料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只是有一些节译,诸如《德国外交文件》等资料。只有将国外的大量材料与中国的资料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搞清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十分复杂。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学者们在这场战争起源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1898年以后，清廷的主要忧虑是政变后的新政权能否生存的问题。整个冲突的核心恰恰在于慈禧太后新政权的合法性。列强各国政府并没有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复辟光绪皇帝的政策，而在京公使团的所作所为误导了清廷，以为列强有推动复辟的大企图。

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在于双方沟通上的两大问题：一是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沟通存在困难，二是外交官与本国政府的沟通不够及时。甲午战后，争夺中国愈演愈烈，列强纷纷召回“中国通”，开始起用非洲问题专家，以致造成了对华政策的所谓“尼格罗方法”。也就是说，把中国视为非洲大陆，将中国人视为黑人。这种方法的具体表现为高压政策，对中国政体、政情漠不关心，以至于造成了外交官与清廷的沟通困难。此外，在华外交官对戊戌政变大多不满，尽管各国政府没有指示要求他们反对慈禧太后新政权，但公使团的大多数对清廷采取了集体蔑视的态度。中国的传统不允许对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更不允许在此问题上与外国人沟通，因而互相猜忌是势所必然。双方疑心越重，危险就越大。在朝廷内部，有关光绪复辟的任何讨论都不允许进行，即使在中外危机加深之时，也很少有人敢于将列强意在复辟帝制的话题正式提出，连主张支持义和团抗洋的守旧派也三缄其口。李鸿章在1900年初曾用过“勤王”两字，其子李经述立即电告父亲，慈禧太后对这种用词极为不快。所以，关于光绪合法地位的问题只有太后本人可以议论。但也只有在她决意开战之机，才将此事和盘托出，以威胁主和派大臣。也有少数的上奏中以委婉用语暗示此事，比如“干我国政”等等。直到中国宣战以后，李鸿章才敢将光绪复辟问题直接向英国首相询问。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原始档案史料里很少触及光绪复辟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清廷所关心的根本问题。

国外档案史料也很少涉及光绪复辟问题。原因是各国政府本无扶持光绪的政策。想让光绪重新亲政不过是在华外交官在现场的即兴发挥的意向,并无政权在背后支持。当然,也有一些政府高官提出过除去慈禧太后的想法,但并未形成真正的政策。于是,这就引起了第二个沟通问题,即外交官与本国政府就这一重大问题没有及时沟通。列强对华政策的主要动力是大国地缘政治,中国政府的更迭不是列强关注的重心。清廷当然对这种政策背景不甚了解,只能凭借在华外交官的态度来加以判断。由此产生的悲剧是,清廷在其最担心的问题上不能与外国沟通,而外交官在此事件中的异常表现并不为各自的政府所知晓。

当然,这两个沟通问题不能全部怪罪于外交官。列强在华外交的工作重点是观察其他列强是否独占便宜,中国内政对外交官和他们的政府来说并不重要。列强外交档案史料显示,大多数的来往电文都是有关列强的争夺,很少涉及中国朝政。因为此时在华的公使团大多对中国都是门外汉,而这批门外汉居然积极干预朝政,这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后果当然不堪设想。因此,1899 年和 1900 年间的中外关系随着公使团与清廷之间的误解而越来越恶化。清廷担心列强的复辟阴谋,而在华外交官的表现使清廷相信确有其事。慈禧太后在政变后已实际篡夺了权力,心理上自然感到紧张。公使团对新政权态度恶劣,是造成慈禧太后不愿在义和团问题上与公使团合作的主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义和团运动的起落与朝廷同公使团关系的起落有直接的关系。

山东的民、教冲突被传教士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问题,因为在山东发生的一系列偶发事件被传教士夸大为中国政府支持下的全面排外的政策。其实,这不符合事实。外交官一开始对传教士的说法心存疑虑,然而随着中外关系的不断恶化,渐渐地也以此种论点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决定。第一个错误是当时在京的外国人并未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就将护馆卫队召进北京;第二个错误是组织西摩远征军去解救尚未被围的使馆区;第三个

错误是在京外交官自作主张在京城内剿杀义和团,导致京城秩序大乱;第四个错误是决定夺取大沽炮台去解救被困的西摩远征军。这四个错误决定一环扣一环,都是导致中国宣战的直接原因。应该说,战争爆发于1900年的6月16日,而不是以6月20日的中国宣战为起点。因为在6月16日,列强对华发动了夺取大沽炮台的不宣而战,慈禧太后别无选择,被迫宣战。

慈禧太后自己对开战的解释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往西安仓皇出逃的路上,慈禧太后对县令吴永有过一段对话:她说她本来不想跟洋人"破脸"的,但是"中间那一段"被洋人欺负得太甚,所以才决定开战。[②]太后说的"中间那一段"究竟是哪一段?笔者以为,这正是3月底到6月中的那一段,此时列强外交官开始用军事手段来逼迫清廷就范。太后的这种解释是否有根据?笔者认为她虽然是对开战所作的直觉反应,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有道理的。

翰林院编修恽毓鼎也认为:"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③]慈禧太后在政变后想尽办法要防止光绪皇帝复辟,而列强公使团成了她的最大障碍。在中外争执无法解决之际,她不惜以开战甚至失地赔款来挽救新政权是合情合理的。[④]恽毓鼎还指出,戊戌政变后两年中,朝廷权贵意在立储,而"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各种证据表明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政策前后并不一贯,原因是对列强干涉朝政的企图吃不准,但又惧怕,所以她的剿抚两难政策是视公使团的所作所为而变化的。

克林德公使之死是造成中外开战的关键事件。可以肯定地说,如无克林德事件,不可能有围攻使馆之举。即使公使团被迫下旗出京,列强出兵报复,战争的性质也大不相同,结果也完全不一样,绝无巨额庚子赔款的可能。

关键的问题是,克林德之死是中国高层有预谋的暗杀还是偶发事件?《辛丑条约》在一百多年前已确认中国政府的罪行,并派醇亲

王载沣赴柏林道歉,此案似乎早已了结。笔者根据多方资料判断,认为"暗杀"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惟一的证人,即公使的中文翻译官柯达士的证词疑点太多,不能自圆其说,也与其他材料不相符合。克林德公使之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偶发事件,这就证明了本书的基本结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是双方的误解与偶发事件。

总之,笔者不同意"义和团战争不可避免"说。中方并无一套成熟的排洋阴谋,慈禧太后固然对开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她自始至终是慎重行事的,没有把军国大事视作儿戏。清廷守旧派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占上风,义和团进京后局势并未完全失控,整个事件中有一位神秘人物起了关键作用,这就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大学士。西方人对荣禄完全有误解,以为他是"亲西方派"。弗莱明的名著《北京之围》和好莱坞的经典巨片《北京五十五天》都对荣禄赞赏有加。在《北京五十五天》中,荣禄居然成了西人女主角的秘密情人,所以在使馆被围时暗中相助。其实,荣禄绝非"亲西方派",他的作用是复杂的,而且有负面的影响。

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慈禧太后的行动受制于公使团的表现。西摩远征军北上和大沽炮台的失陷,使慈禧太后作出了缺乏深思熟虑的决定。在最后关头,她选择了战争风险以挽救她的统治,同时也间接地中止了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势头,这实际上也是她决定开战的根本原因。因此,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不在义和团运动本身,而在于中外关系。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一个衰弱的中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21世纪,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西方对崛起的中国再次判断失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西方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只是希望义和团战争的惨痛历史不会再次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

①Trevor-Roper, Hugh: *Hermit of Peking*, pp. 50—51.

②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卷3,第438页。吴永是曾国藩之子曾纪

洋的女婿，时任县令，为慈禧太后西巡筹办粮草，深得太后欣赏。

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卷1，第47、50页。

④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卷1，第11页。

资 料 来 源

Ⅰ. 原 始 资 料

1. 未刊史料(按国家名称英文字母顺序)

比利时

比利时外交部档案馆,布鲁塞尔,比利时

Classement B. 108;

Classement B. 172; Affairs de Chine, janvier-juin, 1900;

Correspondances Politiques, Chine, Serie Complementaire, 1900—1901;

P. 162, Maurice Joostens, Papers (姚士登私人文件);

P. 1799—1800, Microfilms;

Dossier 129, (projet de Legation Belge, 1900);

Indemnité Boxeurs, 1900—1901

中 国

第一档案馆,北京

清档

义和团(农民运动类,2303—166—12)

军机处录副折,义和团,237 3—73

宫中硃批,义和团,333 4—54

义和团运动,缩微胶卷 N. 631

法 国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巴黎,法国

Chine NS

Chine politique interiore I, II, III;

Papiers Delcassé(德卡赛私人文件)

德　国

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波恩，德国

B. 30, China No.24;

File N. 12742, 17673, 18304, 18306, 18307, 18321—18324

德国联邦档案馆，考布伦茨，德国

Nachlass von Bülow (布洛夫私人文件), N.1016/22

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弗莱堡

Msg 2/5196

RM 2/ 1857—1860, RM3/4270—4280, RM5/5599—5620, RM38/V/64

Files of the Imperial Naval General Staff Office

Soden, Graf von, Kriegestagebuch

Nachlass von Below(贝娄私人文件)

普鲁士中央档案馆，梅瑟堡，前东德

Tagebüche des 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瓦德西元帅在华日记〔全部〕)

意大利

意大利外交部档案馆(M.E.A.)，罗马，意大利

Serie-P Cina, 1898—1901

Pac.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Pac. 423, Comm. Luzzatti-operazioni finanziari e commerciali in Cina(罗莎第舰长在华的商务、金融活动)

英　国

国家档案馆，伦敦

CAB37/53/62(内阁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日志)

FO17/1368(反洋动乱，1897—1898)

FO17/1411—1414(窦纳乐爵士的外交电报)

FO228/1334(外交部收电，1900)

FO228/1352(与驻华使馆的通电，1900)

FO231/63(使馆来往通信)

FO674/83—87(中国拳乱,北京来往信函,1900)

FO881/8032X(北京使馆解围)

FO881/9496X(诺里少校关于华北军事行动的报告)

FO228/1343(外交部发电,杂类,1900)

PRO (Private Collections) 30/67/5(伯蒂私人文件)

WO28/302(司令部记录,中国拳乱 1900—1901)

WO32/6411—6413(格里尔逊上校日记)

WO106/72 1900(中国远征军)

北爱尔兰女王大学,贝尔法斯特

Sir Robert Hart Diaries(赫德爵士日记,1897—1901)

美 国

国家档案馆,华盛顿

RG 45(海军部档)Area 10 File

RG 59 国务院电报通信,驻华使馆电报,1896—1906, Vol. 102—128, 国务院发往中国, 1895—1903, Vol. 5—7

RG 395 (对外远征军档,中国)

国会图书馆,华盛顿

麦金莱总统私人文件

海约翰私人文件

爱迪私人文件

克林德夫人私人信件

2. 已刊史料

比利时

Schwertfeger, Bernard, *Die Belgischen Dodumnete zur Vorgeschichte des Welkrieges, 1885—1914*. Five volumes,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Berlin 1925

中 国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00

《东北义和团运动史料》,沈阳,1981
国家档案局:《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1958
国家档案局:《义和团档案史料》,卷2,北京,1959
国家档案局:《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卷2,北京,1990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山东义和团案卷》,卷2,济南,1980
《教务教案档》,九册,台北,1972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南京,1908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台北,1965
《清德宗实录》,北京,1987
沈桐生:《光绪政要》,江苏,1991
盛宣怀:《愚斋存稿》,武进,1939
四川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团档案》,成都,1985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台北,1973
吴湘相:《驻德使馆档案钞》,台北,1966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集》,北京,1918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北京,1928
中国社会科学院:《义和团史料》,卷2,北京,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筹笔偶存》,北京,1983
中华书局:《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卷2,北京,1964
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卷5,北京,1958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翦伯赞主编:《义和团》,卷4,北京,1949

法 国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DDF, 法国外交文件), 1871—1914, vol. 1—16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Livre jaune, 法国外交黄皮书), Chine 1894—1898, 1898—1899, 1899—1900, 1900—1901

德 国

Behnen, Michael, *Quellen zu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1890—1911*, Darmstadt 1977

Bölcke, Willi, *Krupp und die Hobezollern in Dokumenten*（克虏伯公司与德皇），Frankfurt am Main 1970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schen Kabinette 1871—1914（GP，德国外交文件），Berlin 1926

Rich, Norman, *The Holstein Papers*（霍尔斯坦私人文件），4 volumes, London, 1958—1963

意大利

Atti parlamentari italiani（议会文件），1898—1901

Documenti diplomatici sugli avvenimenti in Cina, Roma 1901

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DDI，意大利外交文件），Terza serie, 1896—1907

Per i documenti pontifici relativi alle missioni（教皇有关传教活动的文件），Grentrup, Theodorus, ed., 1925

Valli, V., *Gli avvenimenti in Cina nel 1900 e l' azione della marina italiana*（意大利海军在华军事行动），Milano, 1905

日　本

《日本外交文书》，卷 33，《北清事变》，东京，1956

《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帝国总参谋部编，东京，1904

荷　兰

Ministerie Van Buitenlansche Zaken, Zittung 1900—1901, Staasbergrooting voor Het Dienstjaar, 1901

俄　国

苏联科学院：*Vosstanie ikbetuanei, Dokumenti i materiali*（有关义和团事件的文献），Moscow, 1968

中华书局：《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1968

帝国总参谋部：《1900—1901 在华军事行动资料》（中译），卷 3，济南，1980

Krasnyi Arkhiv（红档杂志），特别是 vol. LII, XIV, XVIII, XXV, Moscow 1926—1927

美 国

Congress, *Bombardment of Taku Forts in China*(攻打大沽炮台战斗),众院,Doc. 645, 5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D. C., 1901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Washington D.C., 1902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Solicitor, *Right to Protect Citizens in Foreign Countries by Landing Force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美国外交文件), 1901, Washington D.C., 1902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Vav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00*, Washington D.C., 1900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Vav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01*, Washington D.C., 1901

War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00*, Washington D.C., 1900

War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01*, Washington D.C., 1901

Adjutant General's Office, *Report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i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July 1901*, Washington D.C., 1901

英 国

议会文件

China No. 1 (1898)

China No. 2 (1898)

China No. 3 (1898)

China No. 1 (1899)

China No. 1 (1900)

China No. 2 (1900)

China No. 3 (1900)

China No. 4 (1900)

China No. 5 (1900)

China No. 1 (1901)

China No. 2 (1901)

China No. 3 (1901)

China No. 4 (1901)

China No. 5 (1901)

China No. 6 (1901)

议会辩论记录:Hansard, 1895—1901.

Bourne, K., D.C. Watt and M. Patridge, eds., *British C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BDFA, 英国外交文件:外交部内部文件), Part I, Series E, Asia 1860—1914. 特别是 Vol. 24, 25, 26, UPA, 1994—1995.

Gooch, G.P. and H. Temperle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11 volumes, London, 1927.

3. 日记与通信集

据笔者的研究,很多所谓当时的日记是日后添加甚至编造的,比如朴南威尔的《北京使馆被围记》和玛丽·霍克的《北京事件的幕后》之类,极不可靠。这些人当时确实在北京,所以他们的一些叙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日记则不可信赖。所以笔者把一批不可靠的日记放在二手资料中。下面所列的是笔者验证过认为比较可靠的日记和通信集。

Allen, Roland,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London, 1901.

Cambon, Paul, *Paul Cambon, correspondence* (保罗·坎朋通信集),法文, 1870—1924, 3 volumes, Paris, 1940—1944.

Favier, Mgr. Alphonse, *The Heart of Peking*(樊主教日录), Boston, 1901.

高枏:《高给谏庚子日记》,《庚子记事》,北京,1978.

Giles, Lancelot,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部分内容可疑),

Nedland, West Australia, 1970.

Goschen, Edward, *The Diary of Edward Goschen, 1900—1914*, London, 1980.

Hart, Sir Robert

《中国海关密档》,北京,1990—1993.

I. G. in Peking,费正清等编 Cambridge MA, 1975.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ed., by Richard Smith et al., Cambridge/MA,1991.

Hewlett, W.M.,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London, 1900.

Heyking, Elisabeth von, *Tagebücher aus Vier Weltteilen, 1886—1904* (《海靖夫人日记》), Leipzig, 1926.

Janssen Arnold and Freinademetz, Josef, *Briefwechsel 1904—1907*, St. Augustin, 1978.

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台北,1965.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 3,电稿,上海,1987.

Morrison, G.E.,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1895—1912*(莫理逊通信集), ed. by Lo Hui-min, London 1976.

Oliphant, Negel, *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 New York, 1901.

Pichon, Stéphen, *Dans la Battaille, la ville en flammes*(《毕盛拳乱日记》), Paris 1908.

Price, Eva Jane, *China Journal, 1889—1900*, New York, 1989.

Richthofen, Ferdinand von, *Tagebücher aus China*, Berlin, 1907.

荣禄:《荣禄存札》,杜春和等编,济南,1986.

荣庆:《荣庆日记》,北京,1984.

Ruoff, E.G., ed. *Death Throes of a Dynasty*, Kent, 1990.

王凯运:《湘绮楼日记》,卷 2,台北,1964.

王文韶:《王文韶日记》,杭州,1986.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台北,1964.

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北京,1915.

张謇:《张謇日记》,《张謇全集》,卷6,南京,1994.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台北,1972.

4. 回忆录

Anthouard, Baron Albert-François-Ildefonse d', Les Boxeurs, la Chine contre l'étranger(当都阿回忆录), Paris, 1902.

青木周藏:《青木周藏自传》,东京平凡社,1970.

Barnes, Arthur,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London, 1902.

Beatty, David, *The Beatty Papers*, London, 1989—1993.

Bigham, Clive, *A Year in China, 1899—1900*, London, 1901.

Brandt, Max von, *Dreiunddreissig Jahre in Ost-Asien*(巴兰德东亚回忆录), Leipzig, 1901.

Broomhall, M.,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1901.

Brown, Frederick, *From Tie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s*, London, 1902.

Bülow, Prince Bernard von, *Memoirs 1897—1903*(布洛夫回忆录), New York, 1903.

Casserly, Gordon, *The Land of the Boxers or China under the Allies*, London, 1903.

岑春煊:《乐斋漫笔》,见《近代稗海》,卷2,北京,1981.

Chamberlain, Wilbert, *Ordered to China*, London, 1904.

Cheminon, J. and G. Fauvel-Gallais, *Les Evénements militaires en Chine*, Paris, 1902.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1983.

Collin, V., *Un Reportage belge en Extreme-Orient*, Anvers, 1901.

Coltman, Robert, Jr., *Beleaguered in Peking; the Boxer's war*

against the foreigner, Philadelphia, 1901.

Conger, Sarah P., *Letters from China*(康格夫人信件), London and Chicago, 1909.

Crispi, Francesco, *The Memoirs of Francesco Crispi*, London, 1928.

Crowe, G., *The Commission of H. M. S. Terrible*, *1898—1902*, London, 1903.

Daggett, A.S., *America in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Kansas City, 1903.

Darcy, Eugène,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à Pékin*(达尔希舰长保卫法使馆回忆录), Paris, 1901.

Daoulas, Alexis, *Le siége de Tien-Tsin*(达乌拉天津事变回忆录), Paris, 1903.

Dickman, Captain J.T., *Experiences in China*, Kansas, 1901.

Dix, C. C. *The World's Navies in the Boxer Rebellion*, *China*, *1900*, London, 1905.

Frey, General H., *Français et Alliés au Pé-Tchi-Li*: *campagne de Chine de 1900*, Paris, 1904.

Friederici, Georg, *Berittene Infanterie in China und andere Feldzugs-Erinnerungen*, Berlin, 1904.

Gerard, Auguste, *Ma Mission en Chine*, *1893—1897*, Paris, 1918.

Gipps, G., *The Fighting in North China*, London, 1900.

Glover, Archibald, *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 London, 1904.

Golitsyn, Vladimir et al.,《中东铁路护路队 1900 年满洲事件记略》(中译),北京,1984.

辜鸿鸣:《张文襄幕府记闻》,长沙,1985.

Hatzfeldt, Paul Graf von, *Nachgelassene Papiere 1838—1901*, Boppard, 1976.

何刚德:《客座偶谈》,《春明梦录》,上海,1983.

Hohenlohe-Schillinsfürst, *Denkwürdigkeiten der Reichskanzlerzeit*, Berlin, 1923.

Jullian, General Elie, *Souvenirs de l' expédition de Chine, 1900—1902*, Paris, 1928.

Kalmykow, Andrew D., *Memoirs of a Russian Diplomat*, New Haven, 1971.

Kaminiski, Gerd and E. Unterrieder, *Wäre ich Chinese, So Wäre ich Boxer*(罗斯通私人文件), Wien-Zürich, 1989.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卷4,北京,1958.

Korostovets, Ivan, *Rossiia na Dal' nem Vostoke*, Beijing, 1922.

Korsakov, V.V., *Pekinskiia Sobytiia*, St. Petersburg, 1901.

Kuropatkin, General A.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London, 1909.

Laur, Francis, *Siége de Pékin*, Paris, 1904—1905.

Lessel, General Emil von, *Böhmen, Frankreich, China 1866—1901*, Köln & Berlin, 1981.

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北京,1906.

吕海寰:《庚子海外记事》,北京,1901.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北京,1901.

Lynch, George, *The War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1901.

Martin, W.A.P.(丁韪良), *The Siege in Peking: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Edinburgh & New York, 1900.

Mateer, A.H., *Siege Days*, New York, 1903.

Matignon, J.J.,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Paris, 1902.

McCalla, Bowman, *Memoirs of a Naval Career*, Typescript, 1910.

Melotte de Lavaux, Adrian, *Les deniers jours d' une légation*, Liège, 1925.

Mitford, A.B.F., *The Attaché at Peking*, London, 1900.

Moltke, Helmuth von, *Errinerungen-Briefe-Dokumente 1877—1916*,

Stuttgart, 1922.

Pelacot, M. de, *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900jusqu' à l' arrivée du général Voyron*, Paris, 1903.

Pontéves Ruffi de, *Les marins en Chine*, *Souvenirs de la colonne Seymour*, Paris, 1903.

Ransome, Jessie, *The Story of Sieged Hospital in Peking*, New York, 1901.

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London, 1916.

Salvago-Raggi, 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 Memoirs*, in Licata, Glauco, ed., *Notabili della Terza Italia*, Rome, 1968.

Seymour, Admiral Sir Edward, *My Naval Career and Travels*, London, 1911.

柴五郎:《北京笼城日记》,东京,1965.

Steel, Richard, *Through Peking's Sewer Gate*, New York, 1985.

Stenz, Father Georg, *In die Heimat des Kunfuzius*(薛田资神父:在孔子的故乡), Steyl, 1902.

Stewart, Major-General sir Norman, *My Service Days*, London, 1908.

Tirpitz, Admiral Alfred von, *My Memoirs*(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回忆录), New York, 1919.

Vaughan, H.B., *St. George and the Dragon*, London, 1902.

Vereshchagin, A.V., *Na voine. Razskazy ochevidtsev 1900—1901*, St. Petersburg, 1904.

Waldersee, Alfred Graf von, *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瓦德西元帅回忆录), Stuttgart, 1923—1925.

汪声龄:《枕戈偶录》,台北,1964.

Wilson, James Harrison, Under the Old Flag, Greenwood, 1971.

Winterhalder, Theodor Ritter von, Kampfe in China, Wien, 1902.

Witte, Count Sergei, Memoirs(维特伯爵回忆录), London, 1922.

徐一士:《一士谈荟》,北京,1983.

II. 二 手 资 料

1. 西文书籍

与义和团战争直接有关的西文书籍

Allier, Raoul, *Les troubles de Chine et les missions chretiennes*, Paris, 1901.

Atkinson, James, *Australian Contingents to the China Field Force 1900—1901*, Kensington, 1976.

Bazin, Rene, *L' Enseigne de Vaisseau Paul Henry*, Tours, 1905.

Beach, Harlan P., *Princely Me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Boston, 1903.

Bertrand, Pierre, *Les atrocités de la guerre de China*, Paris, 1901.

Binder von Krieglstein, Eugen, *Die Kömpfe des Deutschen Expeditionskorps in China und ihre militarischen Lehren*, Berlin, 1902.

Bodin, Lynn E., *The Boxer Rebellion*, London, 1979.

Brandt, Nat, *Massacre in Shansi*, Syracuse, 1994.

Buksgevden, A., *Russkii Kitai. Ocherki diplomaticheskikh snoshenii Roossi s Kitaem*, Port Arthur, 1902.

Carlisle, Carris, *Party in Peking*, New York, 1987.

Clements, Paul H.,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1915.

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1997.

Cordier, Henri, *La révolution en Chine: les origines*, Leiden, 1900.

Duiker, William J., *Cultures in Collision*, CA: Presidio, 1978.

Edwards, E.H., *Fire and Sword in Shansi*, New York, 1970.

Edwards, Neville, *The Story of China, with description of the events relating to the present struggle*, London, 1900.

Esherick, Joseph,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1987.

Felber, Roland, Der 'Hunnenkrieg' Kaiser Wilhelms, Berlin, 1987.

Fleming, Peter(彼得・弗莱明), The Siege at Peking, London, 1959.

Grigoriantz, Alexandre, La siège de Pékin, Lausanne, 1989.

Hart, Sir Robe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London, 1901.

Heinze, Wolfgang, Die Belagerung der Pekinger Gesandtschaften: eine volkerrechtliche Studie, Heidelberg, 1901.

Henry, Leon, Le Siège du Pe-t 'ang dans Pékin en 1900, Bejing, 1921.

Herrings, Joseph, Taku: die deutsche Reichsmarine in Dampf und Sieg, Berlin, 1903.

Hirschfeld, Burt, Fifty-five Days of Terror, Julian Messner, 1964.

Hooker, Mary, Behind the Scenes in Peking, London, 1910.

Ianchevetskii, Dimitri,《八国联军目击记》(中译),福州,1983.

Jellicoe, George Patrick John Rushworth, Earl, The Boxer Rebellion, Southampton, 1993.

Kaliuzhnaia, Nina Mikhailovna, Vosstanie ikhetuanei, Moscow, 1973.

Kelly, John S., A Forgotten Conference: the negotiations at Peking, 1900—1901, Geneva, 1963.

Keown-Boyd, Henry, The Fists of Righteous Harmony: a history of the Boxer Uprising, London, 1991.

Kieser, Egbert, Als China erwachte: Der Boxeraufstand, Esslingen-München, 1984.

Kleine, Friedrich, Die Unterdruckung der Boxerunruhen in China 1900 nach ihrer volkerrechtlichen Bedeutung, Berlin, 1913.

Krausse, Alexis, China in Decay, London, 1898.

Krausse, Alexis,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Criris, London 1900.

Lederer, André, La mission du commandant A. Wittamer en China, 1898—1900, Brussels, 1984.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The Russo-Chinese War, Tallahassee, 1967.

Leslie, Edwin, Knights Who Fought the Dragon, Philadelphia, 1906.

Loti, Pierre,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Paris, 1901.

Mabire, Jean, L'Eté rouge de Pékin, Paris, 1978.

Martin, Christopher, The Boxer Rebellion, London, 1968.

Miller, J. Martin, The Yellow Peril, China at War with the World, Chicago, 1900.

Müller, Alfred, Die Wirren in China und die Kämpfe der Verbundeten Truppen, Berlin, 1902.

Myshlaevskii, A., Voennyia deistviia v Kitae 1900—1901, St. Petersburg, 1905.

O'Connor, Richard, The Spirit Soldiers, New York, 1973.

Plaschka, Richard Georg, Matrosen, Offiziere, Rebellen: Krisenkonfrontation zur See, 1900—1918, Wien, 1984.

Purcell, Victor, The Boxer Uprising, Cambridge, 1963.

Ricalton, James, James Ricalton's Photographs of China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Lewiston, NY, 1990.

Russell, J.M., The Story of the Siege in Peking, London, 1901.

Savage-Landor, Henry, China and the Allies, 2 volumes, London, 1901.

Scheibert, J., Der Krieg in China 1900—1901 nebst einer Beschreibung der Sitten, Gebräuche und Geschichte des Landes, Berlin, 1902.

Schreiber, Hermann, Opfergang in Peking, Ein Buch um das Sterben des Gesandten von Ketteler, Berlin, 1936.

Steiger, George Nye,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New Haven, 1927.

Tan, Chester C.,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 1955.

Tesi, Luca, La rivolta dei Boxer, Firenze, 1995.

Thery, Edmond, Le Péril Jaune, Paris, 1901.

Waite, Carleton Frederick, Som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1900 Antiforeign Rising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Los Angeles, 1935.

Weale, Putnam (B. L. Simpson), Indiscrete Letters from Peking, London, 1906.

Wehrle, Edmund,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Minneapolis, 1966.

其他有关书籍

Afflerbach, Holger, *Falkenhayn*,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im Kaiserreich*, München, 1994.

Arminjon, Vittorio, *La Cina e la mission italiana del 1866*, Firenze, 1885.

Andrew, Christopher M., *Théophile Delcassé and the Making of the Entente Cordiale*, *1898—1905*, London, 1968.

Avarin, V.I., *Imperializm v Manzhurii*, 2 volumes , Moscow, 1934.

Ballini, Pier Luigi and Pecorari, Paolo, *Luigi Luzzatti e il suo tempo*, Venice, 1994.

Banno, Masataka,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Harvard, 1964.

Barzini, Luigi, *Avventure in Oriente*, Milan, 1960.

Bassi, Ugo, italia e Cina: cenni storici sui rapporti diplomatici e commerciali, Modena, 1929.

Bastid, Marianne,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à la fin de la dynatie des Qing, 1873—1911, Paris, 1979.

Baumgart, Winfried, Deutschland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1890—1914), Frankfurt am Main, 1972.

Baumont, Maurice, L' essor industriel et l' imperialisme colonial (1878—1904), Paris, 1937.

Beasley, W.G.,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1987.

Beresford, Lord Charles, The Break-Up of China, London, 1899.

Blake, Sir Henry, China, London, 1909.

Bland, J.O.P.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London, 1909.

Boell, Paul, Le protectorat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hine et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en Extrème Orient, Paris, 1899.

Bornemann, Fritz, Arnold Janssen, der Gründer des Steyler Missionswerkes (1837—1909), Rome, 1969.

Borsa, Giorgio, Italia e Cina nel secolo XIX, Milan, 1961.

Bosworth, R.J.B., Italy, the least of the Great Powers, Cambridge, 1979.

Braisted, William Reynold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1909, Austin, 1958.

Brandt, Joseph van den, Les Lazarists en Chine 1897—1935, Peiping, 1936.

Brandt, Max von, Ostasiatische Fragen, China-Japan-Korea, Berlin, 1897.

Bredon, Juliet, Sir Robert Hart, London, 1909.

Cady, John F.,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54.

Calleo, David P.,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Cambridge, 1978.

Camperio, M., Autografia, Quintieri, 1917.

Carli, Mario, Ce-Kiang, Studio geografico-economico, Roma, 1899.

Carter, Major General W.H., The Life of Lieutenant-General Chaffee, Chicago, 1917.

Chabod, Federico, Storia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l 1870 al

1896, Bari, 1951.

Chalmers, Rear-Admiral W.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David, Earl Beatty, Admiral of the Fleet, London, 1951.

Charbonnier, Jean, 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Paris, 1992.

Chen, Changbin, La press franc, aise et les questions chinoises (1894—1901), Paris, 1941.

Ch'en, Jerome, China and the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London, 1979.

Chesneaux, Jean,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1971.

Chirol, Valentine,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London, 1898.

Cohen, Paul A.,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1963.

Colquhoun, Archibald,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898.

Cordes, Heinrich, Handelsstrassen und Wasserverbindungen von Hankau nach dem innern von China, Berlin, 1899.

Cordier, Henri,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hree volumes, Paris, 1901—1902.

Covell, Ralph, W.A.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Washington, 1978.

Curzon, G.,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1894.

Denby, Charles, China and Her People, 2 volumes, Boston, 1906.

Dennett, Tyler,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41.

DuBois, Marcel,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un siècle d'expansion coloniale, Paris, 1902.

Dubosq, André, La Chine en face des puissances, Paris, 1926.

Edgerton, Robert B.,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New York, 1997.

Eng, Robert Y.,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 1861—1932*, Berkeley, 1986.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1968.

Feng, Djen-dja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ince 1898*, Shanghai, 1936.

Feuerwerker, Albert, *Rebell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n Arbor, 1975.

Fischer, Otto, *China und Deutschland*, Ein Versuch, Münster, 1927.

Folsom, Kenneth,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1968.

Forsyth, Robert,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1912.

Franke, Otto,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Hamburg, 1911.

Franke, Wolfgang, *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1949)*, München-Wien, 1980.

Frey, General H., *L'Armeé de Chine*, Paris, 1902.

Freytag, Anton, *Die Missionen der Gesellschaft des Göttlichen* Wortes, Steyl, 1912.

Frochisse, J.M., *La Belgique et la Chine*, Brussels, 1936.

Geiss, I.,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1976.

Gernet, Jacques,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 Paris, 1982.

Grenville, J.A.S.,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4.

Gründer, Horst, *Christliche Mission und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Paderborn, 1982.

Hajjar, Joseph, *Le Vatican, la France et le Catholique Oriental*

(*1878—1914*), Paris, 1979.

Hartwich, Richard,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6 volumes, St. Augustin, 1983—1991.

Haverstock, Nathan, *Fifty Years at the Front*, Washington D.C., 1996.

Horbach, Philipp, *Offener Brief an Herrn Bischop von Anzer über die Stellung der Mission zur Politik*, Gütersloh, 1900.

Hutin, Serge,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Robert Laffont, 1976.

Jansen, Marius B.,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1975.

Jenkins, E., *The Coolie, His Rights and Wrongs*, London, 1871.

Johann, Ernst, ed., *Reden des Kaisers*, München, 1977.

Joseph, Philip,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5—1900*), London, 1928.

Kähler, Julius, *Deutschland und China*, München, 1914.

Kennedy, Paul M., *The Rise of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1982.

Kreissler, Francoise,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Paris, 1989.

Kuepers, J. J. A. M., *China und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ud-Shantung*, *1882—1900*, Steyl, 1974.

Kuo, Heng-yu, *China and die 'Barbaren'*, Pfullingen, 1967.

Kruschner, Joseph, ed. *China: Schilderungen aus Leben und Geschichte Krieg und Sieg*, Berlin, 1902.

Langer, William L.,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New York, 1951.

Latourette, Kenneth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1929.

Lee, Robert, *France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China*, *1885—1901*.

Oxford, 1989.

Leygues, Jacques Rapphael and Jean Luc Barré, *Delcassé*, Paris, 1980.

Li, Chien-nung,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Princeton, 1956.

McCordock, R. Stanley, *British Far Eastern Policy, 1894—1900*, New York, 1931.

Mahan, Captain A.T.,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Boston, 1900.

Balozemoff, Andrew,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Berkeley, 1958.

March, G. Patrick, *Eastern Destiny: Russia in Asia and the North Pacific*, Westport, CT, 1996.

Masini, E., *Viaggiatori e Naviganti fiorentini*, Firenze, 1898.

Nevius, John L., *Demon Possession*, New York, 1894.

Nocentini, Lodovico, *L'Europa in Estremo Oriente e gli interessi italiani in Cina*, Milano, 1904.

Pademi, R., *La nuova Cina*, Milano, 1902.

Paine, Ralph, *Roads of Adventure*, Boston & New York, 1925.

Pearl, Cyril, *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1967.

Pelcovitz, Nathan,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 1969.

Perry, Elisabeth J.,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1980.

Piolet, J.B.,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françaises au XIXe siècle*, 5 volumes, Paries, 1901—1903.

Ratenhof, Udo, *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bis 1945*, Boppard, 1987.

Reid, Gilbert, *The Sources of the Anti-Roreign Disturbances in China*,

Shanghai, 1903.

Reynolds, Douglas R., *China 1898—1912*, Cambridge/Harvard, 1993.

Richard, Timothy,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2 volumes, Shanghai, 1907.

Rivinius, Karl Josef, *Mission und Politik*, St. Augustin, 1977.

Ruland, Bernd, *Deutsche Botschaft Peking*, Beyreuth, 1973.

Schmidt, Vera, *Die deutsche Eisenbahnpolitik in Shantung 1898—1914*, Wiesbaden, 1976.

Schrameier, Wilhelm, *Kiaotschou*, *Berlin*, 1915.

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Cambridge/MA, 1971.

Sorley, Captain L. S., *History of the Fourteenth United States Infantry*, Chicago, 1909.

Spence, Jonathan D., *To Change China*, Boston, 1969.

Steiner, Zara, *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1914*, Cambridge, 1969.

Stoecker, Helmuth,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bundert*, Berlin, 1958.

Tamagna, Frank M., *Italy' s Interests und Policie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41.

Thomas, A.,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2 volumes, Paris, 1926.

Thomas, Lowell, *Old Gimlet Eye*, New York, 1933.

Trotta, Adolf von, *Grossadmiral von Tirpitz*, Breslau, 1933.

Varé, Daniele, *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 London, 1938.

Varg, Paul A.,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Princeton, 1958.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London,

1977.

Weir, Gary E., *Building the Kaiser's Navy*, Annapolis, 1992.

Wilgus, Mary H.,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Open Door, and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00*, New York, 1987.

Winzen, Peter, *Bülows Weltmachtkonzept, 1897—1901*, Boppard, 1977.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1957.

Wu, Chao-kwang,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Baltimore, 1930.

Young, Marilyn B.,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ambridge/MA, 1968.

Young, L.K.,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Oxford, 1970.

Zabel, Rudolf, *Deutschland in China*, Leipzig, 1902.

2. 中文、日文书籍

中文书籍

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北京,1959。

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与宗旨》,长春,1987。

程啸:《晚清乡土意识》,北京,1990。

商务印书馆:《近代稗海》,北京,1981。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北,1963。

戴逸等:《清代人物传稿》,北京,1988—1995。

多布隆拉洛夫:《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中译),济南,1982。

董守义:《恭亲王奕䜣大传》,沈阳,1989。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北京,1955。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199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1991。

郭松义等:《清朝典制》,长春,1993。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台北,1972。

侯宜杰:《袁世凯详传》,郑州,1986。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198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1987。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1956。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北京,1981。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台北, 1968。
李柢:《拳祸记》,上海,1905。
李广等:《义和团运动在东北》,长春,1981。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北京,1993。
李文海等:《义和团运动史实要录》,济南,1986。
李宗一:《袁世凯传》,北京,1995。
廖一中:《义和团在天津的反帝斗争》,香港,1984。
廖 一中:《义和团运动史》,北京,1981。
廖一中:《义和团大辞典》,北京,1995。
林华国:《义和团史实考》,北京,1993。
刘体仁:《异辞录》,上海,1984。
路遥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济南,1990。
路遥、程啸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济南,1990。
路遥、程啸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济南,1980。
路遥、程啸编:《义和团运动》,成都,1985。
罗尔纲:《绿营兵志》,长沙,1945。
马东王:《八国联军侵华》,沈阳,1986。
马东王:《张之洞大传》,沈阳,1989。
佐原笃介等:《拳匪记事》,台北,1972。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沈云龙主编:(八咏楼主)《西巡回銮始末记》,台北,1972。
沈云龙主编、劳乃宣著:《奉禁义和拳汇录》(包括蒋楷:《平原拳匪纪事》),台北,1977。
沈云龙主编、乔析生著:《拳匪纪略》,台北,1967。
沈云龙主编、王镜航著:《庚辛之际月表》,台北,1966。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北京,1961。
天津史学会:《八国联军在天津》,天津,1980。
天津史学会:《天津义和团调查》,天津,1990。
王广远等编:《义和团廊坊大捷》,北京,1992。
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1974。
伍廷芳:《伍廷芳集》,卷 2,北京,1993。
吴湘相:《晚清宫廷实纪》,台北,1961。
夏东元:《盛宣怀传》,成都,1988。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199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1992。
徐绪典等:《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济南,1990。
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1992。
杨森富:《基督教在中国》,台北,1980。
张力等:《四川义和团运动》,成都,1982。
张力等:《中国教案史》,成都,1987。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192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洋务运动》,卷 8,上海,1961。
中国义和团史学研究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成都,1987。
中华书局:《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北京,1983。
中华书局:《庚子记事》,北京,1978。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1993。
日文书籍
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と明治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
《近卫文麿日记》,东京,1968—1969。
铃木良:《帝国主义への道一义和团事变と日本》,每日新闻社,1967。
水祝周:《青木周藏一明治外交の创造》,东京,1989。
3. 部分论文

西文论文

Barrett, John, 'America in the Pacific', in *The Forum, vol*. 30, December 1900, pp. 478—491.

Beach, H.P., 'The Anti-Foreign Uprising in China', in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vol. 23, September 1900, pp. 659—668.

Bevan, James A., 'From Filipinos to Boxers in 1900', in *The Leatherneck*, vol. 18, No. 4, April 1935, pp. 5—7, 65—66.

Brandt, Max vo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Independent*, vol. 53, March 14, 1901.

Campiche, P., 'Notes sur la carrière d'Auguste Chamot', in *Revue historique vaudoise*, March 1955.

Carroll, H.K., 'Protection for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Gospel in All Lands*, July 1900, p. 335.

Chalfant, F.H., 'An Argument for Indemnity', in *Chinese Recorder*, vol. 31, November 1900, pp. 540—542.

Ch'en, Jerome,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xer Movement-a Morphological Study',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3, no. 2, 1960, pp. 287—308.

Cole, H.M., 'Origins of the French Protectorate over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1940, pp. 473—491.

Colman, Fl., 'Des congolais agrées à la légion chinoise de 1900', in *Les Vetérans coloniaux*, March 1949, pp. 30—31.

Cornaby, William Authur, 'Forty Facts from China', in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vol. 23, November 1900, pp. 849—852.

Denby, Charles,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of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Forum*, vol. 30, October 1900, pp. 161—171.

'The Missionary Question in China', in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vol. 23, October 1900, pp. 769—774.

The world, 'Partition of China and Rights of Missionaries', in *The Independent, vol. 53, January 24, 1901.*

Doyle, A.P., 'The Crisis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s', in *Catholic World*, vol, 71, July 1900, pp. 548—554.

Dubose, Hampden, 'Are Missionaries in any way Responsible for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in China ?', in *Chinese Recorder*, vol. 31, December 1900, pp. 606—617.

Duchesne, A., 'La dissolution de la Légation belge de Chine', in *Carnets de la Fourragere*, 1950, pp. 193—216, Brussels.

Carnets de, 'Les aspects diplomatiques du projet d'expédition belge en Chine en 1900', in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vol. XXXII, n.1, 1954, pp. 77—96.

Grinevich, P., 'Bokserkoe Vosstanie', in *Problemi Kitaia*, vol. 13, 1934, pp. 242—275.

Jansen, Marius B., 'Opportunists in South China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in *Pacific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20, 1951, pp. 241—250.

Kurgan Van Hentenrijk, G., 'La mission Fivé 1898—1900', in *Mededelingen der Zittingen van de Koninlijke Academie voor Overzeese Wetenschappen, 1962*, pp. 1001—1036.

Lichtervelde, Baron de, 'Il y a cinquante ans...Comment l'envoi d'un bataillon belge en Chine ne fut qu'une vélléité san suite', in *Bulletin de l'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vol. XXI, 1950, pp. 883—886.

Morrison, G.E.,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in *The Times* (London), October 13 and 15.

Morsey, Rudolf, 'Die deutschen Katholiken und der Nationalstaat zwischen Kulturkampf und Erstem Weltkrieg', in *Historisches Jahrbuch der Görres-Gesellschaft*, vol. 90, 1970, pp. 31—64.

Muramatsu, Yuji, 'The Boxers in 1898—1899, the Origin of the I-

Ho-ch'üan Uprising', in *Annals of the Hitotsubashi Academy*, vol. 3, 1953, pp. 236—261.

Myers, Captain John T.,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Defenses of the Siege of Pek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02, pp. 541—551.

Orlov, General N. A., 'Srashenie pri Onguni', in *Istorichskii Vestnik*, vol. LXXXIV, 1901, pp. 137—162.

Popov, A., 'Dal'nevostochnaia politika tsarizma v 1894 – 1901 gg', in *Istorik Marksist*, vol. 3, 1935, pp. 35—37.

Reid, Gilbert, 'American Opportunities in China', in *The Forum*, vol. 27, 1899, pp. 237—242.

Reinsch, Paul S.,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The National Uprising against the Foreigners', in *The Forum*, vol. 30, 1900, pp. 67—75.

Rockhill, William W., 'The Impending Partition of China', in *Collier's Weekly*, 1900, pp. 3—5.

Sheffield, D. Z., The Siege of Peking', in *Chinese Recorder*, vol. 31, 1900, pp. 512—515.

Smith, Arthur H., 'China a Year after the Siege in Peking', in *The Outlook*, vol. 68, 1901, pp. 969—975.

'Eight Months of Parleying in China', in *The Outlook*, vol. 68, June 1901, pp. 440—444.

Smith, Judson, '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in *Missionary Herald*, vol. 96, May 1900, pp. 188—190.

Van de Elst, 'Léopold II et la Chine', in *Revue générale, vol. CXI, 1924*, pp. 410—437 and 590—597.

中文论文

陈贵宗:《义和团是否反封建?》,《史学季刊》,卷 2,1983。

程歗:《关于义和团源流研究的几点体会》,《义和团研究会会刊》,卷 1,1983。

程歗:《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卷2,1983。

陈振江、李喜所:《真假义和团辨析》,《南开史学》,卷2,1982。

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文史哲》,卷1,1981。

顾颉刚:《关于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民间文学》,卷4,1958。

侯斌:《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研究会会刊》,卷2,1983。

李德征:《论袁世凯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义和团运动研究论丛》,1982。

李德征、丁凤林:《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卷1,1981。

李宏声:《毓贤与山东义和团运动》,《山东史学月报》,卷5,1980。

李文海:《论义和团的纪律》,《近代史研究》,卷4,1980。

李文海:《义和团"扶清"口号的两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年2月8日。

廖一中:《义和团运动》,《中国历史学年鉴》,1983。

廖一中:《略论天津义和团运动》,《天津史学月报》,卷5,1980。

廖一中:《论载漪》,《天津史学月报》,卷4,1983。

林华国:《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卷1,1981。

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卷2,1982。

戚其章:《义和团评价中的不同见解》,《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5日。

戚其章:《义和团与八卦教》,《齐鲁学刊》,卷5,1981。

戚其章:《赵三多与义和团》,《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

孙石月、宋守鹏:《毓贤与山西义和团运动》,《山西师院学报》,卷4,1982。

孙孝恩:《试论义和团时期的光绪》,《北方论丛》,卷5,1981。

涂鸣皋:《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社会科学研究》,卷5,1982。

王彬:《谁烧的大栅栏?》,《北京晚报》,1982年10月9日。

王纪河:《义和团运动在直隶》,《河北师大学报》,卷4,1982。

王守中:《巨野教案与德占胶澳》,《东岳论丛》,卷5,1983。

王守中:《梨园屯教案浅谈》,《历史教学》,卷11,1983。

王希隆:《董福祥事迹述评》,《甘肃社会科学》,卷3,1982。

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卷1,1980。

吴金钟:《反洋教运动与余栋臣起义讨论》,《社会科学研究》,卷5,1982。

武育文等:《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社会科学季刊》,卷4,1980。

徐绪典:《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文史哲》,卷2,1983。

杨树华、韩居乐:《廊坊地区发现义和团乐曲》,《河北日报》,1983年3月23日。

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文史资料》,卷120,1983。

郑永福:《评聂士成》,《史学月刊》,卷4,1981。

周海青:《大刀会及其反洋教斗争》,《齐鲁学刊》,卷5,1981。

庄建平、朱金甫:《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清史研究集》,卷2,1982。

4. 未刊博士、硕士论文选

Ford, Andrew T., *The Diplomacy of the Boxer Upris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1.

Ford, Harold, *Russian Far Eastern Diplomacy, Count Witte and the Penetration of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0.

Glatfelter, Ralph Edward, *Russia in China, the Russian Reaction to the Boxer Rebellion*,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5.

Glickert, Robert Winslow,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the Boxer Rebellion*, M.A. thesi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38.

Lindbeck, John M.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1898—1901*,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48.

Rosenbaum, Arthur L., *China's First Railway : The Imperial Railways of North China*, 1880—1911,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72.

Siegler, Sylvia H., *Imperial Servant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Claude MacDonald*, Ph.D. dissertaion,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1975.

5. 部分报刊

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ats-Anzeiger(柏林)

Berliner Tageblatt(柏林)

China Recorder(上海)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海)

Collier's Weekly(纽约)

Corriere della Sera(米兰)

Deutsche Asiatische Worte(青岛)

L'Echo de Paris(巴黎)

The Economist(伦敦)

L'Etoile belge(布鲁塞尔)

Le Figaro(巴黎)

The Forum(纽约)

Frankfurter Zeitung (法兰克福)

Le Gazette(布鲁塞尔)

The Independent(纽约)

Istorichskii Vestnik(圣彼得堡)

Istorik Marksist(莫斯科)
Kölnische Volkszeitung(科隆)
Kölnische Zeitung(科隆)
The London Gazette(伦敦)
Le Matin(巴黎)
Le Messager de Bruxelles(布鲁塞尔)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The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上海)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上海)
L'Osservatore Cattolico(梵蒂冈)
The Outlook(纽约)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天津)
La Petite Républic(法国)
Le Peuple(比利时)
Problemi Kitaia(莫斯科)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安纳波利斯)
Il Secolo(罗马)
申报(上海)
Le Siècle(法)
La Stampa(都灵)
Il Tempo(米兰)
Le Temps(巴黎)
The Times(伦敦)
中外日报(上海)
(二) 中日文书目
(1) 中文书目(近100种,略)
(2) 日文书目(10种,略)
(三) 所引文章
(1) 西文80篇

(2) 中文近 100 篇

(四) 未刊西文博士、硕士论文(各地收藏),8 部

(五) 报刊杂志,中西文字 40 种